

司馬璠著

鬥爭十八年

著 璐 馬 司

年 八 十 爭 鬥

版 再

版 出 社 版 出 洲 亞



亞洲出版社

銅鑼灣怡和街八十八號

營業要目

歡迎各界惠顧指教

出版圖書刊物

代售中外圖書

經銷歐美文具

發售體育用品

歡迎讀者免費閱覽

856.9

8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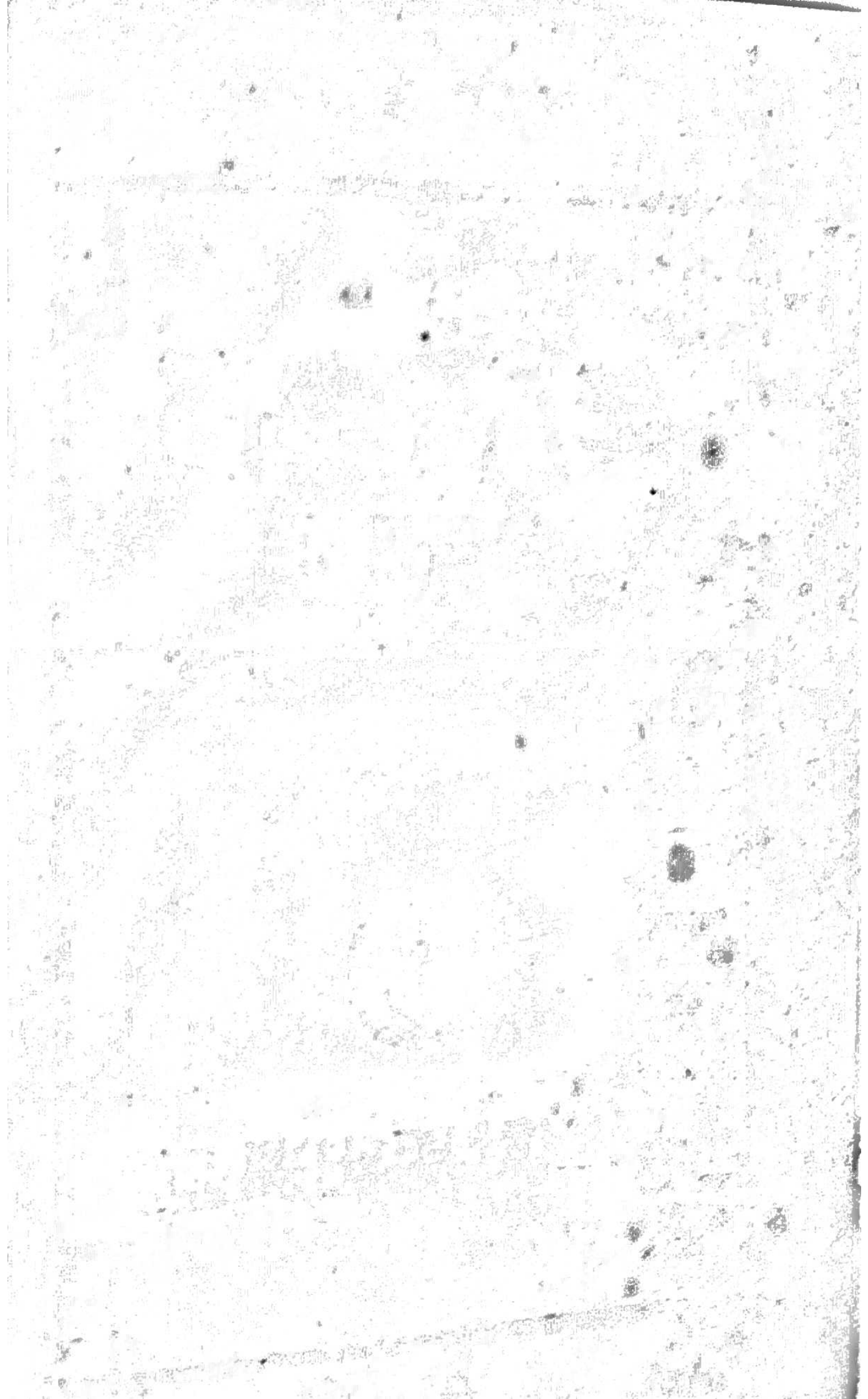
鬥爭十八年

司馬璐著



亞洲出版社出版





目次

胡秋原先生序	一
自序	一三
第一章 革命暴風雨的開始	一
第二章 正式成爲一個共產黨員	二七
第三章 延安「朝聖」	四七
第四章 聚園地工訓練	六九
第五章 「女人到那裡都是一樣」	九一
第六章 捲進黨獄	一〇九
第七章 抗日遊擊生活	一三一

第八章	懷疑是否罪惡？……………	一五七
第九章	我毀滅了我的朝鮮友人……………	一七三
第十章	血腥的皖南浙西地下鬥爭……………	一八七
第十一章	「野百合花」的啓示……………	二〇五
第十二章	「中間路綫」的摸索……………	二二九
第十三章	抵擋「靠攏」的狂潮……………	二四三
第十四章	爲民主中國堅持奮鬥下去……………	二七五

胡秋原先生。序

司馬璐先生將他一生黃金時代的生命，陷入赤色地獄，又終於衝決羅網逃向自由世界的經過，寫成這本「鬥爭十八年」，囑我作一序文。我似乎不能推辭。第一，就公言，我是目擊這一代青年相率墜入赤色陷阱，並且久已看得甚爲驚心動魄之一人。第二，就私言，我認識此一可怕的經驗的作者，至少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

先由第一點說起。我在民國十年進入中學。這正是五四運動第三年，亦中共成立之一年。當時中學生看課外書的機會與熱心，也許較今日爲多。一時的新書刊，我會盡力閱讀。所以我還記得當年青年圈內的情形。俄國人在中國組織中共，除了用直接財政方法外，主要是靠中共之在青年中徵取後備軍的，他們進行此一工作，主要是靠幾條運河：一是馬克斯主義之宣傳，二是俄國文學的翻譯，三是利用並挑撥民族運動，第四則是利用國民黨「合作」來掩護的。所謂共產主義，形式上內容上都是「俄國主義」。他之所以能在中國播種，首先還是靠民國十二三年蘇俄的親善姿態（所謂放棄特權），並高唱「反帝

而來的。不過，五四以後五年間，雖然有馬克斯主義之宣傳，和共黨書報之傳佈，在一般青年中，不過有此一說而已。國民黨改組以後，一時國共不分。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及北伐之進展，共黨才得到大發展。民國十四年我進大學。那時青年很注意國民黨，對共產黨十分生疏。新的「新青年」、「响導」、「中國青年」之類；銷路遠不及「語絲」、「現代評論」之類。郭沫若之流辦「洪水」還氾濫不起來。大約是年漆樹芬「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出版。在北伐軍到武漢時，影響足抵得百萬傳單和四年共黨宣傳之總和。他似乎並非共黨。其書前面還有吳稚暉先生序文。我即是因此書對馬列主義發生興趣的。北伐軍到武漢後，表面是國民黨，實際是共產黨。然其無能與惡劣是驚人的——但比今日共黨，文明得不可以道理計了。而我也正是因為看見共黨較早，才一直對他難感興趣。此時共黨除了「帝國主義大矛盾」外，亦無其他理論。最高譯著是一本哥列夫「無產階級哲學」，波格達諾夫「經濟科學大綱」，李季譯著之「通俗資本論」和「馬克斯傳」。「辯證法」三字，很少人知道。不久武漢政府崩潰。民十七年我到上海讀書。當時共黨等於解體，毛澤東在當草寇。可是，武漢下台的人都在上海從事文化運動。這是共黨第二度的播種。但影響還小得很。「新生命」書局的書，倒很流行。成仿吾之類在講「布爾喬亞記」，「普羅列特利亞文學」，「印貼利更追亞」，「奧伏赫變」之類，還被笑爲「天書」。以後我到日本。九一八前後，「神州國光社」出版「讀書雜誌」，有「社會史論戰」，一時讀者極多。我當時參加寫文章，也大講馬克思主義。我和我的朋友所講的，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有推波助瀾之處，但另

一方面，對俄國共產主義，亦有反抗之處。由於日本的侵畧，蘇俄、馬克斯主義之類，才頗爲人所注意，共黨對「一二八」原是破壞的。後來轉變政策，也談「抗日」，影響漸漸增大。但據我當時在上海教書的經驗，大部分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以及蘇俄之類雖然注意，不算熱心。一般教書的人，寫作的人，亦復如此。不過他的壓力，已隨日本侵畧之深入而增加了。不久我到歐洲和俄國。我的思想完全一變，認爲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根本要不得了。不過當時共黨高談抗日，我還認之爲友。民國二十五年我到巴黎。這時有幾個因抗日問題到歐洲來的教育界中人。其中有一女學生。據說她會參加「一二九」的示威，曾因水龍「受傷」。共黨即捧之爲「中國貞德」。她似乎也自居不疑。以後她成了共黨一名小間諜。（現在據說是一位大共幹的太太，而且專管國際婦女運動了）。我當時很爲她難過。我覺得她「被破壞了」（Spolied）。因爲很可造就的青年，不應當這麼未成即加濫用的。由她推想到國內的青年，會使我十分寒心。當時政府的應付固然不够，而共黨的作法，也太不擇手段了。抗戰以後，我由美返國。我發覺中國變了。過去聽我講馬克斯主義還不明白的同事，聽說我主張資本主義，將信將疑，特來質問。我承認後，他立刻就走。一位青年作家主張「新啓蒙主義」，因爲看過我從前的文章，特來討論。聽見我說唯物辯證法根本不通，幾乎呆得說不出話，我接觸一些青年，他們個個馬列，人人唯物辯證，而且都懂得共黨「八一宣言」中的句子。我才感到四年之間，青年變了。大多數「被破壞了」。

就我親眼目擊的經驗，中共之再組織，是利用了九一八事變；而青年之大破壞，是所講「華北事變

「和「一二九」以來之事。這是中共利用「抗日」「愛國」掩護共黨宣傳組織之成功（這自然是所謂「救國會」「生活書店」的大功勞）。赤色之火，固以共產主義爲火種，但如非利用民族主義之風，還是不能燎原的。「一二九」到現在十七年，當時二十左右的青年，今年三十五歲左右。這是今天中共中層幹部材料的主要來源。我當時十分驚奇，何以一個在埋頭準備抗戰的政府，一個天然代表民族主義的政府，竟沒有能在思想上把握青年，並且授人以柄。我深知問題之嚴重。國民黨中也不是沒有了解的人，但爲數似不甚多，而且很難不用他們的老架子。共產黨的影響日益擴大。有一次我在重慶參加一個所謂作家集會。席上有一小姐甚爲漂亮。旁邊一個男子，狀亦不惡，身上裝一件高加索襯衫。這原是很難看的。我認識這東西，所以隨便問了一句，「高加索的襯衫」？他看見我識貨，十分高興，說，「一個朋友從蘇聯帶回送我的，可不是？」那表情有如小孩受到鼓勵，連他的女朋友眼中也射出高興的光輝，以她的「愛人」能得到一件俄國寶貝而自豪，再看他們手上，一人一本高爾基。（那男的是一位共黨的「名詩人」）在二十年代，時髦青年有的長髮大領結，活像巴黎藝術家。在三十年代，則非「諾夫」「斯基」之書不讀，滿口馬列辯證，研究「拉丁化」「大衆語」，認莫斯科是人類天堂的。這便叫作「左傾青年」。風氣既成，老頭子也變了。一位老友，原來教中國文學史，充其量談談「幽默」。一天相遇頃談，竟大談政治，而他的政治，即認中國必走共產之路。其他講哲學史的，也一定要談「封建社會」，「上層建築」之類，表示進步。共黨利用抗日救國之名（實際上既不抗日，更不救國）拐騙青年，

二十年間，一批一批的，跳進赤色地獄——他們還自以為進了天堂——而此書的作者，也即是這情形下，排隊入場的。

當時我對這一傾向，十分憂慮而且傷心。好多朋友要我出來大聲疾呼。我常常說，「青年都破壞了，說不通的」。同時，政治情形之趨危，也是可想而知的。從漢口到重慶，我辦一人的報紙刊物，盡我一人之心。我不參加一切有組織活動，維持所謂「超然態度」。我講我一人的話，雖然還是無法說得中分明而痛快。我深知抗戰必勝，但亦深知俄國不可測，而不測之禍，必起於東北。民國二十九年，我在參政會提議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我的用意無非因為根本問題甚為難談，（因為俄國當時是「友邦」）希望能將一般目光，逐漸引到東北。（後來我主張建都長春，及在勝利前演講滿蒙問題賣票，用意均在於此）但當時負責答復的一位大官竟說「如這樣做，將騰笑列邦」。肉食者雖說難談，但在朋友間，在文字上，我有時還是力言韓國問題不可忽視。一天幾位朋友和我開玩笑，派我做「韓國大使」。嬉笑間，看到報上有「韓國臨時政府」因開國會吵架，雙方互相攻訐的廣告，我提議大家寫信勸告，立刻信就寫好。簽名者有已死的老新聞記者孫幾伊先生，以及現在台灣的詩人成惕軒先生諸人。此信去果有效，三日後，「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出面請我們吃茶，表示感謝，並說他們已接受忠告而合作了。後來他們問我還應怎麼辦，我勸他們成立「中韓文化協會」，後來也成功了。正在此時，有一個老朋友先「革命」，後作官。失意後，一時會在四川活動，當時閉門家居。靜極思動，說要組織「東方文化

協會」，前來看我。他雖然不一定了解東方問題，但我想無論動機如何，事總是該做的。如是我到他家中，因此，第一次認識了本書的作者。（那個朋友已經死去了。）

我記得第一次的印象，是一短小，黑制服，面貌不算漂亮的青年，但有一雙很INTELLIGENT的黑眼睛。我對政治並無目前目標，所以對他的經歷，從未注意。由於我與「東方文化協會」，「中韓文化協會」以及當時相當活躍的「國民外交協會」有點關係，我們見面四五次。我看他似乎很活動。我偶而也奇怪何以一個二十幾歲的人，不去趕「中蘇」「中美」的熱鬧，對這冷門有興趣，但也沒有仔細推求。有一次他還要我寫文章。我順便問了兩三句話，我感到他屬於「左傾類」。我當然沒有寫，對他也就不求甚解。離開重慶後，我不記得見過沒有。直到民國三十九年春天，我正為陷在內地的家人焦灼。和朋友一道，在九龍鄉下開了一間洗衣店，在香港開了一個貿易公司，與內地通信，常到香港。我們忽然在尖沙咀遇見了。他告訴我是剛由內地出來的。我既了解他以前有點「左傾」，就問他為什麼要出來。他表示對共黨失望。我當時很高興。這是共黨再騙不了青年的徵象。我記得他當時問我香港有些什麼運動，今後應該如何。我只答復說：應該多多使你這樣的人轉變，使共黨黨員轉變。我未想到，他過去就是一個中共地工！

後來，我遇到黃震遐先生①談到他。黃先生對他在上海的活動甚為熟悉。於是我想找他談談。不日卜少夫先生②告訴我，他做過「中共地工」。我就更想談談。後來我們常見面，知道他由共黨到反共的

斷片。如大家所知，一二年來，他對反共文化運動會盡了很多的力。他現在將他個人出入赤色地獄經過報告出來。我目擊一代青年跳入地獄。我能概念的了解青年淪陷後之悲慘。但我沒有這一類經驗，不能切身的形象的了解其中的悲慘。我由若干朋友斷片的報告，歐美人和俄國人的報告，知道許多的情形，但一個可靠的朋友親身經歷的書面報告，還以作者爲第一個。在中國出版界，像這樣一本最深刻最生動的著述，也還以作者爲第一個。他報告：如何由一個普通愛國青年，變爲中共手中玩弄的工具，受盡折磨；如何在一入魔掌之後，如受了魔法的人一樣，無論如何痛苦，依然忠心服貼，毫無怨言；如何對共黨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仍須受共黨陷害，疑忌，而又一面陷害一面利用；如何人性不滅，終於有所覺悟，但因對現實不滿，在思想上仍不能脫離共黨牢籠，不斷找各種理由，安慰自己，爲共黨效力，可是仍得受共黨的迫害；如何被共黨認爲有一分地工價值之時，還得勒索「剩餘價值」；而幸而是理性也好，愛情也好——即使是退色的，終於使他走到香港。而據我所感到的，即使他到了香港，決心反共之後，有一時期，還是有點所謂「狄托傾向」；在思想上，文體上，還不能脫盡共黨之餘臭。——這是必然的。而現在，作者是完全得到精神之獨立了。他已經是一澈底的自由主義者了。他的經驗，是悲慘的，雖然現在也可說是幸運的。

他的遭遇，不是他一人的遭遇。三十年來，我看到許多朋友，許多年長的和年青的，相識的與不相識的，一批批的「志願」的跳進地獄。還將是幾十萬幾百萬人乃至上千萬人。而今天又有幾百萬幾千萬

的青年被強迫進地獄。他們的命運呢，一半比作者更壞——即是毀滅。十分之一，可能好一點，即是因為殘忍無恥，尚能發揮其「本能」。另外十分之四，大體上或者與作者類似罷。必明乎此才了解作者之書，是一代的悲劇，一代的控訴。這不是「紅樓夢」的悲劇。這是「黑牢之夢魘」的悲劇。這不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而是俄國利用中共強姦三十年來中國青年男女純潔靈魂之可戰慄的黑黑犯罪之一頁！

由此，大家可以對中共犯罪的特點有所了解。這些罪是一個三部曲。首先，他用愛國之名，利用青年喜歡活動和冒險心理，佈置網羅陷阱，拐誘捕獲青年。其次，入彀以後即以神話教條灌輸蘇俄必勝共黨必成迷信，同時以「鐵的紀律」，訓練奴役和服從並試探服從的程度；如是，就已經變態了。這時候，他又使青年與社會一切關係切斷，使其不能回到正常社會。最後，才是不顧一切的使用，踐踏，以革命為名，男盜女娼，赴湯蹈火，冒險犯難，殺人放火，賣友殺親，乃至「抗美援朝」，無所不至。而目的只有一個，將中國完全亡給蘇俄，送給蘇俄。而一般青年便半醉半醒的幹這一切，即令有時神志清醒，也無可奈何了。老實說，這情形好像鄉下姑娘進城，追求她們的理想，但遇到騙子，人販子和鴉婆的掙腳，迎合她們幼稚心理，終於納入牢籠。共黨訓練利用其黨員的方法，也完全是人販子對豬仔的辦法，鴉婆對妓女的辦法，不過又進而以豬仔妓女裹脅天下之人，而目的不僅在謀財而在賣國而已，人販鴉婆之總公司，是克林姆宮，中共不過是其中國的分公司而已，共黨誠然可惡，但作者說他們可憐，也是

確實的。

說到此處，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犯罪是不是能够阻止的呢？我以為是可能的。不過共禍如洪水，必由禍源治，於未然治。由禍源治云者，是一文化問題。這要追溯到中國近代文化之衰落，我已在其他地方說過。未然治者，我可指出二點。一是有關中國政府的。抗戰初期，政府威望空前提高。那時有辦法，共禍可能不會發生。而終發生者：第一，政府執政的人，對共禍確是有敏感的，可惜是只有消極方法，缺乏積極的方法，在政治上固根本結民心的方法。尤其是當時言論之尺度，只是爲共黨利用，而其他守法的人要由自由民主觀點批評蘇俄共黨，反而是不大自由的。第二，到重慶後，通貨膨脹與統制經濟政策互相促進，將整個中產階級基礎掘崩，因而使公教人員解體。第三，由雅爾達協定而起的外交之失敗。第四，勝利後之接收。第五，到了三十六年，是一決定關頭，除非國內外有澈底的大變化，即已很難阻止共禍之擴大了。而這一切原因自在忽於不斷擴大基礎，暢通活力源泉，增益生機和知慧；遂不免發生「既得利益階級」，離開民衆，錮蔽聰明；於是乎在根本上並非一種健康狀態。於是乎，政府與知識份子之距離愈來愈大了。但是，其次，中國知識份子並非絕無責任。就我所看到的，抗戰開始時期，我國教育文化界已表現一種衰落和僵化狀態，由於這一原因，一般知識份子的道德的勇氣，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也還要受到知識份子圈內的影響。因此，抗戰時期思想上沒有一個蓬勃的國民反共運動，抵抗俄國人的拐騙運動。我不願將話說得過於明白。我指出一事，即五四以來，我國教育學術界亦

有一種有如政治上「既得利益階級」之支配勢力。他們能爲新舊之爭，但成就不一定與其應有的成就相符。他們也有自保之壁壘，但這壁壘不一定能防共。抗戰以前，我不清楚，抗戰以後，我知道有許多人，論其學問，不比許多教授差，論其文章，不一定比許多編輯差，但不一定能得一正當生活因而使用其能力機會。這般人是能反共的。但結果或者佯狂自放，或者抑鬱而死，或者折磨得成爲廢人，或者憤而唱點左傾調子，即令有一生活機會，那生活狀態亦與上述結果相差不遠。這一般人，今日大都關進鐵幕中了。我還要指出一事，至少抗戰以後，并非無人看到共禍之危機，感到應有作爲之責任。然要想對抗共產思想運動，不是辦一刊物所能了事，必須有一廣大社會政治運動才行的。據我所知，決非無人想到這一點，也並非無人有此志。我個人雖然交遊不廣，確實知道有許多朋友，有意發動一種自由民主的反共運動，我會多次被徵求意見。此足見中國並非無人。我慚愧我對這類計劃和運動，不會積極熱心過。我的理由是：一，政治環境不適宜；二，「青年被破壞了」；三，也許主觀準備還應充實一點才好。最後一點，乃指智識界本身相互間道義心不够而言。今天大家固然非反共不能生存，當年反共並不比不反共容易。如是蹉跎，而紅潮至矣。我痛感於第二點，戰後會回家辦一中學。痛感於第三點，便不爲天下先，而許多朋友也因此消極下來了。今日看來，我躊躇固由以上三種事實，而愛惜羽毛之意，是無疑的；而這畢竟是責任心之不足，也是無疑的。知識份子消極之後，政府要孤立，社會更真空，共產便非成功不可了。我說這事實，不是說我所知道或不知道的許多朋友，當年如能早日有一反共運動，即有何決定

結果。雖然因爲人同此心，如我知道有很多人有此意，則其他有此意者自然還不知多少，如能團結努力，一切的力量不會白費，也是無疑的。我的意思是：今後自由中國的政府和知識份子，必以往事爲鑒。

第一，根本之事是政治爲了本身之健康，總必須擴大基礎，容許競爭，促進新陳代謝，培養人才和青年。培養學術和文化，而這均必須以自由思想言論爲根基。第二，五年十年後的收穫，必須在五年前十年前播種。三，必須了解沒有成千成萬上十萬有思想有才能的新青年，無法救幾百萬「被破壞的」青年並重建我們的國家。四，一切反共的人才能力，必須集中，必須合作，必須互相扶持，知識份子必提高其志氣，責任心，和道義力。五，今日之事，但求反共，不論其他。自由中國的政府及各方反共人士應以此標準求大團結。六，這團結不僅應擴張到大陸，而且應擴張到共黨內部。因在共黨之內，像本書作者的「人，也是成千成萬的。七，而一切知識份子在此義無反顧之時，應排除一切顧慮，爲反共而團結，而思想，而著作，而教授，而互相扶持。知識份子消極不得的。

以上在對一書作序而論，似多爲題外之言，但我相信，對於了解作者所說的故事的背景，意義和教訓，或者不無一點幫助，作者的故事，不是一人的故事，一時的故事；不是浪漫斯，也不是所謂「美文學」，這是一大謀殺案，有史以來最大的謀殺案——百萬千萬無辜青年之靈魂肉體被強奸和謀殺的大慘劇。正因爲中國優秀青年被謀殺了，所以國家在大陸的命運也就斷絕了。本書作者個人雖然獲得新生，然在大仇未復之前，他一定是悲憤的。我看到這一謀殺的進行，未曾大聲疾呼，也願意表示痛心。今日

我們唯有大家起來向俄帝及其劊子手的中共索命，索民族之命，千萬青年之命，並解救那些一息尚存的共黨青年之命。如作者所說，共黨是可憐虫。那是被俄帝盡情强奸蹂躪，强奸復蹂躪，蹂躪復强奸……然後折騰糟踏而死的一種永恆謀殺過程中的犧牲者——而這一謀殺機器的招牌，即名曰「馬列主義」「鐵的紀律」。在道義上，我們的抗俄反共戰爭，不是仇共戰爭，乃是救共戰爭。因此，這一本書，無論對共黨與反共黨，都有重大的意義。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七日明星稀之夜胡秋原揮汗記於燈下

作者附註：

- ◎胡秋原先生，中國權威文史學者，著作甚豐，其最近代表作有「中國之悲劇」，「中國文化與中國智識份子」（即將在亞洲出版社出版）等，現任中華民國政府立法院委員。
- ◎黃震遐先生，中國權威的軍軍評論家，邊疆問題專家，現任香港時報主筆。
- ◎卜少夫先生，名記者，現任新聞天地社社長。

自序

從民國二十四年我參加中共的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我整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鬥爭了十八年！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在鬥爭中成長；也在鬥爭中，繼續摸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中國是不幸的，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尤其不幸，我們都還在應該受基本教育的年齡，都還剛踏進這個社會，我們就被捲入了政治的暴風雨中。

我們熱情奔放，動機純良，以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尋求改革中國的圖案。

但是，在一個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國社會中，青年在思想上沒有正常的出路。於是，一陣風暴，就把我帶進了中國共產黨。

這書中所寫的，是我個人所遭遇的悲劇，也是我們這一整個時代的悲劇，我們這一代多數青年的悲劇。

等到我掙脫共產黨的魔掌以後，我苦悶彷徨了好一陣子，什麼中間路線呀，和平運動呀，「民主人

士」呀……，這些，又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一整個時代的悲劇，我們這一整數讀書人的悲劇。

這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報告，我控訴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們前面。

歷史的脫離不遠，悲劇是不容再演的。

十八年了！

我參加中共，是爲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同樣，我脫離這個殺人犯的集團，也是爲了中國人民的希望

我繼續在摸索！

我繼續在鬥爭！

爲了國家的改造，爲了中國的新生，爲了人民的希望。

共產黨人罵我是黨的叛徒，我要問：

是誰背叛了國家，是誰背叛了人民？

在共產黨人的邏輯上說，整個歷史是一篇大謊話。僅僅爲了某一個時期的政治目的，他們才搬出一套欽定的偽造的歷史。他們把竄改歷史，看作是兒戲，毫不引爲羞恥。一部黨的欽定的歷史，也要常常經過一變再變——適合一定時期的情況和領袖的需要。奉命寫黨史的人，都要隨時準備以身殉黨。何況

我這種對黨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們自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一句不認賬。他們以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蓋天下耳目。但是，比較老一輩的中共黨員，或者當日和我共過患難的一批同志，假如他們還健在活着，天良並未完全泯滅的話，他們是應該為我這本書中所控訴的一切挺身作證的。

一部共產黨的歷史，全部是在這血腥的基礎上寫出的。

共產黨人的心胸狹窄，多疑，小氣，刻薄，殘忍，豈非偶然？此之謂他們的「黨性」。倘使他們不如此，就是一個不够成色的共產黨員了。因為這一切特點是與他們黨的整個組織精神和黨的組織生活分不開的。

鐵幕之內有無數的小鐵幕，每個人被束縛在一個小天地中。

他們要和他們以外的世界鬥爭，他們又要隨時提防自己的同志或每個人藉打擊別人陷害別人來防衛自己，甚至於喪天害理，去殺害自己的父母妻兒，黨鼓勵這種罪行謂之「無產階級的道德」。這種殘害人性的罪行，在黨的領導者有一套邏輯，因為毀滅你的親人和一切所有的社會關係以後，謂之「摔包袱」。當你的一切倫理的社會的包袱摔了以後，你的政治包袱就愈措愈重了。這時，你就僅認識一個主子——組織和領袖。死心塌地的為組織為領袖賣命了。

再說，多數青年根本不懂得什麼主義，他們多半是接觸了一兩句口號被騙上鈎的，青年們上鈎以後，黨就全靠要用「紀律」「恐怖」來維持他的組織了。

當年俄共建黨的時候，列寧和馬爾托夫主要的分歧就是如此：馬爾托夫主張要使人人了解馬克思主義。列寧則主張，不管他們了解不了解，首先要建立一個軍事化的黨。結果是馬爾托夫書生式的見解失敗，列寧就從事「軍事化的黨」的建立，實行的是「募兵制度」，就是列寧所常說的「我們需要的是職業革命家」。「募兵」的方法是「誘騙」，而一入組織以後，就祇有「絕對服從」了。

共產黨在黨內外不斷進行「細菌戰」，這項「細菌戰」就是所謂「思想問題」，思想鬥爭像細菌一樣鑽入到你的全部生活中，每個黨員隨時在遭受死亡的威脅，有時像「人海戰」一樣一大批一大批地死去。下級黨員如此，中級幹部亦復如是，甚至黨的最高級的領袖亦莫不是這樣。誰能夠掌握住組織的機器，誰就可以搖着旗子，自稱代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鬥爭清算別的同志，殘殺別的同志。

進了共產黨這個迷魂陣以後，有的人一覺醒來，已經昏昏沉沉，半身不遂，大小腦已被「細菌」吞噬了一大半，因此祇好麻木的混下去。有的人更殘忍的向別人身上尋找報復，報復循環，鬥爭不絕。誰也不能保證，今天我不把你「鬥」掉，明天你會不會「清算」到我身上來。

共產黨人提倡這種吃人的哲學，而且他們依靠這種吃人的哲學生存。

在那些「靠攏」的人士中間，或許也有少數有懷抱的人，祇是由於他們根本不了解共產黨，一錯到底。他們最初或者不過以為和共產黨人僅僅是「合作」而已。但是，殊不知，在共產黨人的邏輯中，「

合作」就是「鬥爭」，「服從」或者「死亡」，兩條路任擇其一。在一個「軍事化的黨」前面，你能對他們要半點花槍嗎？共產黨對他們用的是最原始的刑法，像拖屍一樣的把他們拖着走。他們起初也是上了共產黨人口號的當，等到一進入這個鬼門關以後，共產黨人的笑容收斂，臉孔一沉，對不起，黨的策畧已經改變了。朋友，誰和你們是朋友呀！

在本書中，我反覆的說，我絕不爲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辯護。但是，我要公道的說一句，一個人當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往往並不覺得自由的可貴，等到連這一點自由也喪失以後，才發現到自由的價值。

大陸變色以前，許多讀書人整天爭爭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爭高下。等到共產黨人把他們一個個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祇好服服貼貼，我不能說這是「自由」的錯誤，而是說，我們任意糟塌自由，不善自運用自由，就無意間做了共產黨人的幫兇了。

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自由和進步是分不開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產黨人要綁我們的手足，就要毀滅我們的自由生活，我們要衛護我們的自由，不要糟塌我們的自由，我們要爭取擴大和提高我們的自由。

自由世界和共黨之間是沒有中間道路可尋的。

共產黨人是不可妥協的怪物。

或者，如果我們糟塌自由，不求進步，敵人就會毀去我們。

或者，更進一步提高和發揮自由的威力，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掃蕩挖淨共產黨的禍根。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七日司馬璐序於香港

第一章 革命暴風雨的開始

我出生在民國八年，這一年，正是五四運動。中國掀起偉大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與青年運動，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提出「科學」與「民主」，爲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廣濶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軍閥的統治，這些軍閥爲了剪滅異己，鞏固自己的勢力，不惜賣國媚外，換取帝國主義的借款。巴黎和會中，中國雖以戰勝國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却同意以山東的全部利益轉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民氣義憤填膺，在北平知識份子的倡導下，如火如荼的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的爆發。

當時在廣州的護法政府是一個革命性的政府，全國人民也對他們懷着熱烈的希望，可惜他們並沒有很好的來領導這個運動，和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結合起來。而不久之後，許多舊日參加五四運動的國民黨人大都熱心「從仕」去了。可是這時候，正當俄國革命的初期，列寧正密切注視中國革命的發展，對

於中國內部的動亂一點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後，中國舊文化的基礎動搖，「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沒有能够及時接應得上，而共產主義的毒菌，却在這時侵入了這個孱弱的病體，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他們以革命的外衣，盜取了五四運動的光輝，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悲劇就這樣開始了。

我出生的地點是江蘇蘇北泰州的一個大鎮——海安。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間，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門前的一條河流和屋後的一座小山。

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庭院好玩，也進不起學校，爬山和嬉水就成爲我們日常的功課了。

這條河，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運鹽河，兩岸是蘇北魚米之鄉，出產豐富。但是農民却終年過着悲慘的生活，災難頻仍，每當收獲的季節過後，農民們首先要將他們的穀物償付高利貸，壯年男女就丟下家，到上海去幫工打雜。我們眼看着糧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從這條河流運出我們的家鄉，而換來的却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這些，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傳運鹽河的兩岸，從前都是鹽場，我們的家雖然距離海邊祇有六十華里，但是我們却一直也沒有機會到那一帶的海邊去觀光過，有些農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們用手車把海魚和「私鹽」運出來，換點布疋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稅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們家鄉，駐紮的稅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

例。而這些稅警，他們平日任性縱慾，爲非作歹，橫行霸道，簡直形同匪盜，孩子們都遠遠的避開他們。

我們小時候最愛聽的是張士誠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來是我們家鄉的一個「私鹽販子」，憤於虐政，率衆起義，他起義的地點就是我們屋後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忠義堂，爲當年張士誠所建。多數的史家都把張士誠寫成流寇或「鹽匪」，然而在我們這些孩子中間，他的英雄事蹟極受我們景仰。每聽到生動之處，我們一個個都眉飛色舞，歡欣雀躍。

我們的家，雖然倚山傍水，可是說不上什麼景色，倒是流傳在民間的傳奇故事和我們整天耳濡目染的一切，直接啓發了我們「替天行道」的俠義意識。

我們三五個一堆，結爲兄弟，時而在小山上演習追逐，時而密議入山探訪異人得道，至少每個人都甘株守，想出去創造。在我們小小年紀，我們的家鄉已開始動盪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農民，母親，姐姐一共四個人，我們租來十二畝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担租，遇到東主有事，還要再去義務幫工；過年過節，我們總要送點鷄鴨去孝敬。父親母親都很勤勞，一有空閒，總去兼做點小買賣補貼家用。我們住的茅屋，幾乎是由父親一手修建的。父親在我們家鄉中間，真是一個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從不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總是讓人三分，自己吃虧，回到家裏，逢飯吃飯，逢粥吃粥，絕不埋怨自己的命運，我們幾乎要笑他連嘆口氣的勇氣都沒有。

民國十六年，那時我九歲了，孫傳芳兵敗北退，飽掠蘇北，接着齊燮元，白賈山部均一路打劫而來，整個蘇北被廢蹋不堪，人民呼號無門。

一天，媽媽一路號哭着回來，我和姐姐急着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始終不肯告訴我們，這一天晚上父親沒有回家，我們才知道他給兵拉差去了。幸好過了兩個多月，他又溜回來，腿上有一塊傷，並不是傷於槍彈，而是吃的槍柄。

父親回家以後，比從前更沉默了，更不愛說話了，甚至對孩子們的笑容也沒有了，起初媽媽總以為他在軍隊裏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過問他。誰知在後來中共黃橋暴動失敗以後，蘇北到處成立保衛團，厲行清鄉，父親以一次「土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經審判就執行槍決了。這項消息立刻震驚四鄉，所有認識我父親的人，無不稱讚他是一個老實人，一個無用的好人。都說：「冤枉了，冤枉了！」

以後我們一家三口，就全靠母親爲人織補衣服糊口，母親個性倔強，富有生命力，父親遭難後她極悲傷，但並不氣餒，雖然這時我已可能幫母親做些事，但她堅要我讀書去，她以最嚴厲的態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時叫醒我，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感於父親苦了一輩，最後又死得不明不白，對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淚，但一見到我丟開功課，又聲色俱厲起來。

我就這樣算是受了三年的學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十三歲這年，母親逝世了！她死得很突然，連交代我和姐

她幾句話都沒有來得及，在死前半小時她還談笑自若，勤勞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喪事是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二姐住到叔叔家裏，叔叔的家境本來也和我們差不多，增加了我們的負擔頗感吃力，我的學業當然停止了。我僅住了兩個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決定自己獨自出外謀生了。

從此，我開始了流浪生涯。

二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沒有了爸媽，離開了叔叔，走向那裏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個比較富有的舅舅家裏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點剩飯剩菜給我，我一氣走出門來，臨走她還叮囑我：「以後別來了。你這倒霉的樣子，不要把晦氣帶到我們家裏。」

我於是又找到一位過去的老師，在那裡住了三天，他爲我洒了一把同情之淚，寫了一封信介紹了一家如皋的雜貨店去當學徒，每月的月薪祇有一吊錢，約合當時的銀洋三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比一個雜役還要苦，掃地，抹桌子，燒飯，洗碗之外，甚至還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裏夜間打牌，我要侍候在側，倒茶拿烟，等到他們倦了，天已黎明，他們一個個困覺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繼續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點倦態，鷄毛帚立刻迎頭打將過來。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隻飯碗，老板娘

把我鞭打得皮開血裂，最後還罰我在烈炎下跪了兩個鐘點。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裏，那是我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見了我的老師，他驚訝的望着我

「怎麼，你——」

「我不幹了。」我把背包往他身邊一摔，似乎在對他生氣，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還沒有忘記在大人前面「撒嬌」呢，好像在當時我敢於「撒嬌」的對象祇有他。

「這沒有辦法呀，吃人家的飯，就得受些烏氣……」我呆呆的站着，老師苦口婆心的對我說。他又介紹我轉入了另一家布店，還照樣是學徒。

我一進門，見到那個肥胖的老板娘，就想起鷄毛帚、鞭子、棍子……雖然當老師送我進來的時候，她滿臉堆着獰笑。布店裏多的是木條尺，我懷疑簡直好像都是爲我而設的。

老師常有信來，教導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時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之類寄給我，要我常常背誦。至少他的熱情，相當感動了我，雖然這家布店的日子並不比那雜貨店好挨，但是我終於忍耐過了三個多月。這期間令我氣憤的一件事是：我離開家雜貨店以後，他們向我的老師討了十八天的飯錢，他們竟說這是「規矩」！

我不願再連累我那位好心腸的老師，決定怎樣受苦也在這布店做下去。真是，不幸的遭遇又來了。

這天夜深，老闆氣沖沖的走來。他一見我遮着布正懸在桌下讀書，大罵不休，把我的書搶去撕得粉碎，我辯說，我雖然夜闌讀書，白天還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沒有打擾別人的睡眠。再，我點的蠟燭，也是我自己化錢買來的呀！

他一聽之下，更加惱怒，罵我：「小雞種，賤骨頭，你也配讀書，給我滾出去。」說滾就滾，我毫不猶豫，扭了背包就走。

從此，我却沒有勇氣去看我的老師了。

路邊，屋檐下都暫時成了我的住所，被這裏趕出，就換到別處去。夜間冷了，就緊緊的縮成一團。有時霍地驚醒，原來是一隻野狗從我身上躍過，我拾起一塊石子打過去，罵聲：「她媽的，你奉誰家主的指使，也來欺負我。」霜露掠過我的臉上，我抹一抹就算洗過臉了。太陽從地面上的升，我就捧起書本子，路人都望着我哂笑而過。當我實在餓得有些發昏，才懶洋洋挺起身子去討些錢買點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這個小叫化子不僅向人家討錢，而且要討舊書舊報紙。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門前，屋內傳出聲音：「哈哈，這個小瘋子又來了。」

時光易逝，現在，我已經十五歲了。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之間，政府一面安內，一面攘外，正當國軍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蘇區的袋形陣綫步步緊縮之際，不料天外飛來一顆救星，這就是日本侵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國軍爲應付東北危局，主力撤退，共軍乘機推進，又恢復原來的形勢。不久「一二八事變」發生，又給中共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中共公開號召「推翻國民政府」。「九一八」後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二八」淞滬之戰期間，中共又乘機佔領了贛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動如此密切的配合下，舉國爲之震動。然而同時也因爲外敵入寇，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高漲，幫助了國民政府鞏固了他的政權。

青年們都放下了書本不肯安心讀書，紛紛請纓殺敵，或者下鄉宣傳，「抵制日貨」之聲响激全國。就在這個時期，我也大胆去找到一個「秦州縣立中學」宣傳隊的負責人，我說：「我願意給你們當勤務兵，一路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錯了，我們這裏是學生宣傳隊，不是軍隊，不要勤務兵，也不打算到前綫去。」

「但是，祇要你們肯收留我，我幫你們做一切雜務，隨你們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遲疑片刻，終於答應我了。

但是，一個多月過後，這個宣傳隊一回到秦州就宣佈解散了。我却由他們介紹當地的一個「秦報」

館去做了練習生。

「練習生」的名義比「學徒」好聽些，工作却還是做些打雜的事，報館的老板是地方上的一個劣紳和訟棍，態度也十分粗野，不過其他的上司總算「文明」得多了。

編輯中有一位丁豐川，還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據說剛從學校出來不久，是報館老板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處得不好，因為他有點藉勢凌人的氣概。他常常幾天不修邊幅，有時又愛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總是遲到早退，對於職業似乎很不耐煩，一有可以出風頭的事，他總是最起勁。但是一經風浪，他又沒有興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實際上起碼的常識都不够，遇到別人反詰，他就面現怒容，大罵山門。或者鄙視的看他們一眼，他自認是這報館中唯一的「前進份子」。

在我偷偷讀書的時候，常常發現有個神秘的影子在我身後出現，抬頭一看，啊，正是他，丁豐川。有一次！他把我的書全部翻了一陣，面現不悅之色，一面念着那些書的名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這些鬼書，讀來屁用。」

我一聽這話，似乎也以爲有點道理，第二天換來兩本「寫信必讀」和「秋水軒尺牘」，他見了又搖頭，我自己翻一翻，也覺得沒有多少趣味。

過了幾天，他拿來幾本郵翰奮（以後成爲著名左傾人物，現已死去。）主編的「生活週刊」，放下沒有多說什麼就去了。

當時的「生活週刊」內容，談政治的部份並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討論青年的切身問題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覺得津津有味。他有時為職業青年說幾句話，也正是我內心的苦悶，讀來頗够刺激。「鄒韜奮」的名字，漸漸成了我崇拜的對象，他，在我心目中，已逐漸代替了過去「張士誠」的影子。

我寫了一段小文章寄給「生活週刊」，他們也給我登出，我高興得跳起來，趕快飛奔到了豐川的家裏，告訴他這個喜訊，他拍拍我的肩膀，得意的對我說：

「你進步了。」

從此，我們開始做了朋友，他每天總要我談談，我也開始仗起他的勢來，對於工作，愛做就做，隨我高興。我的新名詞也漸漸學多了，有時也對丁豐川批評這個，議論那個，他聽了格外高興，覺得我的「覺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識」增加了。

這天，丁豐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後出現。

現在他已經公然干涉我的讀書自由了。他一看我新買來的書中有「曾國藩家書」和「梁啟超全集」，不由分說，大罵了我一頓，說：「這些書都是有毒的。」

以後，他常常檢查我的書籍，我每買回一本書，也戰戰兢兢，先徵求他的意見，可不可以讀，有毒沒有毒，他如果把這本書說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鷄，好像自己犯了什麼大錯似的，期待他的饒恕。

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爲他的俘虜，他說這說那，我不僅隨聲附和，並且一本正經的模仿他的調調兒，也用來對付別的「落後份子」，我自命懂得又要比他們多。丁豐川對我趾高氣昂，我就找別人擺擺威風。

然而，我的「威風」擺出不久，報館中的同事，他們對丁豐川沒有辦法，却向我開刀了。他們向老板告我一狀，說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板在盛怒之下，將我開革，那個丁豐川並沒有爲我說半句話，他對老板又是一套，在老板前面，他一步一趨，完全是一個忠心於統治者的走狗。

這是民國二十四年的事了，這時我十七歲。

離開報館以後，丁豐川告訴我，他有一個「有錢的朋友」願意幫助我讀書，他介紹我去見見他。

他的這個「朋友」名字叫徐志安，當時以美孚洋行的買辦身份在蘇北一帶活動，實際上是中共組織上在蘇北的負責人之一，「解放」以後，出現爲中國石油公司的經理。

我一聽說有人幫我讀書，有些興奮過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處，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簡單的問了我幾句生活上的不相干的話以後，就遞給我一件預備好的介紹信，要我立刻就動身到上海去。

信是沒有封口的，一出門我就打開看了，內容很簡單，好像是：

「風沙兄：

茲有青年朋友×××君擬來滬謀事，請荐與丁經理一談，至感。」

下面的簽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這信中對於讀書一事，隻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為又要荐我去當學徒，很猶豫，但後來一想，既然人家答應幫助我讀書，當然總不會錯的，別的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塊錢作旅費，去上海玩玩也無妨。

上海的地址是靜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門牌號碼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我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沒有問過，大概也許就是「章風沙」吧。

「章風沙」把我的介紹信接閱後，隨口就說了一聲：「你就是×××，我知道了。」他看女傭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暫時安置在他的家裏。他住的是一層房子，一夫一妻和兩個孩子，用了兩個女傭，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歸，後來一個女傭告訴我：「太太在楊樹浦一個工廠做事。」

「章風沙」家裏每個來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後他們避在一邊嘖嘖咕咕又不知說些什麼了

「章風沙」也始終沒有和我提及讀書的事，問起他，他也只是支支吾吾，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答覆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電話。

「你是×××嗎？」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約你談談關於你的讀書的事情，請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號二樓來，我姓陳，你找陳先生就行了。」

這個怪電話使我又是一陣迷惑，我趕去問「章風沙」，他說並不知情。我說：「我需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遲疑的回答我：「你當然應該去。」

陳先生是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他一見到我，很熱情的和我握過手後，就把我帶到一個小亭子間裏，這好像是他的臥室又兼書房。

他逐點問起我的家世，出身，經歷，然後對我說：「你的讀書問題我負責替你解決，你回去寫篇自傳明天上午送來。」

我又徵得「章風沙」的同意，把「自傳」寫好如期送去，陳先生又和我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以後我們每隔四五天見一次面，前後總有七八次。他在談話中，漸漸稱起我「X同志」來，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很榮耀的稱呼，同時，他的身份我也逐漸明白。我又喜又懼，以後我們的約會，我也再不和「章風沙」提及，他也並不問我。

我在陳先生那裡第一次讀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黨的文件——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中共在「長征」途中發表的「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其他幾種極端秘密的小冊子，我看過後，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時他向我說：「我們黨的長征，完全是爲了『北上抗日』。」這段話倒是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

經過這些反覆的談話和閱讀這些小冊子後，他終於給我看了了一份「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章」，要我正式入團，他並爲我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團是黨的學校和後備軍。你是一個無產階級子弟，應該成爲一個優秀的布爾雪維克。」

我的神情極度緊張，已經把來上海讀書的事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我起初說：「我對於革命理論還懂得太少呢？」他說：「這沒有關係，我們祇要你服從革命的領導和紀律。」於是我再沒有經過多少考慮，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遞給他。

回到「章風沙」的家裏，我有幾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雜撩亂，立刻對自己的生活態度都表現得十分不自然，一方面驕傲的覺得，我從此是個「革命者」了；一方面又下意識的想到，如果萬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殺頭嗎？陳先生叮囑過，要提高警惕，戒備我週圍的敵探、特務、叛徒、一切反動份子……，啊，「章風沙」是不是？不，他不會，他一定是我們的「同志」……。

「X先生，這幾天你怎麼的，飯也吃不下，整天儘是坐立不安。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章太太終於忍耐不住對我說。

我急了，連忙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上海真個地方太壞，你這個鄉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經的地方。」章太太聽我說：「沒有什麼」。

她似乎又另有解釋了。

我滿面通紅，把頭低垂下去。

三

陳先生，不，從現在起，我要稱他爲「陳同志」了。他介紹給我兩個同志，一個叫呂金，另一個叫楊瑞華（此人後來在皖南共軍中失蹤），據說他們都是比我較早的老同志，要我應該多向他們學習。我們三個人就編爲一個小組。

他也不再提起我讀書的事了，「章風沙」也沒有提過。陳同志却有一天對我說：「團裏就要決定你的工作了。」

「工作？什麼？」我接上去說：「你不是說過解決我的讀書問題嗎？」

「啊，讀書？一個同志，工作或者讀書不都是一樣。」他含混的說得滿不在乎的樣子。

結果，我却終於獲得一個「讀書」的機會，在黨的意思，讀書，這就是黨派給你的一個「工作崗位」。或者，不如說是這不過給你掛一個名義吧了。陳同志有次就這麼說：「學校算什麼，那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真正的知識，是必須從鬥爭中去學習的。」

但是，由於我的知識慾，和我過去學校教育受得太少的自卑感，能夠有機會進學校，對於我總是一

個莫大的誘惑。

其實，那時我派去讀書的一個學校，是一個野雞到極點的「學店」，學校的名稱是「私立上海圖書館專科學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門薛家弄，沒有經過考試，我就踏進校門。

開始一兩個月，我在學校的成績優越，受到黨的鄙視，陳同志譏諷我說：「你快成一個蛀書蟲了。」

然後他指示我應該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研究「革命理論」，他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沈志遠譯的「政治經濟學講話」，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論」，你都應該仔細閱讀。另外，你應該留心同學中閱讀「大眾生活」和「讀書生活」等進步刊物的份子……。」

但是，不久之後，他突然緊張的來通知我，布哈林的書不能讀了，問他什麼原因，他僅聽說「布哈林是右派」，其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有一天，我一出校門就碰見楊瑞華同志。

「到那兒去，我正找你。」他劈頭就說。

「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呂金被捕了，陳同志要你趕快離開這兒。」

「好，我回去搬我的行李。」

「行李不必要了，收收書籍和信件，立刻跟我走。」

一個學期沒有終了。我的學校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這時，「共產主義青年團」已經隨着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改編爲「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由一名不見經傳的李昌領導，李當時掩護在北大做職業學生，他所能領導的也僅限於北平，在蘇區的青年團，則改爲「青年救國會」，由馮文彬（現任中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書記）直接領導，而實際上全國性的青年運動，依然由過去「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任弼時（後來又一度出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及中共土地政策的起草人，現已死去。）負責指揮。以後，我們就以一個民先隊員的身份，滲透到「上海各界人民救國聯合會」中去。當時我的任務是由組織派到「職救」（上海職業界救國聯合會），和一個叫何懼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何懼是一個生得又高大又漂亮的伙子，年紀比我大七八歲，整天愛談女人，上海的么二，長三堂子，他頭頭是道，瞭如指掌；可以如數家珍一樣的背出來，我們除了爲「職救」保管一些主要文件外，空餘的時間很多，我就隨他東西亂竄，追逐女人，胡調一陣。他頗有神通，常常到處去抓一筆錢來。我有次譏笑他說：「像你這樣真是最幸福不過的了，讀左傾書籍，幹革命職業，過右傾生活，既進步，又浪漫，又舒服。」他聽了也祇是笑笑。

時局一天天緊張，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畧，情緒一天天高漲，正當這個時候，華北又發生一連串的事件，六月間簽訂了「何梅協定」，十一月間相繼出現了「冀東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北平青年學生在愛國的熱情下，爆發了「一二九」，「一二一，一六」運動，旬日之間，像野火燎

原似的，震動全國，這個愛國運動完全是學生自發的，純潔可敬的，狡滑的共產黨人直到後來才混在學生隊伍裡冒充領導者，他們開始的目的，是利用學生的反日情緒，轉變成一個反政府的擴大的內戰，所以黨不斷向學生宣傳，政府是一個賣國的政府，親日派的政府，把學生的情緒從仇恨日本人轉變成仇恨政府。以增加他們在內戰中叛亂的資本。黨的指示要把學生的愛國運動「提高一步」，所謂「提高一步」，就是變質，他們開始以「抗日」的外衣，偽裝同情學生，後來再製造一些「事件」，把學生逼得和他們走在一道。這時他們把學生的組織也逐漸軍事化，秘密設立了總指揮部和組織了糾察隊，用特務學生來監視和強制別的同學的行動。

北平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到上海，我們頓時忙碌起來，我被組織上派充臨時的「交通」，和幾個復旦的同學取得聯系，但是嚴禁我參加學生的任何公開活動。一般的學生一聽到「抗日救國」和遊行罷課都很起勁，事實上幕後玩的什麼把戲，他們完全被蒙在鼓裡。只有政府當局看到我們那種遊行示威計劃的週密，指揮的靈活，沿途的交通網，游擊式的分散和集合，心裏是有幾分數的。

黨裏交給我一網網小冊子和傳單，要我交給復旦的同學，再由他們帶到學校裏。有一次我交給他們一支手槍，我依照凌永青同志——他是我直接的上級給我的指示對學生說：「把這項東西秘密的藏好，在必要的時候帶在身邊，如果遇到同學和軍警發生嚴重衝突的時候，偷偷的放兩槍，那麼，事件就可以擴大了，我們的運動就可能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了。」

那個復旦同學，顯然也是一個同志，但是，不知這他敢負責我太年輕，還是懷疑，還是害怕，他居然表示不服從我的意見，沒有把槍帶去就走了。

我把他的意見向上級請示，得到的答覆是：「怕什麼，這正是對學生的一個政治上的考驗，你問他自己要不要做一個布爾雪維克，如果要，那就應該知道，我的命令，只有服從。」

我謹慎小心的背熟了他的每一句話，然後又傳達給那個同學，他居然固執地不肯接受，他的理由是怕傷害到同學，他甚至對於示威遊行的時候把小學生和女同學放在最前列吃苦頭都提出異議，認為有失人道。他說：「打衝鋒的事，應該是由我們大學生幹的，我們並不怕死，但是應該堂堂正正的……」

「言外之意，他對於這種行爲，表示抗議。」

上級後來知道以後，勃然大怒，連我也一起都被罵在中間，他說：「這些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平時表現好像很積極，一遇到真正的鬥爭就萎縮了。什麼怕傷害了同學，真他媽的活見鬼，不中用的偽人道主義者。我告訴你，這就叫鬥爭，這就是政治。」

但是，我們這些幕後指揮上海學生活動的一批黨的幹部，却受到黨的高級機關的指斥，認為我們沒有脫離立三路線的殘餘影響，行動過左，學生遊行的時候，有些左傾學生罵軍警是「漢奸」是不對的，「黨的幹部應該指導學生爭取軍警的同情，擴大統一戰綫。」——黨的文件上這麼說。但對於我的上級拿出槍來的事，却隻字未提，這也是某些幹部「過左」行動的一部份吧。

萬認爲利用學生運動可以製造一個革命高潮，至於「統一戰綫」我們都不相信會有這回事的，我們不僅利用學生愛國運動，甚至在一個學校中發生一點芝麻大的小事——如學生對某個教職員不滿，某個學生受到學校當局的處分，伙食的不潔等等問題，轉瞬之間都被我們一羣職業的煽動者所利用，竭力把他擴大成一個政治事件。

幾天以後，那個復旦同學祕地失蹤了，上級一口咬定這是政府幹的，學生也是如此普遍傳說，我也如此相信，直到後來別的同學都被釋放回來，他的消息依然沒有下落，我懷疑到可能的不幸的後果，以爲那一定總是政府幹掉了。

「這就叫鬥爭，這就是政治」，在當時我如何能體會這句意義深遠的話，以後想起來，不禁毛骨悚然，爲那個復旦同學叫屈，他不肯接受黨的任務，去打死別的同學，擴大政治影響。自己大概做了替死鬼，完成了這件黨的任務吧。

正當全國的學生愛國運動洶湧澎湃之際，紅軍的主力，在國軍的窮追圍剿之下，經過狼狽的流竄，到達了荒涼貧瘠的陝北。這時，國軍正步步進逼，包圍圈愈縮愈小，毛澤東侷促在瓦窯堡的一角，已成釜底游魂，聚殲在即。然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天外又飛來一顆救星，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共的策動下，發動了「西安事變」，全國的騷動又開始了。

共產黨徒們，一切的左傾份子們，都陷入歇斯得里亞的興奮與瘋狂。

「蔣介石被扣了，政府就要崩潰了，革命的全面勝利就要到來了。」他們都這樣異口同聲的說。他們這時已經一個個以主宰者的恣態出現，如果這時誰對「西安事變」作一點比較冷靜客觀的分析，一定會立刻被目為「反動派」。

我的上級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的住址，我們的見面都是約好我在一個電車站或者橋頭或者公園等待他，有時他臨時闖到我的住處來找我。

不久「西安事變」解決了，蔣先生飛回南京，全國人心振奮，爆竹聲不絕，我的上級覺得他個人的自尊心也頗受傷害，因為他對於政治的判斷，一向是認為根據黨的路綫的，這次居然落空了。起初他向我們自我解嘲，說這是張，楊的不可靠。幾天以後，我們又爲此特地舉行了小組會，他又奉命向我們解釋：釋放蔣介石是黨堅決主張的，黨一向反對這種劫持和軍事叛變，這種軍事叛變是機會主義，他最後還是阿Q式的認爲這是黨的勝利。

他是一個善辯的演說家，聰明的煽動者，他把自己過去的錯誤估計與黨的政策作了自圓其說的解釋，娓娓動聽，滿座的懷疑者都啞口無言，鴉雀無聲，我不知他們是否聽懂了？還是認爲，聽取過上級的報告以後，我們的義務就算完了。

不過，我的上級對於黨的政策把握不定，這裏我也要爲他提出解釋的是，在當時黨的中央一方面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口號，一方面給我們們的指示是：「不但絲毫不能減輕對國民黨統治的進攻，

而且正相反，必須加倍努力，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國民黨的統治」。黨的中央又說，在國民黨區域的一切擾亂，如罷工，罷課，暴動，任何破壞國民黨政權的行動，「都是屬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份。」（大意如此。）這樣，一個執行政策的幹部，如何不感到迷惑，和發生張惶失措步調紊亂的現象？

深冬了，馬路上穿梭一樣的人羣，有些人提着年貨，擁擠在火車站，或碼頭上，準備回家過年去。也有些人面帶愁容，緊張的在奔波。我這個流浪者和亡命者，這天晚上，也靜靜的站在黃浦灘頭，少頃又徘徊在十字街口來回閒蕩，想起我失去的爸媽，想起聽說已經出嫁的姐姐，我的溫情主義發作了，我偷偷的流了幾滴眼淚，又趕快把他收斂了。

家，對於我沒有一點造化。我現在是屬於革命，屬於黨的兒女了。黨，不就是我們的大家庭嗎？歸來時，我一路這樣想，安慰我自己。

農曆大除夕的前一天，上級又召我去談話。

「你在上海熟面孔太多了，組織上決定派你到鎮江去，這是你的旅費和介紹信，這封介紹信是解決你的職業的，組織關係，你到後自會有別的同志來找你。」

原來那是一個鎮江的新辦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我不能不佩服我的上級有辦法，一個異地新辦的圖書館他立刻就知道了，想到我是學過幾天圖書館學的，也居然找到錢素和介紹信，而且說是我一

到馬上就可以上任，以後我就藉着這個圖書館的身份，在鎮江展開工作了。

其實，那時我的組織關係也是十分模糊的，我本來是團員，但團已停止活動了，說是改爲「民族解放先鋒隊」，但我做的是救國會的工作，直接領導我的却又是黨的幹部。我到鎮江的第三天，組織上派的姚鋒同志來找我，他給我交代了兩個同志聯系，當天就回了上海。

鎮江的兩個新同志，一個叫李天民，是江蘇省政府的一個小公務員，後來和我接觸的機會較少。另一個叫湯小南，是民衆教育實驗學校的一個教員。他是一個冒險主義者，同時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也常愛如此責備別人。他常常帶許多不相識的青年藉我的圖書館開會，我稍加阻止，他就罵我是胆小的機會主義者。後來終於鬧出亂子，被捕後立刻獻出名單，被牽連者一共有十七人之多，我也在這次事件中被捕。我聽說那個姓湯的在獄中大發神經，爹呀娘呀亂叫一通，把一切責任完全推在別人身上。我極度憎惡和鄙視他，豈知一年後，我們又在延安碰面，他早已先我而到，態度傲慢，而且懷疑這個，密告那個，我看了簡直啼笑皆非。

鎮江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是由當時的江蘇省主席陳果夫積極支持的，所以當「政治警察隊」逮捕我的時候，他們是不願聲張的。這一天，一個便衣警探持來一張湯小南的字條，約我到他家裡談談，我當時還不知道湯已被捕，隨來人走出門後，另一個守在門外的警探就惡狠狠的緊貼在我身邊，他們一左一右，就把我挾持到隊部來。

「政治警察隊」是一座中國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佔面積不大，進門的右側就是一個小辦公室，我在這裡受到初步的審訊，然後被安置在一個臨時拘留所中，我們這一間裏面大約有二十七八個未決犯人，新犯人進門以後，照例被劃出一塊勉強可睡下的地方，但是夜間依然糾紛迭起，有時甲的腿侵入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蟲白天都大搖大擺的在我們面前走過，午夜的時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總要有幾十條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覺滿意。沒有帶行李來的犯人，就鑽在稻草堆裏，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緊緊裹住，不多幾日，我們的衣服也全都變成灰黑色了。每天有兩餐飯，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兩小片肉，送飯進來的時候，一併提來一桶開水，有些人在自己飲過後，就把碗浸在裡面洗一洗，後來的就祇好吃他們的洗碗水了。這種生活我們當時以為很苦，並且還要對統治者苛待囚徒，表示憤恨，但是比起後來住過的中共監獄，已經是天堂了。

我們在組織中間，平時早受過「應付被捕」的指示，也看過這樣的小冊子。比如關於供詞一項，組織上就告訴我們，作供的時候，在關鍵的問題上絕對矢口否認，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則不妨裝作坦白。凡是必須要牽涉到的人，根本說不認識他，在無法否認的時候，就儘量對這個人加以誹謗和攻擊，說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覆對這個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別人牽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認了。

我前後一共被審訊過七次，他們拿出各種刑具恐嚇我，那個審訊者是個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滿臉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內團團轉，急得筋骨都快爆出來。

「媽的——」連珠砲似的巴掌打在我的耳光上，我用兩手保護我的頭部，繼而他又把我推倒在地，重重的踢了我兩腳，我的傷疤直到一個星期後才好。

我在獄中，時時感到我是光榮的，一個革命者能進一次監獄，不是很光榮嗎？啊，我不是從此又多一次革命的光榮紀錄嗎？我想起那些聽說過的革命家的故事，我愉快地微笑了，甚至對這骯髒的環境也不討厭，捉臭蟲則當作一件樂事，十分有趣。我倔強地，忘記了什麼叫害怕，黨不是常常教育我「監獄是革命的學校，這是一種革命的考驗」嗎？

不過，當時我也有一種迷惑，「西安事變」後，不是說已經「國共合作麼」？怎麼我們還遭到逮捕呢？

半個月後，我被移到另一間獄室，比過去的「臨時拘留所」整潔得多，每人還有一個床位，另外有滿架的書如「唯生論」之類隨我們自由閱讀。這一優待後來知道是由於「政治警察隊」經過多次審訊後，得不到供詞。我們那個圖書館的館長陳復生，這時就出面說情了，說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思想左傾的青年，「幼稚得很，看來不會是共產黨。」這也就是他們最後對我的結論。

我在獄中又奉命寫了一篇自傳，接着他們又寫了十六個思想問題，要我提出書面答覆，把我的答覆

改了又改，然後再叫我抄上去，看來他們是存心放我了。

「政府爲了表示寬大，已經決定對你們不再追究，你們這些受共產黨欺騙的青年，你們怎能怪政府不抗日，政府天天在埋頭準備呀，以後你好好地，在政府的領導下……。」那個年青的政治人員，對我作了一次最後的訓導，然後他告訴我說：「現在，你可以取保釋放了。」

同監的其他難友，都對我表示羨慕，大家都在爲我高興，也有人以懷疑的眼色看着我。

我走出「政治警察隊」，覺得陽光那麼可愛，空氣那麼新鮮，兩隻腳像登雲駕霧似的輕鬆，飄飄然走到大街上，一看紅紅綠綠的標語，才知道這天正是中國的「禁烟節」，六月三日，我一共在獄裏住了一個月零七天。

第二章 正式成爲一個共產黨員

四

我回到圖書館，館長對我很不滿意，我正擔憂自己又要失業了。就在這天下午，我收到一封專人送來的信，信的內容是這樣：

「請即至西門外火車站一談，我手上持有『京戲大全』一部。」

下面的具名是「黃景荷」，這個名字是我過去在上海工作時一個女友的名字，我奇怪了，她找我幹嗎？她又怎麼知道我今天出獄了呢？我立刻毫不遲疑的趕到火車站去，遍尋女客中並無黃景荷，然後我在一位男客當中果然發現他手中持有「京戲大全」，他似乎也在注視我，我們兩對眼睛不期相互對視，然後我慢步走近他，他也輕輕叫了我一聲：「×先生」，我們開始交談，原來他和黃景荷也並不相識，我將要釋放的消息，上海方面在早幾天就知道了，黨派他如此這般的來接我立刻到上海去，我又來不及回去取行李，臨時在車站寫了一封短信給圖書館陳館長，說我出獄以後，因心情不好，暫時回家休息去

了，其實，我那裏有什麼家可回呢！

那位接我的同志他自稱姓郭，在車上儘是打盹，我的腿無意間碰了他一下，他霍然驚動，睜開眼對我翻翻又把眼睛合上了。

到上海以後，我隨他下了車，我們從車站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十六號，他先來招呼我在門外等等。然後又招呼我走上樓去，一看正是我過去的上級，郭好像並不知道我們原已相識，他爲我介紹這是「劉同志」，我却逕稱他爲「孫先生」，因爲這是我過去一直對他的稱呼（他的原名凌永青）。以後我知道，他的確已經改姓劉了。當時用的名字是「劉鵬飛」，到底他的真名字是什麼，我直到現在也不知道。此人後來聽說在抗戰初期被派充「新四軍」第四支隊某團政委，「新四軍」第四支隊不久以遠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和「宗派主義」、「軍閥主義」的罪名，被項英（中共過去主要領導者之一，已死。）派羅炳輝（已死）繳械，他也死於亂槍之中。

奇怪的是，我在獄中的一切表現乃至供詞，「劉同志」知道得那麼詳細，他說我能够機動的應付環境和獄中所表現的堅定，經過這次考驗和鍛鍊，我可以够做一個真正的布爾雪維克了。然後他又要我再寫自傳，再填表格，對我說：「現在，你可以入黨了。」

半月以後，他通知我，小組會和支部的審查，我已經被通過做一個「後補黨員」了。後補期是六個

月。

我隨「劉同志」到了楊樹浦一個骯髒不堪的弄堂，又輕步踏進一所陰森的房子，「劉同志」說這就是他的「家」，就在這個「劉同志」的「家裡」，我和另一個同志同時舉行了一個簡單而嚴肅的入黨儀式，壁上掛上一小張紅紙上塗的鐮刀斧頭旗，我們機械的舉起手，宣讀誓詞，我的介紹人是「劉同志」，另外還有一個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誰。監誓人當時說是一位「馮同志」，我和他僅見過這一面，以後就不知道他和從沒有再見過他。這幕入黨儀式的戲，匆匆演出了二十分鐘，以後就木然的立在那裏聽訓，「劉同志」是自始至終的導演者，他很得意的樣子。

第二天，我就被「交」給一位「賈先生」，他當時公開的身份是上海蟻社的負責人之一，實際上是一負責新黨員的訓練工作。「劉同志」對我說：「賈先生是一位進步份子，並不是同志。」但是他又囑付我接受他的領導，我有些奇怪，爲什麼一個黨員要接受一個「進步份子」的領導呢？但是我因爲信任「劉同志」，沒有多加懷疑又隨着「賈先生」去了。

「賈先生」把我和另外六個青年人編成一個小組，說這是要我們讀書學習，我們每個人都用了一個假名字相互介紹認識，除了小組會議以外，我們不准私相談話，在路上見面也不准招呼。起初，我僅僅知道這是一個在黨領導下的政治性的學習組織。我們七個人中，有一個是被派爲小組長的，他每天要召開兩次小組會議，實際上等於給我們上課，所講授的內容是「黨的建設」，「黨史」，「政治報告」等等，有時並傳閱一些油印的政治文件，這時我們才心照不宣的彼此知道都是「同志」。不久之後，我們

明瞭了，這原來是黨的地下黨校。

蟻社是當時上海的一個公開的左翼文化和青年組織，他除了辦有螞蟻圖書館等以外，並領導許多左翼青年的讀書會，這些讀書會的份子多半是屬於普通的左傾青年，所以黨校被掩護在中間，萬一暴露，他們可以諉稱是讀書會，讀書會讀些什麼書，蟻社當局一向公開表示是隨大家自由選擇的。頂多他們把這個「黨校」的責任，推卸成少數的「左傾幼稚病」的份子個人的行爲。

受訓剛滿半個月，恰遇到七七事變發生。我們那個小組長這時直接以黨的地位對我們說話了，他以爲這次政府一定要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投降」，這麼一來，全國的革命高潮就要到來了，我們的黨就可以領導全國的革命了，他對於報紙上新聞全不相信，對於國軍在華北抵抗的消息也表示不可靠。他這時莫明其妙的委派了我一個武裝委員會的委員名義，要我把徐家滙一帶的老百姓組織起來，累得我跑了幾趟，餓了，就在路邊攤子上吃兩塊甘薯，想來想去，也不知從何下手。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賈先生」，他非常生氣，說這簡直胡鬧，他問這是誰的主意，誰的命令，我說是「先同志」（即小組長）派我的。他接着就把「先同志」叫去大罵了一頓。「先同志」跟着又找到我大發雷霆，並且擺起臭架子對我說：「你懂得組織的秘密嗎？你懂得紀律嗎？你懂得工作的關係嗎？越級報告是違反紀律的。你以後應該祇有對我個人負責。懂得嗎？」

上海的局勢一天天緊張了，紅軍已宣佈改編爲八路軍，接着，八一三抗戰開始了，有些同志很興奮

，有些同志又很頹喪，但是黨的命令，爲了要爭取人心，我們不能不裝做對抗戰很積極的樣子。後來當很多青年黨員要到戰地去的時候，黨的負責人又指斥這是一種風頭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當前方極度吃緊的時候，黨却號召我們到內地做羣衆工作去。全國人民都捲在民族意識的抗戰高潮了，黨這時却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民族的警惕性，而且需要提高階級的警惕性。黨告訴我們，黨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並不是放棄革命，而是爲了保存，鞏固和擴大革命實力，採取迂迴的戰畧，以便進一步領導全國革命。黨又隨時提醒我們，不要給資產階級的意識（所謂資產階級意識在當時即指民族意識）麻痺了。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黨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爭取領導權，加強對黨員與非黨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發展羣衆力量。並隨時準備革命的「轉變」。這時上級特別指示我們，要我們讀列寧的「兩個策畧」這本書。在抗戰初期，黨中央就一再三申五令要我們提防「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理由說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對於革命是動搖的，不澈底的，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黨告訴我們，這是黨的「現階段」的政策。在上海炮聲隆隆中，我們關心的不是前方的勝利，「戰訊」都不大引起我們的興趣，而是許許多多離奇的謠言把我們攪得烏烟瘴氣，頭昏腦脹，從上級和一般同志傳出來的消息，不是說國軍若干「投降」，就是說中日正在「言和」，同志間一見面都愛打聽謠言，愈新鮮愈奇特愈有味，日本人的宣傳往往成爲我們宣傳的好資料。有時一個謠言兜了一個圈子又鑽到造謠者自己的耳裏，我們的上級聽了也付之一笑。很得意的覺得他的造謠的「政治目的」達到了。因爲黨

當時宣傳的中心是打擊政府的威信，「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而在一般的公開場合，我們都已經習慣於高呼「擁護政府」，「擁護蔣委員長」，「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了。

大場失守，大上海的保衛戰漸近尾聲，在撤退中間，有些同志很希望黨能領導我們在敵後打游擊，這點本領是我們若干同志間素來引以自豪的，我們這些年青黨員平日都被「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聽得心花亂放，這時如何不想一顯身手？但是，黨給我的命令却是：

「你立刻到延安去。」

五

在一般的共產黨員和左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當時的「革命聖地」，能够去延安打一個轉，就好像出洋鍍過金一樣，即使是一個白癡，我們也得對他敬畏三分，以那個小組長先同志來說，起初已經弄得有些人不服，後來還是他自我吹噓一番，我們才知道他是剛從延安來的，大家也就寂然無聲了。「組織」對於我們每個人具有一種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許多生龍活虎似的青年，經過兩次組織生活以後，一個個都像綿羊似的馴服了。

老楊拍地一聲，兩手打在我的雙肩上，不知是羨慕還是在嫉忌我，他問：

「X同志，什麼時候動身？」

我連忙閉住他的嘴叫他別嚷，組織上曾經一再的告誡過我們，每個同志的行動祇有對自己直接的上級負責，對其他的人，包括同志在內，也要絕對秘密。我和老楊之間，算是例外的在平時就偷偷的做了「朋友」，他見到我的表情爲之一怔，不久他就會意我的意思，對我弩了弩嘴，默默地走開了。

我們三男一女，從上海動身，據上級告訴我，其他三位都不是「同志」，不過是「進步」份子，由救國會保送的，要我在一路上注意他們，我們四人又暫時編作一個小組，我充作「領隊」，我們根據上級的指示在路上又偽裝過去並不相識，僅僅是旅途中萍水相逢，臨時結識的「朋友」，上級又告訴我們：

「一到西安，辦事處（指八路軍辦事處）就可以送你們了。」

我們謹慎的整理好行裝，懷着沈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過南京，正是一片混亂，憤恨而堅毅的人民，擁塞在街道上，他們看着那些大官員的簇新的小轎車上，裝滿了傢俱，疾馳而過。又呆呆的對我們注視，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心裏想：你們這些平日對老百姓力竭聲嘶喊口號的傢伙，現在却留下我們老百姓，一個個先溜了。

擠呀擠，跨上津浦車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僥倖的。我們四個人也在車上也互相做了一個鬼臉，「慶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漸漸消失了。

我們在每一個小站上都要停一停，讓過軍車，另一列客車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員我們也要讓。有時在

半路上，車行漸緩，三聲警笛，於是全車乘客一哄而散，伏在田地裡驚魂未定，已聽到機聲由遠而近，又掠頂而過，也分不清是日機還是我們自己的飛機。再回到車廂，有人驚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號孩子不見了，然後，孔雀聲夾着鬧聲、罵聲、哭聲……又把我們載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來，這一帶的農村是荒涼貧瘠得多了，時近嚴冬，樹木凋落，風沙蔽空，寒氣逼人，那些衣服襤褸的農婦，迎着霜風，提着一籃籃的食物走過來，她們生得很健康，結實，醇厚可愛，但是等我們想和她們接近時，她們却害怕，面無表情，或者立刻避開我們。

老牛車拖了九天，才把我們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隨海軍又破爛，又骯髒、又混亂。大兵們一批批從華北戰場上退下，沿途以軍人上落爲最多，我們沒有買票就上了車，遇到一次查票，不知爲什麼他也沒有要我們補購，直到西安，我們跳下車，天剛黎明，西安的車站古色古香的宮殿式的建築，我對他頗爲留戀，我們正凝神讚賞，後面的乘客却把我們推到車站口，收票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們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們也無暇流覽西安的街景，立刻叫了人力車，直奔「八路軍辦事處」而去。

西安爲我國古都之一，城市建築一方面已相當近代化，馬路寬暢，街道整潔；一方面具有北方氣質，莊嚴而樸實，絕大部份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國式的房子。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也租的是一幢中國式的住房，大概這幢房子的主人過去還是一個「封建的」

書香之家，一進門就是一座屏風，裡面十分寬大，大約總有四十多個工作同志，都穿著掛有「八路」符號的軍服，往來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緊張。開始接見我們的是一個姓劉的女同志，聽說她過去是四方面軍的老幹部，我們作過自我介紹之後，她轉身去到另一個房內，然後再折回來。特別向我親切的招呼了一聲：「×同志，你有很久的鬥爭歷史了。」這時我相信我的「鑑定表」（每個黨員都有一份「鑑定表」）已經早轉到「西安辦事處」了。她對另一個小鬼又囑付了一聲：「把這位×同志的行李搬進來，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她在四個人中，對我另眼相看，一時頗使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對於這三個同志，似乎也還有點「責任」，覺得自己一到西安，釋手而去，未免太說不過去了，我問劉同志：

「他們三位的問題呢？」

「他們三位我要和他們詳細談談。」

「不過，同志，他們三位是上海方面組織交給我的，是不是可以讓我們一起先搬到『招待所』。」

「不！」她斬釘截鐵的說：「你到這裏了，一切自應交給我們處理。况且我要告訴他們許多話，革命的鬥爭是艱苦的。」

三位同志冷眼看着我，劉同志也一邊諷刺似的在看着我，我無可奈何，祇好無言的隨着「小鬼」走開。

從「辦事處」到「招待所」，祇轉兩個灣就到了，「招待所」也是一座中國式房子，却比「辦事處

「陳舊得多了，簡直傾斜得要倒塌的樣子。裡面的廂房全被打通，地上堆滿稻草，一眼望去，很像一個馬廄，比我住過的鎮江政府的監獄更髒得多了。進門的時候，正有幾個同志坐在屋簷下捉蟲子，我們走過他們身邊，他們似乎也沒有十分介意。就在這座小小的房子中，居然住了靠近兩百人，衣着十分複雜，有些人已經換上了八路軍服，有些人還穿着便裝，這個地方，除了靠了兩部有「八路」字樣的卡車在門外，象徵他是一個「招待所」以外，否則我真要以爲是一個集中營了。

吃飯的時候，我們每個人提着自帶的碗筷，站在院子中等候分組配給，我們這些「鬥爭性」不夠的同志，吃菜搶不過人家，就要吃虧了。

「我們是游擊隊呀！」那些吃完了自己的菜的同志，常常嘻皮笑臉的走到我們這邊來。

「招待所」住的同志，有的是等待去延安的，有的是從延安派出工作經過西安的，他們並不全是共產黨員。所內也是規定同志間不准隨便講話的，然而準備去延安的同志，身邊大抵都帶了點錢，從延安出來的同志總要在我們身上動動腦筋，揩點油水，請他們吃幾次油大，再送他一兩套較好的衣服，我們又可以偷偷的做起「朋友」來了，除了吃油大的時間我們可以做「朋友」以外，在別的任何時間和場合，我們的相見又如路人，彼此側目而視。

我住到「招待所」以後，滿以爲那三個同伴就要搬來，豈知一週以後，還不見他們的蹤跡，我很担

他們，心裏焦急如焚，却又不敢到「辦事處」去問劉同志。

這一天，他們走來看我，我欣喜的擁上去，他們却以不愉快的神情，失望的告訴我：

「怎麼辦，我們現在還住在小客棧，錢快化光了，劉同志要我們寫了自傳，又填了表，又要我們答覆了許多政治問題，去一次談一次，一次次要我們等，等，等，昨天和今天去，她索興不見我們了。我們不僅錢快化完，而且每次提心吊胆的去到那兒，出來時又怕特務釘梢，我們好容易打聽到你這兒，你說，這事該怎麼辦？」

我搔搔頭皮，的確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然而我安慰他們：

「你們忍耐點吧，參加革命是要忍耐的。聽說現在漢奸多，特務多，他們都要混入邊區去搗亂，共產黨爲了保衛革命的根據地，不能不小心謹慎……」

我的話沒說完，其中一位冒起火來，對我咆哮：

「什麼，我們難道是漢奸，是特務，我們是在上海參加過救亡工作的，我們去延安爲的是進抗大學習游擊戰術抗日呀。」

我向他們反覆解釋：「你們是純潔的，然而辦事處也有他的苦衷。」然後再把他們送出門去。他們似乎並不全能諒解我。事實上，他們走後，我就走到「辦事處」去爲他們轉達他們的意思，並拍起胸膛爲他們保證。

「你認識他們多久了？」劉同志問我。

「我是離上海以前，組織上介紹給我的，說他們是進步份子，而且在一路他們的表現也並不壞，所以我敢於相信他們政治上沒有問題。」

「那麼，你知道他們中間的一個曾經和一個叛徒往來過嗎？」

「不知道。」

「你知道他們中間的另一個，他的父親黃汝鑑，還在國民黨政府做官嗎？」

「不知道。但是，」我辯白的說：「即使他父親做官，他也不見得不革命呀，況且，黨現在實行統一戰綫。」

「這不是統一戰綫的問題，總之你還是少管閒事爲妙。」

我快快而退。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時集合，立刻離開西安，坐一輛大卡車，全車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當日即轉雲陽。

從此我就沒有再見過那三位伙伴了。

六

三原距西安九十華里，雲陽是三原的一小鎮，距三原的十里左右，有八路軍的留守處，內戰時期是

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部」，在當地的土共幹部中，當時還傳說着過去彭德懷與丁玲之間的軼事，有一個時期，正當他倆打得火熱的時候，有些善於阿諛和好事的幹部已經準備借題熱鬧一番，老彭却突然來了一個「關謠」，他並且板着面孔對人說：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不久他又改口說，「革命」不勝利，他是不結婚的。再後不久，當他被發現又和另一個女同志同居的時候，有人打趣問他：「這一次總應該讓我們吃一杯了。」彭德懷的神色突然又莊嚴起來，回答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不重視這些形式的。」

我們到雲陽的這一天，安吳堡的青年訓練班特地為我們舉行了一個晚會，由馮文彬致詞歡迎我們，馮是一個又瘦又小的三十來歲的中共青運專家，講話煽動而有力，不過喜歡翻來覆去，堆積名詞和術語，聽多了就使人感到索然無味，乃至厭倦了。他生得一對貓頭鷹式的眼睛，鋒利而陰險，冷冷的射向我們每一個人，好像這裏每個同志都是國特，都是他的敵人似的。

雲陽也有一個「招待所」，但是這時已經滿得無可容納了，我們這天晚上就決定暫時和青訓班的同學住在一起，青訓班一部份同學也沒有固定宿舍，我們佔用了兩大間民間住屋，男女同志混住在一起，這天晚上，我開始和一個女同志小盧做了「朋友」。

小盧是青訓班中一個最活躍的女同志，她剛從延安派到青訓班來當了幹事，她是由雙十二事變時，隨同她的姊姊帶到陝北來的，同志們把她們一稱大盧，一稱小盧，小盧初到陝北時年僅十八歲，明眸皓齒，天真活潑，起初她被一個中共幹部騷姦以後，偷偷的哭過，後來就被許多共幹輪流蹂躪，漸漸地也

就習慣這種生活了，從此就「解放」了。

這天晚會上，她唱了一段陝北小調，贏得不少掌聲，風頭是十足的。

「同志，這是我的被，你睡在我這兒。」我聽到這一陣清脆而柔和的聲音，拾過頭來，一看正是她。我臉上泛起紅暈，她走過來，像母親牽着自己孩子似的，把我一手拉過去，她的大胆和我的拘謹，我不覺慚愧笑起我自己來。

我們和被而臥，燈熄了，才開始互通姓名。

「你爲什麼特別招待我呢？真奇怪！」我問。

「我看你人倒是挺老實的，否則的話，那個指導員也不會放過我的。」

「那麼，這麼一來，指導員不是要恨我了？」

「有什麼關係，我們都是同志愛，我高興誰就和誰……。馮文彬都管不了我，怕他！」

我們「同志愛」了一夜以後，第二晚我再要求她共被，她却拒絕了。第三天，我熱情的招呼她，她兩眼向上一翻，愛理不理的問我：

「X同志，有什麼事嗎？」

我眼前頓覺一片昏黑，低着頭走開了。

這一段迷離的顛暈，害得我苦思終夜，未得入眠。每一個同志的笑聲，我都覺得好像是爲我而發的。

當我後來漸漸懂得「女人」的時候，我以爲小盧或者是代表一種女人的變態心理，一個受傷害的女孩子，她或者認爲這是對男人的一種報復，或者同樣認爲是一種享受……。

「×同志，你是爲失戀而發呆嗎？一個共產黨員怎麼可以如此，假情假意的戀愛，全是智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的玩意。」中央組織部派在雲陽的負責人樂少華（現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副部長），把我叫去嚴厲的批評了我一頓，同時要我摒擋行囊，明天就動身到延安去。

樂少華告訴我們有軍車可坐。第二天當我們的行李搬上車以後，車上的司機又搬下來，然後有些同志去交涉。他們在一邊嘰嘰咕咕說了很久，有一部份的行李才又重新搬上，我和另外一些同志的却一直擱在車外，少頃，他們也拉我到另一邊去參加了他們的小組談話：

「坐車的同志每人要付二十元給司機同志作酒錢，同志，這是我向你轉達的意思。」其中一位掛着「八路」符號的同志說。

「我們沒有錢，怎麼辦？」

「不行，沒有錢就得走路，司機同志是無產階級，你們難道就不能出這幾個錢嗎？」司機也在插嘴了，他說：「好吧，我們就減到十六元吧。」

「同志，我們實在沒有錢，請你原諒。」我們說。

「不行不行，你們走路去。這裡到延安府有一千里，走斷你們的腿。」司機說完，一怒而去。樂少華這時出現了，我們以為他要幫我們說說情，豈知他却是在來「說服」我們的。

「同志們，沒有車坐有什麼關係，走路，這正是革命的功課呀，你們要學習吃苦的精神，鍛鍊鍛鍊自己呀。」樂少華又拍一拍他的大腿。「看，這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過來的。」

經過樂少華這一番「政治鼓勵」，我們的勇氣全提起來，莫說一千里，就是十萬里，我們也有決心。甚至已經上車的同志也不服的跳下，嚷着要和我們一道走路，樂少華又走過去告訴他們：「你們已經出錢了，還是坐上車去。」接着他一看我們也跟他身邊，才又改換了口氣。「爲了革命，坐車走路不是一樣。」

從西安到延安，實際上是八百里的路程，如日行百里，八日可達，普通約行十日左右。我遵從同伴的勸告，買了兩雙草鞋，一雙穿上，另一雙帶在身邊。我背負的行李，在途中走一段放棄一部份，從五十斤減到二十斤，最後祇提一個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陝北山地北行愈登愈高，爬過一層山，又是一層山，山巒起伏，重重疊疊，奇偉雄觀。站在一個高山頂上，極目望去，長空萬里，一個人站在這裏實在覺得自己太渺小了。一個一個山頭連結着。公路圍山而上，看來像一個個螺旋盤。我們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難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難得見到有一兩處樹木的地方。第二天我脚上就起了七八個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別的小伙伴也是一樣，可是，誰肯認輸呢，大家硬着頭皮繼續走。那時正是嚴冬季

節，西北風迎面吹來，我們把頭緊緊的縮在頸內，惟有拚命走路才能禦寒。路上常常數十里不見人烟，到一個比較大的村落我們自己做飯或者休息，有一天我們全日沒有見到一處人家，水也沒有飲的，餓的時候，我們就拿起身邊的大餅吞下去。這生活是够苦了，當時似乎有一段精神力量，所以總覺得並不十分苦，對延安的憧憬嚮往，神秘的幻想，和新鮮，刺激的生活，都把我們這些年青人的精神振作和支配着。有時雖然也常常碰到不快，總極力往好的方面去尋找解釋，自我安慰和繼續把自己陶醉在夢鄉中。比如，在陝北山區步行中，我們除了物質上挨苦和疲憊以外，隨時還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一般的陝北老百姓都知道我們這些外省的年青人是前往延安的，他們十分敵視我們，賣的東西，把價錢都故意提得很高，有時乾脆就不理睬我們，晚上借宿，跟他們好好商量不可理喻時，十之八九是要靠威脅解決問題的。有時我們會勾起一堆疑問：我們的黨不是說代表工農大眾嗎？老百姓爲什麼會敵視我們呢？黨不是說，陝北的人民如何把共產黨當作親人嗎？但是很快的我們又自己回答自己，覺得這些都是由於老百姓的落後不「覺悟」所致，找到這個解釋之後，自己又覺得滿足了。不過一般說來，黨在陝北地區，「威」却是用足了的，許多過去遭受中共荼毒過的人民，如果我們面孔一沉，他們也就再不敢和我們刁難了。

經過中部縣，我們特地繞道去晉謁了黃帝陵，陵園松柏參天，圍繞着莊嚴的陵墓，在陝北是難得見到的勝地。在中共的歷史觀點上，對於「黃帝」的一節是根本懷疑的。但他們到達陝北以後，爲了籠絡

民心，却也每年循俗去「祭陵」一番。

到達鄭縣，我實在支持不住，病倒了，這裏有八路軍的交通站，我被留在站中，次日有軍車經過，我交涉搭上軍車，化去法幣五元，算是特別客氣，另外交通站要我付了兩天的伙食費。

鄭縣至延安，僅一百八十華里，我們總以為當天一定可達，豈知這部老牛車在途中時而停車修理，時而要我們下車推推，公路破爛不堪，車行其上，顛簸不已，危險萬狀，時時可能被拋出懸崖下，我們也偶爾發現一些被毀的車棄在路邊，一見真是觸目驚心，假如不是病了，我寧可背起包裹再走路，誰願再坐這倒霉車子。這一天從早上七時開車，走到天黑，祇行了九十華里，到達甘泉。甘泉，這裡才算是正式的邊區了。

甘泉縣是一個不上百戶商店的小鎮，實際上祇等於我們江蘇一個較大的村莊，許多商店也祇有幾件零落的貨品陳列在那兒，堆滿了塵埃，看來是很少有買主光顧的，貨架東倒西歪，大抵是十架九空，全城找不出一座完整的房子，破落而荒涼，我們過去聽說過邊區的人民生活如何幸福，共產黨到了以後如何繁榮，這時如迎頭澆了一盆冷水，大失所望。但是終於又自己解嘲的這樣想，共產黨人畢竟了不得，他們竟能在這塊苦地方立定腳根。

在邊區以外，我們可以自由向老百姓借房子住，到了甘泉，就不行了。規定我們一舉一動必須經過「政府」。我們走到縣政府去，說是沒有人辦公了；再走到八路軍留守處的團部去，又說是這不關我們

的事，自己去想法吧。怎麼辦呢？我們祇好找到一幢沒有人管的空房子權且住下，主人大概是一個地主，逃走了。當時中共爲了「統一戰綫」又下令停止沒收地主的產業，因此這座房子就空在那裏。

甘泉和甘泉，延安之間的勞山，都是剿共期間有名的戰場，我們在這一帶聽到不少參予戰鬥過的戰士們述說了許多生動的故事，其中也不少是過甚其詞，誇大宣傳的，不外是國軍在某處如何如何遭遇殲滅等等。

愈近延安，每道關口的檢查盤問愈繁，有些是背紅纓槍的自衛隊員，有些是正式的八路軍。去延安的人們，每個人的證件不同，所發生的效力亦各自不同，像我們的證件等級比較高些，沒有經過太多的麻煩，就順利通過了。

現在，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啊，延安，你是中國勞動人民的燈塔，你是中國革命的聖地。還有，那些偉大的革命領袖，毛主席，王明同志，朱總司令……，是些怎樣的傳奇人物呢？

歌聲開始激盪，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還有些別的什麼歌，我不會唱，但也跟着嘴唇上下動動，否則，別的同志看到我不會唱那些時髦歌曲，不是要笑我不够「革命」了嗎？在到達延安的剎那間，我把我的病完全忘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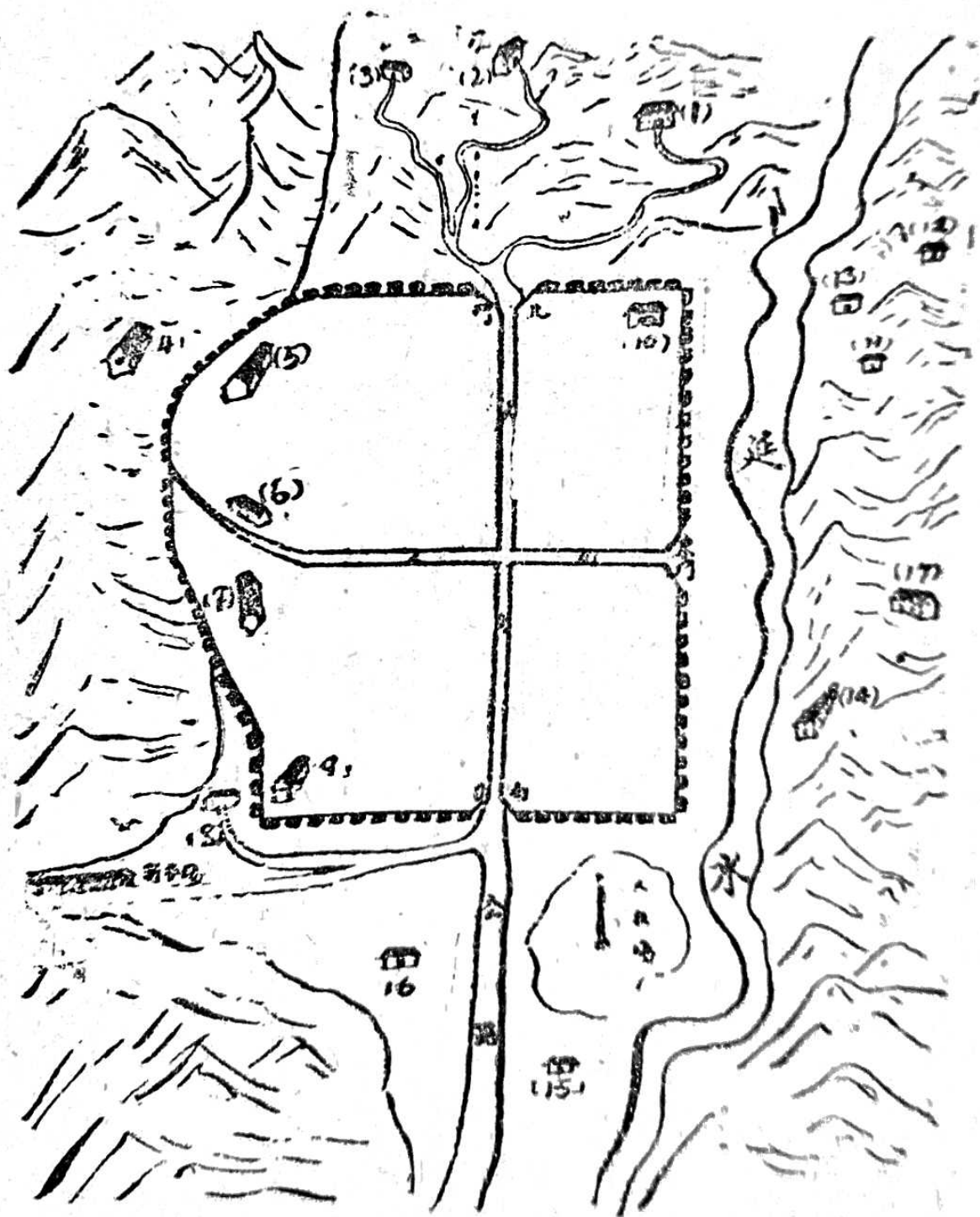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延安「朝聖」

七

延安是一個羣山環抱的小城，南北直徑約一里，東門外面臨延河，城外的窖洞一層層地排列在山腰間，或是非常峭壁的懸崖上，每個洞都有一個弓形門，每個弓形門又以一道扶壁互相隔開，洞前有寬闊的層道，人馬可以來回通行。這個小城市在共軍進駐前僅有一萬多人口，最盛時代有五六萬人。日機轟炸後，城內機關全都遷出郊外，商業亦轉移至南門外新市場。當日延安城的形勢與主要機關分佈如下：

1. 楊家嶺：毛澤東住宅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所在地。風景恬靜幽美，毛澤東住在隱藏在山腳下的一個清明美麗的花園中，用泥和灰色的磚所造成的一些建築物裏。
2. 中共中央黨部。
3. 棗園：中共最高特務機構「敵區工作委員會」所在地。
4. 中共中央大禮堂。規模相當宏偉，在延安是首屈一指的大建築物。

5. 八路軍（十八集團軍）總部。
6. 邊區銀行。
7. 中共中央組織部。
8. 邊區政府，邊區參議會等。
9. 邊區政府交際處，招待所等。
10. 抗大校部。
11. 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此處山名清涼山。與嘉陵山遙遙相對。



12 陝北公學（簡稱陝公）。

13 桃園：延安唯一風景區，爲高級人士遊憩之所，園內有一小茶室。

14 女子大學（簡稱女大）。

15 邊區旅館。

16 邊區保安處。

17 中央黨校

我是扶着病體到達延安的，加之因爲興奮過度，病也就更加劇了。下車以後，我們同車的人，都作鳥獸散，各人找到自己有關係的部份去。我也直接持件找到中央組織部，一個姓魏的同志接過我的證件，再看看我的病容，極不高興，很不耐煩的對我說：

「高同志（當時的中央組織部幹部科副科長）正在開會，沒有空見你，明天再來。」

「同志，我病了，我可以在這裏等等他，而且，我剛到延安，也沒有別處好去。」我說。

「不行，這裡是中央組織部。」

「我知道，這裏是中央組織部。」

「要等，你先到招待所（指中央組織部招待所，距組織部很近）去，回頭高同志再通知你談話。」我無可如何，祇好遵命先到招待所，招待所的主任是一位五十來歲的安徽人，名字可惜我已記不起

了，聽說他在政府的監獄住了十幾年，一出獄就舉家來到延安，他倒是個老實人和好好先生，我把來由說出後，他顯得有些爲難的樣子。

「照規定必須由中央組織部直接介紹我們才能收你，不過，同志，」他說：「看你病得很重了，你就先歇歇吧。」

隨後他又問我要不要吃些什麼，又吩咐管理員替我預備了開水，在旅途的勞頓以後和重病之下，雖然一點點關心和照應，也使我感到分外的溫暖。

感謝這位招待所主任的熱心，第二天他於取得中央組織部的同意後，把我先送到邊區醫院去。邊區醫院距延安城約二十里路，一個僻壤的山坳裏，約莫有三十來個窯洞——我所指的是當時的情形，以後邊區醫院搬城東南外近郊，已經擴大一點了。

在一排窯洞前面，站立着一個全副武裝的警衛，叫我們站住。以後陸續走出窯洞的也全部是些武裝同志，我一看被送到這地方，心頭倒是仆地有些吃驚，然後再看看他們胸前所掛的「邊區醫院」符號，我才放心了。

邊區醫院除「組織上」送來的病人外，是不收其他病人的，有人因爲沒有正式經過組織介紹，醫院當局拒絕收留，在門外就死掉了。進院以後，應該先經政治指導員審查過，然後才由醫生分配你的坑位。每個窯洞有一個大坑，三五個病人住在一起。全院祇有一個外科兼內科的醫生，這個醫生，原是過去

國軍中的一個被俘軍醫，臉上有些浮腫，一見到我們，總是對我們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麼意思。醫院的行政幹部和病人罵他，他也是報以一笑，這大概是他被俘以來，藉以苟延活命的最好的本領和最聰明的辦法了。

院中有十來個女看護，全部都是四川人，過去都是四方面軍裏脅而來的，加上院長，主任，政治指導員，管理員，醫生，勤務員，馬夫，伙夫，警衛班等等，職員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這中間祇有那個醫生算是懂得一點醫學常識。醫藥設備根本說不上，比較嚴重一點的病或者急症，醫生祇好束手。

醫院的伙食比其他機關要好一點，但也要按照在黨的地位分成等級，更高級的黨幹部，則進中央醫院，那裏的待遇和醫藥條件就好多了。

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還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們覺得這裡比起他們原來的部份舒服得多了，而且，一般病人都可以隨便摟着女看護玩玩，打情罵俏，在院裡女看護是不能拒絕的，有些小幹部，在別處是沒有這麼好的福氣的。

我本來沒什麼大病，祇是因為路上太苦，加上受冷，在院裏慢慢就好了。休養期間，整日就是聊天，吃吃玩玩，還比較算是自由，後來胆子漸漸大了，也懂得去纏纏女看護了。

醫院中，有過一次緊張的事情：

在另一個窯洞中，有個老病人，因為他年紀比我們都大，加上聽他自我介紹過他的一段革命歷史，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尊敬他。聽他說：他是最初與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等人同去蘇聯的，回國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幾年的牢，直到抗戰開始，才在「釋放政治犯」聲中被釋來延，但是他這時已經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還告訴過我們一些在蘇聯的故事，在政府獄中受刑和獄中鬥爭的故事，別的就沒有再說什麼了。有一天夜裡，我們醫院裡突然緊張起來，窯洞內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裝同志，我們一個個走下坑來探頭張望，又被趕回自己的坑位上去。

「不得了，那個癆病鬼張抱平，原來是個托派。」在寧靜以後，一個女看護謊張的走過來對我們說。本來這個女看護也一向敬重的稱「張抱平」為「張同志」的，這時已改口稱他為「癆病鬼」了。

張抱平已經被抓去了，這時全院的同志都在罵他，都在從張抱平的平日談話中，竭力尋找可疑的地方，好像個個都願意挺身作證似的，但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大家把張抱平痛罵一陣以後，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從此，我們醫院內的氣氛却改了樣，同志間除了談女人說笑話或者再罵罵政府以外，沒有人再談起自己個人過去的事了。

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也出院了。

在中共組織部，接見我的就是受初次見面的高同志，面目清秀，態度溫文，我見他第一面時，對他印象極好。他對我另談過我一些過去的情形後，又要我寫篇自傳送來。

這時我已正式安置在中央招待所中，開始睡在地上，等到坑上有人讓出一個空位，我才填補上去。自傳送去以後，一次二次再找我談話，把我的過去從頭問過一番，然後覺得沒有什麼疑問了，他問我：

「你對於工作有什麼意見嗎？」

「我希望，黨能送我到蘇聯學習去。」我說。這個念頭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過許多書刊和聽過許多故事，是關於蘇聯如何進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滿等等。所以我早就立定兩個心願，第一個要去延安，第二個要去一趟蘇聯，現在延安總算到過了，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留戀的。剩下的就是另一個到蘇聯的心願了。何況這時我住在招待所中，眼看着那些蘇聯回來的同志威風十足，更增加了我去蘇聯的興趣，於是，當黨問我的工作意見時，我的「到蘇聯去」就脫口而出了。

「這是絕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會對我說：「現在正是國內的革命高潮，在蘇聯的同志還趕着回來。」

我沒有說什麼，我們相對沉默了片刻。

「那麼，你還有別的意見嗎？」

蘇聯夢既已落空，我的虛榮心在追求別的方面的滿足。我回答說：「我希望做點上層工作。」他大笑起來，似乎在故意作弄我。

「哈哈，上層工作，你要做防空哨，還是要拿鋤頭到山頂上墾荒去，這些都是上層工作呀！」我慚愧得把頭低沉下來，他愈笑，我愈是覺得無地自容。

「我告訴你，」他突然嚴肅的對我說：「我問你的工作意見，這不過是對你的黨性的一個考驗，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當黨問他的工作意見的時候，他祇應該回答，服從黨的決定，聽從組織的分配。黨要你到那裡，就到那裏去。沒有半句還價的……。」

他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愈來愈像訓話的口吻了。

「史太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做成的。』布爾雪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好了，沒有什麼話了，你先回去，黨決定了你工作的時候，再通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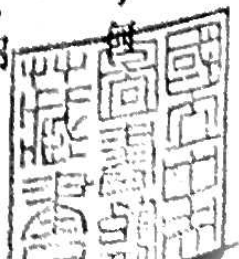
我回到招待所以後，頭有些發脹，一想到「椅子」，「桌子」，「棟樑」，「馬桶」，腦海裡總好像有些恍惚。但轉念之間，自己突然又表現得堅定起來，覺得爲了革命，高同志的話也是對的，反正自

已現在已決心把個人生死得失置之度外，一切獻給黨了。住在招待所中，一日兩餐也不用自己操心，何必再考慮工作問題呢。

住招待所等於住閒，很多同志一住就是幾個月，我們在招待所中，也一樣是要參加組織生活的。招待所的設立，實際上是爲了黨便於集中管理，和隨時了解我們，有時黨要找些不近情理的事或問題刁難我們，考驗我們對黨的組織觀念。有一次陳雲（中央組織部部長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總理兼重工業部部長）到招待所來巡視，這時在所中侍候最忙碌的却不是主任，而是那個留着滿臉馬恩式鬚鬚的總支部書記，他一步一趨的跟在陳雲後面，陳雲每說一句話，他總在旁邊答一個：「是」，陳雲不過在無意間稍微表示過，由組織部到招待所的山路彎了一點，陳雲走後我們立刻奉命修路，把路修直。其實原來的路，十分坦平，新改的路却又陡又險，我們奉命修築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是高興的，然而却沒有一個人敢於講話，修好後也從沒有人再走過，一陣大雨又冲垮了。

延安幾乎天天晚上有戲可看，最初在城內，後來在北門外的中央大禮堂，由演出的部份發出入場券給各機關再分發個人，我們住招待所的人，每天晚上都沒有什麼事，大家就鑽路子找戲票去看戲。

藍蘋（現在的毛澤東夫人，到延安後改名江青）當時在延安戲劇界並不頂活躍，她雖然因爲擁有一點明星的名氣，開始頗能吸引一部分觀眾，後來演過一次「一·二八」的戲，觀眾大失所望，從此她就不再上台了。在這次演出中，倒是另一個姓孫的女演員大出了一番風頭。藍蘋於中央黨校畢業以後，最



初被派到蘇北藝術學院工作，因追求徐一新失戀，（徐一新正擔任魯迅藝術學院的訓導主任，被當時中共中央黨部最爲有希望的青年幹部，自毛與藍蘋同居後，此人消息杳然。）頗不得意，不久就調到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擔任替毛澤東搜集資料工作，與老毛朝夕相處，毛澤東這時正剛趕走他的前妻賀子珍，心情很不好，一對乾柴烈火，就勾搭上了。

有一天，我正在窑洞外晒太陽，勤務員送來一封我的掛號信，一看內容，使我頗費惆悵。事實是這樣：

我在鎮江的時候，有一個楊州的「前進」青年李明，他常常與我保持聯系，他把我們的宣傳品帶到蘇北去，替我們做了不少工作，後來他又介紹我認識不少左傾份子，其中有一個女的，就是這個來信的熊芳，李明和熊芳在抗戰開始後結婚了，他們又一同到了武漢，李明臨時又找到一個左翼團體的關係到延安去，熊則仍留在武漢，但李一到邊區就失蹤了，熊芳四處奔走打聽，才知道她的丈夫已經被捕了，原來當時李明參加的一個左翼團體，不是正牌的，並沒有得到中共的合法承認，祇有一個人與中共組織上有一點關係，找到通行證，到了延安。他們在進入邊區的甘泉以後，立刻就以太派的罪名被捕，從此就不知下落。熊芳到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去問，回說「不知道」。因此她來信要我想想法子，她說，李明絕對是忠實於黨，忠實於革命的，李明的一生歷史她全部知道。她又打算也來延安，用自己的頭顱爲李明担保。

我接到這封信後，又是一連幾夜失眠，我應不應該去爲這位朋友說幾句話呢，在情理上講，是應該的，李明過去一直幫助黨工作，從來沒有一點反革命行爲和可疑的地方呀！但是，在我們黨內，誰都知道，這種替別人說話的事不是好玩的，說不定自己會代人受過，甚至把問題愈纏愈複雜，豈不更糟？而且，在黨內我見到過許多過去的革命元老功臣，後來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殺了，李明過去是革命的，但是，我們到底是幾個月不見了，幾個月中，誰又能担保他沒有變成一個叛徒呢？最後考慮之下，我的結論是，好吧，一切信任黨吧，假如他不是托派，組織上也不會冤枉他。假如他是，我自然也無能爲力了。

在這期間，有另一個過去李明的朋友趙子健來看我，我和他談起這件事，趙子健這時正擔任八路軍總部的宣傳幹事，延安的「人事」非常熟悉，我想他或許比我有點辦法，他倒很熱情而爽朗，拍拍胸脯，說「這件事一手承擔在我身上，祇要他不是托派。」但是後來趙子健二次三次來看我，臉色一次比一次灰暗，他說，他跑過每個有關的部份（指中共特務機關），處處都一樣碰壁，異口同聲的回答不知道，最後還是一個「邊區保安處」的「同志」私相警告他：

「老趙，你管這閒事幹啥？李明的案子嚴重得很，聽說他是張慕陶（傳說當時張是托派在西北的負責人）派來的。你說你們是老朋友，革命還有什麼私情可講嗎？」

老趙一邊說，一邊不停的在搓手，他倒沒有完全失去幫朋友的勇氣，連說：「祇要他真的冤枉了，

我一定有辦法。」他的好勝心很強，臨走時又再補充說上一句：

「祇要他不是那個，我絕對有辦法。」

這一次去後我就一直幾天沒見他，我急了，祇好闖到他的辦公處。

「趙子健同志在嗎？」我問。

一個同志把我打量了很久，然後才問：

「你是那一部份的？」

「我住在中央招待所。」我看看情形不對，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了，但還是鎮靜地從容地回答他。

「你和他朋友嗎？」

「不是，不是，」我立刻否認，又接下去說：「我們不過是同鄉。」

「啊，同鄉，他已經調到別處工作去了。」

我如獲大赦似的，掉頭就走，他又厲聲的叫住我：

「對不住，同志，你貴姓，我們這裡會客是要填會客單的，請你補填一張吧。」

我本來想要聲辯，既然沒有會到人，我有什麼理由非填會客單不可呢？但想一想，自己又軟化了，算了吧，填了吧，老老實實的填吧，把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等等一起填清楚吧。這張「會客單」後來一直被保存在「邊區保安處」，直到我後來在延安被捕以後，也一併拿出當作物證了。（幸好他們沒

有立刻送到中央組織部，否則我後來進棗園的機會也沒有了。）

走出八路軍總部以後，我反覆的想：趙子健難道也是「反革命」，他說，祇要李明不是托派，他一定有辦法，不是撞到鬼嗎？

九

延安的統治者，到處爲「托派」的影子自相驚，究竟托派是怎麼的，主張些什麼，絕大多數的幹部根本摸不清楚，我們所見的反托派的文章，也祇是罵街式的口吻。據說「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現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這麼恐怖，一方面他跟我們之間的具體的形像，觀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據說，「左傾」的機會主義是「托派」，「右傾」的機會主義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名都好像與「托派」有關係的，以後，「托派」的字樣也不准用，祇能稱爲「托匪漢奸」了。

有一次我們在邊區合作社餐室吃飯，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一個邊區劇團的女演員林萍，她在延安已經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畢業，活潑美麗，熱情可愛，時時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邊區認識女同志，沒有人不感到興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單獨住了一個小房間，房內收拾得很整潔，她待人也很富有同情味，態度溫和，心地善良，她雖然沒有特別的好東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給客人一種說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親切而誠懇。她站在你前面，又令你有一種高貴之感。

「聽說你常去看邊區劇團的林萍，是嗎？一招待所的總支部書記笑着對我說。

「是的。」我坦白地說。

「她是有政治問題的，你知道嗎？她有托派嫌疑。她對你說些什麼，她對你談過政治問題嗎？」

「書記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們還從沒有談過政治問題，她也沒有說過一句對黨不滿的話

「你還知道她別的情形嗎？」

「不多，我祇聽說她的未婚夫快來了。」

「這個女人好狡猾，好吧，你跟她多接近也好，不過她說些什麼，你要隨時告訴我。不要中了『美人計』，爲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揚一揚手就去了。

我還照樣常去看林萍，如果現在突然不去，組織上反而要懷疑我了。

這天，林萍的未婚夫真的來了，她裝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祇顧在忙着佈置房屋，看到我，她羞答答微笑的點了點頭，然後又向他的未婚夫看了一眼。半晌，她才說：

「老×，來得好，今天在這裡一起吃飯，我請客。」

「真的嗎？那我却不恭了。」

「啊，我真糊塗，我忘了爲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楊明同志。」
我連忙接上去：「就是你的——」，「楊明」這個名字我已經聽得很熟悉了。

「小鬼，不准你瞎說。」

楊明一直在旁邊冷冷的看着我，笑得很勉強，表情十分不自然，侷促不安。我想，糟糕，他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是不是他因爲林萍和我太親熱了？

我和楊明又連續的見過兩三次，他也漸漸知道我住在招待所，而且也確實知道我是一個可靠的同志，我們的談話也漸趨融洽了。

這天，我們在陝北公學碰到，他拉我在山邊坐下，開始交談。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嗎？」

「我當然沒有你了解得多。」我說：

「你們不是很接近嗎？」

「不要開玩笑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他把臉一沉，搖搖頭，像似很憤怒，又像似很傷感似的，然後又低下頭去。「不，她已經有政治問題了，我和她從小同鄉又是同學，我們在十年前就訂婚了，我也很愛她，我們過去又在一起做過革命工作，這次我很快樂的要求黨把我調來延安，以爲我們就可以結婚了，豈知一到延安，組織上就

告訴我她是一個托派，後來又說是國民黨特務，要我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動證據。你想，這是多麼痛苦的事。」

「那麼，你找到沒有呢？」我迫切地問。

「活見鬼，什麼證據，她懂得什麼，還是那麼一個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麼呢？你能否幫幫我的忙，她究竟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沒有。」

「我也看不出什麼道理，不過，你的心神也應該定定，如果她真的沒有什麼，真金不怕火，組織上也不會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說。

「難道真的不可能冤枉她嗎？」

我沒有答話，我們相對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覺得這句話說得有點「欠妥」，又自己回答了：

「即使冤枉一兩個同志，這也是免不了的，黨不能讓一個反動份子混進組織，破壞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覺，需要嚴密，所謂「以防萬一」，爲了在一萬個同志中防備一個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可能冤枉一些好同志，但，這是爲了革命，也沒有什麼。否則放鬆一個，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了。」

這一次談話以後，我就永沒有再見過楊明，林萍也聽說被掉了工作。

我難以忘記，那個天真的女孩子的影子。

「爲了革命」，「爲了革命」，多少罪惡藉汝之名而行。「爲了革命」四個字像一副萬靈的麻醉劑

，組織上一切的罪行我們都覺得應該寬恕他。

一〇

在延安，有兩個地方我最愛常去玩，一個是陝北公學，另一個是邊區政府交際處的招待所，陝公收容的多半是沒有黨籍的「進步」青年，也許正因為他們缺少黨性，倒還保留着一種年青人純潔的革命氣質。邊區招待所住的，一部份是我們的「客人」，一部份是具有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生活態度的「進步份子」。普通中共的幹部都換上的一套臃腫的棉軍服，這裏是不多見的。這些「進步份子」多半還穿着他們舊有的各式各樣時髦裝束，招搖過市，一般的中共幹部都對他們側目而視，而我却更對他們特別感到興趣。

延安是沒有春天的，直到農曆二月間了，淒厲的西北風還在終日呼嘯，銀色的山頭，雪還沒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還浮着厚厚一層冰。迎着風，攢着柴，抬着石頭，鋤着荒地，年青人過着日以繼夜的刻板生活，沒有波浪，沒有情調，沒有歡樂，沒有趣味，晚上再圍着豆油燈開小組會，這些年青人是可愛的，誠實的，在這個春天的季節，他們却忘記了春天。

延安一般的幹部，每天是七分錢的菜錢，部隊祇有五分錢，開飯的時候，十個人一組，共一小碗菜，一個冬天間，要連吃幾個月的紅蘿蔔。一個夏天，要連吃幾個月的南瓜。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團級以

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湯。再上部長師長，有小灶，兩菜一湯。政治局和毛主席一類人物，則有四菜一湯。階級是被嚴格的劃分着。

「有的同志提出，共產黨既然要消滅階級，爲什麼我們這裡又要劃分成許多等級呢？但是，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爲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我們可以告訴他，主席同志，這是黨的命令……。」素以中共清客著稱的艾思奇（他被中共捧爲權威的哲學家，現在是毛澤東的智囊之一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教授。），有一次在抗大對學生這麼說。

我離開邊區醫院以後，有一天突然想到，在那裏的時候，總還算是交過幾個「朋友」，應該去看看他們。

我停步在一個窯洞前面，裡面有人正在大聲喧嘩。

「我們沒有病，爲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裡。」

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制住。

他們在繼續掙扎，望望衆人，似乎在期待他們的同情，有人在唏噓，有人在嘆息，有人在罵他們有

神經病。這是我在邊區第一次見到的中共幹部公開的反抗的動人的場面。

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

「我們回到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裏來。」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掛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

「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

「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裏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爲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

「你不怕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你嗎？」另一個幹部插口說。

「我們從此安安份份當老百姓，管他反動派不反動派。」

「哈哈，你們不像是神經病，原來是你們的革命立場動搖了。」

大家都笑了，他們也漸漸安靜的難爲情似的坐下來。

沒有熱鬧看下去，大家也就散了。以後也再沒有人關心到這兩個江西佬的事。

從這件事以後，我才開始注意到，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流行得很普遍，患「思鄉病」的大部份是農家子弟，他們往往都是直率的提出「回家去」，十之八九都被上級擋住，也有些開小差的，抓回來就立刻處決。至於知識份子的幹部，他們就聰明多了，當他們在邊區苦得受不了的時

饒，他們絕不說「回家去」，他們可以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不過有的人也是屢次不得獲准。我記得有個女子大學的指導員甘流，因為她的母親在長沙病重，她屢次請假不假沒有准，而且還遭到上級的中斥，組織的批評，同志們的譏諷，她一氣之下，羞憤自殺，死後被草草埋葬。自殺的事屬於「社會新聞」，在延安當然是不准宣佈的。

一一

在招待所住了一個多月，實在有些閒得不耐煩了，我找到中央組織部。

「高同志，我的工作決定了沒有？」

「啊，你，」他似乎已經早把我的問題遺忘了。「一兩天內通知你。」

這個時候，我聽到從前方回來的同志說，八路軍一一五師在晉東南連吃日本人的敗仗，幹部傷亡殆盡，林彪本人也負傷回到延安，由於一股愛國熱情，我頗想到晉東南去，我大胆的向高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他也沒有多加考慮，立刻回答我說：

「你是不適合担任軍事工作的。」

我回到招待所裏，心頭悶悶不樂，因為這時我實在有些靜極思動了。幸好第二天高同志又約我到中央組織部去，而且問題立刻就解決了。

「這是陳雲同志。」高同志把我領到另一個窖洞內，爲我介紹說。說過他就先走開了。

陳雲看上去約四十多歲，穿着整潔的一套斜紋布軍服，歪靠在背椅上，很不在意的向我點點頭，他生得又瘦又小，像個猴子，兩目炯炯有光，很精幹的樣子，枱上堆滿了文件，正在批閱。我站在一旁等了約有五分鐘，他帶着濃重的蘇南土音問我：

「啊，你就是××同志。」

「是的，陳部長。」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中共主要的領導人物之一，共產黨人一向總說是不拘形式，但由於他表現得那麼威嚴，我不由得也拘謹起來。

陳雲繼即翻閱關於我的文件，他選出兩個問題問我：

「你在鎮江工作過的那個圖書館，既然是有陳果夫支持的。他們難道沒有要你參加過國民黨嗎？」
「從沒有，我年齡也太輕，他們似乎也沒有怎樣注意過我。」以下我就大大的罵了一頓國民黨的人都是糊塗蛋，「在國民黨人中間，誰注意過這些事，化錢辦了事業讓我們活動，他們完全被蒙在鼓裏。甚至在我被捕以前，還沒有跟我談過思想問題呢。」

他滿意地笑了。

「那麼，你在被捕後出獄的時候，寫過悔過書嗎？」

「沒有，關於這點我在自傳中已經說過了，那時他們寫了幾個問題要我書面答覆，我抄了幾段「唯

生論」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他們以爲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左傾青年，一定已經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對他們從沒有承認過任何一件活動，他們也沒有再要我悔什麼過，就叫我交保釋放了。」

他讚美了我一齣：「你很聰明機警」，看來，他又是很滿意我的答覆的。然後他又遲疑了片刻。

「你是比較適合合作白區（當時中共人士對邊區以外一律稱「白區」）工作的，你有鬥爭經驗，但是太年輕了，而且黨的教育不夠，現在決定派你受訓去。」

「是到黨校嗎？」我問。

「不，到棗園去。」

他着勤務員去叫高同志來，又要我隨高同志辦手續去。

高同志給了我一封信，要我直接到棗園去找曾希聖（當時棗園的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秘書，現任中共安徽省政府主席），在途中，我又偷把信拆開看了：一件是介紹信，另一件是我的「鑑定表」，「鑑定表」有幾句對於我的評語，大意是：

有組織能力和鬥爭經驗，但具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個性強、驕傲、缺少勞動觀念，組織生活鍛鍊不夠。

第四章 棗園地工訓練

一一一

棗園是延安僅次於桃園的風景區，這裡原是從前一個姓吳的大地主的家園，吳滿有就以獻出這個棗園而換得中共的一個「勞動英雄」的榮銜。（吳滿有後來爲國軍俘獲，在南京和西安等地演說廣播反對中共，現在聽說在台灣。）其實，所謂棗園者也僅僅祇是百十棵棗樹疏落的點綴而已。在這裡逗人注意的，倒不是那些棗樹，而是在園邊那一排別緻的窯洞，這些窯洞的精緻和美麗，在延安的確是難得見到的，洞口另用整齊的石塊砌過，很像一排洋房，山邊的泉水，山前的棗園，配合着這一排洋房式的窯洞，這裡，就是當時中共最高的特務頭子康生（他的原名是趙容，山東人，當時任中共「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人民政府山東省政府主席。）的住宅。進去的時候，要通過兩道傳達，四道檢查，洞口不時有獵狗搖搖尾巴注視你。康生是十分喜歡他的獵狗的，他一共養了四隻，狗和康生一樣享受特灶待遇，一般幹部見到狗餐都羨慕嘆息不置，大有人不如狗的感覺，但是據說這些狗也是擔任警衛工作的

牠自然也就成爲我們的同志了。

我找到曾希聖，他是個四十左右，一個文質彬彬的南方人，十分胆怯，說話吞吞吐吐，猶豫不決，有點婆婆腔，時而「這樣呢」「那樣呢」「好不好呢」，他不敢決定我的問題，又介紹我見潘漢年（現任中共上海市第一副市長），潘漢年當時是中共「敵區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常來往於政府區域秘密指導地下工作，是個滿面堆着笑容，內心十分陰險奸詐的人，他善於化裝，有時甚至在接見自己的幹部時，也化裝一番，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穿着一身中國長袍，戴着深度的近視眼鏡，一看上去，像個道學先生。第二次他着的是制服革履，眼睛上遮了一塊紗布棉花，說是眼睛有病開刀了，一看上去，又像個受傷的軍官。別的同志告訴我的，也是形形色色，各有不同，說他頭髮有時梳得很美，有時很隨便，他不大愛在公共場所出現，爲人多疑。這些大概都是他在長期的地下工作中所養成的習慣。我離開棗園不久，他後來就到「白區」巡視工作去了。

潘漢年沉着老練，處事有魄力，他僅畧問過我幾句話，就招呼一個叫劉人壽的把我編到他的小組去，這就是棗園的敵區工作幹部訓練班，專門訓練地下工作的領導幹部，爲延安最神秘的機構之一。

我們一般的待遇在延安各機構中算是頂好的，和馬列學院一樣，每天有一毛五分錢菜錢，菜裏都飄上幾片肉，份量也多，可以够吃，每日一頓小米飯，一頓羹，或者麵條，另外每月有兩塊錢零用。我們發的軍服也是上好的。

劉人壽（以後上海解放時他又在上海出現，現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秘書）是我們的小組長，我們一組中其他的同志有：汪漪（女，燕京大學畢業，身材苗條，極美麗，以後一段時期行踪不詳，數年後她又返共區，與中共作家劉白羽結婚。）張素琴（女，爲電影女明星張瑞芳之妹，以後行踪不詳。）海稜（四川人，以後負責主持新華通訊社之各地秘密通訊網工作。）王拓（現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際處處長。）劉德甫（後聞在豫被政府逮捕，結果不詳）。艾丁（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機要處長。）黃可夫（原係華僑，後來聽說他到南洋「做生意」去了。）陳健民（以下我要詳細的談到他。）

棗園的學生，一般的文化程度都比較高，開始數星期，我們上課不多，多半發些油印資料給我們的小組討論，其中特別要我們從許多生動的革命史料中去學習，了解黨如何從兩條戰線中展開鬥爭（即黨內的鬥爭）和革命技術，一般的說，我們的學習偏重在秘密組織和地下工作方面，有的同志還要學習一些特種技能。除幾項基本課目由康生、劉少奇、陳雲、楊松、李富春、高崗等人担任外，不少課程是臨時流動加進的。

毛澤東給我們一二個星期作一次政治報告，他的湖南土音很重，聲調很低，缺乏抑揚頓挫，但極富幽默感，常常說得哄座大笑。他說話的時候，總是手不釋烟，每說一兩句話總要咳嗽一聲，似有肺病，當時也沒有現在這麼胖。我記得有一次毛澤東對我們說：「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我們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呢？同志們，我保證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麗的小汽車，和保證你們個個有出洋

的機會。」這種話從一個黨的領袖口中說出，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我聽他親口如此說過。他說得個個同志心花亂放，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的說：「兄弟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在這樣的教育精神下，這些幹部在後來如何不滋生升官發財，貪污腐化的思想呢！

毛澤東的報告，有些簡直沒有一點內容，我們總要照例官樣文章討論一番，然後糊裏糊塗的複述一遍就算交代了。假如毛澤東把白說成黑，黑說成白，地球說成方的，麻雀說成老虎，不僅沒有一個人表示異議，照樣由大家隨聲附和，御用的文人，也搶來發揮渲染，譽爲「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偉大的創造和發展。」

毛澤東在聚國除講課外，他有時也找些同學個別談話，或臨時就直接決定了他們的工作。這些都是屬於最機密的特殊任務。

毛澤東到我們班裡的時候，常常由一個外國人陪着，這個外國人的名字叫馬海德（譯音），據說是德國人，他當時公開的身份是一個醫生，但是從來沒聽說替任何人診過病。

一二一

氣候漸漸溫和，課程却一步步地漸漸加緊，我們這一小組算是特別幸運，班裡兩個最妖媚的女同志都編在我們組裏，給我們這個組生色不少，也給我們以莫大的快樂。訓練班的紀律十分嚴格，同班不同

組的同志不能隨便講話，這幾位女同志，更給我們一種獨佔的機會，我們在得意興奮之餘，常常把「游擊隊歌」改唱成：

「我們生長在這裏，

每一個女同志（原詞爲每一塊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佔去，

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汪漪和張素琴，不僅婀娜多姿，身段動人，而且她們的歌都唱得很好，汪能唱外國歌，張能唱京戲，有些幹部常邀她們到自己的審洞去「個別談話」，聽說唱唱歌就放了回來，這是我們同組的同志常常感到最高興的。

許多中共的顯要人物都陸續在我們班裡出現：

陳紹禹（即王明，當時中共的第二號領袖，後遭毛澤東清算，現在是中共政府的一個小官。）給我們講聯共黨史，但是他祇來過一次，其餘的課一直是吳黎平代的，陳紹禹是一個漂亮的中共人物，講話煽動有力，人極機警靈敏，他說話的時候，全場自始至終，掌聲不絕。康生當時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志萬歲。」當時誰能想到這位喧赫一時的中共領導者以後的命運呢。

吳黎平挾着書本一段一段的讀，史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也曾把他描寫成一個漂亮人物，他還像

個書生，不過老是那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此人現在不知去向，生死不卜）。

劉少奇給我們講中共黨史，其人貌不驚人，面目可憎，醜而且陋，說話的聲音像個女人，他當時的地位是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部長，這或者就是他以後「發達」的資本。他常告誡我們不要存有「領袖慾」，他說：「我們的黨，想當領袖的人，偏給他當不了領袖；一聲不响的人，却可能一步步爬上。」直到劉少奇今天爬到中共第一號紅人的地位，我們才領會到他這幾句話的奧妙。比起鋒芒畢露的王明，劉少奇當時的確是「一聲不响的」。他經常總是那麼陰沉，一臉殺氣，和一副大出喪的面孔，他對我們，從沒有笑過。

講黨的問題的是陳雲和康生，陳雲講的部份是黨的組織方面，康生講的是黨的秘密工作鬥爭技術方面。陳雲在前面已經說到過他。康生是延安高級人士中洋味最重的人，生得一副洋面孔，態度也有些洋行買辦的樣子，喜着馬靴，騎馬，攜帶洋狗，打獵，同時他也是延安最威風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帶上四個以上的警衛員。他說話的時候，也喜歡把中國話「洋化」，比如說「托洛斯基匪徒」，他偏要把音加重拉長，說成「托——洛——斯——基——匪——徒」。

康生的課，大部份是說些地下工作的經驗和生動的故事，很能引人入勝，其中也有不少是經過誇大或故意賣弄自己對黨的功績。他當時很捧王明，他說王明同志是我們黨最重要的舵手。王明在座的那一天，他說得格外肉麻。

另外幾個講課的是：李富春，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個典型的共產黨的奴才，從沒有半

他自己的見解，專在文件上咬文嚼字用功夫，教我們「中國問題」。另一個是高崗（現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當時是邊區黨委書記兼邊區參議會議長，我們常聽他講高談闊論。他給我們講「羣衆運動」，祇看到他嘴唇上下移動，簡直不知道他說些什麼，他的官僚架子還很大，我們一發問，他總懷疑我們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搗蛋。值得我懷念和尊敬的是楊松，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過去擔任過東北抗日聯軍政治委員，所以這時他給我們講「統一戰綫」，他在講課中愛用談話的口吻，並常常問我們有什麼意見，我們的發問，至少他在邏輯上回答得使我們滿意，我在重慶的時候，中共却宣佈此人病死，說是「積勞成疾」，並大大恭維他一番，我暗自爲他悲痛良久，當我決心脫黨的時候，這也是我深思熟慮已久的，爲什麼我們黨內比較好的領導同志，以後如果不昧着良心向權勢低頭，不是被殺，就是「病死」，否則不是脫黨，就是被打入冷宮？

給我們作過臨時報告的很多，其中知名的有：王稼祥，當時的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現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講「中國革命與武裝問題」。羅邁（即李維漢、現任「中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當時的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給我們講了半天對於中國社會團體與政治黨派的調查與分析，據他說：「民社黨黨員一共二十四個人，青年黨黨員不出一百人。」他稱張君勱爲「張排長」，這種挖苦和刻薄「同盟者」（我們黨當時還在和民社黨青年黨講「統一戰綫」呢！）的態度，也就是我們所受的教育。鄧發（當時的工運部長，後來死於飛機失事）給我們講「工人運動」，他說了幾句意義深長的話：

「我們的黨是一個勞動階級的黨，但是現在，一小部份人（！）已經忘本了。」洛甫（即張聞天，現任中共政府駐蘇「大使」，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在「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講話中非常露骨的說：「我們放棄了階級鬥爭了嗎，沒有，民族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部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革命分爲兩個階段，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民族鬥爭的領導權，第一個階段打敗外國的資產階級和麻痺本國的資產階級，第二個階段打敗本國的資產階級和麻痺小資產階級，建立工農社會主義的政權。」

當我們正在延安受這些推翻政府的訓練的時候，周恩來還在政府區域的大後方到處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擁護國民政府」的口號呢！

一四

我到棗園不久，延安就發生張國燾的出走事件。

「張國燾同志出走了。」素來消息靈通的海稜，第一個把這個消息告訴我，他起初說成「張國燾同志」，後來覺得有些不妥，又連忙改口把「同志」兩個字畧去了。

「真的嗎？」

「千真萬確，他到中部縣去祭陵，乘機就溜到西安，投到國民黨去了。」然後他又對我說：「不要說出去，這項消息很秘密呢！」

其實，不久這項消息就已經傳遍整個延安了，當別人告訴我，或者我再告訴別人的時候，大家總照例同樣拖一個尾巴：「不要說出去，這項消息很秘密呢！」

我們正式看到「官方」的表示，還是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的決定」，這以後，才看到延安的「新中華報」和「解放」報上，陸續出現了許多篇攻擊張國燾的文字，等到張國燾發表「告國人書」後，中共的大將都一個個親自出馬，到各個單位作了「政治報告」，每個人也藉此自我表白一番，藉罵張國燾表示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小組會上也以這個問題為中心，展開了討論，我們班上另外發了一份參攷資料，指責張國燾一貫的「反黨」行為，我們又照例把黨的文件背誦，這樣上級才算是滿意了。

那時候在延安的舊四方面軍幹部，顯得格外尷尬，他們過去都是張國燾的舊部，到延安以後，低聲下氣，忍受過長期的中央幹部的侮辱，這時好像一個個又變成嫌疑犯似的，被別的同同志另眼相看。

「當心他啊，他是過去四方面軍的。」有些同志常常這樣警告我。

這時在邊區張國燾的影子已經逐漸代替了過去張慕陶的影子，但我却從來沒聽說過在張國燾走後對邊區進行過任何反黨的組織活動。

也有的同志是替張國燾惋惜的，認為張國燾過去在黨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後來為什麼要跟毛主席作對呢；也有的同志偷偷的議論，張國燾不走是不行的，他雖然已經向中央認了錯，但是這筆賬毛主席

還沒有和他澈底算清呢。

有一個念頭在我心裏轉了轉：

張國燾的四方面軍如果當日沒有在甘肅遭到馬家軍的打擊而潰敗，如果他今日還是個掌握十餘萬紅軍的領袖，我們黨的同志，今天又會用什麼眼光來看毛澤東和張國燾呢？啊，難道權力就是決定真理的唯一標準嗎？

我這樣癡癡的想着，想着，很快的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意識在我心中作祟，「一個布爾雪維克，祇應該無條件信任黨，服從黨。」我悠悠哉哉的又把念頭轉到別處去了。

星期日，我想換換氣氛，閒逛到我那個住過的中央招待所，正有一個陝北土共幹部在那兒放高嗓子丑表功，述說他過去與四方面軍鬥爭的故事：

「當四方面軍從甘肅被國民黨軍隊追得無路可走到達我們關中蘇區的時候，我們首先很客氣的接應他們，又舉行歡迎會招待他們，然後繳下他們的武器，就對他們說：『同志，你們辛苦了，調你們到後方休息去。』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騙到山溝裡，把這些王八龜孫子的四方面軍都活埋了。」

「活埋的時候，那才好玩呢，開始，我們笑嘻嘻的對他們說：『同志，把坑挖好，我們要活埋國民黨軍隊了。』他們果真起勁的挖，一鍬一鍬的挖下去，抹抹臉上的汗珠，還笑着說：『再挖深一點，讓這些國民黨軍隊躺在裏面舒服些。』我們也笑笑，挖好了，我們把他們一個個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

們還以為咱們開頑笑呢，等到我們提起鐵鍬填土的時候，才大聲呼叫：「同志，我們不是國民黨軍隊呀！我們罵：『媽的，管你們是不是國民黨軍隊，老子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說得意，另一個同志大聲的呵責他：

「同志，如果你們真的這麼做，你們就錯了，張國燾犯了錯誤，不見得每個四方面軍的幹部和戰士都有過錯。你們太過火了，我相信這絕不是黨的命令。」

「什麼，不是黨的命令，是我們過火了？難道我個人和他們過不去。我那時是個支隊長，咱們團長要我們這麼幹的，團長說是高崗同志的命令，高崗同志當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們祇認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幹啥，咱就幹啥。」

又一個同志在旁參加表示意見：

「同志們，不要爭論了，爲了革命，任何手段，對付黨內黨外的敵人，都是必要的，合理的，這是我的結論。」

這個結論一出，句句都是從我們的革命經典上搬來的，大家就寂然無聲了。

一五

延安，這個過去荒涼的小城市，一天天的熱鬧了，一到黃昏，街上擠滿了穿着灰棉軍服的同志們，

和剛來邊區的左傾青年男女們，有些幹部們渴慕那些青年們的鮮艷逗人的衣着，這些人使他們大開了眼界，使他們才發現還有另一個世界。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爲之顛倒。「延安頌」的歌聲响澈全城，這個新興城市，充滿了新生之氣，活力充沛，活潑而又緊張，能叫青年們不响往他。每天，南門外都有成批的青年湧到，邊區招待所忙個不休，應接不暇，街邊的小吃館子，一個接着一個開張了，滿座嘉賓，談笑自若。週末的晚上，有「愛人」的同志都可以請假，有錢就到邊區旅館開個房間，無錢就在郊外野合，從表面上看，這個城市真是一片昇平之象。

然而這城市的另一面，却潛伏着我們肉眼所見不到的暗流、時時有着「耳語運動」，比較與權威方面接近一點的同志，有時就帶出一些流言了：

「城門口都在修建堡壘工事，聽說胡宗南就要打進來啦。」

大家面面相覷，有的人漸漸就談到準備跟國軍打游擊的問題上去了。

流言時時傳來，總不外國軍在邊區邊境如何如何挑釁和進攻，但事實上打開地圖一看，衝突的地點又多在邊區以外。黨對外所提出的口號是「一切爲了抗戰」，但在我們的同志日常談話中却很少談到抗戰的問題，日本人似乎與我們沒有什麼相干，照當時的緊張空氣看起來，好像祇有國民黨才是我們的唯一敵人。

然而，當時日本人進攻中國的藉口是「防共」，雖然八路軍也在華北跟日本人打着捉迷藏式的游擊

戰，但那是十分可笑的。日本人爲了他的「政治宣傳」，也終於來了一次對延安的大轟炸。

這一天是星期日，我正從新華書店買好書準備回去，突然聽到沉重的機聲由遠而近，我和週圍的人都在路邊站定了，有人還在懷疑這是不是飛機聲音，有人還認爲這或者不過是國軍飛機到延安上空「示威」來的，誰想到是日本飛機呢。當局從來沒發過這樣的警告啊。當飛機快要臨空，我們抬着頭還在計算呢，一架，兩架……七架，拍拍拍拍，機關槍响了，我們這時才開始向山邊狂奔，轟，一個炸彈就像丟落在我身邊似的，我躺下來，接着又是轟轟轟，嘩嘩嘩，我以爲山塌下來，睜開眼，蔽空盡是沙石，我盲目地繼續向半山爬，一個血肉模糊的人走到我身邊：

「同志，我沒有受傷嗎？」

「啊，沒有，沒有。」

我說着，其實並沒有仔細的看他，他跟着就倒了下去，我把他拖在身邊，這時，天空還响着依稀的機槍聲，飛機已經漸遠，我就乘着這機會把受傷的同志挾到新華書店洞口，裡面的人拒絕我們進去，他說：「已經不能容納了。」我見到裏面實際並沒有滿，再和他們商量，他們不耐煩的說：

「不要再費話了，到別的地方想辦法去。」

我和另外許多驚魂甫定的同志都匍伏在洞口，這時書店內，一個像負責幹部的，指揮另一個同志說

「把他們統統趕開，誰知道誰是放信號的漢奸。」

我祇好把那個受傷的同志，抱到一邊去，再定睛看看自己，也早變成泥人兒了。這次大轟炸以後，延安才公佈規定了空襲警報。

當我由山邊走出的時候，我見到了遍地都是死屍，橫陳在一路上，這些人都是臨時倉卒的往山上奔逃奪命的，他們差不多都是學生的模樣。

延安不是一向說是組織嚴密嗎？這次大轟炸中所表現的混亂，確令許多人有些懷疑了。幸好當局不久處分了幾個不重要的小幹部，才安下了我們的心。然而那一百多個冤鬼，已經從此不能再活過來了。

一六

「做一個共產黨員，最好根本不要有『思想』，或者一直不用『思想』。否則，不是帶來許多煩惱，就會發生『思想問題』了。」有一天在聽過劉少奇的課後，不知怎的，我突然好像有些感慨，對艾丁這麼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連忙問我。

「不是嗎？講『聯共黨史』的時候，這個那個，後來都一個個被殺頭了。這些被清算的人，不是據說都是聯共最初的創造者和領導者嗎？爲什麼一批批老人都在後來成了反革命，或者無聲地死去？現在

說，托洛斯基、布哈林、季諾維埃夫、康米涅夫這些人一開始都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走狗、奸細、敵探，我真不明白，難道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一定要製造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來反對他們自己嗎？今天劉少奇同志又說，過去代表共產國際派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如馬麟，米夫等人，以後都成了托派，那末，究竟過去的中國革命，是國際的主張對呢？還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另外決定了自己的政策？……。」

我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事先並沒有經過多少考慮，而且自以為對黨也沒有存有什麼惡意，祇不過在聽課以後，一時的感觸，湧上心頭，一吐為快，何況我所說的都是劉少奇等人所講過的事實，我所提出的問題，也祇是屬於研究性質。

他沒有等得及聽完我的話，就提起兩隻狗腿子飛奔而去。

我犯了什麼天大的罪嗎？警衛員緊緊的挾着我，把我送進一個窰洞，在總支部書記程緒東面前，他這時筆挺的站在那兒。一見到我就粗暴地問：

「你，你就是×同志。」

「是的，我承認這是我的錯。」我懂得一般我們黨的幹部的心理，不管自己有沒有理由，不等他開口，先自己認了「錯」，讓他的火氣稍許平息下去。

「當然，從一個革命政黨的立場上，」我繼續陳述下去：「爲了黨的利益，黨應該對於黨內的宗派主義者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把無產階級的敵人，澈底的從黨內清洗出去。」

我文不對題地趕快搬出了一大段黨八股，進一步爲自己建立好了「防禦工事」。

「那麼你知道你的這些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危險性和嚴重性嗎？」

「是的，同志，但是我的意思不過是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了解，我的出發點是純潔的。」

「了解，你要了解，你要了解這些叛徒嗎？你要了解這些反黨的思想嗎？」

「當然，同志，我知道一個好的布爾雪維克，祇應該知道自己份內的事，無條件的服從組織，隨時準備犧牲自己，一切服從黨的利益。你應該明白我提出這些問題的動機，在政治上，我絲毫沒有動搖我對黨的信念，但是，我們對黨內的敵人進行鬥爭，應該把他們的鬼臉一個個拉出來剝皮抽筋，毫無保留的讓羣衆澈底了解他們的反動面目，最後廓清反動派和叛徒的殘餘影響……」

他笑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多讀讀史太林同志和黨的文件就够了。」

我大搖大擺的走出來，許多同志都以驚異的眼光看着我。無疑的，從史太林同志的著作和黨的文件中，是不能夠滿足我對於反對派的了解的。但一想到組織的威嚴，我就有些麻木了。當我們最初與共產主義開始接觸的時候，爲一個崇高的理想所吸引，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以後，我發現多數的年青黨員多極易於滿足於淺薄的教條，而且，愈新鮮愈好，對於「昨天」，都很健忘。十之八九都變得麻木了。列寧的所謂「職業革命家」，奧妙之處就在此，一個革命青年到了「靠黨」、「吃黨」的階段以後，思想還

不麻木嗎？一個個生氣勃勃的青年還不變成奴才嗎？還不服服貼貼的，死心塌地的，聽從黨的擺佈，服從黨的鐵的紀律，血的紀律嗎？

但是，從這次事件以後，我當時的確是從內心責備了我自己，爲什麼要「懷疑」呢？是不是我在政治上發生「動搖」呢？動搖，這是一個革命者多麼大的恥辱啊。我覺得，我應該隨時警惕自己，把一切「懷疑」都送掉吧，否則，一個「動搖」的革命者，是要被人譏爲落後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是要受黨的紀律制裁的，是要有嚴重的後果啊！

從此，我覺得我也應該和別人一樣，漸漸變得麻木，不，應該說是變得「聰明」了，遇到「問題」我在腦子裏轉一轉，就讓他含混過去，或者，我順着黨的文件和領袖的文告解釋，但求別人不來挑別我就夠了。

以後的課程中，吳黎平告訴我們，平心如何如何做了漢奸，吳清友的理論如何是一個托派，鄒韜奮的思想如何是一個國家主義派的時候，我當時聽了，直接的感覺都發生了「懷疑」，這些人不都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嗎？黨過去不是一直在竭力捧着他們嗎？他們不是繼續在爲中共散佈「革命種子」嗎？怎麼他們却一變而爲「黨的敵人」了呢？我有些迷惑，但這時我的確已經是一個乖巧的共產黨員，絕不提出疑問，小組會的時候，隨着上級所講的再發揮一番，我竭力克制自己的理智。明天黨裏是另一個講法，我亦復如是。我認爲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是應該如此的。陳雲同志不是常說嗎？黨的意志的一致，是

布爾雪維克組織的基礎。我們的黨性堅強的程度，就全看我們犧牲「自我的意志」，當一個人把「人的尊嚴」磨得差不多了，就成爲一個標準的共產黨員了。

「割掉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放棄智識份子的自尊心，拋棄溫情主義的包袱。」
「我們的一切乃至生命都是屬於黨的。」

有些同志常常用這一切教條激勵我，現在，我算是完全進入被催眠的狀態。「黨的命令，就是真理。」這種緊張的「黨性」觀念，在我的全部靈魂中，已經代替了其他的一切。

一七

「你有什麼工作意見嗎？」

「沒有，我服從組織的決定。」

康生同志在我們這一班將結束的時候，逐一和我們個別談話，我們幾乎全是如此千篇一律的回答他，他也感到非常滿意，覺得黨的這一番訓練到底沒有白費心血。

「啊，你原來學過圖書館的，好吧，你就到黨校去管圖書館吧。」
康生同志繼續對我說。

這時，訓練班的空氣顯得分外緊張，每個同志都大致分派好了工作，彼此皆秘不宣布，好像大家都

在提防別的同志。有的同志，我和他點點頭，他也以為別人要探聽他的秘密似的，趕快閃開。開飯的時候，平日那種熱鬧的場面不見了，這時，每個人都像有一頭沉重的心思，比較起來，要算是我的心頭最輕快了，因為我祇是去管管圖書館呀！

有一天開飯的時候，我撞到一位滿臉板刷鬍子，帶着我們家鄉土音的人，看他的實際年齡，也不過四五十歲。有人偷偷告訴我，這就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他在這裡受訓後，後來就擔任民主同盟工作，長期潛伏在民盟內部，以後在昆明被暗殺身死。

我這時和「白區」的朋友還在通訊，我的通訊處是由一個商店的地址轉交的，正在我快要離開棗園的時候，「白區」的朋友滙給我一筆錢零用，雖然祇是八塊錢小小的數目，但我够高興了。我接到這封信後，不能不找學校當局說一說，包括我和這個朋友的關係及錢的數目，其實他們或許早知道了。但是倘使出於自己「疏忽」，將來發生「誤會」是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的。我和學校當局說明以後，頃刻之間，全班的同志都知道我已經成了一個「大富翁」，空氣頓形活躍，這個拉我請客，那個要我「共產」，我被逼得無可如何，祇好一起拿出請大家一次吃光了。

吃過以後，大家抹抹嘴，油腔滑調的「審問」起我來：

「你的那個朋友是不是資本家啊？」

「不是，不是，人家滙來八塊錢，怎麼能算是資本家。」

「不是資本家，那一定是土豪了，哈哈！」

「這個朋友雖然比較算是有錢，但是他倒是很同情我們的。」

「有錢的——朋友，同情——我們，你真是見鬼了，哈哈！」他們冷笑一陣就一哄而散。

「哈哈！」我也陪着他們不自然的笑着，心裏實際上很難過，覺得他們傷害了我的好心的朋友是不應當的，我無言的目送他們離去。

延安的天氣，一過冬天，很快就接上夏天，這時的氣候悶熱而乾燥，有時早晚和白天的溫度相差距離很大，冷的時候，我們就披上棉軍服，熱的時候，我們就一個個跳進延河洗個痛快的澡，延河洗澡，這是我們最愛的玩意兒，也是最高興的樂趣。男男女女，河上作「鴛鴦戲水」之樂，往來在水中追逐，有的女同志公開向我們挑戰，她們首先用水潑在我們頭上，我們就追過去，一定要她吃口水，或者摟住她，直到她求饒爲止。這種場合，每個人都脫得清光，等級高下的階級身份一點都無從分別，男女間才算享受了一點「共產主義」！

我們多數同志都經常患着感冒，這種感冒，我們幾乎並不把他當作病看待的。甚至其他一些小病，我們也不十分留意，「邊區醫院」這時還沒有搬到城郊來，太遠。「中央醫院」的醫生官僚架子太大，我們也不想常去。此外這時延安就祇有一個由國民政府派去的紅十字會醫療隊，能普遍爲一般同志和老百姓服務，但是我們又受到警告：「那些紅十字會的人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呀！」甚至有時還傳出更爲離

奇的謠言：「紅十字會所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他們負有使命專來破壞我們邊區殺害我們的同志呀！他們奉命在我們的食水裡下毒，散播細菌呀！」

在一次延河中洗滌以後，這時我真的病了，息的是惡性瘧疾，我實在忍不住了，扶病獨自走到「中央醫院」去。

「同志！你的病沒有什麼要緊呀！」醫生對我說。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點藥呢？」我問。

「呃，我說過了，你的病沒有什麼要緊，你不知道我們這裏藥品很困難嗎？」

「同志，我實在痛得不得了，是不是可以先給我一點什麼簡單的藥呢？」

「你有組織的介紹信嗎？」

「沒有。」

「對不起，我們這裡沒有組織上的介紹信是不能配藥的。」

「……………」

我懷着頹喪的失望的心情，再扶着病體回到班裡。

「噢，這裏你們已經結束了，你的組織關係已經轉到黨校，我看，你還是先搬到黨校再給你治病吧，這點點小病算得什麼，我們長征的時候，還帶着病一面行軍一面作戰呢。」

當我向曾希聖說明了我的意思，請他給我一封介紹信去「中央醫院」時，曾希聖對我說了上面一番話。然後他又囑付我：「同志，工作重要啊，爲了革命……。」

於是，我又扶着病，背起行李，走向黨校去了。一路上走走息息，三十幾里路足足走了一整天，到了黨校，我已經面無人色，幾乎立刻要倒下來。但是組織科長楊西光同志却又和我打了半天官腔：

「你有病，怎麼能工作，你爲什麼不先把你的病醫好再來。」

他剛一說完轉身就不見了，隔了大約十分鐘的光景，來了一位管理員，他對我說：

「楊科長吩咐了，你暫時先和勤務員住在一起，恐怕你的病會傳染……。」

「那格够的噢！」一個小鬼提着我的行李，十足四川口音，不高興的帶着我到他們的洞裏去。

這個小鬼（勤務員），後來幾天倒和我處得很好，也很能體貼我，他把自己的被單也加到我身上，隨時來問我要不要開水，有時還特爲燒點小米稀飯，有一天，居然還找到點大米來，後來我的病漸漸好了，送了一件舊線衫給他，他高興得不得了。在這個鬼城裡，雖然是極小一件富有人情味的事，怎能不時時勾起我對這個小鬼的懷念呢。

第五章 「女人到那裏都是一樣」

一八

黨校公開對外，普通都是用「中山圖書館」的名義，實際上「中山圖書館」是黨校內的一個附屬部門，也是用來掩護黨校的。

黨校同學有五百餘人，每人每天的菜錢是七分錢，較棗園爲苦。這裡主要的是訓練黨的下級幹部的。

我到黨校工作，頗不受黨校當局歡迎，起初我總以爲我的病體初愈，影響到別的幹部對我的接近，後來才知道這中間却大有文章。原來棗園訓練班是以訓練「敵區」工作幹部爲中心的，所有畢業的同志都分發到邊區以外的地區去工作，爲什麼却將我一個人調到黨校？據棗園敵區工作委員會向中央組織部說：因爲聽說黨校向中共組織部要一個圖書館人材，去當圖書館主任，而我過去正學過圖書館學和管理過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因此就被當作「圖書館專家」送我到黨校去當「中山圖書館主任」了。黨校畢

業的同學一部份也送到「白區」去工作，雖然黨校和棗園在派出幹部的時候，同樣都要經過中央組織部，但彼此間却常常總有些不十分愉快的事情，棗園爲了加緊對黨校展開爭取地方組織的鬥爭，因此就需在黨校內部做些「了解」工作，以便他們在中央組織部前面取得更有利的發言地位。

我在黨校，除了參加黨校內一般的組織生活外，另由潘漢年介紹給我一個黨校的同學程方善，我們隨時聯系，他就把我們在黨校內「了解」的一切帶到棗園去，我自己得抽空，也藉口到城內去，實際上是去看潘漢年，潘走後，後來我就常和會希聖見面。

「中山圖書館」內有兩間房子，一爲藏書室，一爲閱覽室。全部圖書約五千餘冊，但除了當時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幾種書，每種都在一兩百冊以外，其他的書，實際不出五百種，這樣一個小圖書館，當時連我一共用了六個管理人員，平均一個管理員祇管八十餘種書籍。但這種情形還算好，我後來不久在參觀抗日軍政大學瓦窰堡分校圖書館時，全部不出一百種的書籍，也一樣用了五個管理人員，都是女同志，其中一個正待分娩，另一個正抱着孩子喂奶。我一進去就打趣的說：

「啊，你們這個圖書館好威風，不出一百種書籍，居然有七個管理員。」

「不，我們祇有五個人。」其中一個女同志對我說。

我指着那個大肚皮的和另一個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刻薄的說：

「她們不就是四個嗎？」

邊區所有的圖書館，從來沒有把圖書分類編目過，中共黨局一向就是把圖書當作幾個個體的女同志的。自從「中山圖書館」開始一點制度化以後，我就成爲名揚邊區的一個「圖書專家」了，抗日軍政大學的圖書館，邊區青年救國會的圖書館，都是經過我爲他們整理編目的。

我們的圖書館中，除我以外，其他幾個也都是女同志，她們的名字是：紀潛、夏森、沈璉、殷芝瑤，和他君萍。紀潛和夏森都是四川人，紀潛受過較好的教育，過去在四川大學畢業，以後又在中共黨校學習過，她當時的愛人是鄧拓（現在是中共的黨報負責人之一）。沈璉是抗大畢業，他起初的愛人是抗大教育科長楊雲史（已逝去）。後來的愛人是陳伯鈞（當時的抗大訓練部長，羅瑞卿的左右手，以後却不知下落）。殷芝瑤是黨校畢業，她對任何一個男同志都感到興趣，整天忙於交際，工作最不起勁，她和另一個陝北公學的同學蘇蕙（現任中共中央華南局婦女委員會主任），是當時延安有名的交際草，他君萍有肺病，帶着深度的近視眼鏡，她算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助手。

夏森是五個女同志中最漂亮的一個，生得一對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臉蛋兒，她不多笑，不多說話，一舉一動却都引人入勝，笑的時候，甜而美，兩個酒渦微微露出，舉止很文雅，從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轉中就使人感到，她不僅美麗，而且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孩子。

「你簡直置身於一個「女兒國」了。」有些同志都很羨慕我的工作，常常這樣調笑我說。

「女孩子玩玩可以，當心不要陷入情網，那是對你的革命前途有妨礙的。」又有的同志這樣警惕我

說。

玩玩嗎？我不會，這些女同志有時却要玩玩我呢？戀愛嗎？我好像也不懂，究竟戀愛對於革命有沒有妨礙呢？在這幾個女同志中，夏森確是可愛，她好像對我還不錯呢。但是，她愛我嗎？至於我，我應該如何先向她表示呢？又應該如何先試探她呢？不行，這是不可能的，追求夏森的同志多得很多呢。但是，聽其自然吧，我何必顧慮這麼許多呢？尚使……哈哈！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總要反覆的想過這些以後，然後才漸漸入眠。奇怪，我爲什麼要想這些呢，我真的已「陷入情網」了嗎？

開小組會的時候，我一定要選夏森對面的位置坐下，假如我的發言能博得她的一颺一笑，我就感到全身輕快，爲之雀躍。

夏森，這時已經能給我精神上一種力量了。

一九

延安在經過日本人的大轟炸以後，商人們在南門外二三里處，沿着狹窄的小山溝間搭起一排極簡陋的土屋，就臨時作起新市場來了，這裏每到傍晚，已經逐漸代替了過去城內的鬧市。新市場的背後，有許多曲折的小山徑，有些山窪下或崖石間，常常有一對對情侶喁喁私話，粗大一點的索興就「方便」起來。中共的警察及便衣特務也常常往來巡梭其間，他們留心的却不是男女同志的幽會，而是同性同志間的

私會。

我徘徊了約莫十分鐘，遠遠的看到夏森嫻嫻而來，她雖然和別的女同志一樣棉布軍服，但絲毫沒有減少她的風韻，飄飄然，移動着窈窕的步伐。

「我還以為我已經來得很早呢，你已經先來了。」她一發現我，立刻跳到我身邊拉着我的手說。

「我沒有了手錶，我怕我來遲了。」

「你的手錶呢？」

「昨天賣了。」

「爲什麼。」

我沒有立刻答話，臉先紅了，低下頭來，她催促着要我告訴她，我才慢吞吞的說：

「今天是我二十歲的生日，我沒有爸，沒有媽，沒有一個親人，今天特別感觸，今晚我想請你大吃一餐。」

「你真是孩子，原來你今天是大壽。」

我們雙雙走進一家北方館子，一連點下幾隻菜，做了到延安以來第一次的大豪客。我們先飲了一斤土酒，覺得土酒太不夠勁。又添了半斤高粱，夏森也極快樂，起初她說不會飲酒，也勸我少飲些，但後來居然和我飲的份量差不多。

「夏森同志，我太孤單了，祇有你了解我。」我抬起她的手，輕輕的用我的兩隻手搓揉。

「你有些醉了，我們還是出去散散步吧。」她沒有掙脫我的手，順手把我扶起來。

我們一路走，一路談着我們過去的故事。找到一個掩蔽的地方坐下，我乘着三分酒興，就躺在她懷裡，她不但沒有拒絕，而且也溫柔的偎着我。

「你是什麼時候才『覺悟』和參加革命呢？」我問她。

「那才有趣呢，我本來好好在華西大學讀書，父親一定強迫我和一個『門當戶對』的富家子弟結婚，那個青年我知道他，整天花天酒地，胡調女人，誰喜歡他。我一逃就逃到廣元當小學教員，我父親又打聽到我的地址，還是勸令我回去，據說那個男的父親是『哥子』裏的『大哥』，不給我父親臉，我心腸一硬，就聽了一個同學的話，隨她到這裏來了。」

「難怪你還有這麼多小姐氣，原來你是大家閨秀。啊，那你父親一定是個大地主了。是不是？」

「不准你這麼諷刺我，小姐又怎麼樣，難道就不革命嗎？」說着她故意撒嬌的扭轉了一下身子，接着又抿着嘴笑了。

「我以爲『階級意識』……………」

「你覺得一個地主出身的女兒，階級意識模糊嗎？立場不穩嗎？好多老同志都說我進步得挺快呢！」

我一聽到「老同志」，立刻在我心頭上衝動了一下，給我眼前投下一個陰影。我意識到，許多同志的戀愛，情敵一碰到「老同志」，差不多就完了。

「你爲什麼不說話了，說呀，說呀，真急死人。」她一句句緊逼着。

「是不是我剛才開罪了你，我向你道歉好不好？」

「沒有。」

「你的酒真的飲多了。」

「沒有，假如再來十斤一百斤高粱，我也要飲的。」

「哈哈，你終於開口了。」

我也勉強陪着她笑了，又回到沉默。兩手不停的捻着她的烏黑的頭髮，和摸着她嬌嫩的臉。

「不行，你一定要告訴我，是生我的氣了？」

「沒有。」我在她額角上吻了一下。

「不行，不行，你快說，否則我們從現在起就絕交。」

「絕交嗎？我還是你的主任呀！」

「那麼就不絕交，你快說——。」

「你真的一定要我說。」

「是的。」

「你也要坦白。」

「當然。」

「那麼我問你，你剛才說到『老同志』，你是不是很喜欢他們。」

「老同志新同志都是一樣，有什麼喜歡不喜歡他們。」

「老同志威風，革命歷史長，黨的地位高，特別是參加過長征的同志。有許多女同志最後都被老同志征服了，你有沒有這種虛榮心。」

「我——，你這簡直是侮辱我。」

「羅校長（指羅瑞卿，當時的抗大副校長，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中共特務頭目之一。）是不是對你很好？」我單刀直入的一步逼緊她。

她僵了好一會，起初似乎很生氣，然後托起我的頭，睜大了她那晶亮的眼睛，直線的對視着我：「你不要誤會，我不會愛他的。」

「那麼，你們……。」

「不錯，我們常在一起，那是羅校長說是爲了我的進步，找我談話的。」

我繼續靜靜地聽着，讓她一個人說下去：

「瞧他那四十把開放的年紀了，我怎麼會愛他。」

二〇

第二天早上，夏森故意藉翻圖書目錄的機會，挨到我身邊，順手遞給我一封信。內容大意是說：你的疑心病怎麼這樣重呢？你太神經過敏了。

他這天隨時都在留心我那副沒精打彩的樣子，有時他獨自一個人避在一邊沉思，似乎也頗爲難過，我看了，卻又覺得自己很不應該了。紀潛在一邊看得明白，他一向找到機會總要挑逗夏森幾句，這次他又對夏森揶揄起來了：

「夏森同志，什麼事這麼不開心呀，我們的X主任的情緒也受到你的影響了。」
她們彼此都很有趣的互相看了一眼，我還是沒有說話。午飯以後，夏森跑進藏書室，我走近和她搭起腔來：

「你和我生氣嗎？」

「沒有呀，是你生我的氣呀。」

她又回到她的宿舍，取來她的日記，翻開昨晚的一段，指給我看，上面寫着：

「你這淘氣鬼，我哭了一晚了。」

我一手把她的日記搶着，她用雙手緊緊捏住，一面對我說：

「不行，別的你不能看。」

但是，日記終於到她的手上，我頭也不同，奔向一塊曠地，然後再從容地展開，我記得大概是：
×月××日：羅校長今天送給我幾首歪歪斜斜的詩，我看了好半天，也不知說些什麼，一開門我把它撕了……

×月×××日：今晚羅校長把我關在他的房內，一定不放我走，我衝向門前，他還是一直拉住我，要我陪他多談談，我說：「時間不早了，我要趕回去開小組會了。」他說沒有關係。今晚他顯得比平時格外可怕，我掙脫了他的手，他又幾次撲向我身邊，我一面迴避到門口，一轉身又打開了門，站在門口，我說：「羅校長，明天會了。」他還是照樣對我嘻皮笑臉，招呼我回去，最後他有些老羞成怒了，他說：「夏森同志，你是脫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月×××日：……羅校長的勤務員又來叫我，我說今天我有事，不能來了，他說羅校長說有要緊的事，非去不可。我走在勤務員的前面，偷偷的淌着淚。見面以後，又是沒說上一句正經話，他還是那樣動手動腳，我氣得不得了，真想罵他，但想想又忍住了。

歸來時，我又哭了。羅校長啊，你爲什麼一定要糾纏我呢？

女人，女人，女人到那裡都是一樣啊！

.....
我隨便翻了幾頁，又急忙把日記送還夏森。

「這次你一定要生我的氣了。」我說。

「不，你仔細看看也好，現在你總應該了解我了。」

我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她給了我一個甜蜜的吻。躺在我懷裏，又流起淚來，我低下頭，吮乾了她臉上的淚珠。

「你以後不要再神經過敏了，好好的工作，爲了革命……。」她繼續鼓勵我說。

「噢，誰！」我突然發現門外一個黑影子閃過，大聲一叫，把她嚇了一跳，她惶惑地看着我，當我立起身來，那黑影子已經一溜而過。

我們又相對沈默了一刻，結果還是她首先想到，我們應該開始工作了。

夏森的神魂十分不定，一走出門就闖了一個小禍，慌慌張張的走近桌邊，把桌上的墨水瓶撞翻了，墨蹟濺滿了她一身，這正是不久的將來我們之間惡運臨頭的預兆啊。

一一一

羅瑞卿是現任的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長，在當時的官銜是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由於正校長林

彪常不在校，他的副校長實際上等於校長，所以我們都普遍的稱他爲「羅校長」，我們黨校的總校長——羅邁，却是另一個人。

他是四川人，身材高大，但並不魁偉，瘦削得像一具僵屍一樣，臉上有一個瘡疤，據說是在內戰時期被打傷的。平日極少笑容，說話時有個習慣，總愛惡狠狠的咬咬牙，脾氣很壞，暴躁的時候就拼命直蹦直跳，捶胸蹬足，惡言罵人，每一個部下見到他都像見到活閻王，嚇得不敢抬起頭來。但在女同志前面，他就不同了，喜笑顏開，不停地發出「格格」的笑聲。

我們圖書館的殷芝瑤，是羅邁的特務，我們那天遇見的黑影子可能就是她。我和夏森之間的情形，羅邁自然十分清楚，因爲殷芝瑤隨時給他都有報告。我有時常常發現她賊頭賊腦的在翻我的箱子，在行政上，她雖然是我的部下，我的部下做了我的特務，我就反而奈何她不得了。

夏森的心思愈來愈沉重，我總怕勾引起她內心的痛苦，每當我想和她談談的時候，我就想起她日記上的兩句話：

「女人，女人，女人到那裡都是一樣啊！」

有時她好像也準備和我說些什麼，我總是先安慰她：

「夏森，我是了解你的。」

我能忍心和她說些什麼呢！

夏森的臉色漸漸由憂鬱變得蒼白，又變得浮腫，她還是奉命繼續常到羅瑞卿那裏去，但是我知道，她好幾次都是哭着回來的。

不久之後，夏森被調出我們圖書館，說是調了工作。這天我正好因事外出，回來的時候，她的全部行李都搬光了。

所有的同志都冷笑的看着我。

我默不作聲的回到自己的宿舍內，假裝睡了一會兒，我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在態度上保持鎮靜，又回到圖書室內照常工作。

一兩天後，我逐漸聽說夏森已調到抗大擔任教育幹事，以後她約我在新市場我們原來幽會過的地方見過一次面，沒有講多少話她祇是嗚咽下淚不止，我們同走出新市場，她才擦乾了淚痕，我祇連聲要她好好保重自己。我們又約在第四天仍在原地方見面。這天，我等着等着，一直沒有晤見她。每當抗大的通訊員到黨校的時候，我又留心有沒有夏森給我的信，因為她上次的條子是通訊員帶來的，但是一次次都帶給我失望，我想，難道我們之間這一次的晤面，竟成爲我們最後一次了嗎？

夜間愈是失眠，小便愈多。這夜在我小便時，見到皓月當空，萬籟俱寂，頓時百感交集，也勾起我的相思，我就獨自在山邊流連了片刻。突然一隻粗大的手掌牽住我的衣領，另一隻手持着駁亮槍對着我

「來，跟我走！」

他把我又交給另一個警衛員，沒有等得及讓我聲辯，就把我關進一個小小的禁閉室，天亮了，經過警衛班長的詢問，把我送總支部，組織科長楊西光走來又把我審問一頓，然後哈哈大笑說：

「你情場失意了，失戀了。」
結果他們就把我釋放了。

這項消息不脛而走，頃刻之間傳遍全校，乃至又傳到抗大去，羅瑞卿却於這天下午在我們黨校出現了，他一到黨校，就找我到羅邁的房內談話去。

「你人很聰明，也很年輕，祇是爲什麼不把你的聰明和智慧貢獻給黨，給革命，給工作……」

「……」

這個突如其來的談話，也可以說是警告，很出我的意料。我像受了催眠一樣，呆呆的立着不動。

爲了革命，爲了他是長征的老同志，我應該犧牲我們的愛情嗎？不，夏森是愛我的，我應該再寫信約他談談。

我終於鼓起最大的勇氣，大胆的寫了一封信給她，由通訊員帶去，然而結果像石沉大海似的，我始終沒有獲得她的回信。

她變心了嗎？不，不會的。

然而，不久之後，却聽說她和抗大的訓練部長陳伯鈞同居了，這不是更奇怪嗎？夏森會移愛於陳伯鈞嗎？還是由於羅瑞卿爲了自己難以告人的原因，「賞給」陳伯鈞呢？陳伯鈞又是沈萍的愛人呀，他們之間又是如何變化了呢？簡直是一篇糊塗賬啊！

一一一

我披頭散髮，瘋瘋顛顛，整天神色不定的在校內來往徘徊，總支部又特地找我去談了一次話，說了一套膏藥經：

「你工作情緒不好，完全喪失了一個布爾雪維克的品質……。」

在小組會上，我也受到同樣的批評檢討。

「從現在起，我一定要好好安心努力工作，同志們，我錯了。」我含着淚，帶着顫抖的聲音說。

然而，是不是真的我錯嗎？我不敢聲辯。反正，現在已經到了應該把過去的一切完全遺忘的時候了，夏森，讓她在我的心靈上死去吧。然而，走在路上，我却又浮起她的影子，我希望能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路上遇見她。

但是，無論如何，我現在應該照常的積極工作了。

一個秋涼的下午，我們黨校正舉行審判「托匪漢奸」的大會，我毫無表情的隨着同志們走到「七一廣場」（「七一」是中共的建黨紀念日，這個廣場即命名為「七一」）上：

一羣激動的同學圍着場子，在高呼口號，唱着國際歌。當中擺着幾隻檯子，旁邊坐着我們黨校的負責人和其他邊區黨校，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等單位的代表。正中立着一個囚首垢面的年青人，一副哭喪着臉的可憐的樣子。大概就是將要審訊的「托派漢奸」，由幾個荷槍實彈的武裝同志押着。

審訊開始了，先由十八集團軍邊區留守處宣佈他的罪狀。我祇模糊的聽得，該犯是山西人，名字叫郭其華，於一九三五年在山西參加托派組織，以後又受過日本特務機關的訓練，於雙十二事變時過黃河派來邊區搗亂，偽裝革命，混入組織，被捕前已經擔任十八集團軍的營級幹部……。

審訊開始的時候，起初「犯人」還想答辯，但是終於敵不過羣衆的叫罵聲，喊殺聲，他祇好俯首一一承認。

「你供給過日本特務機關的情報嗎？」

「嗯，是的。」

「那是不是托派的組織命令你做的？」

「嗯，是的。」

「你奉命散毒，放火，暗害革命首長，準備軍事叛變……是嗎？」

「嗎，是的。」

「……………」

「……………」

這幕戲故意放在我們黨校演出，顯然是有特別意義的，因為一般同志對於當時黨的宣傳說，托派與日本人勾結，多半是有些懷疑的，這次公開審判，不就是活的黨的教育嗎？

被審訊的「犯人」，這時是以演員的腳色出現的，在他臨死以前，黨經過週密的佈置，導演這幕戲，希望能對黨發生教育的影響。一個意志薄弱的人，在死亡的威脅下面，他們祇好隨着導演者的手法去擺佈，導演者又欺騙他，如是你如此這般的承認了，還可能獲得意外的「赦免」的機會。一種低級的本能——在死亡的前面延長生命的喘息和期待僥倖的心理支配着他，當這個可憐亦復可鄙的人最後被宣佈死刑的時候，立刻臉色慘白，正掙扎着要說些什麼，已經被槍柄先打昏在地上，隨後就被挾出人叢中，在山邊一槍斃命。

這個短時期內，據我所知道，在邊區，特別在延安，陸續逮捕了好些人，其中我直接認識的有三個：一個是沈堅，他原是在正式大學中學理化的，後來被派在邊區難民工廠當技師，一天機器的螺絲釘脫落，出了毛病，政治指導員一口咬定是他故意破壞的，他辯說這是機器太陳舊的原因，後來黨支部開

會討論的結果，也認爲他有「國民黨特務」嫌疑，就此被逮捕，以後下落不明。

一個是「新中華報」的編輯劉毅，他寫好一篇文章交到總編輯向仲華那兒，向仲華沒有用他的稿，却把他的稿交到黨報委員會，告發這篇文章有托派觀點，於是劉被傳談話，一談數月，後來寫了悔過書被逐出邊區。這個姓劉的在上海「解放」時，又以丑表功的姿態出現，向中共邀功，到處打聽我的住址，以便向中共出賣我。

最後一個是徐景任，他是我的小同鄉，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認識，也就此搭上封建的同鄉關係。他自稱是老幹部，參加過長征，對我大擺其老幹部的神氣，但似乎又極不得意，時而微露出不愉之色。他又自稱是在邊區政府任秘書，但又整天在邊區招待所與新來的女同志鬼混胡調。後來有好多天我沒見到他，他的一個女朋友告訴我，聽說他已經在數天前被捕了。

第六章 捲進黨獄

二二二

我現在已經調了工作，中央組織部通知我的時候，也沒有說明什麼理由，我也不便問什麼，我當時祇覺得，或許由於我在黨校後一段時期，爲了戀愛的波折，工作表現不好。我絕沒有想到其他方面去，更沒有想到任何政治問題上去。羅瑞卿這時已把我告到中央組織部，說我思想有問題，政治有問題，參加秘密的小組織，有托派嫌疑……，這一切，我還被蒙在鼓裡呢。

我已經被組織上當作偵查的對象了，但是我新調的工作是「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新華日報」是當時中共最大的機關報，先在武漢，後在重慶出版），依然十分重要，假如真的我在當時有反黨活動，這項職務對於我是更便利的。爲什麼黨在當時既然一方面已在開始偵查我，一方面却給我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呢？這似乎是一個謎，但也極易於瞭然，因爲他們就妙在已經對你佈下天羅地網，而又不動聲色，再看你如何來運用這樣一個機構。

我這時的工作表面上是受徐冰（邢西萍）領導的，徐冰當時是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的秘書，（以後在重慶是周恩來的政治顧問。軍調部時期，作葉劍英的政治顧問，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長）我屢次去請示他工作上的意見，他總祇是陰陽怪氣的笑笑，或者簡單的敷衍我幾句。另外有兩個辦事處的同事，表面對我忠實，實際上都在做我的特務，有心看我的笑話。一般的共產黨員都受的是特務訓練，平時過的是特務化的組織生活，在他全部的行為上都養成濃厚的特務習慣，當上級告訴你說某一個同志有某項政治嫌疑，即使是平時表面上十分要好的朋友，這時也得在上級前面把你挑剔指摘幾句，甚至大罵一番，因為愈如此愈能表示他對黨的忠誠。當組織上繼續指令他偵查你的時候，你平時的說話都可能會被他斷章取義，生活上的細節，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有人為你報上去。反映上去以後，他覺愈大愈嚴重愈對他們有利，他說不定也可以由此可獲到上級對他的特別青睞，以犧牲同志作為自己受祿登科的階梯。這樣一來，在一個單位內，同志間往往都在互相監視中，每個同志都向上級報告別同志的一舉一動為榮，殊不知自己也同樣在別人的監視中。結果是我們全部都在組織的戲弄中。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自然喜歡到處鑽鑽，何況我是一個黨報的記者，我覺得我的職責應該出去跑跑新聞。我何會想到，我已經在暗中被監視了。

由於官僚主義的普遍流行，中共當局是從來不把新聞記者當作一回事的。他們祇相信有了政府的公報就夠了，新聞記者這項職業實在是多餘的。或者，頂多也不過是寫寫中共要人的訪問記吧了。

中共的官僚主義即使當時許多中共的負責當局也並不否認，爲什麼這種官僚習氣如此普遍呢，這原因一是官僚主義與獨裁政治是分不開的，有了政治獨裁，就必然產生官僚主義。二是由於延安雖苦，但拿延安比起長征時代。生活已經安定得多了，多數幹部都流行着太平觀念，而且他們初嘗做官的味道，有時也愛故意擺些威風。有一次，一批抗大，陝公畢業的同學，被決定派到前方去工作，他們被開置在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招待所，一住就是幾個月，無人過問，這批青年都還有點稚氣，他們都熱血沸騰，決心想到前方去打日本人的，在這種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下，當然心中有些不忍，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外長），被這羣青年團團圍住，堅持要他答覆工作問題，王稼祥起初想把他們嚇跑，但圍上的青年愈聚愈多，有人甚至致抬出「毛主席」的大帽子，對王稼祥說：

「王主任，你不管，我們就祇好直接寫信給毛主席了。」

「王主任，革命也該有這些官僚作風嗎？」

「好了，我就是官僚就是了，」王稼祥厚着臉皮，堆着假笑，刁滑的把大家也引得笑起來。

他們輕視乃至敵視新聞記者的原因，也是與獨裁政治分不開的，因爲他們的政治地位，不是依靠公衆輿論，而是依靠權力建立的。其次是由於他們在新聞記者前面的自卑心理，害怕新聞記者。當「邊區臨時參議會」舉行第一屆大會的時候，我以一個黨報的記者身份去會見高崗（當時的邊區參議會議長）

，他站在大會堂前，披着軍服，嚴肅的看着我，我本來早見過他，但是他裝得對我毫不相識的樣子，當我說明了來意後，他很不耐煩的說：

「新聞記者的事，我們這裏不管。」

「高議長，這不是你管不管的問題，這次參議會表現了我們邊區的民主精神，應該向全國報導，這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這關你啥事。」說着，他把頭看向別處，聳聳肩膊，跟着就走開了。

我不知又爲了什麼原因，突然被中央組織部通知把我調到邊區醫院擔任文書，當時邊區醫院已經遷到延安近郊，我祇直覺的感到，我是被降級了。誰又知道他們已經正在醞釀，將如何處置我呢！

二四

我上次離開邊區醫院，這次再回去，整整又是一年，這次我是以職員的身份回去的。從外表上看，邊區醫院的設備和規模都比過去進步得多，也有了幾位像樣的醫生，正因爲我這時是一個職員，對於醫院的了解也遠較過去爲透澈，這時醫院兼替老百姓診病，院中的藥品雖然照樣困難，起初我很奇怪，爲什麼有些老百姓却比我們自己的同志易於獲得較好的醫藥，這是真的「爲人民服務」嗎？不是，後來我才知道要用較好的藥物是需要化點黑錢的，我們的高級幹部或者富有的老百姓都有這種機會。院中的藥

品數量祇有一個粗枝大葉的估計，從來沒有嚴格的統計。病人的伙食除菜錢外，另外每人一天有二十四兩米，小米一半，另外是大米和麵粉，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這吃剩的米麵和尅扣的菜錢，就由政治人員把他賣給老百姓，大家分化。院中的醫生和政治人員常常對立，但關於貪污的部份，則彼此互相照應，醫生偷賣藥品，幹部尅扣伙食。一般的小幹部也默不作聲，倘使你告發了而拿不出真憑實據，則他們就可以反過來指你是特務造謠破壞，而你倒可能首先鋸鐐入獄了。

醫院中有一部份是隔離病房，既名之隔離病房，當然總有幾分神秘和恐怖，我有天無意之間閒逛到那兒，一個背槍的小鬼從土堡中鑽出來阻住我的去路。

「同志，你是那一部份的？」

「我是邊區醫院的。」

「這裡不能通過，趕快走！」

我折回來，當然也不便於表示什麼。有一天和一位醫生在隨便聊天中談及這件事：

「隔離病房中住的是些什麼病人？」我問。

「你去過那裏嗎？」他神情極度緊張的注視着我。

「我無意之間經過那兒，看來倒森嚴得像一座軍營呢！」我又接上去問：「你們醫生，一定知道那裡的病人了？」

「那真是病人！應該隔離的病人，院方不准，說院裡病房不够用，等等再說。後來聽說就給別的部份借用，我們就不清楚了。」

「別的部份？那一個？」我好奇的追問。

「誰知道，聽說那裏還住了一個過去的部長和兩個高級政委呢。」

他很不願意再把這個問題談下去，我們以後就轉了話題談些別的了。

後來，不久之後，這個醫生在我們醫院中不見了，我聽說他「調了工作」，實際的原因是，他醫死了一個據說並不該死的幹部的病，政治人員硬指他有政治嫌疑，故意用錯了藥，把革命幹部暗害了。他「調了工作」以後，從此就沒有了一個同志再見過他。

我在邊區醫院工作的時候，每天非常安閒，抄點報告表之類，每星期頂多祇有一兩次，這時我倒有很充份的時間自己讀讀書，有些在延安比較知名的文化人，我常常愛去看看他們，其中有：

艾思奇，他現在是中共的權威哲學家，自稱是中國的米丁，初到延安時頗受歡迎，但因為他不及別的中共幹部一樣善於詞令，以後被逐漸冷落。有一次我去看他時，他正被沸水燙傷，我替他找到高粱酒代替火酒把棉花浸入，臨時敷在上面，後來多餘的酒，我們就共飲了。飲酒的時候，他時時搖頭嘆息。現在似乎在毛澤東身邊很得寵，兼在華北革命大學教書。

李初黎，他是早期創造社的人，以後在日本很久，這時他在延安擔任「敵軍工作訓練班」的主任。

他愛飲濃茶，爲桃園茶室的長期茶客。現在是中共中央人民 府華僑事務委員會辦公廳主任。

柯仲平，一個神經質極重的詩人，健談，愛飲兩杯酒，他當時是邊區文藝協會的負責人，辦有一個小刊物——「邊區文藝」。現在是中共西北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任白戈，他也是搞哲學的，極看不起艾思奇，因爲他過去在上海辛樂書店（據說是托派的文化出版機構）與葉青等人共事過，所以當時在延安極不得意。現在是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

徐懋庸，也是個極不得意的文人，過去在上海與魯迅筆戰成名，當時擔任抗大一個大隊的教育科長，對於過去的事一字不提，整天翻書本整理教材。常常喜歡不自然地笑笑。現在是中共中南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武漢大學教務長。

除這些人外，我另外有時看看一些舊朋友，有少數是從上海去的，有少數是後來在延安熟識的。由於戀愛問題的打擊，我偶爾表現一點消極或說些風涼話則間或有之，至於參加任何反黨的小組織，或從事任何反黨活動，則根本是白天見他媽的鬼！

但是，不久後，我終於爲這項罪名被捕了。

當我被捕以後，我才知道，我的工作調來調去，都是羅瑞卿搞的鬼。他爲我羅織罪名，佈置好一個圈套，一個不成，再換另一個，待有機會，就把我捉去。

邊區保安處最初找我去談話，一談就談了三個鐘點，開始從我的家庭出身問起，後來就問到我參加革命的經過，他們又問到我對李明的認識，和上次去看趙子健的目的，我都一一照直說了。這時是由一個不十分重要的幹部主持的，當他問我認不認識一個叫薛敏這個人的時候，我說從不認識。他又問我知不知道「新哲學研究會」這個組織，我也說不知道。他繞繞圈子，又再重覆的問我這些問題，我依然回答不知道。天啊，我委實一點也不知道啊！

審問的幹部急得臉色發青，滿面殺氣，揚一揚手，招呼另外兩個同志走開，然後，突然好像又變得很斯文的對我說：

「你說，你照直說吧，這裡沒有別人，沒有關係，我總幫你忙的，『新哲學研究會』會員名單裏有你的名字，你賴是賴不掉的。我相信你也祇是被騙參加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的。」

「我委實一點不知道，要我說什麼？」

他狠狠的望了我兩眼，又接上去說：

「你好好說出來，立刻放你回去，否則的話，哼哼……。」

一會兒，一個面目姣好穿着整齊制服的中年人走進來，立刻，審訊我的那個幹部就迴避在一邊，進

來的人，我認識他就是周興，當時是邊區保安處長（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長），他正對我怒目而視，最初審訊我的那個幹部又走近輕輕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他陰險的對我說：

「已經派人到邊區醫院拿你的鋪蓋了，住在我們這裡也是一樣的，沒有什麼不舒服。」

現在，我算是失去自由了，我被帶進一個漆黑的窰洞，我一進去，就摔了一交，剛一站起，又踢倒另一個犯人。

「唉呀，好小子，瞎了眼睛嗎？」

他隨手也回敬了我一拳。

我定一定神，才懣懣的看出，這個窰洞裏，數數連我一共是十一個人。

接着，我的鋪蓋送來了，裡面被翻得不成樣子，再看看，我的讀書筆記和幾件較好的衣服都不見了。

犯人是被規定要勞動的，我們這一組是派在挖新窰洞，由武裝士兵押着，我們一早就在警笛聲中，匆匆集合出發工作，其中有幾個犯人罪嫌較重的，身上被套上紅色的外衣。除了偶爾相罵以外，犯人間不准交談，所聽到的祇是一片「砰砰」「沙沙」的聲音，我挖了不上十鋤，手上就起了水泡，後來被改充用斧箕搬運沙石的工作。

第五天，我又開始被審訊了。

「在你的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光明的路，向黨澈底坦白，另一條是毀滅的路……。」周興一開始就對我這麼說。我全身打了一個冷戰。

「你不要狡滑，照直說了吧。在我們這裡，鐵打的，鋼鍊的都要軟化的。」另一個幹部又說。

「同志，我的確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句話剛落口，周興立刻吼起來：

「不知道？你是不是參加過『新哲學研究會』的小組會議？」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團體。」

「媽的，老子親眼看過你們在十里鋪（距延安東門外十里處）的一家小館子集會。」

周興身邊冒出一個小幹部，一面說着一面就拿起手邊的一根粗杖，沒頭沒腦的向我亂敲，崩，崩，崩，如雹子似的落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我閉着眼睛，用全力支持住我的身體，耳朵翁翁的亂叫，等到我睜開雙眼時，周興已經走開，那個執着棍杖的傢伙還在繼續的問：

「你究竟說不說？」

我起初沉默了好一會，表示無言的抗議。當他繼續問我的時候，我反問他：

「同志，你剛才說見到我在十里鋪開會，究竟是那一天？還有別的一些什麼人？」

「你先說，我再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說的。」

他吆喝一聲，幾個武裝同志七手八腳的把我拖到老虎凳上，雙手吊起，大腿用繩子綁在凳上。上面坐着一個滿面橫肉的彪形大漢，然後將我的小腿用棍子往上撐，骨頭吱吱的發出響聲。

一塊，兩塊，三塊……。

「你說不說？」

「我不知道，同志……。」

「再加！」

我這時不知怎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他們以爲我屈服了，又把我從癱瘓昏迷的狀態中扶起來。

他們又繼續對我進行疲勞審問，我對他們說

「同志們，我爲了革命，參加黨，受過千辛萬苦，冒着無數艱險，爲黨工作，今天你們把我打成這個樣子。但是，我對黨依然沒有怨言，我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子弟，我是黨的好兒女，我以爲黨爲了保衛革命利益，對敵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們鄭重的處理我的案子，如果證明我確有叛黨行爲，我願以生命抵償。」

在半個月以後，我們這個審洞內，提出兩個犯人，不知他們是被處決了，還是被釋放了，反正不會有人知道的。另外，我們這審洞中又增加了一個新「犯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勞志修，江西人，他一進來以後，就常常發牢騷，把共產黨罵不絕口，他罵的時候，別的犯人就向他伸伸舌頭。後來不久之後，這個勞志修就找機會和我接近，對我表示十分「同情」的樣子。我一開始就懷疑這個傢伙，後來他更大胆地向我談起黨的路綫問題，說黨出賣了無產階級革命，我力斥他的觀點錯誤。他屢次糾纏我，屢次又被我用黨的觀點駁得啞口無言，有一次我很不在意的問他：

「同志，你是什麼罪嫌被捕的？」

他支支吾吾，吞吐了半天，才想了一個罪名來。

「哈哈，我也是政治犯！」

他的馬腳已經完全露出來了。

他住了大概祇有十天，後來就不見了。我相信這個假犯人出去之後，一定很幫了我的忙，因為他可以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我的腿部漸漸鬆動，又恢復了勞動。一次我們工畢返來，遠遠瞥見殷芝瑤正經過那兒，她也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來，我却睜大眼睛多看了她兩眼。

兩個月以後，我由邊區保安處遞解到中央組織部，離開邊區保安處的時候，我奉命具了一個結，不

得將內部的情形洩漏，否則要受革命紀律最嚴厲的制裁。一到組織部，我就等於被釋放了，這次和我談話的是樂少華，因為我在獄中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我表示我始終忠於黨，忠實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我表示我對於自己個人這次冤獄並無怨言。假如黨給我一次最後的機會，我願意到任何最危險的地方去工作，爲黨作一次最後的表現，甚至隨時犧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顧……。

樂少華把我這封信轉呈上去，中央組織部再交給樂少華處理，要他簽具意見，同時並負責重新審查我黨員資格。

樂少華和我談過幾次話後，我相信他在良心上一定了解我這次的冤獄——假使他的良心並未完全泯滅的話，他爲了謹慎起見，決定暫時停止了我的黨籍，但是却同意了我提出的工作意見。

「你到安徽蚌埠去，準備做高冠吾（當時僞組織的「安徽省長」）的工作，這一工作十分艱巨，你先要打進他的公館做一個時期工役，你的任務是掩護……，詳細的情形你一到蚌埠就寫封簡單的信給四成巷二十七號之一鄺發盛先生，你本人千萬別去那兒，自會有人來找你，然後，他們會指示你一切的……。」他一面吩咐，一面接上去又說：「你到蚌埠的時候，不要住在旅館裏。」

「但是，我在蚌埠並沒有熟識的親戚朋友呀！」

「那麼——」他皺眉頭，猶豫了片刻再說：「有一個僞區長，你可以先住到他家裏，不過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到西安辦事處再說，我另外寫信給西安辦事處的柳樹春同志。」

他可能知道我此去是凶多吉少的，因此又假作慈悲的說：

「不要過分緊張，這工作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他拿出一疊老法幣，數一數一共是二十六元，對我說：

「這是你的路費。」

二七

這已經是延安的春夏季節，河水已經解凍了，河身雖濶，但水倒極淺，有時水不過膝，站在浮橋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底的石子，有時發水時，水又流得十分湍急。

這時延安中共當局正在組織生產運動，這真是一幕騙人的大喜劇，毛澤東和朱德在自己園內種了幾棵花，就算起了「帶頭作用」，所有的幹部、士兵、學生一律抬着大糞，揷着鋤頭，上山開荒。原因據說是爲了「衝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以求「自給自足」。

我們還記得，黨不是在不久前還宣傳過邊區是「豐衣足食、物產豐富」的「模範抗日根據地」嗎，會幾何時，我們黨又要號召「克服困難」了，縱然有「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他也僅僅祇限於工業日用品方面，何以我們的糧食和蔬菜都發生問題了？這是一個謎（直到我後來在皖南作地下工作時才揭穿，我在後面再述），反正一般的中共幹部都是善於健忘的，他們對於黨昨天所說的話早已忘得乾乾淨淨，

這些可憐的孩子們，黨今天說些什麼，他們就要跟着一步一趨，一點不能走樣，實際上他們祇有那麼一點小天地啊！

毛澤東的興緻倒很好，當生產運動如火如荼，軍民整天汗流夾背的時候，他這時還有閒情逸緻乘車兜風，這時毛澤東已經有一部小包車了，這車是海外華僑獻給抗日將士作救護車用的，車過延安，就由毛留作私人座車了，車上永遠是老毛携着藍蘋和一個司機兩個衛士。藍蘋已脫下海勃荊大衣換上另一套深紅色的春裝，她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這時又有一個無恥下流的影人袁牧之（現任中共中央電影事業管理處處長），通過藍蘋的關係，纏着毛澤東，要以毛和藍蘋為男女主角，一搭一檔，拍一部影片，據說是爲了作幹部「示範」的，毛澤東或許是出自好奇心，或許是爲了討得藍蘋（藍蘋原是電影明星）的歡心，一口答應了，延安是沒有攝影場的，因此他每天照例要到南門外大校場上，塗上胭脂，忸怩作態，粉墨登場。我這時因爲快要離開延安，沒有參加生產運動，就常到南門外去看毛主席拍片子，他所拍的這部片子，後來不知怎的胎死腹中，大概是成績不佳。這已經早成了被人遺忘的故事，這個殺人魔王，還一度做過「明星夢」呢？

陳紹禹（即王明，過去的中共第二號領袖，現在是中共法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這時也在延安，他倒時常獨自漫步在街頭，也不帶一個警衛員，低着頭，不發一言地，沉重的脚步聲中若有所深思。

陳紹禹的才采，演說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態度，都深得一般青年對他的好感。當他初從蘇聯回延安

的時候，毛澤東在機場上鶴立二小時之久歡迎他，他一下飛機，毛澤東就奔過去抱住他，狂吻不已。一路上擁擠着歡迎的幹部，搖着小旗子，口號聲不絕，街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

「歡迎世界革命的領導者王明同志。」

「擁護我們黨的英明的領導者王明同志。」

「王明同志萬歲。」

陳紹禹後來就在武漢擔任中共代表團的團長，他的才華橫溢，鋒芒畢露，以此就種下了他後日遭受清算的禍根。

陳紹禹後來從武漢回到延安時，毛澤東對他很冷淡，不久他到黨校作過一次演講，講話將結束的時候，他特別呼籲「全黨團結」，當時我們倒並不十分有異樣的感覺，以後當他遭遇厄運時，回味這些話就令人有些感慨了。

不知道什麼人替毛澤東出了一個好主意，把陳紹禹派在女子大學當校長，第一可利用娘子軍把陳紹禹綁住；第二他個人不能有所活動，否則就可以藉女人的題目打擊他；第三，這可以表示毛主席「寬大」，黨不是不給他工作呀！

黨內領導機構鬥爭的暗潮在激盪着，不過還沒有表面化吧了。

當時延安有些幹部在背地議論，對毛澤東和藍蘋同居的事頗表不滿，其中一個同志就說：

「王明同志也是這麼說的。」

我快要離開延安的前幾天，有一個同志（我應該稱他爲朋友，因爲他以友誼待我，在黨內是頗不容易的，我祝福他能在今天還健在，並能從人性中澈悟。爲了他的安全，我不便寫出他的姓名），他深知我這些時在黨內所受的委屈，偷偷的對我說：

「你不妨去找王明同志談談，或許——」
但是我一直沒有這樣做。

再會吧，延安，這時大約是一九三九年的六七月間，我在延安一共住了一年半，在一年半中間，竟發生了這許多的事故，現在我能對延安說些什麼呢？在當時，這城市不失爲一個有朝氣的地方，儘管我個人有許多辛酸的不幸的遭遇，我還是愛他的，何況，我覺得，在一個偉大的革命浪潮中，個人的微波又算得什麼呢？更何況，我是爲着一個崇高的理想來參加革命的呀。我懷着個人沉痛的創傷，但是在政治上，我的脚步還是穩定的，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我離開了延安。

海濶天空，人事茫茫，我這個年青的孩子，過去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託在黨，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委身於組織中間，現在，我又要重新摸索了。

二八

迷惑地想

離開延安時，我是獨自步行的，以後在路上，我們逐漸結合到七個人，我們彼此間都不談各人的「政治問題」，結合在一起，替着小隊子生活方便；二則爲了互相照顧；三則爲了共同戒備。遇到檢查哨，各人都各自拿出自己的路條來。

其時，分發到全國各地的幹部都經過西安，乃至到華北工作的幹部，都要打從西安經過，比較順利，所以這條路上是頗不寂寞的。

政府所辦的咸陽「勞動營」，專門與中共展開爭奪青年的鬥爭，他們在沿邊區的邊境，設立了許多「青年招待所」，我們走出邊區，一不留意，就會落到他們手裡。我們在邊區所聽到的關於咸陽勞動營的消息是極端恐怖的。

那時邊區的周圍，已經從政治磨擦演變到零星的局部戰事，我們一過郿縣，空氣頓形緊張，郿縣以南三十里鋪，共軍雲集，戰壕層層密佈，堡壘林立，雙方嚴陣以待，戰事一觸即發。當時共軍先派了一小隊士兵爲我們探路，回報前面沒有「敵人」後，才讓我們通過。過封鎖線後，就到「白區」了。我們又化整爲零。這天晚上，我到了洛川，找到一個老百姓的家裏住下，也不想出門，但是老百姓却立刻報到當地的縣政府，縣政府立刻派人把我逮捕了，送到國民黨縣黨部去，和我談話的是一個國民黨工作人員陳義伯（此人後來參加民主同盟，和我做了很好的朋友。）

「鎮靜一點，你不要害怕，到我們這裏工作也是一樣。」陳義伯首先安慰我說：

「你是共產黨員嗎？」他繼續問。

「不是！」

「你知道誰是共產黨員嗎？」

「不知道！」

「你是組織上派你工作去嗎？」

「不是，是我自己請求離開的。」

「那就好了。」他和藹地說。

這天晚上，他把我送入了「青年招待所」，「青年招待所」又把我編入了小組和分隊，小組也開小組討論會，分隊也開晚會等等。

「在我們這兒，和抗大的生活是一樣的。」分隊長對我說。

「哎呀，我的天！」第二天早上集合的時候，我幾乎嚇得一跳，原來有些我在延安常見的積極份子，這時都搖身一變，成了「青年招待所」的積極份子了。

「在我們這兒的工作同志，抗大陝公畢業的同學多得很呢。」分隊長又得意的對我說。
這是怎麼回事呀，我迷惑地想。

事實上，這批人中有三種：第一種人是真正不滿意共產黨的，所以他們在邊區表現得很積極，一出

邊區就以反共的身份出現了；第二種人專以出風頭爲目的，思想根本糊塗，不足道；第三種人却是真的命令他如此，偽裝反共，掩護他們在「勞動營」內活動。

我們在洛川住了三天，一批批從邊區走出的青年，都被編入「青年招待所」的大隊中，第四天，我們浩浩蕩蕩從洛川出發，準備到咸陽去。

在行軍休息的時候，我從另一隊的指揮當中，聽到一個耳熟的聲音，拾過頭去，啊，奇怪極了，那不就是沈亭嗎？

他正大聲的罵着共產黨，一點也沒有錯，前面正是沈亭。他的威風，比起在延安的時候，毫不遜色。「糟了，我怎麼辦呢？」我暗自向自己說。

他是真的叛黨了嗎？假如他真叛黨了，他不是要把我的一切，出賣給國民黨嗎？

沈亭在延安時，由陝公，而抗大，而黨校，都是極活躍的份子，在黨校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支部的小組長呢？正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我在黨校及以後一段時期的情形，他是相當熟悉的。

我當時雖然爲黨所遺棄，但我却極端鄙視這種叛黨份子。

我一方面極力注意隨時避開他，讓他暫時不致發覺我；一方面我已打定主意，立刻從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中，冒險逃走。

我們到達三原的時候，機會果然來了。

三原背山傍水，這條河流要算是我們在陝北所見過的中間最好的，岸邊鋪滿彩色的沙石，河水不深，其聲汨汨，從遠處高山曲折流下，環繞着半個三原城。出城數里，有瀑布的奇景可看。

在旅途中我們的確疲憊不堪，連帶隊的國軍官員也需要休息了，因此決定歇一天。全體到河裏沐浴，準備第二天再出發。

開始沐浴的時間是下午四點鐘，帶隊的國軍官員對我們說：

「今晚的伙食費索興一併發給你們，你們洗好澡就去吃飯，晚上七時點名，務必準時歸隊。」

沐浴的時候，自然有幾個人是奉命監視的，開始他們還認真，半小時後，他們就馬虎疏忽一點了，有些人洗好，沿着河邊蕩，一直蕩過去，說是看瀑布去了。我一蕩就蕩出他們的視線，一口氣就跑了四十里，當夜住在草灘。等他們晚上七時點名或者再等等才能判斷我已經逃出的時候，已經無從追及了。

第二天中午，我就到達了西安。

第七章 抗日游擊生活

二九

到西安的第一個目標，我當然立刻去到七賢坊——十八集團軍西安辦事處。開始，我祇被簡單的問過幾句話，就暫時住在招待所內。

招待所的生活，還是老樣子，不過內部比過去還更混亂得多。門外的戒備，也比過去森嚴得多了。招待所內有幾個老住客，他們都在這裏住了三五個月。其中最久的是一個女同志，已住有半年以上，她本來是從延安派出工作的，却在招待所內受了孕，我見到她的時候，已經大腹便便了。她會爲此受到辦事處的責備，最難堪的是，當詰問她和誰戀愛時，她東扯西扯，說不出所以然來，後來，吞吞吐吐的說出辦事處兩個同志的名字，辦事處叫出這兩個同志，他們又都不肯認賬，結果這筆糊塗賬也無法再追問下去了。

「孩子生出以後，你可以送到邊區托兒所去。」有一個女同志這麼對她說。

「見你的鬼，托兒所，活的送進去，死的抬出來。」她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另一個女同志說。

原來那時的邊區托兒所，所謂褓姆，根本沒有受過任何訓練，她們都是從部隊或農村中調出的低級女幹部，或者帶着自己的孩子在身邊，我在延安時會進去參觀過，一個高頭大馬的河南老鄉「褓姆」引導我們，她伸出一雙粗糙的手，摟住一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面黃肌瘦的孩子給我們看，我幾乎驚嚇得叫出來：

「這孩子還能活幾天呢？」

所中一共有三十多個孩子，經常都大約保持住這個數目，每天至少總有一個孩子送進來。死亡率的可怕就可以想見了。

走出的時候，我們正遇到一個孩子的死屍從所中搬出去，有一個同志問：

「這孩子怎麼死的？」

「啊，這是另一個褓姆同志不小心，喂孩子食物的時候噎死的，已經受到組織上批判了。」

當幾個女同志正在談論到延安托兒所時，我面前立刻浮起這段回憶。

「把孩子送給老百姓吧。」這是她們最後的結論，倘使能够找到老百姓肯收容。多數的女同志最後都是這樣處置她們的孩子的。

從「孩子問題」談下去，挑起了許多女同志無限的感觸，一般女同志被派出工作，除了少數以外，

差不多始終祇做些男同志的輔助工作，她們多半以「臨時太太」的身份，由黨暫時配給給某一個男同志。這是革命工作呀，她們當然祇得服從，她們時而被調開，時而又配給另一個男同志。在這些女同志的工作期間，「臨時太太」造成了多少的悲劇，女同志們流了多少眼淚，出現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啊！

招待所住到第四天，我被叫到辦事處去，我在辦事處早已報告過從邊區出來被政府扣留的情形，以及如何逃脫。柳樹春同志當時還給了我一頓安慰。這次不同了，他臉色全變了。

「請你立刻搬出招待所。」他對我說。

「但是，我在西安熟人很少。」

「不行，你立刻搬出去。」

「但是，我的工作問題呢？」

「以後慢慢再談，總之你現在立刻搬出去。」

當時我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可去，舊的社會關係在去延安以後，差不多全斷絕了，有些人倘知道我從延安出來，也不願意接待我這個客人的。

在窮思苦索之下，我想起一個過去不十分頂熟的朋友，聽說他住在青年會宿舍，但是不知現在還不在，硬着頭皮，且去碰碰再說。一見之後，我推說暫時借住三兩天，他滿口答應，而且很客氣。青年會多住一個人要另付房租的，這房租也是他替我們代付的。這個朋友的名字叫郁宏初，是中國銀行西安

分行的一個職員，十餘年的離亂，現在早已消息杳然了。

我在青年會宿舍就一直住了下去，每隔一兩天我到辦事處去一次，有時他們不見我，有時他們簡單的敷衍我幾句，其中祇有一次，柳樹春和我作了比較長時間的談話。

「你逃脫得太容易了。」他半信半疑的說。「你的情形也太巧了，你原來是有政治問題的，這次被捕後又逃脫得這麼容易。」

他邊說着，慢吞吞的噴出一口烟，又繼續說下去：

「國民黨的特務也真太狡猾，有時他們是要使用苦肉計的。」

「柳同志，你以為我——」

「不，不，」他立刻又轉過口來：「其實，你跟國民黨幹也沒有關係，現在大家都是爲了抗戰。況且西安是國民黨的地方，我們也不見得對你有什麼辦法。哈哈……。」

我極力一再聲辯，他幾乎不耐煩得要打起瞌睡來。

「同志，不要性急，革命是要經得起考驗的，有空你還是時常來談談。」他一面說，一面把我送出去。

我知道，我的問題又變得複雜化嚴重化了，但是自己却也很鎮靜，心平如水，因爲我自己明白，我與國民黨的確沒有任何勾搭，我相信黨遲早總會了解的。

我照樣三五天去一次辦事處，不成，又再去。每次從辦事處走出以後，我都從街道上繞過許多巷子緊張的防備國民黨特務人員釘我的梢。

然而，在最後一次接觸中，柳同志正顏厲色的對我說：

「我們的意思，最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什麼，你的意思是？」我驚訝的問。

「我們的意思，你最好立刻離開西安，否則大家都有些不方便，在西安，你的熟面孔太多了，其實我們也不怕什麼，不過爲了你着想，你還是早日離開爲妙。」

「柳同志，這，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的聲音有點發抖，催促着他說個明白。

「你不要裝聾作啞，我們沒有多時間和你應付，這是我給你最後的警告。」他無情的，聲色俱厲的又對我說：「請你立刻離開西安，否則大家都不方便。」

說着就立起身，作送客的樣子，我這時意亂如麻，心痛欲碎，無力地抬頭看一看他那冷酷的面孔，走出了辦事處。

我回去在宿舍內睡了一天一夜，我說我病了，也沒有進一口飲食，我在床上反覆的思索，不知道是什麼一股力量，突然又給我一種勇氣，我跳下床來，自言自語的對自己說：要堅強一點，「真金是不怕火燒的。」我想起在延安曾經安慰和鼓勵過楊明的這一句話。

這時我爲了生活，覺得一直依靠別人不是辦法，我就開始在西安的秦風日報寫文章，由此就認識了該報的主筆宋野平和成社長，他們就邀我入該報擔任編輯。在秦風日報，我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工作到十一月。

在秦風日報的工作很順利，我兼寫社論，很得成社長的賞識，成社長平時對一般同事都很刻薄，但對於左傾份子却特別厚待，藉以表示他的「前進」，我的薪水被他訂得較高，弄得全報社的老同事大爲不滿，於是就有人向地方當局告密，說我是共產黨，我當時寫的文章確也篇篇都是「延安文法」。政府警察局就派人到報社抓我，我這時還住在青年會宿舍，有一個報社的同事又通知了我，我於是又立刻逃出，住到西安郊外。

我這裡要補述的是，那個秦風日報後來「靠攏成功」，成爲中共在西安的代言報紙，但不久就被西安當局封閉。西北「解放」以後，成社長被解回耀縣原籍「公審」，結果不詳。宋野平於上海「解放」以後，在上海出現，不久也以「叛黨」和「國特」的罪名被捕了。

三十

在西安郊外，我住在一個叫吳復如的朋友家裏，他是我在秦風日報工作時認識的一個左傾青年，住一間破舊而矮小的民房，他在剛軍政工隊中教唱歌，晚上我和他以及他的太太三個人共睡在一隻木板

來上，他的太太是學繪畫的，所以小夫妻二人的生活帶有濃厚的藝術趣味，他們毫不避諱的常常將我的面公開表演，我每在他們吃飯前就藉故外出，整整今個多月中，我每餐就買半斤鍋盔和以饅頭充飢。

當時，國軍騎兵第二軍何柱國（何柱國於抗戰勝利後，由政府派任東北保安副司令，目前任蘇聯大使館飲酒中毒，瞎了眼睛。）的部隊正奉令從綏遠調赴河南東部，部隊經過陝北期間，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給他們極深的印象。何柱國在西安，決定要物色一批青年政工人員帶到河南去。

我由老吳的介紹，陸續認識一批左傾青年，其中還記得名字的有：王世賢，王漢，徐流等，王世賢是東北人，靠了這個橋樑，我們就拉上何柱國（何本人是廣西人，部隊是東北軍）的關係，洽談之下，何部的左右都認為滿意，我們又另外集合了十多個青年，領了騎二軍的軍服，臂章符號和路費，就開始到河南去了。

離開西安的前一天，我又到過十八集團軍的西安辦事處，告訴他們我要去河南，問他們的意見，他們沒有特別表示什麼，祇說：

「很好很好，你去開關開關。」

我們這個臨時組織的小集團由騎二軍西安辦事處指定王世賢為領隊，我們在一路上也開小組討論會，檢討會等等，又是搬出的延安的一套辦法，每個青年都在爭取表現懂得這些玩意，表示自己是「前進份子」，不久我就發現在這些青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從延安跑出的，其中王世賢也告訴我，他過去有

過期關係，現在斷了。

車過洛陽，我們沿軌道走了一節路，穿過了許多山洞。地方駐軍特地派了兩名武裝士兵護送我們，在洛陽附近的山地戰壕內，我們匍匐前進，遠遠地還可以看到風陵渡敵人的步哨。

洛陽下車以後，我們就開始步行，河南的老百姓都樸實，勤勞而剛直，令人可愛。可惜由於歷年內戰頻仍，平靜的農村，不是毀於砲火，就是被擄取得凋零冷落，極目望去，一片淒涼。這些農民被逼得無可如何時，往往挺而走險，因之民團之盛，亦甲於全國，無怪乎這塊平原上，多被人稱爲「民風强悍」了。

葉縣一帶，比較富庶，物價極低，我們在那兒大吃了一頓，過葉縣即抵漯河，漯河本來是平漢鐵路上的一个小鎮，由於抗戰期間走私風盛，成了私貨集中的大本營，暴發成一個熱鬧非凡的小城市，有「小上海」之稱。

在路上我們一共遇見過兩次「土匪」，經過我們「說服」以後，都自動走開了，這是我們遭批政工人員初試鋒芒，大家都十分得意。從此我們更相信所謂河南的「土匪」本來都是些善良的百姓。

共軍徐海東部過去在河南大部地區流竄過，因此我們在河南多處地方，還隨時可見到剿匪時期的反共標語。

騎兵第二軍的總部在河南的東南部沈邱縣，沈邱是一個三等小縣，在安徽省邊境。我們走了八日。

才到建了。

到沈邱的第二天，騎兵第二軍政治部爲我們舉行了一個歡迎茶會，何柱國也出席講了話，我代表我們這批朋友致了答詞。以後我就被派到當時該軍主辦的一張戰地油印報紙「抗戰日報」擔任主筆。

騎二軍不是中央嫡系部隊，但是却有不少中央派去的幹部，在中下級幹部中，以西安幹部訓練團派去的最多，這些人也和一般的共產黨員一樣，鬼鬼祟祟，氣量偏狹，喜歡對別的同人吹毛求疵，今天挑剔這個，明天懷疑那個，紅帽子滿天飛，他們時時和我們之間引起尖銳的摩擦，我們非常討厭他們，却並不怕他們，因爲我們一進入騎二軍工作，第一個目標就尋找到內部的矛盾——特別是中央和雜牌軍隊之間的矛盾，找到矛盾以後，擴大矛盾；在沒有矛盾的地方，我們設法製造矛盾，祇有日益發展中的矛盾，才能增加我們生存和工作的空間。這是我們在延安學習的一系列的工作技術。

我這時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還是一個忠心耿耿的熱心的積極的黨的工作者。在延安的時候，我受過黨的打擊，有過不滿的情緒，由於在離開延安以後，我所接觸的一切更使我看不過去，乃至時時激起我的憤怒，這時我過去對黨的不滿，已經漸次消失了。每當我想起過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我總這麼想，這不過是個別幹部的個人行爲，這與黨的革命路線，黨的政治領導是不相關的。甚至可以說，這是革命過程中免不了的現象，我應該毫不猶豫地忠實於我的理想。

這時，我常以非黨的布爾雪維克激勵我自己，我們黨的領導者過去也說過，一個非黨的布爾雪維克

和黨員是一樣偉大的。

我已經在騎二軍的一些左傾青年中取得領導地位了，我在這批青年中選擇了十一個人形成了一個核心，又分成兩個小組，每週舉行一二次小組會，都是藉館子裏小吃的機會，我輪流參加每一小組的會議。這些青年都急於想找到黨的組織關係，我雖然一再說明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我不便說出我脫黨的經過，他們或是不相信，或是半信半疑。後來我們就作了一個糊塗決定，說是爲了共同致力於尋找黨的組織關係，先成立了一個臨時支部，其實在黨章中是沒有這項規定的，這種做法在當時的環境下也是極端危險的，萬一有一個同志出了問題大家都完了。而且無路可走，因爲我們實在與組織上並沒有接上頭，幸好這些青年對我都有信心，相信我有辦法，我在這個充滿了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小集團中當了支部書記，而我個人也爲了向黨力求表現，採取了許多過左的做法，實際上，我們這個組織根本與秘密工作的原則相違背的。

在當時，我們的組織沒有遭受直接破壞，一網打盡，已經算是萬分僥倖。但是，國民黨在軍中的特務人員，關於我們的情報已經像雪片一樣，因爲我們善於運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何柱國總是衛護我們——他自己也極注意我們，但是相信我們不是共產黨員，假如他確定我們中間某一個同志已經無可寬容時，他的處置也還是比較開明，請這個青年自動離開。三個月中間，我們一共有兩個同志被送出騎二軍的防區。

一九四〇年三月，政治部主任李春華派了一個「抗戰劇團」（這個團體是直接我們的核心領導下的）到安徽阜陽一帶（是騎二軍的游擊區）進行流動宣傳，我以「抗戰日報」特派員的名義奉命隨同出發。

在騎二軍，我練習騎馬的機會很多，有些同志也的確學得好，活躍在平原上，跳上跳下，疾馳如飛。但是我學得太糟了，第一次被馬在半途摔下來。第二次過河的時候，馬在河中央順水而下，和我大開玩笑。第三次馬繮控制不住，它一口氣就狂奔了十餘里，從此可把我嚇壞了。所以這次行軍，我自動放棄了騎馬的權利，把行囊放在人力推動的大車上，隨軍步行。

我們到達安徽邊境，正遇到日本人的大掃蕩，潰散的士兵和難民和我們迎面而過，他們對於這種日本人的掃蕩，似乎也習慣了似的，並不顯得過份沮喪。

日本軍隊一路自亳縣，一路自蒙城，一路自六安夾擊阜陽，我們這時的目標，也已放過了正面的阜陽，而迂迴到太和的側面，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我們在黑漆的深夜偷過了公路。邁過公路，前面就是潁河。第二天我們大胆的想在白天搶渡過，一過潁河，就又是敵人後方的一大片我方控制的完整地區，我們的活動就可以開展了。

鄉公所和船上的水手都極力勸阻我們，說是白天過不得，危險太多，我們不聽，堅持立刻過渡，有的同志說：

「我們有七支傢伙，和二十六條好漢，鬼子來了就和他拚。」

河並不寬，在這邊可以清楚的看到對面，一隻小木舢先渡過河去看過對河的動靜，回報說附近沒有敵人，因此我們立刻躍身下船，開始啓渡了。

我們低着頭，摒着呼吸，船在河心輕輕的划着。

老百姓真好，當我們的船快抵對河的時候，一個老百姓急向我們搖手，我們的心情立刻緊張，船頭掉過身來了，但是敵人的巡邏隊也已經趕到河邊，當他們開始射擊的時候，我們這邊正狂奔上岸，我們也還了兩三槍，然後就四散奔逃，我們偷走到一個老百姓的稻草堆裏面，這時日本人已經過河來了，四處搜索，零星的槍聲和日本人的馬靴聲，使我在一天之內，受過無數次驚嚇。

晚上，日本人退了，我又鑽出來，急急先找到一口水喝，開始找別的同伴，一直到天亮，我們才找齊了九個人和三支槍，另外有幾個散兵這時也和我們走在一道，怎麼辦呢，我們就決定：

咱們打游擊吧！

三二

開始決定打游擊的時候，有一個同志就向大家介紹說我是游擊專家，就舉了我當起司令。

其實我過去不過在書本上學過一點游擊戰術的理論吧了，現在一旦真的當起「司令」，我倒有點丈

一二和御川換不着腦袋，就惶惑起來。

「你不要擔憂，自有我來替你做小諸葛」那個最初提名我當「司令」的史劍三——我們通常叫他老史，對我拍拍他的胸膛，表示他頂有把握。他接着說：「打游擊說難也並不難，咱們遇到散兵和青年的人就帶了走，遇到敵人就逃。」

「糧食呢？」我說。

「咱們去找鄉公所，保甲長開刀，他們不找糧食來，我們就把他們抓起來當漢奸辦。」

我們這支游擊隊，居然愈滾愈大，因為當時正是日本人掃蕩之後，散兵及無所歸依的百姓特多，不上一個星期，我們居然擴充到三四百人。

但是糧食和武器的困難却一天天嚴重，內部的信心也有些動搖，三個五個又開了小差出去。

我為此瘡實傷了些腦筋，鄉公所，保甲長也委實沒有辦法，他們一見我們就訴苦：

「我們這裏平時是三不管，一遇到要糧要草大家都來了。過去有中央軍，和平軍，新四軍……，像你們這樣的游擊隊也有時來時去的。」

「這裏也有新四軍嗎？」我問。

「嗯，有的，但是不常見到他們，有時他們有一兩個政工人員來。」

「他們也常來要糧嗎？」

「當然，而且比誰的任勞任怨多。」

「老百姓喜歡他們嗎？」

「說得上什麼喜歡不喜歡，不過老百姓的確都怕他們。」

從此以後，我心裏下隱隱着一個秘密，我希望能在這些地區遇見一兩個新四軍的工作同志，或者，遇到機會，我能把部隊拖到新四軍方面去，這不是我對黨的忠誠最有力的表現嗎？

過了三天，老史告訴我，離此不遠的河邊，有一艘日本人的小艇靠着，艇上的日本人和偽軍大部分都已經上岸了。

「這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打過這一仗，我們就可以在老百姓中樹立威信了，而且，還可能得到敵人很多東西。」

「好吧，我們立刻就幹。」當時在我心中却另有打算。

果然，我們撲了一個空，一些沒有經驗的小伙子，在遠處就放了槍，敵人一聽到槍聲，就從容的作了準備，「劈劈拍拍」的機槍聲不停地向岸上四處發射。而我們的「海軍」（另有一條木船，載上幾個善於泅水的游擊隊員，準備在陸上襲擊開始以後，他們從水中強登敵人的艇上。）也一直沒有表現的機會就逃了。

這一次襲擊不但沒有打到敵人，而且老百姓有些怨恨起我們來了……

「這些游擊隊也和新四軍一樣，鬼子打不着，可是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根據老百姓的經驗，日本人緊接着就要來的，我們打嗎？這時我們全部祇有七十多支長短槍，其中還有幾支不能用的。不打嗎？老百姓以後不是對我們更要反感了？

最後我們決定先撤到附近另一個地區，相機進擊來攻的敵人，或者偷過河去。
部隊開始行動後，意外的是，敵人並沒有來。而我們却在這天夜裏順利地過了河。
我們急行軍，一夜走了九十里，次晨六時左右，東方微白，我們走到孫家集附近，隊伍開始混亂，有人起初說發現一些神秘的影子，但是當我們仔細地注意的時候，又看不出什麼動靜。

「莫不是鬼影子嗎？他媽的！」

「管他是人是鬼，再看見老子要打槍了。」

「是好漢的就站出來，你們是賊胚子生的狗雜種嗎？」

「……………」

弟兄們紛紛議論着。

「鎮靜一點，可能是發現敵人了。」老史对大家說。

我靜靜地聽着，用雙眼儘量向四週搜索，希望能有奇蹟出現，我心裏有幾分明白，這一帶已經是新四軍的游擊區了。

我們的先鋒支隊這時退下來，部隊全部停止前進，秩序大亂。

「不好了，我們一部份弟兄在前面被繳械了。」
全隊爲之嘩然。

「他們是那一部分的？」我問。

「不知道，看來他們的服裝和我們差不多，滲雜不齊，大概不會是鬼子或和平軍。」

「啊，大概就是新四軍了」。有個幹部若有所悟的說。

我們的幹部經過緊急集議，這時，另一個被擄的幹部被釋放回來，正式證實了對方是新四軍。新四軍要他回來通知我們，我們前後左右都被包圍，除了立刻繳械集中待命以外，祇有死路。「我三番五次的告訴他們：同志，我們也是抗日部隊，借一借路不可以嗎？他們說，不行，管你抗日不抗日，到了我們的根據地，就得服從我們的領導。他們的態度很強硬，最後還說，到了我們這兒，我們有的是強大的新四軍，和嚴密的羣衆組織，你們飛也飛不脫。」那個被擄釋放的幹部述說着。

幹部們聽了這些話都極憤慨，有些弟兄們聽到，又傳給別的弟兄們，他們都大聲的叫囂起來：「咱們打出去，衝過去，新四軍太欺負人了。」

「沒天良的新四軍，鬼子把我們趕到這裏，你們也要消滅我們嗎？」

我與老史和另外幾個幹部費了好半天的勁，才把大家的情緒壓制下來。

「弟兄們，不要嚷，我自會有辦法。我們都是爲了抗日，不應該和新四軍衝突。現在，我親自去解決這項誤會，部隊交給蘇副司令（蘇大奎，原在正規軍中當過連長，是我最初集合的幾個人之一）指揮，你們要服從他的命令。」我說完以後，解下了武器，帶着一個衛兵和那個被擄過的幹部起身就走，弟兄們目瞪口呆的望着我們而去。

三二一

那個被擄過的幹部担任响導，他說我們的部隊還距孫家集有五里多路，新四軍和他談話的一個司令員在不到孫家集一里的一個小村邱坪住着。

「從這裏轉一個灣，前面就可以看見了。」他剛一舉起手正待指給我看，路邊蜷伏着的一個小鬼，突然站起來，出現在我們的前面。

「站住，不許動！」小鬼舉起槍描準我們，他穿着一套很不合身的大軍服，舉一舉槍，褲子幾乎要掉下來。

我們那個响導貼過去，和他輕輕的說了幾句話，然後他仔細的打量了我一下，再命令我們不許動，他就走開了。不到五分鐘，他就帶來另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幹部，據說是一個連指導員，他畧問過我們幾句話，就把我們帶了進去。

走了一里多路，連指導員就把我們引進一個小村落，我們再隨他進去，裏面黑壓壓圍有一大堆穿便服的人，據說這是一個區公所，指導員把我們交給其中的一個，然後又進來幾個拿梭標（他們稱爲紅標）的農民站在我們身邊。以後，其他的工作同志大概都知道了我們的身份，一個個走近，好奇的看顧我們。

「這個就是土匪頭子嗎？」其中一個說。

「土匪頭子逮了，爲什麼不把他綁起來。」又一個說。

「這個土匪頭子年青得很呢，還很斯文呢。」有的又這樣說。

我抬起頭，用銳利的眼光看了他們一眼。

這天晚上，一個新四軍的幹部帶着兩個武裝士兵，又把我們從區公所提出，說是帶我們見司令員去。然後他又考慮了一下，把我的响導（我們那個被擄過的幹部）和我的衛兵留下，帶了我一個人去。

我已經有過一夜沒睡了，精神非常疲乏，夜色朦朧，我根本看不出一綫路影，祇覺得腳下一塊高一塊低，有時「哎呀」一聲就跌倒在地裏了。兩個士兵把我扶起來，就乘勢在我身上搜索了一番，把我的手錶和自來水筆全拿去了。

我們走到牛王鋪，說是到了，那個押送我的幹部進去一問，才知道今晚司令部已經搬了。於是我們就在牛王鋪草草休息了幾個鐘點，其實我一分鐘也沒有入睡，天還沒有亮，我們又繼續啓程。又走了一

整天，到建曹市。

曹市是一個很小的鎮市，鎮上過去比較大的房子都被新四軍拆毀了，據說是爲了防備日本人來後便於駐守。鎮上祇剩了三三兩兩的破落的住戶。司令部設在鎮東二三里的一個小莊上，在這裡，我見到了當時的蘇豫皖邊區縱隊司令員彭雪楓。他是中共傑出的游擊戰指揮者之一，赤手打出這個邊區，後來部隊擴充到一萬多人。他却離奇地死於蕭縣附近。

這是一個十分戲劇化的場面：

我進入司令部的庭院後，裡面一所中國式的大廳，大概就是彭司令員的辦公室兼臥室。我走到廳前的台階，剛跨上第二步，一個警衛人員模樣的幹部就喝令我停住，然後他們就抬出一只木質的靠背椅放在廳前的走廊上，彭雪楓走出，我向他敬了一個軍禮，他輕輕的點了點頭，就端正的躺在靠椅上，又招呼我跨上兩級台階。這或許算是一個「受降儀式」，然而在當時我覺得彭司令能親自接見我，還有點受寵若驚哩。

談話開始，先由立在彭雪楓身邊的一個蕭主任（據說是政治部主任）問了我的部隊的人數、武器、成立經過……，然後是彭雪楓講話，大意是：共產黨是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凡是抗日的朋友我們都歡迎合作，但是必須接受革命的領導……。

「是的，彭司令員，我們正預備接受革命的領導，我自己過去——。」我說。

「那就好了，你們願意參加革命，那就沒有問題了，至於你自己過去，你不用說了，我們已經很清楚，以後再談了。」

彭雪楓接着就提出，要我們先交出武器，再把我們調到比較安全的地點受訓。

「彭司令員，假如要弟兄們先交出武器的話，可能要引起誤會的，我覺得——」

「那你說怎麼辦，所有的反革命部隊接受收編的時候，都和你一樣狡猾，都藉口弟兄們不答應，其實弟兄們都是工農份子，沒有不反對你們……。」

我聽到這幾個「反革命」的字眼加到我頭上，宛如晴天霹靂，幾乎立刻要跌倒在石階上。

「是的，司令員同志。」我習慣的回答。

他看我自己「馴服」了，就起身走進廳內，鍾主任隨了他一同進去，然後鍾主任又走出，坐在彭雪楓坐過的靠椅上。他比彭雪楓更威風，兩隻腿交叉着，時而搖搖上半個身子，他恐嚇着我說：

「你們這點烏合之衆，其實我們要把你們武力解決的話，真不費吹灰之力。」

他儘管說得這麼狂妄，我看在馬克思的面上，決定還是繼續忍耐。最後我們協議的結果是：

- 一、我們的武器暫時可以由自己保存，但必須交出全部彈藥。
- 二、我的部隊也暫時保持現狀不動，但必須服從新四軍的命令。
- 三、我們的幹部過去概不追究，但必須接受新四軍所派的政治人員的指導和訓練。

我們也沒有經過什麼簽字的手續，就算是正式決定了。

我帶了六個新四軍的幹部，又匆匆趕回自己的部隊，這時部隊中有些弟兄知道情形不妙，不願爲新四軍改編的，已經私自開小差跑了四分之一，餘下的就由新四軍的幹部點編訓話完畢，奉令開拔，目的地誰都不知道。

「彭司令員還有話對你說，你隨我去。」走在半途上，其中一個新四軍幹部，就把我帶到另一條小路上去。

「你就暫時在這裡等着吧。」他把我帶進一間草房子，裏面有一個新四軍的士兵，像是等我很久了，這個士兵會意地把我留下，那個幹部就走了。

三三二

這草房子，有一個小勤務員不時來去，吃飯的時候，也是他提着送來。這附近當然有一個機關或部隊，是屬於那一部分我就知道了。

我走進走出，那個士兵和我寸步不離，乃至我大便的時候，也站在我身邊。從不和我多說話，我也不便問他，恐怕增加他的疑竇，有一次他問過我是什麼地方人，我說是江蘇人，他說：「不是，不是，你絕不是江蘇人，我到過江蘇，你的口音根本不對。」從此我們之間的話就更少了。又有一次，當小勤

務員送飯來的時候，他翻開熱烘烘的饅饅一看，突然對我說笑起來：「你看，這饅饅做得又圓又長，簡直像個雞×。」說完，他突然又收斂了他的笑容，覺得剛才失去了他的尊嚴似的。

那個士兵不知什麼原因，四五天後就調走了，新來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兵油子，滿臉鬍鬚，結實的大塊頭，當接替那個士兵的時候，他世故地看了看我。隨後，當我們倆之間寂寞了不多一會兒，他就和我搭起腔來：

「你在這裏關了幾日了？」

「不，怎麼好說是我是關在這裡，我等着四五天了，彭司令員要召見我呢！」

「彭司令員要召見你？」他驚訝的問了我一句，又懷疑地瞥了我一眼。「真是怪事。」

「難道有別的事嗎？」幾天來蘊藏在我心中的一片疑雲，經過他這一提，倒立刻需要找到一個回答

「啊，沒有什麼。」接着，他又自言自語起來：「老子當了一二十多年兵，所見到的怪事可真多。哈哈，我們這種當兵的，在那裡幹都是一樣的。」

一說到他的當兵，他的話鋒更健，講個不停：

「老子起初跟吳佩孚，後來又跟了老馮，老馮垮了，就跟了老蔣，後來又當過皇協軍，我們奉令清鄉，新四軍來，我們一舉手又變成新四軍了……。」

我們之間漸漸做起朋友，他埋怨他當了二十多年兵，升不到一個官兒。

我們這間房子內，除了送飯的小勤務員常來以外，有時也偶爾有一兩個新四軍幹部來走走，打個轉問幾句話就去了。在這種場合，他有時故意厲聲的罵我一陣。當幹部們走過以後，他又陪過笑臉，走過來拍拍我，向我解釋：

「不這樣是不行的，他們都說你是反動派，土匪和叛徒，其實我看你根本不像個壞人。老弟，我待你也不錯，想來你也不致於出賣我，我老實告訴你，見什麼彭司令全是鬼話，你的問題恐怕麻煩得很呢？」

我低着頭，不發一句話。

「你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國民黨派你來的，我張德標如果存心害你，就不是爺娘養的。」

「不，我根本不是國民黨，我原來祇不過在騎兵第二軍幹過一個短時期。」

「那麼，你是不是可以回去？」

「回去？」

「是的，否則你在這裡是絕對沒有活命的希望了。這裡逮到你以後，立刻就打電報到上頭，上峯的回電是立刻幹掉你。但是由於不願使你的部下激起變化，所以一時還沒有下手。這話絕對可靠，司令部的社會科特派了一個姓羅的幹事來執行你的事，羅幹事和費區長是過去華中軍政學校的同學，他告訴

了費區長，費區長又回去告訴了他的哥哥，就是前一天來過的那個土頭土腦的大漢子，以前是幹過土匪的，現在當本鄉的自衛隊長，他和我很好，一走出以後，就偷偷的告訴了我。他還嘆了一口氣，好像不勝惋惜似的。」

「假使我決定回去，你呢？」

「我——」他猶豫了一會，說：「我祇有跟你一道走了。」

「那不是使你也太危險嗎？」

「怕什麼，我張德標平生做事敢作敢當，開小差也不是這一次了，再說，我交了你這一個朋友，也值得。」他定了定神，拍拍自己的胸膛說：「出這個區域全包在我身上，不過路上的自衛隊是要看路條的，其實他們和我一樣都是老粗，你隨便用一個什麼鄉公所的名義寫一個就行，因為他們從來也是不蓋章的，而且我在本地很久，一切都好對付，走出新四軍區域以後，就要看你的法寶了。」

我們在夜裏三更左右就動身，張德標主張不要走大路，專走小路，我們裏面穿的是便服，外面再套上新四軍的軍服，因為在普通的情形下，遇到穿軍服的新四軍是不加檢查的，第一天，我們一氣就走了百四十里，當第二天張德標對我說：「這一帶大概沒有新四軍了」的時候，我兩腳祇曉得不不住的在搬動，頭部特別沈重，一路走一路在打盹，後來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睡了一夜。

過了肥河，到了馬家店，這是一個三不管的小鎮，我們撕了路條，剝下身上的舊衣服賣了幾個錢，

就在這裏睡了一天一夜。

「張大勝，謝謝你救了我，我將來一定要報答你的。但是我要問你一句話，你這次為什麼不救我，除了爲了我以外，還有別的原因嗎？」

他對我很激動的說：

「這個撈什子的部隊我早就想離開了，咱雖當過漢奸，一聽新四軍這邊好，打鬼子和共產黨過來了，他媽的，結果他們既不打鬼子，也不共產。」

我又半晌沒有說話，從他那純樸的面部的表情，我呆望了很久，我的雙眼濕透了。





「鬥爭十八年」的書評

華僑日報：「這本書每篇都含有不止作者個人的辛酸與血淚，他刻劃出整個時代的大悲劇，直接或間接的替我們每個人說出若干心裏想說的或是想知的事實和情緒。」（棲霞）。

華僑日報：「『鬥爭十八年』為一部自傳式的反共力作，我盡了兩日兩夜的功夫才把他讀完，他給我的是：

——目瞪口呆，驚心動魄！

「『鬥爭十八年』是這年代一部有濃厚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文藝性的僅有的作品……，以平鋪直敘的率真去寫真實的動人的故事。」（羅拔高）。

工商日報：

「吾為確信共黨最後必敗之一人，今讀司馬璐之『鬥爭十八年』自傳而益信。而此書之將對海外有志青年發生深刻影響，又無疑也。」（或人）。

香港時報：

「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親身經歷的忠實報導，以面對的角度予中共作無情的赤裸裸的暴露。故事生動，文筆簡練，因而關於我們這一時代的大悲劇的描寫，更見深刻。」

「由一個人看一個時代，看世界，這是本年度香港第一本最有價值的書，也是對共產制度作無情攻擊的第一本好書，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對於這類作品是不宜放過的。」（艾林）。

英文虎報：「『鬥爭十八年』為中國前共產黨員所著有關於中共問題之稀有著作之一，是每一個要求了解中共在世界上的影響者的必讀書。」

天文臺報：「讀完司馬璐的不著後，那能不感慨橫生。我對『鬥爭十八年』的作者表示敬佩。」（君左）。

新生晚報：「震動香港出版界的一本書是：司馬璐著作的『鬥爭十八年』。」

民聲報：「如果真想真正瞭解中共的內幕，我敢負責向讀者推荐，可以讀這本書。」（徐歸田）。

民聲報：「本書的出版，為一九五二年的自由文壇燃起一把熾烈無比的反共烽火……作者的悲劇，亦即是我們這一代每一個青年的悲劇，所以我對於本書所述，有一種親切之感。」（行雲）。

學生週報：「這本書是司馬璐先生參加中共工作的血淚紀錄，他無保留地揭開了中共醜惡的嘴臉，暴露了中共一切欺騙、卑劣、兇殘的行爲，指出了它們用怎樣的手段去摧殘和利用一個為追求理想而奮鬥的純真的青年。」（嚴啓楨）。

針

報：「這是一本好書，好在著者有那麼被壓迫的豐富經驗，以種種事實證明那種違反人性的勾當，終必被有良知的人們所反對。著者寫他由深深被騙而至基於人性所發生的猛省與選擇自由的過程，極為真切。」（南方）。

自由陣線：

「一本『鬥爭十八年』，寫盡了大多數熱情奔放的青年所扮演各種形形色色的配角……這是一本有價值有生命力的作品，值得向青年朋友們推荐，尤其是能給正在徘徊不定的青年們一個當頭棒喝。」（王潛文）。

第八章 懷疑是否罪惡？

三四

我們路過臨泉的時候，張德標遇到一個過去的老長官在那裏開一個小館子，他過去懂得炸油條和做酒糟，就被留下幫忙了。

我在第一天返回沈邱，立刻就去了政治部主任李春華，關於我從新四軍逃回來的事，我隻字未提，說了一個大謊，我說我們的游擊隊給日本人打散了。

李春華聽了以後，十分高興，他認為我們這次打游擊雖然失敗了，但是已給騎二軍的政工人員帶來莫大的光榮。他又立刻把我引見何柱國將軍，何柱國過去曾見過關於我們游擊隊的消息，以後正爲我們的下落擔心，一見到我回來，慰勉有加，立刻就決定提升我當抗戰日報社的社長。

這時我很想安靜的做些實際的抗戰工作，對於共產黨的作風，有了更深一步的反感，也極端痛心，但是，我還是極力的想寬恕他們，還認爲這不過是一個嚴格的戰鬥的革命的黨所免不了的。有時，我還

是癡癡痴想，這不過是某些個別幹部的個人錯誤，與黨的領導機構和革命路線是無關的。爲了革命的利益，個人受些冤屈，我總應該忍耐些。我們的領導者過去不是常說，一個好的革命者，一個優秀的布爾雪維克，應該要經得起千鎚百鍊嗎？

我的思想陷入極度矛盾中。

我努力抑制自己對於黨的憤怒。但是，天呵，這種對於一個革命青年的玩弄和摧殘，難道就叫做千鎚百鍊嗎？

一顆受過聖職薰陶的心呵，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念，依然沒有動搖，但是，爲什麼我偏不幸要多受這麼許多的磨折呢？爲什麼我偏不幸在黨內要遇到這麼許多的魔鬼呢？這是偶然的嗎？

我立刻又覺得，這一切懷疑，都是罪惡，對於一個自己追求過的崇高理想的懷疑，都是可恥的行爲，還是小資產階級的不潔的思想在我心中作祟。我應該再把自己的思想澄清，堅定起來。一個偉大的理想原不是那麼容易一蹴即達的，一個革命的黨也不是立刻可以達到爐火純青的。我是無產階級的兒子啊，我是黨一手培植的幹部啊，無論在任何的挫折中，我應該堅持我的信念，理想和對黨的忠誠；……。

我漸漸的又陷入自我陶醉中，我是在欺騙我自己呢？我還是在安慰我自己呢？

騎二軍中還有幾個過去「臨時支部」的同志，他們還時時問起我：「與黨的組織已經取得連絡嗎？」

「我們什麼時候再開會呢？」我祇是苦笑。或者告訴他們：我們時時刻刻記住在黨的路線下工作，有
沒有組織關係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內心是痛苦的，痛苦啊！

這時，我們在騎二軍中，還是和幹訓團的一批青年處於對立的地位，我的工作比較謹慎，很難被他們抓到什麼口實。但是，我的比較接近的一些年青朋友們，往往爲了壁報上的一段文字或標語上抄了一些共產黨的新名詞，不斷的受到打擊，我的內心又時時燃起憤怒的火焰。好幾次我氣得想立刻離開那兒。

然而，正當這個時候，騎二軍却對我很禮貌的下了逐客令：

我一聽說何柱國將軍找我立刻去談話，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

見面時，我照例向他行了一個軍禮，他很客氣，這次一定招呼我坐下，我想事情定是更不妙了。

「一個青年爲自己的理想奮鬥，這是很好的，我從來不但不加阻止，而且極願意幫助他。但是，你也應該了解我今天的處境，我的苦衷……。」這是何柱國將軍的開場白。

「軍長，你的話是什麼意思？」我問。

「沒有別的，我祇問你，你是不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不是！」我非常爽朗的回答他。

他在枱上翻了翻，檢出兩項文件，隨手遞給我，一面對我說：

「你自己看看吧。」

兩項文件是用不同的字體寫的，一項是講我過去在黨內擔任過的工作；另一項是說我這次是新四軍派來騎二軍工作的。後一項全是胡說，而前一項則幾乎全是事實。我看過以後，呆了半喇，何柱國兩隻眼睛緊緊的釘着我注意我的反應。

「你在這裡，關於你的閒話早已很多了，我一直是衛護你的，因為我是一個軍人，一向是愛惜人材的。但是現在這種情形下我也沒有辦法了，我們決定請你自動離開，同時我保證你，你在騎二軍防區內，你的安全我絕對負責。另外，這是我個人送你的一點路費。」當何柱國和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他的態度極溫和，絕無一般軍人那種暴戾的氣概，在當時的一般軍事將領中，似乎是少見的。

第二天我就離開了騎兵第二軍。我還清楚的記得，那些給我送行的青年朋友們，那些可愛的青年們，他們一直送我到十里外，女孩子們都流淚了，他們都謳歌我爲了信仰而遭受了打擊，然而，誰能够了解到我這時內心的苦痛和沉重呢？

我決定到重慶去，去看看這個戰時的首都。

從沈邱到後方，我們又要在日本佔領區的夾縫中走過，敵人兇暴殘忍，不時掃蕩，採取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沿途好多地方，都是斷牆殘垣，已不知經過日本人縱橫往返掃蕩過多少次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同胞是堅毅的，剛強的，他們毫不把日本人放在眼裏，敵人來了，他們就暫時避開，把孩子老婆糧食送到遠處去，壯年的人們，時而集中，時而分散，神出鬼沒地困擾住敵人，他們祇有極少數陳舊破爛的武器，其餘的，有的用梭標、鋤頭、厨刀乃至扁担和棍棒和敵人搏鬥，這一次旅行，給我極豐富的見識，我才發現到，這一個偉大的民族反抗異族侵略者的場面，並不祇是在共區所獨有，感謝偉大的抗戰啊，他把我們民族潛在的活力奔放出來。這時我所見到的，已與抗戰初期潰敗時的混亂與沮喪完全不同了。

「不，同志，我不能收你的錢，你留着別的用吧，你們打鬼子太辛苦哪，我們老百姓出點力又算什麼呢！」一個推手車的農民這麼對我說。

「先生，你愛吃點什麼呢？愛吃麵還是愛吃飯，我親自給你下廚做去，千萬別客氣，我自己的孩子也在外面和你們一樣啊！」一個年老的婆婆這麼對我說。

到處是溫暖的聲音，到處是祖國的愛啊！

馳騁在豫南的大半個平原上，心情漸漸開朗，我像是剛擺脫下一個重担子。

然而，這不是很矛盾嗎？一個反抗舊制度的革命者，一個顛倒於共產主義神聖理想的革命者，當他暫時擺脫了革命工作，擺脫了黨的政治上的束縛，回到舊制度下，又覺得可以呼吸一口新鮮的自由的空氣，舒暢一下。但是很快的又感到對這舊社會的不滿，娼妓、賭博、乞丐、流氓、欺詐、貧窮……，這一切不都是這個社會的黑暗面嗎？不都是在腐蝕着這個社會嗎？這能够是一個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所應該看得過去嗎？這個社會到底是太不合理啊！

「應該繼續戰鬥！」我鼓勵着自己說。雖然這時我已經負了創傷，這創傷是屬於心靈的，這創傷是來自於我們黨的同志們的。

從駐馬店到泌陽的一段路上，我本來可以一直走過去，但是我却折到竹溝去，竹溝，這是一塊過去豫南老蘇區的根據地，新四軍的留守處也會在這兒過，以後又發生過「竹溝慘案」，這個山叢中的小市鎮，染紅了我們同志的鮮血，我還是依樣以一顆虔誠的心，去憑吊了這個革命的山鎮。

過漢水的時候，我和途中的同伴合雇了一隻木船，這樣的大川我已經久違了，心情霍然活躍，忘却了旅途的疲倦，也忘却了心頭的創痛。木船一擺一擺地搖着，微風漸漸撩人，落日映在碧綠的水中，船上的槳聲和悅耳的船夫曲，像是一個大樂隊演奏着交響曲，有的人寫意的躺着，有的人提起嗓子，對着漢水，高歌起來。

從襄陽乘汽車本來可以直達宜昌，但是我先買了到達當陽的票，因為想去瞻仰這附近「三國時代」

的遺蹟，「趙子龍教主」的長坂坡和關雲長墓等等，「義薄雲天」的關雲長，在中國民間流傳了許多傳奇性的故事，我也受到若干影響，在墓道上默默地繞了三圈，和瞻仰這個歷史上的英雄遺蹟。然而，在回來的路上，我又想起，關雲長的事蹟，不是被我們黨裡斥為反動的封建意識嗎？可憐的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永遠在偶像中間兜圈子，想填滿我們心靈上的空虛，孔夫子不能滿足我們，就找到關雲長。關雲長不能滿足我們，就找到外國的馬克思。馬克思又不能滿足我們，再想起關雲長。有人或者又再拾出孔老夫子等等來嚇唬我們。我們半輩子就做了這些偶像的奴隸，偶像的殉葬者，這是誰在作弄我們，誰的罪惡啊！

這天晚上，我喝了兩大碗黃酒，就安睡了。

宜昌當時每天在空襲警報中，居民們都習慣地帶足一天的糧食到四郊去，早出晚歸，我在宜昌候船，一直等了七天，才搭到一艘「差船」（運兵的船）到了重慶。

三六

我於一九四〇年八月間到達重慶。

在重慶，我祇有半個朋友，那就是當時的大公報記者和後來一度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的

「署長」范長江。

我在西安秦風日報以及後來在河南的時候，因為和范長江都是新聞工作的同業，就通過幾封信，但是從沒見過面，因此祇能說得上是半個朋友。從通信中和文章中，彼此都知道是「進步份子」，但是誰都不知對方與黨的關係。可能他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即使已經入黨，在黨內的地位也並不高，否則，第一，以黨當時對我的態度，他如果是一個比較負責的共產黨員的話，我到重慶以後，他一定應該知道，就不會再幫助我。第二，當時在重慶的黨的高級幹部如徐冰等，公開在羣衆（同路人）前面批評攻擊他，假如范長江當時是一個黨的負責幹部，黨至少在羣衆前面是不至打擊他的領導威信的——范長江當時領導一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第三，當時在重慶的幾個中共小幹部如石西民（現任南京新華日報社社長），徐邁進（一度出任新聞總署辦公廳主任）等，都常常麻煩他，刁難他，而他也不一定常買賬。

我一到重慶，由於范長江的關係，就住在青年記者學會的宿舍，該會的地址在觀音岩張家花園，同住的有十幾個會友和該會的職員六七人，范長江是該會名義上的領導者，徐邁進（當時是重慶新華日報的辦公廳主任）則主持組織工作，日常會務由一個秘書叫傅于琛的共產黨員負責，傅携着一家老小都住在會裏。另有一個職員楊重光，他在會裡僅是個幹事的名義，但是却有極大的權力，他的工作不受會裏任何人指揮，常常神秘地幾日不見，我很奇怪他整天忙些什麼，祇是有一次在中央銀行，無意間發現他和一個朋友在一道，我一見他這個朋友我很面熟，想了許久，我才恍然，原來這是我在延安棗園見過的

，因此我肯定的斷定，這個楊重光就是中共的特務系統的，他的職務是利用青年把不滿意這個時局，他做他的特務網。

我當時接近的全是一批左翼文化人，雖然我已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一遇到黨的文化上的號召，我都能十分賣力。我以自己過去參加過組織生活的經驗，加上與他們之間常常接觸，對於中共控制重慶文化運動的活動，也清楚的看在眼里：

新華日報在組織上規定是由徐冰代表黨報委員會領導的，但該報社長潘梓年（現任華中文教委員會主任委員）經常越過徐冰直接請示周恩來。

除新華日報是黨的公開機關報外，當時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以後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營，這個會表面上的領導者是郭沫若，郭沫若是一個聾子，視綫也不大清楚，平日他的一切往來公私文件都由一個共產黨員馮乃超代拆代行，當時中共在重慶的文化運動最高決策者是以徐冰為中心的，包括馮乃超，錢俊瑞，夏衍，王炳南等幾個人的一個小組（矛盾在當時頗不得意），黨給馮乃超的任務是，左右郭沫若這個偶像意志，再通過他的名字在文化界發號施令。郭沫若以前是共產黨員，後來獨自逃亡日本，以懦怯為黨停止了黨的黨籍，但是後來他在文學上和學術上的成就，却在知識份子間發生相當的影響，幾乎和魯迅並駕齊驅，於是他又被黨認為是一筆奇珍的財產，馮乃超以後就做了郭沫若的秘書，隨侍郭的左右，一遇到郭的思想有了「偏差」，馮就奉命去「說服」他，馮乃

超久已成爲郭沫若的生命與靈魂的主宰者，直到現在他還是郭沫若的辦公室主任，郭沫若一日不死或被清算，馮乃超這個黨的終身職業大概不會有所變動的。

錢俊瑞的活動重點在教授方面，因爲他當時是一個半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也常代表徐冰向文化界的左翼積極份子傳達黨的指示。他在從事中共文化運動後，不久就和一個左翼女文化人沈茲九（現在是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的老婆）同居，沈有一個漂亮的女兒，是她從前的丈夫生的，隨在媽媽身邊，這女孩子生得亭亭玉立，惹人憐愛，不久錢俊瑞又和這個女孩子發生關係，沈茲九憤而攜着女兒出走。這是一件在左翼文化圈子中盡人皆知的事。這個錢俊瑞，現在正當着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兼教育部副部長（部長馬叙倫是個傀儡）。

夏衍當時則指導着一般的「統一戰綫」性文化團體內的左翼文化人的活動，最大的障地是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中蘇文化協會，夏衍個人總很少出頭露面，利用「同路人」去包圍各該會的國民黨的負責人，在中蘇文化協會內，他們利用葛一虹，曹靖華控制了洪鈞（當時中蘇文化協會的秘書長，孫科的親信），另用幾個並不十分知名的共產黨員郁文哉、潘德楓（這兩個人現在都是「中蘇友好協會」的負責幹部）等人，不聲不响地攫奪了會務的實權。在「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內，中共所遇的敵手是張道藩（現在國民政府的立法院長），就比較吃力得多，夏衍的策畧是，一方面扶植掛着自由主義外衣的溫和親共作家老舍、洪深等人抬頭，一方面對外指斥梅雨、沙鷗這幾個人是「國民黨特務」（實際上這幾個

人都是爲中共工作的，現在都還在共區服務），以使得他們增加與張道藩接近的機會，取得張道藩的信任，同時並乘機孤立王平陵這批真正的民族文學作家。

我到重慶的時間，正碰上重慶的大轟炸，青年記者學會和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是隔鄰，我們就避在他們的防空洞內，在這個時期，我認識了黃炎培，當時一般的左翼份子，受到中共的影響，都對黃炎培沒有好感。我聽到其中議論的一個說：「他是蔣介石身邊的放賑的，當政府在什麼地方發生了政治性的災難的時候，就由這個笑面虎出面爲政府消災降福了。」又有人說他是政府的「欽差大臣」，有人又說他是專替蔣介石貼膏藥的……。所有形容他的一切稱呼，都極盡刻薄之能事。後來黃炎培以民主同盟要角之一出現時，許多中共人士乃至一般左翼份子，還是一樣對他懷疑很久。現在這個黃炎培，已貴爲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副總理，從北洋政府時代的官僚，一變而爲民國的「欽差大臣」，再變而爲中共的幫兇。

我住在青年記者學會宿舍不到半個月，傅于琛就對我傷起腦筋來，會裏規定每星期舉行一次會員座談會，在我參加的第二次集會上，我赤裸裸的舉出十件以上的事實把會務批評得十分尖刻，傅于琛等人漲紅了臉，非常侷促不安，他剛一提出答辯，又被我以新的論據新的指責把他轟下來，我所用的全是術語連篇的標準中共式的演說，如「關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尾巴主義」，「機會主義」等等，弄得他們啼笑皆非，奈何我不得。其實我那時也犯了「報復主義」，我把自己在黨內所受

的一肚子烏氣，幾個個機會在這批小共產黨自身上發作了。我的講話處處表現很「驚人」，大家都閉口結舌，面面相覷，但却沒有一個人對我喝采，共產黨員及共同路人固然不必說，會裏也有一部份親國民黨的會員，他們聽到我的說話和立場，完全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口吻，也一樣對我懷疑，在他們的了解中，這不過是「狗撿骨頭鬼打架。」

這次座談會，范長江，徐邁進等人都沒到，第二天由傅于琛反映過去，他們都慌了手脚，特別是范長江，簡直氣急了，立刻來找我：

「你爲什麼不把這些話直接和我談談。」他一見面就這樣責備我。

「是的，我正想找你談談。」我莊重的說。

「現在你已經放過砲了，還說什麼呢？」他的怒氣已經漸漸消失了。「老弟，你到底還年輕一點兒。」

「但是他們要知道，我是善意的。」

「不管你善意不善意，他們不諒解你。」

「……………」

我卻因禍得福，范長江立刻奔走替我找到一個職業，不久就走馬上任去了，這時傅于琛等人也好像

鬆了一口氣，着實高興了一番，特地破鈔請我進了一個四川小館子，吃了四杯大糖和幾籠蒸牛肉。

三七

重慶，這個戰時的首都，英雄的城市，這時是民族解放的神經中樞。年青的人，都挺起胸膛，朝氣蓬勃，充滿了新生的氣象。他們和她們，一個個高唱着戰歌，一批批走上戰場。這是祖國的新苗，祖國的希望啊！然而，在這個莊嚴的城市，却同時也有各種各樣的病菌在侵蝕着，腐蝕着他，共產黨人所關心的是不是抗戰的勝利，而是如何加重這些腐蝕的因素，加速這個社會秩序的破壞，動搖抗戰的基礎，打擊政府的威信，以便於他們準備「革命條件」。而在另一方面，腐敗的官僚集團，他們醉生夢死的生活，昏天黑地的作風，他們也在不知不覺間起勁的幫共產黨的忙，爲他們自己掘着葬送自己的墳墓。

揚子江，嘉陵江環抱着這個山城，這城市，隨着山形的起伏，而建築起波浪式的馬路，新式的洋房和舊式的房屋交錯着。夜晚，山城和江邊紅紅綠綠的燈光互相輝映着。

「你沒有到過香港吧？這就像香港的夜景啊！」陸詒（當時的新華日報記者）和我漫步在重慶對岸的玄壇廟江邊時，指着對江對我說。

「你知道，我進新華日報也是范長江介紹的，機會是很偶然的，他們需要一個戰地記者，我正好有這樣的興趣，需要一個崗位給我發揮，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因爲我對於實際政治沒有興趣，我愛山，

愛海洋，愛藝術，愛大自然，愛冒險，這些條件使我選擇了新聞記者的職業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道路。是進了新華日報以後，我感到空虛，我覺得寂寞起來了。」他又繼續的說。

「爲什麼？」我問。

「我們也不過隨便談談，新華日報給我的待遇很好，但是，他們把我當作了一個技術人員，你想，一個新聞記者，如何能受這樣的束縛，所以我和他們（指新華日報的共產黨員同事）都談不來，也始終合不來，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我要求的是廣濶的智慧。他們要求的是一個狹隘的小天地。不過，有什麼別的办法呢，既進了新華日報，就得混下去。」他停頓了片刻，又繼續說下去：「我了解，一個革命者是需要犧牲自己的一部份青春和幸福的，在這點上，對於一個真正的苦行者，我也很佩服他們，但是在我，我以為革命是屬於浪漫主義的。如果革命一定要勉強把人用一個型代替另一個型，就沒有意思了。比如我說，我一方面是一個舊社會的反抗者，舊禮教的背叛者，但是一方面我還是愛我的賢慧的小脚太太。我沒有必要把我的好太太一脚踢開。正如別人沒有必要用一套什麼觀念來強加諸在我的身上。他們那些人（指共產黨員）自以為有勇氣，可惜他們那股勇氣我是沒有的。我期待一個革命的暴風雨，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勇氣。我在新華日報，不過是看作一個職業吧了。」

這是我搬出青年記者學會的第三天，陸詒來看我時說的，我陪伴他沿着江邊一直散步到夜深，我們才分開。他對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當時沒有表示，我在情感上很喜歡他這一個朋友，而且也很同情他

的境遇，但是我怎能有所表示呢？要是說服他吧，我當時的確也和他有些同感；要是附和他吧，我當時對中共也還存着幻想——至少黨的政治路線是沒有錯的。我煩惱起來，我能表示些什麼呢？而且在我們黨的政治氣氛中，誰又能保證他對我說的話是不是出於由衷之言呢？不久之後，他倒真的離開了新華日報，他對我還特地解釋說：「我離開新華日報，心裡很難過，我和他們以後還是朋友，我希望以後以朋友的地位，從旁對他們多幫些忙。」我聽了祇是笑笑，笑他糊塗到了極點，他滿口「朋友朋友」，在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朋友」的觀念是沒有這回事的。此人後來一直糊塗下去，在「解放」後又跟着靠攏了，不過，我還是能原諒他的，因為他說過，他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

這時已是九月的天氣，熱得還是透不過氣來，汗珠流得像雨點一樣，我們不肯坐滑杆的人，一走出門，沿着路一個山坡一個山坡的爬過去。在一個短時期的寧靜生活後，我現在又開始終日忙碌起來了。

在重慶，所有的年青的人都是那麼緊張而活潑，日本飛機一批批飛臨上空投彈掃射，一陣轟炸過後，年青的人立刻從地下鑽出，在火焰中在瓦礫中工作，在打掃過灰燼後，新的建築物又生長起來。這些充滿活力的堅實的年青人，如何不令人謳歌呢！

第九章 我毀滅了我的朝鮮友人

三八

我這時的職業是朝鮮義勇隊的總隊長金若山（即金元鳳）的私人秘書，同時又因為該隊有中文刊物和常常出版些中文叢書，因此我又兼任了中文編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朝鮮義勇隊全隊約有三百餘人，這一批幹部後來都成了北韓當局初期建軍的骨幹，現在正在和南韓及聯合國的軍隊作戰。而這一批幹部，最初送到華北，却是我為中共立下的「大功」。

朝鮮義勇隊是由四個流亡在中國的朝鮮革命黨派組織起來的，包括有：朝鮮民族革命黨（領導人金若山），朝鮮革命前衛者同盟（領導人金仁哲等，後與朝鮮民族革命黨合併），朝鮮民族解放同盟（領導人金奎光，他們自稱是朝鮮正牌的共產黨，回國以後，却給金日成逮捕起來，下落不明），朝鮮革命者同盟（領導人柳子明，無政府主義者，以後無形瓦解）。以上四黨派中，以朝鮮民族革命黨力量最大

這批革命青年，人數雖然不多，但素質極好，他們都在二十五歲上下，朝鮮亡國三十年期間，他們大部都是在一個革命的家庭中長大的，在朝鮮亡國以後，隨着他們的父親顛沛流離，不斷受着革命的薰陶，體健力壯，生活刻苦，不怕犧牲，意志堅定，思想純潔，社會關係單純，而且他們每個人都至少能懂得中、韓、日三種語言文字。具有這一切條件的這批朝鮮青年，想不到當時已經被周恩來注意到，成爲中共所獵取的對象了。這時他們正在考慮到如何下手。

總隊長金若山，我始終認爲他是一個可敬的朋友——雖然他後來爲中共所利用，但是我直至今在始終懷念這位異國故人。他熱情、誠懇、重道義，氣度大，他常常做些吃虧得連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祇可惜書讀得少一點。我和他相處之後，不久就建立了兄弟般的莫逆之交，他一切都信任我。

我這時爲「羣衆」（也是中共的機關刊物），「新華日報」，「國際新聞社」（范長江所主辦）陸續寫了七八篇專門討論朝鮮問題的文章，資料大部都來自朝鮮義勇隊，我的文章發表以後，受到一些朋友的注意，因爲在中國專門研究朝鮮問題的人極少，而中共也認爲我的文章沒有脫出馬列主義觀點，對我大捧特捧，我於是又一躍而被左翼文化人譽爲「朝鮮問題專家」。——一個才二十多歲的青年，已經先後獲得三個「專家」的銜頭：圖書館專家，游擊戰專家，朝鮮問題專家，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而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的悲哀！

在延安時代，中共黨報委員會的徐冰，這時正在重慶，他是了解我在延安的冤獄的經過的，這時就

把我請到「周公館」去。

「周公館」在重慶會家岩五十號，一座單獨的中西合參的房子，裏面被隔開有二十多個小房間，兩個大廳，有時住得滿滿的人，有時幾乎一半以上都空着，空着的房間又被臨時充作會客室，這座房子名義上是周恩來的私人「公館」，一看就知道是個機關，是當時中共領導國民黨區域活動的大本營。進門的時候，先從一個小窗口遞進一張條子，然後由一個武裝警衛員把我帶進去，這時我遇見一個熟人，他和我點點頭就走開了。這人叫朱海民，我知道他一向是做電訊工作的，這時我私下忖度到，這個「周公館」內一定也有電訊設備。

我在一個小房間內坐定後，勤務員拿烟倒茶招待得非常殷勤，一會兒，徐冰走進來了，他和我熱烈的握手，笑聲不停，倒真像是久別重逢的老朋友，客氣得令我心中忐忑不安。

「今天在這裡吃便飯了，到了這裏，你像是回到娘家一樣。」我當然不好客氣，就耐心坐下暢談了。

「你比從前消瘦多了。」他看了看我說，又滔滔不絕的談到營養問題，似乎很關心我的健康。

吃飯的時候，同席的有周恩來（當時中共的重慶代表團首席代表，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總理。）王若飛（當時中共的重慶代表團最高負責人之一，政協時，飛機失事身死。），董必武（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總理），葉劍英（現任中共廣東省政府主席），張曉梅（徐冰的老婆，當時中共在重慶作婦女運

動的負責人），陳家康（當時中共代表團的機要秘書，後充中共代表團發言人，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長），徐冰和我。徐冰把同席的人一一爲我介紹，並把我的才幹和對黨的貢獻不絕口。菜很豐富，可惜我祇低着頭吃我眼前的一樣菜，這或許是由於在這許多黨大亨前面，自己過份的自卑心吧。徐冰在當時佈置這種氣氛，完全是有意計劃的，他要使我感到黨對我已經沒有一點懷疑，信任我而且重視我。周恩來在飯後和我談了約莫七八分鐘的話，所說的，現在想起來倒是發人深省的，他說：「中韓關係將來是的確太重要了。第一次中日戰爭中，中國在朝鮮的失敗，是滿清帝制崩潰的信號。」最後他要我向金若山先生致意。

這一劑強心針，的確發生了重大的效果，黨的許多領導者對我這麼好，我不感到光榮嗎？我至少被我的虛榮心暫時征服了，我對黨的某些幹部某些作風的不滿，又被沖淡了，甚至被驅散了。我對黨的信心又在開始復活了。這一強心針，延長了我的罪惡，我又賣命的死心塌地爲中共工作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和徐冰的晤面，有時在「周公館」，有時約在外面，二次三次以後，他漸漸要求了解我們朝鮮義勇隊的一切，如朝鮮人在中國的黨派活動，他們與中國當局的關係，朝鮮義勇隊的內部組織情況，朝鮮革命者個別的分析等等，我盡我的可能，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知道的，我盡力去搜集他所需要的材料滿足他。後來我們的談話又漸漸談到我個人的問題上面。

「你離開組織以後，實在是黨的一個損失。而且我很了解你，你的脫黨不過是爲了個人問題。」他停了停，似乎是期待我的反應，我沒有答話，他又繼續說下去：「你離開黨以後，沒有對黨抱怨過，你的表現很好，我們都知道。現在我打算考慮恢復你的組織關係——不過我還沒有向組織上提出過，你的意見怎樣？」

我沒有像初入黨時那麼興奮，但是聽了徐冰這一番話，心裏也很高興，我隨口說出：

「假如組織上信任我，相信我還能爲革命多做些工作，我自然是願意的。」

我又依樣畫葫蘆的寫好一份自傳送過去，後來他幾次見我的時候沒有提起過，以後他又把關於朝鮮義勇隊的這份工作移交給陳家康，也沒有再提起我的組織關係的事。我以爲這件事已經告吹了。

一天，有一個在救濟委員會做事的東北青年姓郭的（名字我現在想不起了）來看我，他說于毅夫先生找我談談，于毅夫我是知道的，他當時是東北救亡總會的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同時主編一個叫「反攻」的刊物，我們並不相識，他找我幹嗎呢？但是我知道他至少是個「進步份子」，見見也沒有關係，於是我和郭君約了一個時間，在一天晚上，就到領事巷東北救亡總會見了于毅夫（于現任東北人民政府黑龍江省政府主席）。

于毅夫把我接到會客室，我們聊了半天東北問題和朝鮮問題，話題又轉到我的本身，他對我的的一切都很有熟悉，最後他正色的告訴我：

「我奉重慶市委（于毅夫當時也是重慶市委）的命令通知你，你的組織關係已經恢復了，你暫時和我隨時聯系。你是黨組織苦心培養出來的一個幹部，你過去已經犯過重大的錯誤，黨已經寬恕你，以後你必須做一個堅強的革命鬥士，一個好的布爾雪維克。」

三九

我和于毅夫每一二個星期見一次面，而接觸比較多的還是陳家康，雖然一個地下工作者與一個公開的共產黨負責幹部常見面是不方便的，但是當時有許多事需要我們直接解決。

陳家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湖北佬，武漢大學畢業，中英文都有相當好的基礎，生得又瘦又小，倒黜得十分短小精幹，他的記憶力也十分好，往往我說過的話，乃至數目字，他過若干時日還清楚的記得。

當時陳家康給我的任務是：說服金若山，把朝鮮義勇隊調到華北工作去，說服金若山並不難，因為：第一、我當時提供了許多資料給金若山，告訴他日本人正把朝鮮人向華北大量移民，朝鮮義勇隊祇有在敵後，在華北發展才有前途；第二、他對我很信任，頗能尊重我的意見；第三、他的舅舅金斗奉（即現任北韓政府主席，地位在金日成之上，但無實權，過去係韓國一著名學者）和妻子林哲愛（已逝世，後金若山與崔東仙女士結婚）當時都極力支持我的意見，我們於是就緊緊的包圍了金若山。

但是，困難是，當時政府也極注意朝鮮義勇隊的動向，要朦混過是極不容易的。於是，黨裏又給我

派了一個助手，由另外一個與金若山相識的朋友出面把這個助手介紹到朝鮮義勇隊當書記，專門幫助我製造假報告，應付政府。以致後來我們把朝鮮義勇隊隊員調出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了華北，政府還屢在鼓裏，我們祇編了一三十個人，在三、五、六等區區調來調去。絕沒有露過馬腳，而且還獲得過政府的傳令嘉獎。金若山這時領到政府和中共兩方面的雙重津貼。

然而，當後來朝鮮義勇隊的隊員陸續調到華北以後，中共就變了卦，陳家康以十足的官腔對我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依靠信仰，而絕不應該以錢去爭取同志。他們要去華北，這是他們自己要求的，自願的，我們已經幫過他們的忙了。朝鮮革命是朝鮮人自己的事。」

「不過，家康同志，我們過去曾經答應過人家；而且，現在國民黨打擊他，他在經濟上的確困難；再說，他們現在工作上也確有必要用錢。」

「你說的幾點都不能成爲理由，我們過去答應他，是的，但是那時有那個時候的情況，有那個時候的工作必要……。」「我們爭辯了很久，最後他才答應向恩來同志商量先借法幣一萬元，過了幾天，他祇交給我五千元，我轉交給金若山，他很不快，勉強的收回去，我向他饒舌作了好久的解釋，我說：「周先生和陳先生都感到很難過，對你幫助不够，不過實在也是太困難了。」

後來當金若山的幹部全部被中共抽空以後，金若山又通過我向黨裏提出，他自己也要到華北去，這時周恩來正式拒絕了。理由說得也很堂皇。「恩來同志的意思，要金先生繼續留在重慶，這裡的工作比

過去更重要得多了。革命工作在那裏都是一樣的。」陳家康對我說。

然而這中間真實的原因，我心裏很明白，金若山是當時朝鮮革命運動中最有威望的領導者，他過去在朝鮮人民中是一個英雄的傳奇性的人物，我們黨裏最初必須利用他，才能把這大批青年關押出去。但是這批青年到了華北以後，他們還以為金若山是一直和他們一道的。如果金若山一到華北，領導的真心自然又落在金若山身上，中共就不易直接控制了。

金若山這時很苦悶，「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祇有我一個人真正的了解他，在情感上，我很喜愛這個朋友，也同情他的境遇。而且處處總竭力幫他的忙。但是，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是要執行黨的任務啊！在我們黨的一次小組會上，曾經討論到金若山，黨對他的結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和個人英雄主義者，政治上是不可靠的。」我不禁要跳起來，想爲他說幾句話，然而黨的世故告訴我，還是玩不得的。

金若山今天還可能是我的敵人，在情理上，我不應爲我的敵人辯護。但是，倘使金若山今天能有機會讀到我這本書，我相信他或許會流淚的。在這裏，我還想舉出一件事實——假如金日成不以這項理由來作爲打破金若山的藉口的話。我在後來完全脫離中共而擺脫中共的政治影響以後，組織了「中國人民黨」，這時中共正對我進行猛烈的打擊，但在這時候，我和金若山依然是很好的朋友，他給我極大的鼓勵，他後來回到漢城，也把他的朝鮮民族革命黨，改組爲「朝鮮人民黨」，這時我在上海，我們通過幾

封情意懇摯的信，我勸他不要到北韓去，他最後一封情隱約的告訴我，北韓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南韓的情勢太壞了，甚至逼得他在漢城也住不下去，他已經搬到鄉間去了。

落筆至此，我黯然下淚，往事縈徊，故人依依，我敢說他那時在本質上還是個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共產黨毀了他不算，天涯之闊，竟讓我們的英雄沒有去處。自由世界之大，竟也讓這個英雄走頭無路，我能不拍案浩然長嘆。

金若山後來終於到了北韓，我聽得別的韓國朋友說，金日成由於他在韓國人民中的號召力和影響，起初很禮待他，這時他的舊部（朝鮮義勇隊隊員，也就是經我送到華北去的）如金斗率，已經當了北韓政府主席。樸孝三，已經當了北韓軍第一軍團的司令員（這是北韓的第一支武裝部隊）。潘海亮，已經當了北韓警備司令。因此金若山在北韓政府中也得到一個國務委員兼檢閱部長（約等於我國的軍政部長，專管軍事行政）的名義。後來在韓戰以後，在蘇聯受訓的朝鮮青年幹部一批批回來，他的舊部一個個被剝奪了軍權，他也從此不知了消息。

我默默地祈禱這個異國的故人無恙。

四〇

民國三十年一月，在皖南發生了新四軍對政府的叛變，我有好幾個朋友如劉海燕（我在鎮江時最主

更的助手），徐師範（過去在河南辦過「大衆報」）等都死於這次事件中，傷心慘甚，我當時聽了黨內的宣傳，說：這是政府對我們黨的陰謀，我益加憤慨。這時在重慶的我們黨的組織，幾乎每天至少總有一兩個傳說，就是政府準備要按黑名單逮捕我們，一般半公開的共產黨員和黨的工作者，當時都奉命轉入地下或調動工作，我們同志間在途中遇到，也不敢招呼，「說不定他——」，彼此都疑神疑鬼地，事後再想想對方那副毫無表情的面孔和家有喪事的樣子，也就釋然於懷了。

我繁伏在金若山的家裏，他們夫婦都很了解我，他的太太對我也體貼入微。住了半個多月，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時，陳康離開了重慶，他派人送來一張條子，告訴我，如果有重要的事，可以直接與董必武聯系，于毅夫已經悄悄離開了重慶，組織上派了一個叫寧啓枷的青年與我暫時連絡，他當時的職業身份是一個店員，他來看我的時候，總是用口頭傳遞一些消息，然後再把我的情況帶回去報告，我這時正在埋頭讀艾思奇的「哲學選輯」，他却對我說：「暫時不要讀這些書了，還是讀些『金瓶梅』一類的小說吧。」

我因為朝鮮義勇隊的工作關係，過去認識了王芃生（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爲蔣先生身透研究日本問題的權威，已逝世，）我常去看他。也爲了他的「官方關係」，使我多了一重掩護。王芃生身體肥碩，一見人總是談笑風生，沒有官僚架子，待人誠懇，說話率直，他常常單刀直入地問我：

「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

「不是。」

「是呀，我總說你不是，我看你也不像，不過我這裏總常有人對我說你是共產黨，我總是盡力替你解釋。」

我聽了心中暗自得意，這一位一向以對日本問題判斷正確見稱的長者，而對我的判斷卻是錯誤了。王九生很愛護我，我當時在重慶的安全，多少得力於他爲我說話。後來在我最後脫黨以後，我就再沒有勇氣去看他，直至他死於南京之後，我還是深感有愧於他。

我在金若山家裡住了將近一個月的光景，有一天傍晚，寧啓枷帶來另一個高大的約莫有四十來歲的安徽人，寧爲我介紹，「這是施同志，是組織上的負責同志。」金若山住家的環境是一個很大的桃園，我們三個人就在樹蔭下選擇了一塊石頭坐下，我靜聽着施同志對我的指示：

「國民黨正在準備對日本人的投降，蔣介石、汪精衛已經就要合流了，根據黨裏確實的情報，在重慶現在駐有汪精衛的代表，蔣、汪有時唱唱雙簧，那不過是爲了欺騙人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是必然要叛變革命的，他們爲了佈置一個投降的準備，就必然要消滅共產黨，瘋狂的進行反對革命人民的大屠殺。現在，全國性的反共高潮就快要到來了。」他有條有理的述說着這一套黨八股，莊嚴得像廟裏一尊羅漢似的，然後又不覺自己好笑起來。

「你的理論修養也很高，這些我都不用多說了，你抽煙嗎？」我說「不會」，於是他又繼續說下去：「國民黨是必然要失敗的，因為我們的黨有堅強的領導，全國人民的擁護和強大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敵後的廣大的根據地。但是——」他重重的吸了一口煙，又回復了那一副羅漢面孔，繼續說：「但是，爲了粉碎敵人的陰謀，爲了減少革命的不必要的損失，爲了保存黨的優秀的幹部，組織上作了全面的應變準備，因此，你明天必須立刻到蘇浙皖邊區去。」

「明天！聽說買車票頗不容易，普通也要登記半個多月才能買到。」我說。

「這用不着你擔心，早替你登記好了，寧同志明天陪你一起到車站去，他替你買好票，送你上車。」

「我的工作——」

「這完全要看情況變化，必須等你到屯溪才能決定，或許作地方黨的工作，或許要派你打游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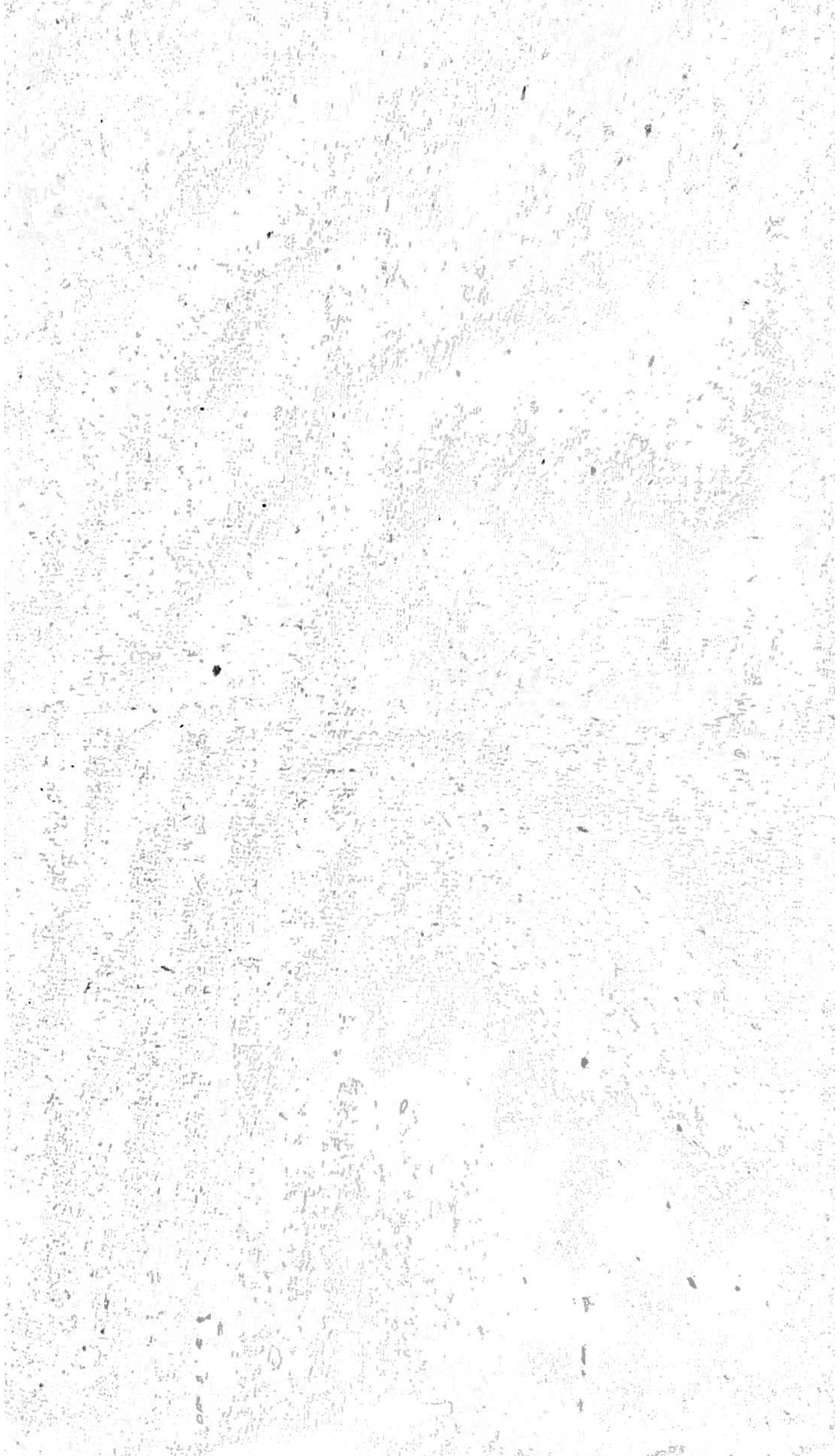
「那麼，我要不要見見董老（指董必武）？」

「不必了，他已經知道了。」接着，他又吩咐我：「必須立刻摒擋一切，要極端秘密。」

他遞給我一疊簇新的鈔票，對我說：「路費一共是五百元。」另外又給了我一件軍事委員會的出差派令，作爲我途中的證件。

，我收拾好行李之後，就告訴了金若山，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們相對淚視，幾乎都要從眼眶裏迸出眼淚。他這時爲了把朝鮮義勇隊的隊員送到華北，已經漸漸爲各方所知悉，外受中國當局的壓力，內受韓國其他各黨派的不滿（如金九所領導的韓國獨立黨及其韓國臨時政府），甚至，他自己的老幹部爲了這件事，也不能諒解他（如成玄國爲此與他吵過架，李集中爲此自殺了）。最後他自己要求到華北去，中共又不答應，他這時看着我就要離開，不禁感觸到自己又將何去何從。我是毀滅金若山政治生命的直接罪人，雖然他從來沒有埋怨過我，但是，我，我當時能對他說什麼呢？

這天晚上，我就在海棠溪車站的一個小客棧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果然寧啓枷的神通廣大，很順利的買到了車票，我就離開重慶了。



第十章 血腥的皖南浙西地下鬥爭

四一

從四川到安徽屯溪，我是繞道貴陽、桂林、衡陽、鷹潭這條路，爲了想藉這個機會，看看朋友，我就從鷹潭乘了浙贛鐵路的火車直達金華，金華有一朝鮮義勇隊的辦事處，負責的是李蘇民、王通等，是我在重慶時的好友，我到金華的時候，金華一度緊張，我們就隨着台灣義勇隊到了衢州，不久，我們又一同回去，在這度時間內，我和台灣義勇隊的總隊長李友邦相處了一段短時期。

李友邦現在已在台灣以共諜的罪名被槍決，他是台灣人，在黃埔四期讀過書，參加過中共，後來被捕，又自首過，直到抗戰開始，以黃埔生的關係，在陳誠將軍的支持下，組織了台灣義勇隊，開羅會議以後，台灣決定歸還祖國，台灣義勇隊改組爲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國民黨團合併後，李友邦以青年團中央團部的幹事一躍而爲國民黨中央委員兼臺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直到後來他被捕下獄。這倒是十分奇怪的事：李友邦在國民黨中不斷陞官，而且做的是黨官，但是他在信仰上始終是相信

馬克思主義的。他常在公開集會中演講，滿口「總裁偉大」，「國民黨萬歲」，一下台以後，立刻又向我們解釋：「他媽的，這是什麼玩意兒。」因爲他從朝鮮義勇隊的朋友中，也知道我是一個半公開的共產黨員，因此對我說話也相當露骨，他迫切的希望我們能幫他解決中共的組織關係，竭力向中共討好，在當時的台灣義勇隊中，掩護了不少的共產黨員，後來在台灣被槍斃的女共諜米諾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此外比較知名的有一個他的神秘的潘華秘書（曾在福建爲政府逮捕，又爲李友邦保釋，後去上海。）賂耕漢（現任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計劃局局長）。張一之（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科委員會委員）。朱芳（女，當時擔任台灣義勇隊的政治組訓工作，她有一個行踪不定的「臨時丈夫」，常常每隔二三個星期來一次），另外李友邦還收容了幾個皖南事變中逃出的幹部，（如翁文章等）。李友邦和金若山正相反，金若山是後來一步步從被騙到被逼與共產黨站在一起，而李友邦則賣力的向中共爭取表現。（李友邦當時跟中共連絡用的化名是「番王」）不過在當時我知道，李友邦雖賣力，中共却始終對他沒有好感，所以他常感到苦悶。李友邦個人的生活很奢侈，家中置滿最時式的陳設，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上一座小山，得坐四人大轎。遇到國民黨的達官貴人駕到，他善於趨炎附勢，會吹會拍，餽贈手面很大。他常常又向我們解釋：「這是不得已的，不學點官僚樣子，在國民黨內是混不成的。」

金華是一個可愛的小城市，氣候溫和，街道整潔，市面繁盛，百貨充斥，攤販的叫賣聲，婉轉動聽。這個小城市常常被人披上了「小杭州」的外號。可惜我在半個多月以後，就匆匆的取道蘭溪去屯溪了。

由金華乘電溪，乘的是內河的小木船，船上搭的差不多都是走私客，在雙層的鋪位上，每人所佔的地位僅勉強可躺下一個身子。河流湍急，險石甚多，船行速度比步行還慢，在第十天的傍晚，我們才到達了電溪。

到電溪以後，我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遵照組織上的指示，我寫了封信給新河灣「南皖旅社」轉交劉盛之先生，內容是說：令親陳石如先生托我帶給你一些禮物，已經帶來了。下面的具名是「徐忠發」信發之後，我一直等了五天，沒有回信，也沒有人來，屯溪接近前綫，旅館查得也很緊，我十分焦急，於是親自跑去，一看我的信還插在那兒，當時我本想把信取回，但仔細考慮一下，這是組織上的指示，我怎能違背呢。還是耐心的回去等着吧。

大概又過了三四天，終於在一天早上八點鐘左右，我還在熟睡，突然我的房門被人輕輕的「砰砰」敲了兩下，我被驚醒，披上衣服開了門，一看是個五十上下的傭工模樣的老頭子。

「你就是徐忠發先生嗎？」

「是的。」我本來還帶着三分睡意的神態，突然被他驚醒。因為我在旅館登記的是我的出差證的名字，「徐忠發」三個字祇是我給劉盛之的信中用到，我用雙眼緊緊的釘住他，「你是——」

「啊，我是劉先生要我拿禮物來的。」我給他遞過一杯茶去，他就一屁股坐了下來。

我們的談話，漸漸從天氣，說到屯溪吃的玩的，彼此都在繞圈子，摸索對方。

「這是什麼顏色？」老頭子指一指自己身上的衣服對我問。

當時他穿的是「身陰丹士林布的短服，然而我卻毫不遲疑的回答他：「你這是白色的。」接着，我就轉到他身邊，驚呼：「啊，你就是劉先生，劉同志」。

這是當時組織上在皖南的一個暗號，離開重慶的時候，施同志告訴我，當你的信發出後，組織上和

你連絡的時候，不管他指一樣什麼顏色的東西問你，你一律說是白色的，然後，你們就可以暢談一切了。

老頭子後來告訴我，劉盛之這個名字也不是他，不過是一個代名字，他的名字是江耀祖，江耀祖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字，我又不知道了。而且他實際上也並不算十分老，不過爲了「工作」，留得滿臉的鬚鬚罷了。

我們在相互表明身份以後，他告訴我，這裏的環境太壞了，國民黨特務十分猖獗，第三戰區的長官顧祝同是親日派，和漢奸汪精衛有勾搭，他們不打日本人，專門對付共產黨，要我務必謹慎。

第二天，他替我介紹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又給我找到一個臨時的住處，於是我就遷出了旅館。

「要錢化的時候，你就找這位殷經理調一調，他是我的好朋友。」老頭子又給我介紹認識了一個大南商行的殷經理，並且這樣囑付我。其實我心裏明白，可能這個「殷經理」就是爲組織上的「經商」者。

第四天，我就參加過一次小組會議，小組會是在一家成衣舖裏面舉行的，成衣舖口有我們自己人作眼鏡，裏面我們擺着麻將檯子，六個人坐着，其中兩個人裝做看牌的樣子，主席是藥長明，當時的蘇浙皖邊區區委，後來當他不能在皖南立足時，被調到蘇北當縣長。他約三十多歲，給我的印象是個花花公子，胸前掛了一隻「皖南行署」的證章。一出門就叫黃包車，有一天他和我在一道，爲了和車夫講價斤斤計較，他攔了車夫兩記耳光，連我都看得呆了。有時他花錢又很隨便，常常進館子，一叫就是許多隻名貴的菜，大吃大喝，他對我說，他用錢都是從家裡帶出的，他幹革命完全是貼老本的。

藉打麻將開小組會，常常弄假成真，因此同志間賭風很盛，爲了工作上的必要，組織上也並不說什麼。

我和殷經理見面以後，他不久交給我一百元，但我在一個星期就化光了（當時普通的伙食祇吃三十多元一個月），爲此我被老頭子叫去罵了一頓，他說我的化錢太隨便了，完全失掉立場。他並且警告我。

：「你的生活，你的一舉一動，組織上全知道。」他後來又要從我的談話中，了解了解變長明最近的私生活情況，另外，他還告訴我，有一個姓蕭的青年同志，政治上可能有問題，不可靠，要我留心他。甚至他介紹給我的那個「好朋友」殷經理，他也對我說：「他祇能做朋友，政治上是靠不住的。」

每一個高級的負責同志都提醒我們，不僅要提高對黨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對黨內同志的警惕性，他們隨時在相互之間需要「了解」，當然也一樣需要「了解」我。我們的天地是如何狹小啊，在我們的組織以外，自然都是我們的敵人；在我們同志間，甚至包括那些和我們最接近的「了解」你的同志在內，誰又能保證，說不定他正是你的敵人呢！

「潛伏在組織內的敵人，要比我們正面的敵人可怕到一千倍，一萬倍，他們偽裝積極與忠實，取得組織上的信任，實際上在從事反黨的活動。搞地下組織工作最艱難了，有時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忠實可靠的份子，結果却是一個敵人的奸細。一個愈像忠實可靠積極的同志，愈要當心他。」老頭子有一天對我這麼說。

「然而。我相信，真正的敵人奸細，那不過是極少數中的少數吧了。」我表示我的意見說：「我們總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同志都當作敵人看。」

「不對，」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意見，「提防黨內黨外的敵人同樣重要，中國有句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黨內的敵人比黨外的敵人更危險。」接着，他又以最沉重的語氣補充了一句：「我們黨內」

切的反黨活動，都是和敵人直接有聯繫的。」

我又習慣地點點頭，跟前又出現一個可怕的陰影，一種無名的恐懼情緒在我內心激盪着，「奸細」、「反黨活動」這些帽子我過去不是都被加過嗎？一頁頁沉痛的回憶，湧上我的心頭，而這時，老頭子却繼續說了兩句話，好像正是針對着我，爲了安慰我似的。他說：

「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組織上是絕對信任他的。」

考驗，這中間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爲了考驗一個同志，組織上有時故意給你無理的一些打擊，甚至佈置好一個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驗掉自己的性命。

老頭子有一次和我又談起在江西蘇區時代屠殺A B團（是一個接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組織，江西蘇區時代，在中共黨內有極大影響）的故事：

「那時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審判別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審判別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審判，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我敢說這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證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假如你不是反黨份子，當黨指你是A B團的時候，黨對你說，你已經承認就可以無事了，一個意志薄弱的共產黨員，往往因爲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來，而另一部份，則因爲黨冤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滿，對黨抱怨。黨當時處在萬分緊張的鬥爭情況下，正需要把黨內的這兩種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種份子意志薄弱，本質上是易於動搖的，後一種份子對黨抱怨，正證明他對黨的

忠誠不夠，這兩種人却隨時易於成爲叛黨份子，殺了乾淨。另外還有一些亂用A B團的罪名殺人的幹部，當然黨也是一併殺了……。」他滿口殺呀殺的，說得滿不在乎，吐沫好幾次噴到我的臉上，他也不覺得，又繼續說下去：「同志，這次清洗我們的黨，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殺掉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今天還成個什麼樣子呀！」最後他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話算是作了結論：「至於我，自然也是從那次鬥爭中考驗過來的。」

「那麼你當然也吃過一些苦頭了。」我半開玩笑似的說，

「自然，赤衛隊先把我綁起來，主持審判我的一個幹部不斷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張承認自己已是A B團員的自白書上簽字，我至死也不承認這會事。然而我却不斷呼號着說：『黨對於反革命份子的嚴峻處置是對的，我始終忠實於黨忠實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已貢獻於黨，你們怎樣處置我，我都沒有話說。』幾天以後，另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我就被釋放了。而那個灌我辣椒水的幹部，却以A B團的罪名被殺了。」

「你真了不起，真偉大，真不愧爲我們黨的優秀的領導幹部。」我極力恭維和稱讚了他幾句。

這次談話中，他才正式的告訴我，他是邊區的黨委的組織部長，其實，我早知道了，那是小蕭告訴我的。但是自從我在黨內「世故」一點以後，一向遵守一個原則：不知道的事不去問他，不關己的事，不去管他。能求明哲保身就夠了。老實說，對於組織生活我已經有幾分厭倦了。這時共產黨已經在精神

上不能騙我，看到他們的行徑，馬克思主義的聖潔信仰，在我心中早已打了折扣。這時能够維繫我最後一個時期的組織關係的，不如說是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忠的觀念束縛住我，和加上對組織的恐懼。

四二

我當時的工作是幫助老頭子整理各地的工作報告，和我接觸的除我們小組的五個人外，另外一個就是小蕭，他是作交通的，我們小組中後來又陸續走了兩個，另外新來了一個，他的名字叫瞿飛，是一個新四軍的老幹部。

成衣店是我們常常碰頭的地方，成衣店的櫥窗中放着幾件衣料，是用着做各種符號的。藍花的放在上面，是要你等一等再來；紅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如果你不是特別約好的，請勿進來；無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你可以自由進去；如果這幾件衣料一起收去，就表示，這裏發生危險或已經發生什麼事件了。

成衣店連老板和老板娘，夥計在內，一共祇有四個人，但是開起飯來總有一桌，我們有幾個同志是經常在那裏吃飯的，我偶爾也在那裏吃過一兩餐，碰到生面孔彼此也不介紹，藥長明祇爲我介紹過老板說：「這是李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李老板是很好客的。」老頭子也有一次背地裡對我提起：「李老板

很同情我們，人也熱心，但是他不是同志。」但是我心裡也明白，李老板包括他的夥計在內絕對是我們組織上的同志，這個成衣店是他奉命爲組織上作掩護的。說不定那個年輕的老板娘，還是黨給他配給的「臨時太太」呢。我心裡羨慕地說：李老板呀，好福氣！

另外我還到過一個地方，是一個王大嫂的家裏，這是組織上專門用以個別談話的地方，王先生據說是作跑單幫的生意的，經常不住在家裏，我們的同志就作爲王先生的單幫客朋友而常常在他家裡進出，實際上我後來也明白，他們也不是正式夫婦，是由華東局派來的一對臨時夫婦，在租好房子後男的就奉命調到別處工作去了，而這個女的，後來就又成爲老頭子的情婦。

在王大嫂家裡，有一次我留下一張條子給老頭子，後來他爲此又申斥了我一頓，他說：「你有什麼事當面對我說，別再寫條子，一個好的秘密工作者，絕不能在任何場合留下一個字的痕跡。」

「王大嫂是我們自己人。」我解釋說。

「誰是自己人，誰？誰？」他歇斯的里亞似的暴跳起來，直到我認錯了爲止。

「民國二十三年，我在福建被捕了，是由於叛徒出賣我的，他一口咬定我，我始終矢口否認，我前後一共被審訊過十幾次，國民黨就一直拿不出一點證據。我甚至說我是不識字的，他們對我一點辦法都沒有，最後把我送到南京模範監獄去。假如我平時留下一絲一毫的筆跡，那一次不是就完了。」他以教訓似的口吻對我說。

一般的共產黨員都規定在同志間除對上級外，絕不得提起自己的過去的事，但是老頭子却總喜歡在我前面顯耀，常常和我談起他的過去的故事：

「我也在上海工作過，我們的工作，一直打入敵人的心臟，巡捕房到處都是我們自己人。」他很自傲的向我看了一眼。「說不定那些平日殺共產黨最利害的捕房頭，有時就正是一個共產黨員呢！」

「這是怎麼回事？」我驚訝的問。

「妙就妙在這裡了，他們不多殺一些共產黨員是沒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幾個自己的幹部有什麼關係，何況這也是對黨的一種貢獻呢？一遇到緊要關頭，他們對黨的幫助可真不小呢？」

「呀！」我不禁要驚呼起來。

「大驚小怪做什麼，你聽我慢慢說下去，比如有一次，那時康生同志當上海聞人處洽卿的秘書，黨的中央執行部在上海，王明，周恩來等都集中在那兒，有一天又遇到叛徒告密，中央執行部被破壞了，幸虧康生同志事先與巡捕房的同志有連絡，否則全完了。」

外間落着傾盆的大雨，這天，他似乎也不準備出去，我們一面談，一面剝着花生，過一陣，又買進來油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興趣愈來愈好，又繼續說下去：

「包打聽和我們真像捉迷藏似的，我們把他們兜得團團轉，當我們發現敵人正在集中注意力對付我們的時候，我們索興就和他們多開些玩笑，你還記得，過去上海報紙上不是有所謂綁票案，箱屍案一類

的社會新聞嗎？這種玩意我們就幹過，殺的當然是個把叛徒，反止人不知，鬼不覺，幹出以後，鬧得社會上滿城風雨，敵人終日忙個不休，疲於奔命，然後再乘着敵人眼花撩亂的當兒，給巡捕房再撥些離奇的電話去，指揮他們滿街東奔西突，煞是有趣，我們坐在家裡哈哈大笑，這是爲了什麼呢？這就叫做麻醉敵人的神經，這就是鬥爭的藝術……。」

「這些倒都是極有趣的故事，我入黨幾年來，還沒聽說過呢？」我心裏極度憤懣，但爲了想藉這個機會多知道一點這類的事，我以最大的忍耐力湊着他的趣對他說。

「你不懂的多着呢？沒有十年以上的組織生活和鬥爭歷史，你就算是懂得革命了？」他侃侃而談，愈說愈加起勁。爲了在我面前賣弄他的「資格」，他幾乎忘記了他自己目前的身份。「我們不僅要迷惑敵人，甚至要迷惑自己的同志。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沒有一個同志是絕對可靠的，有時我們要這樣做，却故意要裝成另一個樣子。革命的策畧沒有直綫的，總是迂迴曲折的，沒有規律的，全靠隨機應變。爲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爲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這次我又重覆的聽到這句話，然而現在我也才算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真實意義，這時，我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這一天，我走到成衣店的附近，櫥窗內的衣料突然收去了，我趕快奔回去，一看我們門窗的上毛巾（安全符號）也被收去了。我正在路邊徘徊猶豫間，突然有一個人從後面輕輕的推了我一下，回頭一看，正是王大嫂，我又驚又喜，她對我使了一個眼色，示意我不要多說話，隨着她走。

我們走進一個小巷子，巷口擺着一副餛飩担子，賣餛飩的對王大嫂點了點頭，我們就跟在王大嫂後面繼續走進去，在一座房子的前面，門口又坐着一個要飯的叫化子，他也對王大嫂微笑了一下——沒有問題，賣餛飩的和叫化子都是我們的同志化裝的。這情形已經明白的告訴我，一定發生了什麼緊急的物件了。

跨進門內，迎頭正碰見小蕭，王大嫂已獨個兒先走進去了。

「不得了，出事了！」

「怎麼回事？」我問。

「我也不大清楚，回頭讓別的同志告訴你吧。」他猶豫了片刻，對我說。

這時，老頭子已走出房門招呼我。「我們已暫時全集中到這兒來了，我真擔心你，要王大嫂四處找你。」他好像很關切我似的對我說。

房內擠了七八個人，在紛紛議論，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在這天早上，我們一個製炸藥的同志，他因為一失手之間，驚動了鄰舍和房主，結果大家都說他是漢奸，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了。而這個同志，是

知道我們幾處連絡地點的。於是各處下了安全符號，紛紛搬家。

這事很奇怪，這個被捕的同志，在第三天就出獄了，他是本地人，聽說他家裏化了點錢。

這個同志的輕易釋放，却惱怒了我們的老頭子。「問題絕沒有這麼簡單，這一定是敵人的反間計。

」他肯定的說。

「幹掉他，免得留下後患。」另一個同志提出獻議。

老頭子沉着臉沒有答話。

「這個小赤佬，我祇要把他騙到郊外，兩個指頭就結果他了。」

老頭子依然沒有答話。

幾天以後，這個爲製炸藥被捕過的同志果然失蹤了。我會爲此問過老頭子：「是不是我們把他幹了？」他起初搖搖頭，謊稱不知道，後來他不着邊際的對我談了一套理論：

「你知道嗎？革命是需要殘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們的敵人。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革命的殘忍。放過一個敵人——即使他是可能的敵人也吧，你想想，革命將遭受多麼重大的危害，錯殺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人有什麼關係，革命是多麼一件大事。」

我不便再追問下去，我想了想，那個同志是我們組織上殺害的是絕無疑問的了。

在這一同時期，那個被害同志的家屬，也在向地方當局要人了，警察局堅決否認知道這個人的下落

，家屬說：「先前被你們關過，現在纔之以失蹤，還不是你們幹的嗎？」而這時我們黨的組織，却又恬不知恥的，命令在屯溪的黨員發動地方開明份子出面講話，控訴國民黨親日派殘殺青年，油印的小傳單也寫得十分動人，說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的又一滔天罪行」。

國民黨的傻瓜們，却把所有的憲警們，申斥了一番。

「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老頭子又在對我上課了。「因爲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爲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資料。否則的話，祇好我們自己動手了，不過，那總是不得已的。」

我一面在聽他這些話，我在騎兵第二軍爲中共告密的影子，又在我面前重現了。

「你爲什麼近來老是不說話了！」老頭子問我。

「我以爲作爲一個共產黨員，祇應該知道執行組織上的命令和你的指示，多說話是沒有用的。」我勉強地說。

「那對極了，所以我很信任你，你確是黨性強，一天天有進步。」這時候已經是炎熱的夏天了，他搖搖扇子得意的對我說。

天哪，這些就是革命嗎？我痛苦的在我內心叫喊。

跑開吧，逃走吧，但是，我到那兒去呢？我不會被人譏爲懦怯嗎？我不會爲人罵爲變節嗎？

四五

在我們一道工作的同志中，新來的瞿飛也和我處得很好，他喜歡飲酒，是個酒鬼，又特別愛拻別人的油，常常拉住我要我請客，一陣酒興上來，三杯黃湯下肚，他也能和我無所不談。

「過去幾年躲在山裏打游擊，實在太苦了，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他的牢騷開始了。「現在調來做白區的秘密工作，真是到了天堂哪！」

「你說這是天堂嗎，那咱們還要革啥子命？」我笑謔地對他說。

「錯了，錯了。」他連忙更正。「算我犯了錯誤。」

「不談這些了，咱們還是談你打游擊的故事吧。」我特別推崇了他一番：「關於打游擊，你的經驗太多了，我要多多向你學習哩，你不相信吧，我也打過游擊呢，但是後來失敗了。」

他立刻加倍的自傲自大起來，很輕蔑的看了我一眼。

「你也打過游擊？你們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打游擊你們怎麼成。」他接着問我失敗的經過，我不便把新四軍收編的事說出來，推說是爲了經濟問題。

他立刻接下去說：

「對哪，頂重要的是經濟問題，打游擊找人並不困難，簡單的武器也容易解決，但是，弟兄們總不好餓着肚子呀！」

「那麼，你們過去是怎樣解決的呢？」我問。

「瞧你這副齷齪子的樣子，那裏配談打游擊，好吧，總算看在老酒的情份上，老子給你上這一堂課吧。」

「輕聲點，好不好，這裏還有別的客人哪！」我輕輕的拉了他，提醒了他一聲。

「嘿，你這胆小如鼠的形式邏輯者。」他常常怕別人看不起他是工農幹部出身，總愛似通非通地突然而用這麼一兩個名詞湊合上去。「其實，祇要發得下狠心，找錢也不難。打土豪是個辦法，可是現在不行了，不過你要是指他是通敵的漢奸，他就沒有話說了，反正是不必經過公審的，或者還可以把游擊區以外的有錢的紳士拖進來。所以要執行得法，打土豪現在還是一條路。設卡設稅也是個辦法，不過這帶要有一個比較鞏固的游擊根據地才行，武裝走私也是個辦法。伏擊敵人的運輸車輛也是個辦法，不過那總是太危險了。最有效的辦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搶……。」

「怎麼，那不是使老百姓對我們發生反感嗎？」我打斷他的話說。

「你真是又太書生之見了，這完全是技術問題。」他張大了口，送進去一塊塊大肥肉，狼吞虎嚥一陣以後，又接着說：「比如說，我們先派一部份同志化裝土匪去搶了，等到老百姓報告到我們隊裏來，我們就立刻就派一支部隊追上去，這時，我們那些奉命搶掠的同志，已經滿載而歸，從另一條路歸隊了。這樣，老百姓不但不會對我們有反感，我們地方黨的組織，還要發動老百姓對我們慰勞呢？」

他說着不禁大笑起來，我也假裝着附和着他笑，並且對他連聲讚美：「好極了，好極了。」

「還有一個好辦法。」他說着又吞了回去。

「說呀，幹嗎說了一半又吞了回去。」我催促着他。

「這是萬萬說不得的，說出去你我都完蛋。」他想了半天，終於耐不住的說了出來：「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印假鈔票，你不見我們黨裡拿出來的都是一疊疊的新鈔票嗎？」他用手做了一個印刷的姿勢。「還不是這麼嘩啦啦發出的。」

這次他沒有笑，臉色沈重的看着我。

「我看你有幾分醉意了。」我對他說。

「我沒有醉，三五斤老酒我不在乎，不過，很嚴重，嚴重，我剛才的話說得太多了。」

「放心好了，我不會說出去的。」

「你知道，我現在是負責管錢的，所以我曉得這些秘密。」

這家「正興菜館」是屯溪一個比較具有規模的館子，我們吃得杯盤狼藉，我無意間抬頭看到牆上「戰時節約」的佈告，再四週看看別的拾子上的客人，他們——這些善良的百姓們，用什麼眼光來看我們這兩位豪客呢？以為我們是貪官污吏？還是以為我們是富商巨賈？誰會想到，我們正是天天在咒咀這個惡社會的革命者！

第十一章 「野百合花」的啓示

四六

老頭子總算待我並不很壞，他後來準備到天目山和杭州一帶去處理一些問題，決定把我帶在他身邊。天目山是國民黨所領導的游擊區根據地，杭州是日本人佔領的城市，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也很高興作這一趟旅行，雖然是很冒險的。

「不要怕，在那一邊（指日本人和汪精衛漢奸方面），我們自己人多得很。」老頭子特地這麼對我說。

由屯溪，我們乘木船到了浙江的桐廬，桐廬以上，都是山地，我們步行至於潛，在靠近臨安縣二十華里的一個私人小醫院，老頭子召集了浙西地委會議，出席會議的連我和老頭子一共是七個人，我還記得的有兩個：一個是蔣萊（後來被開除黨籍，原因不詳，繼又被浙西國民黨當局搜捕，逃到桂林，改名姜慶湘，專寫經濟學方面的文章），胡漢亮（抗戰勝利後一度出現過上海，對我說已經經商，絕口不談

政治，上海解放後出現爲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總務處長），在安吉，孝豐一帶，有一支我們黨所領導的游擊隊，也派出一個代表從敵後趕來參加，會議關在醫院的手術室中舉行，一共舉行了一天半，老頭子首先作了政治報告後，我們又聽取了各個地委的工作報告，這時我也才明白這次老頭子的此行目的主要要有幾個：一是解決當時黨所領導的游擊隊與地方黨之間的磨擦，據地方黨的幹部所申訴的理由，游擊隊處處忽視地方黨的領導地位，侵犯羣衆利益，表現軍閥主義；游擊隊的黨代表對此也有答辯，他們認爲地方黨的幹部不能與他們配合，以致軍事行動上屢受牽制，後來有個地委指着游擊隊的代表說：有幾個游擊隊中的幹部，跟地委關係較爲接近的，或者被你們秘密處決，或者藉作戰的機會，你們從旁開槍把他們打死了。他們爭論得十分激烈，幾乎要動起武來，游擊隊的代表甚至說：「這塊革命根據地是老子們一手打出來的，老子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這幾句話把老頭子也激怒了，他大喝一聲，才把那個游擊隊代表壓制住，然後他做了結論：一部份地委及地方幹部改派游擊隊的幹部參加，而今後游擊隊必須由地委統一領導，這個結論當時被認作是公正的，但是游擊隊代表却堅持全部地委及地方幹部，由游擊隊改派，最後他們雖然勉強接受了黨的決議，但是當會議結束後不多幾天，我和老頭子還沒有離開天目山的時候，孝豐的游擊隊就逮捕了十多個地方幹部，和擅自派出大批的他們自己的人，老頭子聽得這個消息一句話也不說，氣得臉色發青，他說：「這些違反黨紀的叛徒，我決定向組織提出開除他們的黨籍。」

後來游擊隊的領導人被開除黨籍沒有呢？沒有。老頭子和游擊隊領袖的申訴同時被送到黨的華東局。

華東局並沒有追究是非，黨的領導政策是尊重有槍桿有實力的幹部的意見的，因此終於追認了游擊隊所派出的幹部爲合法的，這時老頭子已在江西玉山被捕下獄了。我們此行第二個任務是解決楊維禮的入黨問題，楊維禮當時是政府的浙西行署政治大隊長（此人在抗戰勝利後，尙由政府派充臨安縣長），他在浙西擁有極大的幫會與土匪力量，根據地委當時所簽署的意見是，楊維禮對於組織上的掩護功績極大，而當時游擊隊關於楊維禮的報告却絕對相反，他們說楊維禮是國民黨的特務，反動派，甚至勾結日本人的黑澤部隊進攻我們黨的游擊隊。問題的背後也包含着地委與游擊隊的鬥爭，地委當時頗想扶植楊維禮的力量以打擊游擊隊，而楊維禮的條件却是要黨先承認他在黨裏的相當地位，這事給我們極大的煩惱，後來的決定是關於楊維禮的入黨問題從緩，僅由地委加緊與他聯系，楊維禮却從此消極了。我們最後一項任務是了解杭州黨的情況。在這不久前，我們杭州的組織，爲了一個在偽組織中工作的幹部發出大批僞市民證而露出破綻，本來一向我們許多幹部就憑着這些僞市民證進進出出，後來敵人跟蹤追蹤，一舉而破獲了我們在杭州的組織，我們黨在杭州的活動受到一次致命的打擊。華東局的命令要老頭子親自去了解一番。在我們處理過地委與游擊隊的糾紛以後，就動身往杭州去了。

楊維禮當時雖然對我們組織上極感不快，但總算還是够義氣的，他派了四個便衣武裝政治大隊的隊員把我們一直護送到艮山門——因爲當時杭州的日本人搜索得很緊，直接進杭州就太危險了。

杭州的四郊盡是國軍的游擊隊，日本人如驚弓之鳥，且夕數驚，入夜像湖邊路一帶，簡直像鬼市一

樣，陰氣沈沈，也時常聽到零星的槍聲。

我們以單幫客的身份進入杭州，老頭子就化裝做老闆，我就充作他的小伙計，在杭州第二天，老頭子找到偽杭州市政府的張秘書，一個帶着深度近視眼鏡，骨瘦如柴，好像還有點肺病的人，他一同是與蔣東局的高級幹部保持直接關係的，所以這次杭州的組織變化沒有影響到他。他同老頭子報告了這次事件的詳細經過，當他們談話的時候，老頭子示意我走開，不過後來他還是告訴了我一部份。

「這次幸虧日本人幫忙，多數同志已經釋放了。」他說。

「我想，這些日本人一定是日本共產黨和國際主義者了。」

「那也不見得。」他格格地對我笑起來，「你搞了這麼多年的政治，難道還不懂得這中間的奧妙嗎？」

「這中間還有奧妙，我可就不懂了。」

他吸着烟，一面仰着頭吐出一個個烟圈，微笑着。

「奧妙，這就叫政治了。」他得意地說：「日本人正在江南掃蕩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需要新四軍給他幫忙呢？」

「我們……」

他立刻打斷了我的話，臉色突然嚴肅起來，「你不懂的不要多問，政治是奧妙的，你還得多多學習」

，將來自然就都懂了。」

我和老頭子本來在旅館中住在一個房間內，第二天我們見到張秘書後，就被分開兩個房間，晚上張秘書請我們吃了一餐豐富的飯，他送我們回去的時候，已經將近午夜，他和老頭子嘻嘻哈哈鬼崇崇說些什麼，我也不大清楚，然後張秘書又嘻皮笑臉的拉住我說：

「你對於杭州姑娘有興趣嗎？」

「噓！」我吹了一聲口哨，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抬頭看看老頭子，他也在笑。

「忸忸怩怩做什麼，我們革命者就不應該注重這些形式，何況又是逢場作戲，你們等着，我立刻去替你們選兩個好貨色。」他剛一走開，又回過來輕輕的對我說：「在杭州的貨色中，過去有兩個我們的同志，蠻漂亮，可恨現在都調了工作了。」

張秘書看了看這家旅館的「貨色」，都覺得不够滿意，伸了伸舌頭，又懊喪的看了看我們。最後着了一個茶房出去找了幾個來，和我們禮讓一番以後，就留下一個陪他自己，他開了另一個房間。

「還怎麼成。」我走過去對老頭子說，這時他的酒意也似乎清醒了。

「你也不必太拘謹了，有時爲了工作，爲了掩護我們的身份，這也是必要的。」他對我說。

「這位是楊委員。」

「這位是邵主任。」

我奇怪我們的老頭子在偽組織中竟有這麼許多朋友。我們住在旅館裡，也有漢奸在日本人的憲兵隊打過招呼。在第五天，老頭子要我準備收拾好行李，我們要搬到「西湖博物館」去。

「道不成，不是要被罵我們是漢奸。」我從來沒有正面反對過他，這次却終予忍不住了。

「不要費話，你不懂，立刻搬過去。」待他走過之後，我怒目的看了看他的背影。

住在「西湖博物館」的一段時期內，我們的生活很寫意，也遊遍了西湖所有的名勝。當時的西湖，却是日本人軍事管制下的禁區，祇有日本人和幾個大漢奸有幾隻龍船（遊艇），我們這時衣襟上也掛了偽組織的證章，大搖大擺的坐在上面。湖心亭上不知被那一個勇敢的英雄偷過去刻了幾個字在上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老頭子和偽組織的幾個漢奸都在笑這些字寫得無聊，一定是重慶份子幹的，我當時對國民黨依然沒有好感，但一遇到侮辱抗戰的行爲，我是不能忍耐的，我又憤怒的看了他們一眼。

當時我們黨在淪陷區的策畧是，與日本人和漢奸，一方面鬥爭，一方面合作，這話怎麼說呢？因爲我們黨裏知道，沒有「民族解放」的口號做號召，我們是不可能奪得羣衆的後備軍的；同時，沒有日本人的合作，則我們沒法打擊國民黨和政府，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用敵人的手，來打擊敵人，瓦解敵人，這是最機動最巧妙的革命策畧。」——康生同志過去會屢次對我們這麼說。然而，祇有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動的例子：在敵人的偽組織機構中，大量的充斥着我們的同志，他們藉日本人的刀，去

「廢除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人員，甚至我們黨的組織，也經常和日本人的特務機關交換情報。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難道所有的共產黨員都願意這樣抹了民族良心去做這些喪天害理的事嗎？不！但是，這是革命鬥爭的策畧啊！黨的命令，黨的紀律，那一個共產黨員敢予違抗？何況，不是一個中級以上的黨的幹部，誰又能夠了解這些黨的機密？有些年青的共產黨員，也未嘗不天真的，與高舉烈的組織游擊隊，想打日本人，但是黨的高級領導機構所決定的策畧影响了他們的行動——要他們努力壯大自己的實力，於是對日本人就游而不擊了。因為黨的某些高級的領導者，正和日本人保持密切的聯繫呢？在羣衆前面以抗日相號召，對日本人又勾勾搭搭；在國民黨前面講合作，又藉日本人的手打擊國民黨。這正是策畧上非常辯證的運用。」

「我做這份工作真苦惱，老百姓都罵我們是漢奸，但是，這有什麼辦法，這是組織上的命令。」一個小漢奸（杭州偽新民區署助理員周民儔），由於一個偶然的工作機會，他了解了我的身份，對我這樣訴苦說。

「啊，是的，不過你要知道，這也是革命工作。」我言不由衷的敷衍他說。

「是啊，做漢奸也是革命，聽說好多大漢奸都是我們黨的同志。比如像袁殊（當時的偽中央宣傳部部長），我就聽說過，他是……。」

「你少管閒事，多做你份內的事。」我連忙打斷了他的話。

四七

我們從杭州回到屯溪，由兩個當地的農民爲我們帶路，從一路的談話中，我才知道，他們是結義堂的弟兄，他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共產黨，不過他們對於日本人都很仇恨。我們的黨在當時一方面反對封建的幫會，一方面又在農村中利用封建形式，扶植和建立幫會的力量，問題是這幫會能不能在我們黨的控制之下，如果是的，則這些幫會的弟兄倘使幹些打家劫舍的勾當，一樣獲得我們黨的保障，這些幫會的弟兄平日給我們的方便和掩護的確不少，他們參加了共產黨的組織——這種封建形式的外圍，然而他們對於共產黨，却茫然不知道什麼。

回到屯溪以後的第三天，老頭子就匆匆的到江西玉山去，這次去做什麼，他沒有告訴我，我也不便問他。但是這次他却在玉山被捆了，據我們黨裏的同志傳說，他這次被捕，不是爲了黨的組織活動，却是爲了另一項罪名。

「幹嗎又是這麼神秘，他既然不是爲了黨的組織問題被捕，究竟是爲了什麼？」我逼着小蕭問。

「說是爲了販賣鴉片的事牽連到他。」

「什麼，販賣鴉片，這簡直是胡說，難道我們黨的領導同志，會幹這些不名譽的勾當。」我一本正

經的這麼說，而且表示極端憤慨。其實，我早聽說過了，我們黨的秘密工作的經濟來源，第一靠販賣鴉片，第二靠印假鈔票，第三靠走私投機買賣，第四靠打劫。一邊區不是進行過生產運動嗎？就是讓關中一帶肥沃的地區空出來改種罌花呀，你知道，革命沒有大量的錢是不行的。」翟飛早就告訴過我這一節話。

老頭子從此就不知了他的消息，依照我們黨的紀律，像老頭子這樣的負責幹部，被捕後即使不死在國民黨手裏，釋放後組織上也會立刻派人去把他幹掉的，老頭子最後究竟死在國民黨手裏還是死在我們自己同志手裏，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老頭子，就是當日在蘇浙皖邊區黨內聲名赫赫的柳英同志——又名江耀祖同志。

老頭子被捕後不久，梅益（現任中共中央人民廣播事業局副局長）就從上海趕來接替了他的工作，梅益原任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是一個智識份子出身。過去的老頭子雖然看不起智識份子，但他處處還覺得需要依靠我，所以我們彼此之間還相處得不算很壞。老梅却是另一個作風，開口閉口大罵智識份子不可靠，遇事好像專門和我作對似的。他是一個瘦長的個子，戴着近視的眼鏡，胸襟狹窄，說話尖刻，言語傲慢，舉止粗暴，對同志的態度，幾乎不把每個人當人看。

「買不到三砲台，也該買大前門，這種蹙脚香烟怎麼能抽！」第一天他着一個同志去買香烟，就發了一頓大脾氣。

我們在第三天開了一次會，他聽取了每個人的工作報告後，作了總結。

「每個同志都必須立刻找到職業掩護……」。

「我們應該儘量利用進步份子，我們自己的同志不應該隨便直接出面領導鬥爭，必須極端謹慎保存黨的幹部，過去的山頭主義是不對的……」。

「一切的力量都應該利用，又應該巧妙的利用，站穩立場，分清敵、友、我三方面，但是我們的敵人和朋友，不是絕對的。我們共產黨人，認定所有的資產階級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也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就要到來，但是我們爲了縮短革命的時期，和減少革命的犧牲，我們應該針對資產階級內部的混亂現象，在一定的情況下，決定打擊的對象和爭取的對象——列寧說，雖然他是暫時的，不可靠的也好。我們黨的今天的基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但是，不要忘記，這僅僅是今天的政策，我們所面對的是全世界的階級敵人。」在他的工作總結中，一句話沒有提到打日本人的事情，連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我們黨的今天的基本政策」，也不過成爲一句幌子吧了。

這時，太平洋戰爭已經開始了，在這以前，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們黨中央政治局頒佈過一個「增強黨性的決定」的文件，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性，糾正一般黨員的個人主義自由思想，以及一切無組織無紀律作風。這文件的中心意義是：由於抗戰，我們的黨獲得了空前的擴展；但是也正由於這種擴展，民族意識和自由主義帶進了我們的黨，黨的高級領導當局認爲這是我們組織上的一種危機，

認為如果不強調國際主義、階級意識與黨的集中性、服從性，以打擊民族意識和自由主義的話，則，我們的黨，可能為各種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所麻痺與瓦解。老梅的講話，正是在這個文件發表以後。

黨的八股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變的，毛澤東派和王明所領導的留俄派都同樣看到黨內組織上的危機，但是他們的「對症下藥」就各自不同了，「增強黨性的決定」可能是王明等人當時在黨內爭取領導地位的最後一次表現和掙扎（當時秦邦憲還未死，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等這批人，在黨的中央政治局還有極大的發言力量。），但是不久，由毛澤東所發動的「整風運動」就開始了，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中，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說，提出「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口號，於是黨內領導者的激烈的鬥爭又重新開始，「整風運動」的號召顯然是針對「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所表現的黨八股，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王明這批人的宗派主義的行動，毛澤東的攻擊開始後，再接再厲，又在同月八日作了聲討黨八股八大罪狀的演說，留俄派開始也作了還擊，不過這時王明已逐漸失却自由，毛澤東的「整風運動」的號召漸佔上風，進一步穩固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一部份留俄派（如張聞天等）也倒向他。四月底，中共中央才正式發佈了整頓三風的命令。

我們屯溪的地方黨的組織，直至六月間才接到黨的正式文件，於是我們立刻舉行整風動員會議，成立了整風學習小組，並指定每個同志，第一階段秘密閱讀整風文件，第二階段根據文件精神舉行批評會

，要各人坦白說出過去在思想上，作風上的所有錯誤。

在每次開會的中間，老梅總是威風十足命令我們「坦白所有的錯誤」，好像這項「整風」的對象，專爲整我們，與他自己無關似的。

我每次開會，除了把我自己痛罵一頓以外，絕不多言。我以爲這是防衛我自己的安全最好的辦法。其他的同志，都差不多全被捲入這個鬥爭浪潮，互相挑剔，詞鋒都很尖銳，祇是大家都忽畧了老梅，老梅也獨自坐在上面微微發笑，一枝烟接着另一枝烟不停的抽着，開會的時間，我也感到無聊不耐，開始拿烟抽着玩兒，這烟當然是從老梅面前揩油來的。當我拿起第三枝的時候，老梅很不高興的沉着臉對我看了一眼，「他是個多麼吝嗇的小氣鬼。」我心裡好笑的對自己說。

有一天，鬥爭會居然爆出了冷門。

「我可不可以對我們的領導同志批評幾句話。」說話的是一個北方大漢，我也仔細的看了他一眼，他是剛從蘇北派來工作的星光同志。

「當然可以，不過要舉出確實的事實，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領導的威信。」老梅答覆說，顯然，他的神情是緊張和不安起來了。

「是的，梅同志，我說的是我們黨內領導者的官僚主義，有的同志批評別人的地方，正是他自己個人的錯誤。有的同志口裡說得挺漂亮，說是反對黨八股，但是他們却偏偏滿口都是黨八股；他們說是反

對宗派主義，但是他們打擊別的同志，偏偏從宗派主義的觀點出發，他們說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但是他們自己却滿口都是主觀和教條……。」

「不，星光同志。」老梅立刻打斷了他的話。「你不要盡是繞圈子說話，你不能任意打擊組織上的威信。你你你，你舉出事實來。」他已經無法掩飾他的惶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急得用手帕擦了擦額上的汗珠。

所有的同志都提高了興緻，大家都會意的偷看了一下老梅，等待看這場好戲。

「我說的不是事實，是原則。」他的答覆令我們大家都感到大失所望，老梅却因此鬆了一口氣。

「對了，剛才星光同志說得很對，我們每個領導同志，都應該注意不致犯這樣的毛病。」他好像突然從一個惡夢中清醒過來，轉過臉，對我們大家這麼說。

有一天，我偶然逛進一個舊書舖，在無意間翻到一本王實味著的「野百合花」（王實味，原係在馬列學院工作的中共作家，「野百合花」發表後，為中共所整肅。），我如獲至寶似的把他買下來，秘密地藏懷裡，偷偷的帶到一間小茶館，把他夾在一份報紙中一口氣讀完，心中覺得一陣無限的舒暢。「野百合花」是一篇諷刺當時延安生活腐化浪漫的雜文，一年前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在中共高級當局間掀起軒然大波。我早已留心「野百合花」的事件，對他極感興趣，祇可惜這篇文章直到現在才看到，真是莫大的遺憾，我現在還記得「野百合花」中有幾段最刺眼的文字是：

延安的生活，「衣分三色，食分三等。」「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 這樣。到處烏鴉一般黑，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他對於別人沒有一點愛，要做羣衆工作非場合不可。」「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級對上級感覺他們是異類。」

「野百合花」，對我們黨的腐化情形，是多麼大胆的暴露啊！我們黨的領導者，他們的鬼臉都被生動的刻畫出來，正是這樣的醜惡啊！

我慚愧，慚愧，我在延安的時候，同樣也接觸過這些醜惡面，然而我却缺少王實味那樣深刻的體會和理解的力，我更沒有王實味那樣勇敢，向我們黨的這些「大人物」立刻直接挑戰，他們，那些「大人物」們，在我的心目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他們是神的化身，是不可冒犯的偶像。

然而在這時候，王實味對那些「大人物」的挑戰，已經獲得我的共鳴了。我默默地爲這個黨的「叛徒」祈禱，祝福他能平安地脫離這個魔窟。

王實味是我們黨內一個具有高級理論素養的幹部（馬列學院是當時中共的最高學府），他同我們黨的「大人物」挑戰，是由於他的革命意識模糊嗎？絕對不是。當我的「革命意識」還模糊的時候，我的確是個黨的好幹部——一個祇知盲目服從的好幹部，但是，當我逐漸成爲一個成熟的共產黨員以後，面對着血淋淋的事實，在我面前就面臨了抉擇：或者是抹盡天良，同流合污，犧牲別人，成全自己往上爬，同時也繼續欺騙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們陷進這個天羅地網；或者是，毅然決然的下定決心，擺脫遺倫殺

我良心上實在不容許我再和這些流氓們廝混下去，這幾年來，我所親身體歷的還不多嗎？難道我還要繼續欺騙我自己，以爲這些幹部的罪行，與黨的領導，黨的路線，黨的整個政策的無關嗎？難道我還可以拿寬恕個別幹部的態度來寬恕整個黨的罪惡嗎？難道我的忍耐我對黨的忠工，就可以洗脫我的「同謀犯」的罪名嗎？權力慾的貪婪，使這批人都陷入了瘋狂的境地，鬥爭啊，殺啊，毀滅舊世界的一切啊，他們張大了血口，吞噬所有的人們，什麼理想，什麼馬克思，什麼主義，到他們嘴裡全成了鬼話——這種連篇的鬼話，就成了對青年們的香餌！

我要招回我的靈魂，我要呼喚我的靈魂，勇敢一點啊！

四八

這時金華已經被日本人佔領，我們黨又在金華，義烏，東陽，永康，武義一帶，領導組織了一支游擊隊，我被老梅派往連絡。其實，這本來是很不必要的，因爲這支游擊隊已在浙江省委的領導下。不過，在當時我們黨的地方領導者中間，有一種十分普遍的看法，黨的中央是重視武裝鬥爭的，誰掌握更多的武裝，誰就有更多的發言權，每個同志在黨的地位，主要的要依靠在武裝鬥爭中的力量來決定，因之在敵後或接近敵後的許多地方黨的負責幹部，都極力想在發展私人武裝力量上努力，除了隨時與國民黨

的游擊隊磨擦以外，甚至我們自己的同志間，也互相吃槍對方的部隊。黨的中央沒有什麼是非可說，他永遠是相信力量就是代表真理，有更多的槍桿子的一方面總是對的。我會經進出過敵人的區域，加上對金華一帶的情形也比較熟悉，因此就被派了我這個任務，而老梅却不知道，我這時早已下了決心，乘這個機會逃出他的魔掌。

但是，金華我不能不先去，因為這樣可以使老梅不致立刻注意到我，而且，我們在黨的工作中，一向都知道，隨時可能有別的同志在監視你，說不定你平日認為最知心的朋友，說不定一個車夫，一個碼頭脚力，一個旅館茶房……，他就正在奉命監視你，隨時把你的一舉一動報告上去，說不定一個整天搓揉麻雀的官太太，一個歡場中的女人，一個和尚，尼姑，道士……。做久了地下工作的人，多半養成一種深刻的恐懼心理，把週圍的每一個人，都看成是你的敵視者。別人的一笑一怒，本來與你毫不相干，都會引起你的種種猜疑。風吹草動，重重的敲門聲，輕輕的脚步聲，靜夜中的犬吠聲……隨時都可能使你心地裡仆仆地跳。

我躺在船上，一連幾夜沒有好好睡過，有時剛昏迷地睡過去，又很快的被惡夢驚醒。

「你是叛徒！我要用黨的紀律制裁你！」是老梅的兇惡的粗暴的聲音，接着他下令把我活埋，另一個同志就拿了一把鐵鍬給我，要我自己挖一個坑，我反抗他們，罵他們，我說：「你們這些吃人的野獸，殺人犯！」老梅一個耳光把我打醒了。

一個夢剛完，眨了眨眼，心頭還在跳動，另一個夢又開始了。

我和老頭子面對面地正受着政府法庭的審判。

「你要爲他作證！」一個政府的官員命令我說。

「是的，這是正義的審判，我要作證，他是殺人犯，毒品犯，僞鈔犯，土匪頭子，和勾結日本人的漢奸，同時也是一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

「你，你，你瘋了。」老頭子撲向我怒叫。

「我沒有瘋，你們才是一羣瘋狗！」我毫無恐懼的指着他的臉說。

我一拳重重地擊中在木板上，霍地驚醒。

在金華下船以後，我直奔火車站，當時的火車僅可以通到龍游，我買了車票，這天火車脫班，夜深才到湯溪，我面對着淒涼的黑夜，不禁潸然下淚，誰能够了解我這顆痛苦和寂寞的心啊！

這許多年來，我的一顆純潔的心，一天天受到損傷，我貢獻了我的青春給這個理想——我過去把他看得是如何的崇高和偉大啊。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經全部變得漆黑，這個追求，今天已經澈底的幻滅了！

我們生長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代，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這麼一個災難的國家和離亂的社會，多麼不幸啊，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我們像是被這世界所遺忘了的一羣孤兒。

我們反叛這個不合理的時代和社會，我們追求國家的新生，但是我們的錯誤，能全責備我們年青人嗎？

我們這一代青年，思想上渴望追求光明，熱情澎湃，而國家的動亂環境，沒有給我們以廣泛的機會。共產黨人指點我們說，燃燒起你們的仇恨的火焰吧，你們要恨，恨所有一切的人，你們要把舊的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於是，這種恨的教育，又把我們帶上了互相仇殺的深淵。他們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當作政治上運用的對象；黨鼓勵我們不擇手段的去攫取一切，又交給黨的領導者，然後又一層一層交上去，這個黨的領導，就建立在這樣一個黨內與黨外，黨內與黨內互相鬥爭的血腥的金字塔式的基礎上啊！當你進入這個殺人犯集團以後，你將被逐漸割斷了你的私人的一切社會關係，包括你的親戚和你的朋友，血統和友誼，這些人性的屏障，他們都要替你清除淨盡，然後你就會死心塌地的成爲一個職業革命家了。他們把欺騙看作是革命者的神聖權利，黨欺騙着羣衆，同志欺騙着同志，上級欺騙着下級。鬥爭與欺騙，這是共產黨人認爲二而爲一的革命藝術。他們，今天所說的可以和昨天的不同，說的又可以和做的不同，這叫做「適應情況」。策略變了，他們可以自圓其說，詭稱馬克思主義原是靈活運用的；路線變了，就拿一部份自己的同志做犧牲。他們拿馬克思做擋箭牌，把馬克思化身做千百個馬克思作種種各式各樣的，面目不同的，矛盾百出的，雞零狗碎的胡亂解釋，馬克思不够用了，他們也可能借重中國歷史上的秦君流寇，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都有了用處。這個黨，一方

面在口頭上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然而他們在精神上，組織方法上，鬥爭手段上，無一不和法西斯主義者一脈相承，一摸一樣，簡直活像是一對孿生弟兄。這個黨，口口聲聲代表無產階級，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然而他們高高的站在人民的頭上，他們會絲毫的顧惜到人民的哀號嗎？他們說，黨的組織實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一個普通黨員，有絲毫權利討論到黨的路綫政策嗎？這個黨，是一個完全以命令支配黨員行動的黨，軍事化的黨，特務化的黨，每個黨員，毫無保留地毫無還價地服從黨的紀律。黨的基本政策就是「殺人越貨」四個大字。在這個「殺人越貨」的大原則下，一個共產黨員可以在技術上多用功夫，謂之策略。這一切，美其名曰就是：「靈活的運用馬克思主義。」

我們在龍游下車以後，正值午夜兩點鐘光景，城裏戒嚴，路不通行，我們就被日本人押在車站上過夜，這時我的思潮像千軍萬馬一樣的奔騰，湧上心頭，我要控訴啊，那個欺騙我，凌辱我和折磨我的共產黨。

今後我將何去何從？千頭萬緒，反覆地思索着。多麼不幸啊，我們這一代的青年！

在天色微白的時分，我打定了主意，到重慶去吧，由於在重慶我還有些朋友，可以找到職業。我寫了一封長信給金若山，請他匯一筆路費給福建南平的一個朋友轉給我，同時並請求他，千萬別在「我家裏的人前面」（暗示中共）提及我，詳情容我再當面和他談，我很感謝他，當後來我抵達南平的時候，接到他的覆信。知道他都為我一辦到了。

我已習慣於在淪陷區和自由區之間的「陰陽地帶」鑽進鑽出。在日本人前面，我有時顯得落落大方，像個浮誇執拗的油少年；有時我又裝得半癡半傻，像個土頭土老的鄉下漢……，想到這些富於浪漫主義情調的生活，我又微笑了。

四九

走出日本人的封鎖綫以後，途中我們臨時結識了一羣旅伴，有時步行，有時乘段舟車，使我感動的是，當時有許多年青人，三三兩兩的，成羣結隊的，他們都不顧重重困難，冒着生命的危險，突破日本人的封鎖，湧向大後方去。他們之中，好多人目的地都沒有，但在他們的生命中充滿了自信，他們說：能在那裏參加抗戰工作都是一樣的。

當我們穿越浙閩邊境的仙霞山嶺的時候，當地的人警告我們說，這一帶常常有土匪出沒。我心裏是雪亮的，在這些崇山峻嶺中，過去一向武裝掩護着中共的浙江省委和福建省委的活動，山區的核心部份有一個小小的特區存在。山勢奇險，軍隊不敢輕進，但是山中却是不毛之地，裡面的供應幾全部要仰給游擊隊（當然他們以土匪的面目出現）在山區周圍的掠奪。我當時以我的經驗，把一羣旅客加以臨時的組織，分別規定出各種信號，在途中遇到可疑的情形互相呼應，使土匪知道我們有備，而且不易測出我們一共有幾多人，總算很僥倖，我們終於安全通過了。

南平以下，乘公路汽車可以直達江西贛州，我們在途中經過了江西的老蘇區長汀，瑞金，寧都等地，我這時的心情，很不願有任何人和我談到共產黨，然而無論在飯館和旅店中，却偏遇到有人以這些作爲話題，有的本地的老百姓，談及當年紅軍暴行，猶有餘悸，毛骨悚然，他們還指手畫腳的告訴我，那一家滿門抄斬，那一個村莊的人被統統殺光了，那一處還有滿坑屍骨的萬人塚。我聽了祇是臉上不時泛起紅暈，有時很不自然的應答兩聲。在老蘇區中，反共的標語也特別多，那些過去遭受過紅軍荼毒的人民，時時懷着無比的憤怒，等待着報復的機會。

在贛州，我找到一個在空軍中服務的親戚，他起初不很高興理我，因爲他過去知道我是共產黨，不很諒解我，我們也很久不往來了。當我這時對他說明了一切以後，他很熱情的拉住我，對我說：

「啊，你終於回來了！」

我被感動得兩眼充滿了淚珠，最後終於忍不住流了出來，這時我幾乎想在他前面痛哭一場。是的，我是回來了，我過去爲了黨的生活犧牲了我一切的親友來往，現在，他們是不是都能寬恕我呢，同情我呢！

贛州在當時大後方的城市中，倒有幾分新生之氣，給我以很深的印象，也給我一種希望。

當時在大後方，由於戰區的分割，交通極感不便，從贛州我又繞道廣東的韶關乘車到了廣西柳州，再過桂林而達衡陽，在這些地方，我陸續接觸過一些自由主義者的文化人，這些人中，雖然後來幾乎全

部投共，但在當時，他們絕不是清一色的左傾份子，他們雖然也對當時的執政者表示不滿，但是他們的心情我是完全了解他們的。在我自己，當時雖然對於中共已經極端痛恨，但對於這批自由主義的文化人對政府的批評指責，我依然是具有同感的。

這一次旅行，耗時一個半月，歷經九個省份，最後再度取道貴陽，於民國三十二年的春天，回到重慶。

到重慶的第二天，金若山設宴爲我洗塵，席中金若山爲我介紹了東方文化協會的秘書長郭春濤。

郭春濤是個老國民黨員，先後當過馮玉祥的政治部主任，楊虎城和劉湘的智囊，國民黨改組派時代的政府代理實業部長（原任部長是陳公博），此後即永不得志。抗戰期間，獲得于右任先生（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的支持，在重慶搞起「東方文化協會」，同時秘密與譚平山（中共最初的領導者之一，後脫黨，現又回到中共，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主任），陳銘樞（早期福建人民政府的領導者，現任中中軍政委員會委員）等人組織「三民主義同志會」，進行抗日反蔣活動，「三民主義同志會」後來併入李濟琛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郭當選中常委兼上海市主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出任「政務院副秘書長」，一九五〇年「病逝」北平，就此了結。此人平日過於坦率，常愛口出狂言，我深知他久之必不容於共產黨人，所以他的死因，我始終是認爲可疑的。

我們經過幾度談話後，他後來就邀我擔任了「東方文化協會」秘書。從此我們朝夕相處，談話的機

會很多。

有一天飯後，他在發完一大陣牢騷後，表示他認為中國需要有一個真正的小資產階級政黨，他指責當前的小資產階級不是自暴自棄，就是隨着別人亂嚷無產階級革命，他慨歎現在共產黨正在將各種不滿現狀的份子熔於一爐，倒好把天下一把抓了。這天飯後，

「現在，你以為應該怎麼辦才對？」我說。

「最重要的是，國民黨要像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小資產階級也要提高自己的自尊心，負起責任來，共產黨也就不可能把大家吃掉。大家把界綫分分清楚。黃河有了河套，長江有了支流和湖泊，所有的水就不致盡流入海了。我是個小資產階級，我絕不冒充無產階級，我要建立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黨，領導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固然，國民黨不能諒解我，蔣先生不能諒解我，但是我這樣做，也正是爲了要救國民黨和愛護蔣先生。」他聲若洪鐘，說得十分激動，其中也有八九分意氣的成份在內，把政府負責諸公的名字一個個點出來罵。

「這很難，因爲小資產階級的確太散漫。」他一定要我表示點意見，我祇好這樣敷衍了兩句。

「我說過，小資產階級不要自暴自棄，你還這麼青年，就這樣沒有出息了。」他這回說過，格格地笑了。

其實，那時我是相當欣賞他的抱負的。這時期，我在郭春濤家裏，陸續認識了許多國民黨革命委員

會和民主同盟的人士，如譚平山，王崑崙（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委員），章伯鈞（第三黨的領袖，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之一，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長。）鄧初民（現任中共所辦的山西大學校長）等等。

第十二章 「中間路綫」的摸索

五〇

剛從一個共產黨人的牢籠中飛出，才發現到，在這地球上，除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小天地之外，還有一個廣大遼闊的世界，慚愧和譏笑自己過去是多麼無知和淺薄，我們過去被關在那樣一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小天地中，對於這個真實的世界，竟是這麼茫然。我們在共產黨內，受的是偏見，武斷和仇恨的訓練，他們把這個世界說得如何的醜惡，但是却把我們帶入一個更醜惡的行爲範疇中去；他們說另一個「天國」是如何如何的美麗，然而這批把我們引進「天國」的帶路人，我一個個都見到了他們的真面目，都是魔鬼，都是魔鬼啊！這些魔鬼們，他們起初戴上和善的面具，和你接近時，都很溫文有禮，然後，他們口中念念有詞，漸漸就用毒藥把你昏迷過去，於是，這時你沉醉在夢中，他們就乘機綁了你的手脚，給你加上鐵鐐，當你發現站在你前面的突然是這批青面獠牙的怪物時，你一時會感到詫異，但是他們都一個個稱呼你是「親愛的同志」，或者，你和他們的厮混就會逐漸感到習慣了，於是，他們也把你裝

上書面，配上獠牙，加以「改造」，他們還會對你說：「對人的鬥爭，是需要殘酷的。」

這是可怕的噩夢，可怕的長夢啊！多少人做過我這樣相同的夢，又有多少人在這個夢中遭受了毀滅

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體鱗傷的身軀，終於勇敢的，不顧一切的，從這個囚籠中掙扎出來。

「無疑的，這個現實的世界也是醜惡的，但在兩種醜惡之間，我倒覺得這個現實的世界還可愛得多了，因為他至少還有一半的光明面。」有一天，我對郭春濤這麼說。

「你說的光明面指的是什麼？」他問。

「至少，我覺得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空氣是不必化錢買的。而在另一個共產黨的小天地中，連空氣也被專有和統制起來了。」

郭春濤沉着臉，半天沒有回答我的話。

「你不要誤會，我絕不是爲這個不合理的社會辯護。」我接上去說：「我繼續在尋找革命的道路，中國和世界都要換個樣子的，但是總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國今天需要怎樣的政府呢？第一要肅清貪污無能的官僚，第二要顧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計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一

我對其點的意見，便他激烈起來，他認爲他在現狀之下，根本得不到自由。

「郭先生，我以爲你不必這樣動肝火，意氣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養，當然看問題要比我深刻得多。」我用高帽子先將郭春濤的氣平了下來，又繼續說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爲一個國民黨員，還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可以高談闊論的大罵國民黨，你能說國民黨獨裁嗎？如果國民黨真有一套獨裁的本領，你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他微笑的點了點頭，好像還同意我的說法，又聽我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呢，我個人與國民黨祇有怨，沒有一點緣分，但是，我們說一句話總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那麼我可以說，如果你指責國民黨的政府人員無能則是天公地道，要說他們獨裁，他們就太不够資格了。」

在我們這次談話後不久，我和他提出一個辦刊物的計劃，我的計劃是由東方文化協會出面來主辦，他起初表示極力支持我，後來聽信了王炳南（當時中共在重慶作國際情報的頭子，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話，就變卦了。中共當時已經知道我出現在重慶，而且也相信我已脫黨（因爲組織關係未轉到重慶），至於爲什麼脫黨和如何脫黨，他們還不怎樣清楚，我一怒而離開東方文化協會，我說：「這個刊物我決心辦，現在我自己單獨來。」

其實，我那時候能憑什麼辦一個刊物呢，我自己身邊一個大錢也沒有，但是，我下了決心，無論如

何要辦出這個刊物，我知道，有些朋友都在背後議論：這個窮小子發瘋哪！

這個時期，正是重慶的雨季，我全身祇有一套爛西裝和一雙破皮鞋，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從天明到黑夜，滿街奔跑，回來的時候就像一個落湯鷄一樣，把衣服和皮鞋吹吹乾，第二天再照樣出去……。

每一個朋友的地方，這樣三元五元的募化，有的朋友爲我的熱情所感動，又爲我介紹新朋友。一個月以後，我們居然湊集了法幣一萬多塊錢，我們的創刊號出版了，這個刊物定名爲「自由東方」，我們不談中國的內政問題，專談東方民族的解放問題，獲得了廣泛普遍的支持，在刊物出版後，又陸續收到許多捐款，其中，金若山捐助了他在重慶僅有的一筆私人財產——一座洋房。孫科捐助了法幣八百元——當時他和司徒德（現任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中國代表）等正籌組「中韓文化協會」，我在這時也出版了一本「朝鮮革命史」的書。

我們的刊物不僅能够按期出版，而且逐漸擴充了兩個書店——牛角沱的「東方書店」和民生路的「自由東方社門市部」，因爲「自由東方」是中國唯一專門研究東方民族問題的刊物，當時在重慶的各國外交人員都十分重視我們的意見，我記得，有一篇我自己寫的關於印度問題和另一篇梅公毅（越南問題專家）寫的關於越南問題的評論，都受到英國保守黨報紙的猛烈抨擊，中國外交部還特爲此給我們來了一封公函，要我們以後的評論謹慎一點，免得給他們外交上增加麻煩，我接到這封信後非常氣憤，奔到外交部找楊雲竹（當時的外交部亞東司司長），他倒說得很客氣：「你們寫你們的文章，我們外交部辦我們

的外交。」自由法國駐重慶的總領事（名字可惜我忘記了），由於孫源（當時法國新聞處的中文編輯部主任）的介紹，他常請我吃飯，他的意見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他說：「你們對越南問題的看法，甚至我們法國人也具有同感，但是，我要提醒你的，自由法國也絕不讓舊法國的殖民政策重演的。」另外，朝鮮的金若山，日本的青山和夫，鹿地亘，越南的胡志明和其他幾個流亡在重慶的緬甸、泰國人士，都常在我們這個刊物寫文章。胡志明當時在廣西柳州，常和我通信，從他給我的來信中，我知道他在柳州的境遇很潦倒，也很苦悶。柳州有一個「越南革命同盟會」，幾乎所有越南的革命流亡者全部排擠他，有人因為他到過蘇聯，做過共產黨，罵他「蘇聯的間諜」；有人因為他主張與中國合作，罵他是中國政府的間諜；有人又因為他主張與法國建立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綫，又罵他是法國的間諜；有人又因為他主張利用日本與法國維琪政府在越南的矛盾，罵他是日本的間諜。他不堪煩擾，常常寫些感傷的中國舊詩寄給我，後來在一氣之下，就回國打游擊去了。以我的判斷，他在柳州時，可能已經與共產黨失却組織關係，直到後來他在越南掌握武力的時候，才恢復黨籍的。

「自由東方」雖然不評論中國內政問題，但是基本上還是一個中間偏左的雜誌，寫稿的作者中，還有不少左傾文化人如石嘯冲（現任中共人民外交學會秘書）、陳洪進（農業問題專家，以後不知消息）、陳翰伯（現任中共新聞學院院長）等，這時中共對我採取保留態度，我思想上比較接近和同情民主同盟，和章伯鈞，鄧初民，張申府（原係救國會領導人之一，後因贊成國共和談，為中共所排斥，永不復

再見於政治圈中）、沈鈞儒（救國會與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等人常在一起，因此這時我就參加了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民盟）。

五一

當時中共與民盟之間的關係並不像以後那樣密切，的確是貌合神離的，中共對民盟的政策是，表面捧場，背後拆台；一面打擊，一面拉攏；個別爭取，分別離間；上層敷衍，下層分化。在基本上，他們很討厭民主同盟，很不願意民盟在組織上所發展。當民盟接近瓦解的時候，他們有時也從旁托他一下，因為民盟這塊招牌的存在，對中共是有利的，可以為中共壯壯聲勢，與中共的政策相呼應；但是當民盟一旦在組織上開展的時候，他們又從中阻撓，因為民盟的組織倘真有所發展，在中共又認為是個威脅。所以中共對民盟的態度是，在上層扶住他，在羣衆中孤立他。

章伯鈞是當時民盟組織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時民盟的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實際上等於是個無兵的司令。他一方面要仰承中共的鼻息；一方面又得應付內部的責難，「民主同盟，組織散漫，又沒有羣衆基礎，太不成個樣子。」有些人常常這樣責備章伯鈞，而章伯鈞也祇好嘆口氣，說聲：「沒有辦法，環境太壞了。」言下大有把這個責任完全推在政府身上的意思。其實呢，說句公道話，發展民盟組織最大的障礙却是中共。

章伯鈞整天滿腹牢騷，罵這罵那，他說話粗魯，聲調宏亮，措詞也毫不閃爍，赤裸裸的，我一到他家裏，他總是留我吃飯，打開他的話匣子，把牢騷發洩完了，然後才肯放我回去。

他常說，中國是一個流氓社會，搞政治的一批人沒有七分流氓氣是不成的。他指出中國歷史上許多真命天子，不是都市流氓出身，就是農村的流氓出身，有時他說得得意時，口裏噴出白沫，吐得滿地是痰。

章伯鈞這時也許就由於他的一套「流氓社會」觀念出發，他在生活態度上，極力模仿一個流氓的調兒，他最得意的是那一頂鴨舌帽，因為戴起來就更像個流氓了。

「中國的士大夫沒有氣節，沒有一點骨氣，讀書人一個個都變得這麼無恥，你看——」他氣憤憤的又接上去說：「黃老頭子（指黃炎培）從前清秀才，到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的政府，那一個朝代沒有他的份；沈老領子（指沈鈞儒）表面上一副道學先生的樣子，其實他的要求最簡單，祇要抓到他的癢處，一點小甜頭他就不講話了；再說譚平山，簡直更無恥了，過去領導過共產黨，以後被中共趕出來，就和我們一起組織第三黨，以後又參加國民黨，成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最積極份子，現在又一變而爲「前進」擁共的份子，開口閉口毛主席如何如何偉大。你想想，中國遇到這批士大夫幹政治，一時怎能有辦法？」

「不過，章先生，」我想說的話，滑到嘴邊，又縮了回去。

「你說，你儘管說，沒有關係，我把你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樣，我們第三黨老的一批人都不行了，現在正需要像你這樣敢作敢為的青年。」經他這麼一說，我就毫無顧忌的直截的指出一件事實來：

「最近外面有一個傳說，你們第三黨一面在罵政府，罵國民黨，然而又在背後跟國民黨勾勾搭搭，說是你近來跟吳鐵城往來頗為密切；在這次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名單中，你們一方面想在民盟的配額中多爭幾席，然而又在直接跟政府想另外多討幾個；又聽說近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和你討價還價呢，你們一手伸着向國民黨要錢，一手又伸着向共產黨要錢。」

我說得他漲紅了臉，從頭頂一直紅到頸子。

「絕對沒有這回事，這完全是別人造謠中傷我們。」他稍許定一定神以後，以肯定的語氣答覆我。從他的表情上，一看就知道他是很不自然的。不過這一來他的牢騷却漸近尾聲，我因此也得到早脫身的機會。沈鈞儒也時有怨言，不過他說得比較含蓄，不像章伯鈞那麼直率。

張申府逢人必罵「五十號」（即周恩來公館），他說，「五十號」的人太看不起他。他又說，抽象的共產黨都不錯，具體的共產黨都個個不是東西，「五十號」的人更是混蛋。

「我們都老了，不行了，中國的希望就看在你們這一代年青人的身上了。」每次他談到最後，都是這麼感喟的對我說。

中共對於自己的脫黨份子參加民盟者，非常注意。除了一部份是奉命打入民盟，隨時聽黨的命令的

幹部以外，對於我們這種自動參加民盟的，都採取嚴格的監視的態度。

「你參加民主同盟了，哈哈！」董必武有次見到我這樣說。

「你參加民主同盟了，恭禧，恭禧！」陳家康見到我也這樣對我冷嘲熱諷的說。我當時心理極端難過，因為我對於共產黨雖然極感不滿，而且也已經脫離了共產黨，但是就對陳家康個人來說，我還是有些情感的。

唯一痛快的倒還是徐冰，他在我前面把民盟的各個領導人都罵遍了，然後他問我：

「這批臭官僚，爛政客，黨棍子，你跟他們鬼混是什麼意思。」

「統一戰綫呀！」我幽默的回答他。

他一言不發，走開了。從此我和共產黨人之間再見面時，彼此更覺得無話好說了。

五二

我當時在民盟的工作是擔任一個小組長和代表章伯鈞與許多青年團體保持聯繫，我的後一項工作，與當時中共在重慶的青年運動負責人劉光（留俄學生，抗戰勝利後死於南京），不斷的發生摩擦，而我的活動範圍要比他廣闊些，不像他那麼鬼頭鬼腦，畏首畏尾，礙手礙腳，氣度又特別狹窄，但是他也沒有辦法，我很了解他，作爲一個共產黨員，他怎能不如此呢！

劉光和魯明（新華日報記者）這時在一些青年團體中破壞我，開始祇是些無關緊要的攻擊，如說我酗酒，玩女人，我不配領導青年運動等等，後來，中共在重慶的組織大概已經接到蘇浙皖邊區黨委的報告，知道了我的脫黨經過，對我的打擊就一天天加緊了。

他們這時把我周圍的一批基本朋友加以挑撥分化，這批朋友中包括祝公健（現任中共上海市工商聯合會調查組長），夏弼蒙（即丁日初，國民黨中央委員丁超五之子），石嘯冲等。

爲了組織統一的青年團體問題，我和劉光由摩擦演至正面衝突。

「這是沒有必要的，這將暴露很多革命青年幹部，給敵人以一網打盡的機會。」劉光說。

「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批青年朋友的情緒很高，他們都具有這樣的要求。」我向他解釋說：「而且，這些參加的份子都是每個青年團體的負責幹部。」

「那不行！」劉光堅決地說。

「但是，我祇能尊重大家的意見。」

結果，我們建立統一的青年團體的計劃，不顧中共的反對，終是實現了。我很明白，中共當時反對這個青年團體的實在理由是，唯恐失去他們在左翼青年運動中的直接領導權。同時這批青年與民盟結合起來，也可能給民主同盟輸入年青的血液和生命力，使民盟活躍起來，這是他們所最顧忌的。至於「暴震青年幹部」，完全是一種口實，一派胡說。

我們在上清寺的「特園」（民盟盟員鮮特生的住宅，當時爲民主同盟在重慶最主要的活動據點）舉行了大會，成立了「青年聯誼會」，爲了不致因爲我個人的緣故，而致使中共給這個團體更多的爲難，因此我們決定由石嘯冲和祝公健主持這個團體，而結果他們後來却把這個團體出賣給中共了。

暴風雨一樣的打擊對我開始了，他們說我：偽裝前進，欺騙青年。他們說我：表面上生活與青年共甘苦，背地裏吃好的穿好的。我和幾個女朋友往來，如金端荅（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金仲華的妹妹，實際上是劉禾子——一度擔任香港文滙報的總編輯在追求她），李白虹（女記者，實際上石嘯冲在追求她），翟一我（現任上海大公報記者）等，這時都被他們渲染得有聲有色，說我整天都在鬧桃色糾紛。而頂重要的是攻擊我，辦刊物，辦書店，組織團體，資助許多青年，這筆錢是從那裏來的。他們起初以懷疑的口吻，後來索興就武斷的說，我是受國民黨津貼的。這些謠言一個個都是從「五十號」的總謠言台發出的。

這些攻擊，我從來沒有加以答辯，關於我的經濟來源，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起先是辛辛苦苦募來的。後來是我已經有了初步的局面以後，熱心朋友自動捐助的。再後，由於我們這個刊物多少還有些影響，我們在政府配給到許多平價物品，假如這算是「國民黨的津貼」，我就無話好說了。

章伯鈞起初還相當衛護我，不過後來他也經不起中共的壓力，再加上中共一再的警告他，說我在民盟內搞小組織。經此打擊以後，後來民盟並沒有直接對我採取什麼行動，祇是我和章伯鈞的往來逐漸疏

，同盟開會也不再通知我，章伯鈞的秘書王新吾也爲此和他大吵了一架，毅然脫離了他。

王新吾常常來安慰我，而我倒熱烈的鼓勵他：

「不要灰心，我們繼續摸索革命的道路吧！我幹過共產黨，深刻的了解一個共產黨員的味兒不好受，於是我離開了他。但是我雖然對共產黨人的作風手段不滿，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想還相當尊重，中共在今天所提的基本政策也大體上還適合我們的政治要求。因此我個人在脫離共產黨以後，採取了中間偏左的道路，參加了民主同盟。別人罵過我們是共產黨的尾巴，我們也承認是尾巴，現在證明，做尾巴也是不容易的。」

他長嘆了一聲，也感慨的說：

「做尾巴真是痛苦，我幫章伯鈞多少年了，曉得共產黨人的臉色是不容易侍候的，你想，一個當了多少年的共產黨員對於他們黨的政策都難以掌握，何況我們？我們剛摸清楚了他一點，他突然又來過十萬八千里的大轉彎。他們拿馬克思的教條說得娓娓動聽，好像馬克思主義翻來覆去都好解釋似的。你以爲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這樣呢？」他睜大兩隻眼睛看着我，期待我的答覆。我笑了笑，沒有答話，於是他又繼續說下去：「章伯鈞常常被他們叫去罵一頓，回來以後，總是他的老婆倒霉，他把氣再出在他的老婆身上。」

「他們對章伯鈞也如此嗎？」我問。

「可不是，難道我騙你不成。」他幾乎說得有些激怒。「甚至一個中共的小幹部，他們對章伯鈞也當面呵責，毫不留情，他們在自己的黨內做慣了奴才，一旦有機會作威作福起來，比他們的主子還兇呢！你懂得，張申府爲什麼會同中共的關係搞不好，他就是從不買這些中共小幹部的賬。」

「章伯鈞也是一個黨的領導者，他怎麼也可以這樣對共產黨低聲下氣。」

「不這樣不行呀！」他繼續說：「王炳南有次就教訓了章伯鈞一頓，你們民主同盟，國民黨憑什麼要買你們的賬，還不是因爲我們有五十萬大軍和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這時，另外一個朋友方覺文走進，插進來參加我們的談話，他聽了兩分鐘，就不耐煩地說：

「無聊，無聊，你們原來討論這樣無聊的問題。和共產黨人做朋友，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他乾乾脆脆就把你看作羣衆，你就得老老实實接受他的政治領導，你說他百分之九十對，百分之十不對，不行。信仰是不容許打折扣的，依照共產黨人的規律，信仰應該變得像迷信一樣，不管這個菩薩是泥做的，紙畫的，你一見到就得屈膝下拜。共產黨人自以爲他們就是真神，做共產黨羣衆的祇有兩種人，一種是天真無知的小伙子，他們像趕迎神賽會一樣的湊熱鬧；另一種就是老眼昏花的失去生命自信的人，他們需要用神來安慰自己快死的生命……。」

「你這算是爲我們作結論嗎？」我開玩笑似的對他說。

「是的，該爲你們做個結論了，共產黨，無知無識的人可以做個好黨員，服服貼貼的人可以做個好

羣衆，你們又想和共產黨人滾在一起，又要議論他；不服他，這怎麼成。你們既想和共產黨人攪在一堆；又想跟共產黨人鬥法，這不是做夢是什麼？」

第十三章

抵擋「靠攏」的狂潮

五三

金若山送給我的房子，是一座上清寺山頂上的小洋房，前面有一塊空地，我把他修建成一個精緻的小花園，從我的門前可以遠眺嘉陵江的景色，我的屋後又是一大片曠地，再過去就可以走到大田灣。這座房子開始是我獨個住的，後來陳洪進、劉尊棋（當時的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國際新聞局副局長）等都在我家裏住過，山坡雖高，每天客人總是不斷，他們都十分喜愛我這座房子。這座房子後來我把他變賣，作為擴充事業的基金。我就搬到民生路去。

這時，我還在民主同盟中。

我在中韓文化協會兼了個秘書名義，每天總是照例的到鄒容路中韓文化協會去看看。會務沒有多少事，我就和餐廳（中韓文化協會附設的）職工聊聊天，尤其那個副經理姓江的，我一向總叫他「小江」，是一個很活潑能幹的年青人，我很喜歡他。

這一天，我們又在閒談。突然大廳起了騷動，小江剛走出，槍聲突起，一個電力公司的工友田達被打死在地上，這時小江正扶住流血的人，頃刻之間，廳內擁滿了一批穿短襖的人，大家一口咬定小江是兇手。小江跟着就被帶進警察局，雖然怎樣搜也搜不出他一件武器和別的證據，結果還是吃了幾個月的官司。

事發的第二天，街上飛滿了傳單，「新華日報」上也說，這是國民黨特務份子的暴行。

「這事有點蹊蹺，餐廳所有的同事都說殺人的絕對不是小江，但是他們祇有肉嘴巴，人家共產黨有一張報紙呀！」我和中韓文化協會的秘書長司徒德說。

「是啊，真奇怪！」司徒德說：「而且小江也從不像一個與政治上有關的人。」

這時另一個朋友李渭泉笑着對我說：

「這事與小江可能沒有關係，恐怕與你倒有些關係呢？」

「什麼？與我有關係？」我吃驚地問。

「我看，這事可能是佈置好要殺你的，後來感到對你無法下手，就隨便殺了另外一個人，想把殺人的罪名加在你身上。小江沒有政治關係，你就不同了，你是一個共產黨的脫黨份子。但是，你們注意到嗎，小江跟你生得一模一樣，可能是奉命哄叫的囉嚙，開始就哄錯，後來祇要將錯就錯了。大家又知道，你在中韓文化協會，他們哄出去自然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帶上。而且，中共現在正在外面說你與國民黨

有關係呢！」

我聽了沒有做聲，司徒德滑頭的笑了一聲說：「不致於這麼嚴重吧。」

這就是當時轟動重慶的中韓文化協會槍殺案。李渭泉後來在昆明發生李公樸、聞一多（均係民盟黨員）的槍殺案以後，又對我說：

「你如果在那次中韓文化協會的槍殺中被打死就好了，說不定新華日報還爲你出特刊，追贈你一個民主烈士呢？」

「你以爲這次李公樸，聞一多的事，都是共產黨自己幹的？」我問。

「當然，絕無疑問，政府做這樣的事自討苦吃，犯不着，共產黨就不同了，他們認爲殺一個人可以造成政治影響，又是一種政治教育。況且被殺的或者本來就是他們認爲有了問題的人，死後再爲他們出特刊，開追悼會，送殯，又是政治……。」

「你說得太刻薄了。」

「說我刻薄，好，你等着瞧吧。」他說完就揚長而去。

果然，不多一個時候，我又有事發生了。有一個民主建國會的朋友田鍾靈（又名蘇東，後來在香港辦過「快活報」，現在大概在廣州）請我吃飯，我很謹慎，我說：「不必客氣了，我請你吃便飯吧。」

我們就約好在青年路的「愛崙餐廳」，屆時他又帶了一個叫李新明的朋友來，吃過飯，我們就分道

揚鑣。豈知第二天我打開「新華日報」一看，赫然一個大標題，就止是說爲了我請客，李新民途中被人打傷，幸好當時李新民溜得快，不然他做了「民主烈士」，我也做了兇手嫌疑犯，中共的陰謀又是一箭雙鷗了。

我在連續遇到這些事以後，正在驚魂不定之際。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心心茶室飲茶，我旁邊的枱子上，也坐着另一個茶客，開始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好像記得樣兒很熟，在那兒見過呢，一時想不起，漸漸地，我們彼此都覺得拘束起來，我想起來了，他原來是我在延安棗園時的同組同學陳健民。

我大胆的移近他的位子，他很難爲情似的起身和我招呼。

「你老得多了，我們在延安的時候，你還是個孩子。」他對我說。

他又告訴我，他決心不再幹政治了，這一行太可怕了。我起始對他這話有幾分懷疑，因爲所有的舊同志間一見面都是如此相互敷衍的。但是，當他知道了我確是一個脫黨份子後，他却告訴了我一個下面的駭人的故事：

他這次從昆明來，在昆明的時候，他在政府的一個後勤機構中服務，同時担任中共的工作。有一天，黨裡命令他立刻逮捕一個人，逮捕以後，立刻處決。事後再向政府公布這個被處決的人是個圖謀不軌，陰謀暴動的共黨份子。

「我遵照黨的命令，把這個人逮捕過來了，然後我又命令部下把這個人犯捉來。」

「啊，一見面之下，原來也是我們的要國同學，我還記得嗎？就是那個身體結實，矮個子，會唱山歌的李維茲。」

「開始，我們彼此都不講話，他懷疑我是個黨的叛徒，逮捕了他；在我，是奉了黨的命令處決他的，當然也懷疑他一定是個出賣黨的叛徒。」

「但是，我看在舊同學的份上，待他很好，而他也漸漸發現到，至少在我個人，對他並無惡意。」

「於是，我們之間交談起來了。」

「原來，當時在昆明的黨的組織，經費很困難，他奉了組織上的命令，去搶劫了源昌公司，這是昆明的大公司之一。事發之後，才知道這家公司有龍三公子的股份在內，龍雲追緝甚力，限期破案。黨的負責人知道闖了大禍，都慌了手脚。因為黨在西南的活動完全是由龍主席掩護的，這個案子一旦破獲，如何得了。」

「因此，我這時才恍然，黨命令我殺他，原來是爲了滅口。我把我的任務告訴了他，我們彼此都擁抱在一起，流了好久的淚。」

「我送了他一點路費，告訴他，走吧，你快走，走得愈遠愈好。在一剎那間，我自己也提了一隻小箱子，偷偷的逃來重慶。」

「我現在真的對政治完全灰心了。」他又重覆了這麼一句。「這一行真不是我們這種人幹的，媽的

，什麼革命。」

五四

陳健民又常常偷偷的問我：

「在延安的時候，我就聽說你有托派的嫌疑，現在你可以老實告訴我了，你究竟是不是托派？」

「你這沒有出息的傢伙，」我罵他：「什麼托派不托派，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半個影子，有胆量咱們自己幹自己的，爲什麼老是在共產黨呀，托派呀中間兜圈子。」

這幾句話，大概很可以代表我當時的基本態度。

一個激烈的革命青年，開始從迷信共產黨，到依附民主同盟，從極左轉到中間偏左，在「中間偏左」的道路中徬徨了一陣子，又是失望，感到此路不通。這時，我的思想在急趨動盪，對我的中間偏左的道路開始澈底的清算。我對每個朋友都說：

「不要相信任何一種魔道，不要相信任何一個救世主，他們都是騙人的。自己要怎麼想就怎麼想，要怎麼幹就怎麼幹，昂起頭，走自己的路。」

我離開民主同盟以後，許多同情我的朋友又聚攏起來，於是，我們就在「走自己的路」的精神下，開始組織了「中國人民社」。

「中國人民社」發行了自己的機關報「人民週報」，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加以公正無私的批評，國民黨在這方面倒還表現得大方，對於我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時共產黨對我的「謠言攻勢」又起，他們說國民黨支持我。

「中國人民社」不久就改組擴大為「中國人民黨」，所以在中國政治上最初用「人民」兩個字，我還是毛澤東的「老大哥」呢！

「中國人民黨」最初的一批人，除我以外有：王新吾（原係章伯鈞秘書），趙公愚（時事新報記者），後來又担任上海申報的東北特派員），丘斌存（後來一度担任台灣財政廳副廳長，現在還在台灣），蔡力行（聯合週報發行人，以後又主辦聯合編譯社），包直（重慶「新聞快報」的經理），譚宇人（四川袍哥的活動份子，他變賣了全部家產，貢獻給團體），黃德樹（是一位很精幹的年青人，他當時担任我的秘書）等七十餘人，基幹份子都是青年，以後參加的有大批袍哥弟兄。令我最感動難忘的是，有些袍哥弟兄給我寫了血書，請求參加我們的團體。

共產黨人是最現實不過的，當我們的人民黨成立後，他們又伸手要和我做「朋友」，有一天，石西民來找到我，對我說：

「家康（這時陳家康剛陪同董必武出席舊金山會議返渝）想和你談談，你願意嗎？」
他們很聰明，知道我對陳家康還有些情感，想從這一點上來突破，以為如此一來，又可以俘虜我

了。

「我以為要談談的話，我們之間目前似乎沒有什麼好談。」我直率的拒絕了他，我說：「如果他有便，來我這裏坐坐，我一定買上好的龍井茶款待他。你們共產黨人之間雖然沒有友誼，但在我，還依然把他看作朋友的。」

我們在「人民週報」上繼續抨擊共產黨，石西民和陳家康以後都沒有再來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整個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畧已在開始轉變：在歐洲，他們過去需要發揮民族主義，以對抗希特勒的德國；在美國，他們過去需要散播兩個世界長期和平共存的思想，以圖取更多的美援。代表這一個時期政策的最高峯是「德黑蘭會議」。在「德黑蘭會議」以後，史太林在行動上已經開始了大轉變，從與盟國合作的政策轉變到準備世界革命的政策。因此，這時期，史太林在國內清算了瓦爾加思想（瓦爾加原係蘇聯的權威經濟學者，他說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可能繼續保持經濟繁榮。）；在歐洲，他們開始了打擊受到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的共產黨——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謂狄托主義；在美國，他們開始了打擊受到民主主義影響下的共產黨——美國共產主義政治教育協會，白勞德的堅持德黑蘭路線的思想。

在這史太林的大轉變期間，我看到一羣共產黨員對於政策無法把握的可憐相，真要噴飯，笑掉牙

齒。

當白勞德最初宣布美國共產黨改稱爲美國共產主義政治教育協會的時候，當時，許多左傾份子甚至共產黨員，對於這件事都很不了解，累得中共中央爲此大力進行說服工作，他們印行了許多小冊子，同時在新華日報上重覆的解釋，說這件事是美共的英明的措施。白勞德是如何偉大的天才的領導者。後來，正當喬木（即喬冠華，現任中共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國際新聞局局長。）翻譯了一篇白勞德的「德黑蘭的道路」的長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時候，刊了兩天就不見下文了。果然不久，白勞德就遭到清算，開除，和宣布爲叛徒了。

南斯拉夫的狄托，過去被共產黨人歌頌爲南斯拉夫的英雄和南國之父，重慶的共產黨人甚至唱過「我們跟着狄托走」的歌。當南斯拉夫早已和蘇聯發生糾葛的時候，由於雙方都沒有公布真相，公開撕破臉。這些昏迷的共產黨員還在繼續歌頌狄托，等到共產國際情報局一旦宣布了狄托的「罪行」，第一天共產黨報紙沒有登載這項消息，他們還不相信這是事實呢。等到後來一經莫斯科證實，他們又大罵狄托爲「匪徒」了。

這些跟着黨的政策顛顛倒倒的共產黨人，如今都成爲黨的大亨了。我相信，也祇有這樣的共產黨人，才有這份福氣，在共產黨內做到大官。

「共產黨員一共分三等，」我有次對王新吾說：「第一等共產黨員善於揣摩領袖的心思，他的一舉一動正像狗的嗅覺一樣靈敏，成爲主子最心愛的哈吧狗；第二等共產黨員從來不用思想，他祇須跟着黨

的政策變，成爲一個機械的忠實的執行者，這種狗祇會咬人和聽候使喚，它們不一定獲得主子的寵愛，但是主子却覺得它頗有用處，這種狗如看家狗和獵狗都是；第三等的共產黨員，祇會呆頭呆腦的背誦教條，他們一遇到機會，就要作爲黨的清算下的犧牲者，通常吃的狗肉，都是宰的這種狗。最後還有一種自命爲前進的左傾份子，他們不分晝夜的狂吠，這些都是屬於滿街撒糞的野狗。」

王新吾立刻接上去說：

「照你這樣說起來，第一等狗應該吃保健餐，第二等狗應該吃小灶，第三等狗應該吃大灶，而那些野狗之類，祇該在路邊檢點剩餘的骨頭之類了。」

我們都哄笑起來。

五五

在抗戰勝利的爆竹聲中，我個人因爲經營一部份商業，從昆明剛運到一批貨物，這時貨價慘跌，我幾乎遭到破產。所以後來我要等到把一切的債務理清後，才能「復員」到上海去。

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把我在重慶剩下的一點財產，全部留給繼續在重慶的一批人民黨青年朋友們，兩手空空隻身的跑到上海，當時在上海的一些人民黨同志，也一樣都是些窮鬼，他們還等待我到上海後有些苗頭呢！我一到上海，房子立刻發生問題，開始幾天住在朋友家裏，後來忽然靈機一動，計

上心來，我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會關係，幫助一個朋友擴充了他的公司，這公司就提出一筆款子在川公路三英里替我租了房子，我又利用這個據點，在上海辦了「大江通訊社」和「武訓圖書館」，奠定了在上海活動的基礎，以後我又在虬江路積善里頂下另一幢房子。

而在這同時期，當我一到上海的時候，上海的中共刊物「文萃」（後來改爲地下刊物，主編的是陳子濤，過去是廣西日報總編輯，在黨內還和我共事過，以後被殺於南京）却撒出彌天大謊，硬說我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帶了一大筆款項在上海活動，在同一期「文萃」上攻擊我的文章有三篇之多，洋洋大觀，簡直說得上是一個專號了。這時我接讀之下，不但沒有一點激動，而祇是啞然失笑，因爲中共對我這種無聊的舉動，我受得太多了。祇是他們加給我的這些罪名，我却受之有愧。當時中共在上海的特務人員，用一切手段在破壞我的社會關係，他們甚至對我的朋友說，我娶過三個老婆，現在，我還是很抱歉的說，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結過婚呢。

不過，我後來一段時期在上海用錢的隨便却是事實，甚至我有些要好的朋友都感到詫異，我幾乎三天就要大宴賓客一次，來客中不少都是汽車階級的紳士。然而，誰能知道，當席終人散以後，我還要靠我的兩腿跑回自己的家呢！誰又能了解我的苦衷，不請這些紳士們，我的錢又何能源源不斷而來？法幣一天天在貶值，他們調一筆款子給我翻幾個身就給我不少方便了。

另外，政府的配給物品和美國的剩餘物資，凡是任何文化機關能得到的機會，我都能設法鑽到門路

• 我很坦白的說，這些就是我的財源。

對於一個創業的青年來說，這些弄錢的辦法當然不能說得上是頂合理的，然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下，政府並不留心青年的創業，社會風氣也不能給青年以鼓勵，更好的辦法又是什麼呢？

人民黨召開過幾次擴大幹部會議，也不時的發表對國是的意見，在基本上，我們這時還是在中間路綫上兜圈子，不過已經漸漸從民盟時期的中間偏左，一步步向右擺，擺到中間偏右了。這時俄國大鼻子在東北的暴行，蕭軍的「文化報」事件（蕭軍原爲一左翼作家，勝利後在東北辦「文化報」，因暴罵俄國人在東北的醜惡，遭受中共的清算，現已折磨而死。）已經把我激到對共產黨人深痛惡絕的地步。

東北的戰爭正在熾烈地進行，華北和中原也陷於遍地烽火，國共談判也在不絕如縷，我們這時雖然痛恨共產黨，但是覺得應該爲國家多保留一分元氣，爲人民少受一分災難，憂心如焚，迭次沉痛呼籲，堅決反對這個殘酷的內戰。可是當時共產黨人嗜戰如狂，不顧人民的死活，停戰的關鍵在共產黨人方面，他們把人民的聲音置若罔聞。而當時政府對我們這些新興的政治團體也缺少認識，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苦心，爲了拯救人民，也爲了拯救政府，拯救國民黨。這個仗當時如果一定要打，正是上了共產黨的圈套。因爲一個經過八年抗戰混亂糜爛的國家，正是共產黨人奪取政權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這時，中共在上海的特務人員把我們的活動情形在香港的中共報紙「華商報」發表了一篇通訊，盡挖苦之能事。而在同時，在香港的人民黨同志曾經用過我的名義請客，請帖發出後，「華商報」又發

表了一篇短評，題目也很俏皮，用的是一句京劇的名字「馬義救主」，說這幕戲正在重演。

我和郭春濤偶爾在朋友家裡碰到面，他這時正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兼上海市主任委員，我們彼此點點頭過後，都苦笑笑，我們之間的距離已經愈拉愈遠了。我從囹圄裏鑽出來，他從外面鑽進去。我要救這個老朋友也無能爲力了，他的苦悶，他的一股氣無法發洩，已經接近一種政治的歇斯的里亞的個人自殺行爲。這時他即使明知知道這是一碗毒藥，也要喝下去的。這時代悲哀的是，有的人是糊裏糊塗的吸上了毒，變成了癡君子；而另一些人，則明知知道這是遺害終身的毒物，但是爲了「發洩」，他也祇好不顧一切的吞下去。

「所以說，天下的騙子是騙不完的，因爲天下的人上當也是上不不完的。」我有次終於忍不住了，對郭春濤說：「卽如像郭先生這樣的聰明人，也甘願上鉤。」

「嘿，嘿，沒有辦法。」他依然在苦笑。「蔣介石反正不放過我。」

「我倒要問問你，」我嚴肅的對他說：「你現在還談小資產階級革命嗎？假如你一直堅持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路線，我一定舉起雙手擁護你。」

他假裝咳了好半天，顯然他是在考慮回答我這個問題，因爲我這個問題正擊中他的要害。

「唉，現在情形不同了。」他費了好大的氣力才吐出這句話。「現在頂重要的問題是迎接革命勝利，組織聯合政府。」



郭春濤當時熱中的是所謂「聯合政府」。他說完了「聯合政府」四個字以後，又眉飛色舞起來。我決定不放鬆他，一句句逼上去。

「你以為共產黨來，是你的革命勝利嗎？你以為「聯合政府」假使成立，就是共產黨的革命目標嗎？」

「周先生（指周恩來）說過，至少在二十年之內，中國共產黨不會談共產主義。」

「周恩來簡直是胡說，騙三歲小孩子，」我氣憤的說：「共產黨祇要一控制到政權，就要立刻實行獨裁，他如果不如此，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獨裁之下，新民主主義呀，社會主義呀，共產主義呀，什麼名目都是一樣的。」

「你這完全是國民黨幫兇的口吻！」

「你才是共產黨的幫兇！」

「小老弟，你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不，我絕不後悔，你將來才要後悔，但是當你開始後悔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死無葬身之地了。」

我罵完他以後，狠狠的看了他一眼，掉頭不顧而去。在歸來的途中，我很難過。

五六

「大局恐怕真的要糟了！」我有次對我的同僚黃德樹說。

「你以爲——」他遲疑了片刻對我說：「是不是因爲政府軍隊這樣連吃敗仗下去，共產黨要把全局吃乾了。」

「嚴重的還不祇此，」我接上去說：「這次我們的對日抗戰，最後勝利來得這麼容易，這麼僥倖。國家新的血液沒有培養成熟，所有回來接收的人員都是舊人，舊官僚、舊作風、舊樣子、老百姓本來希望日本人滾出後國家有一副新的面目，現在這股熱情已經全成泡影了。」

「是的，」他同意我的意見說：「我們這批讀書人，也可以說是自由份子，今天真是苦悶到了透頂。」

「執政的當局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勝利，冲昏頭腦，手忙腳亂，他們早就有幾分麻木了，這時更不容易發現他們自己的弱點。而一批共產黨人他們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毀去這個國家的基礎，所以他們幸災樂禍，認爲這是他們千載難逢的奪取政權的好機會。但是，我們自命爲自由份子的這批讀書人，也要負責。」

「你說我們也要負責？」

「是的，我們都希望把國家弄好，」我激動地說：「但是，我們都沒有從建設性的培養民主精神上爲國家多下功夫，我們全靠飛機大炮去阻止共產黨，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精神陣綫却早就崩潰了。」我稍停了一會，又繼續說下去。

「還有，美國人對中國的這種拖泥帶水半死不活的政策，將來也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第一、他們對中國或者可以根本放手不管，聽由中國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樣倒可以激發中國的民族自信心；或者，他們就應該對中國真正負起責任。結果呢，他們給中國政府一點吃不飽餓不死的「美援」，弄得個中國人都變成可憐巴巴的樣子，天天盼着「美援」望眼欲穿。而同時他們却一手導演和談，對中共實行綏靖，把政府軍隊乃至全國人民的反共鬥志都磨掉了；第二、他們口口聲聲要扶植中國的自由份子，民主勢力，然而中國真正的自由份子，民主勢力在那裏呢？美國人找來找去，祇找到民主同盟的幾個政界和黨棍子出來點綴。而中國真正廣大的新生勢力他們並沒有放在眼裏。這又正中共產黨的詭計。」因爲共產黨人是不願見到中國真正的新生勢力抬頭的……。」

「你說的都是實話，美國人到中國也出於一番熱心，不過他們實在不够了解中國。比如，他們以爲中國共產黨還有點「民主氣味」呢！比如，他們又以爲祇要給政府加點壓力就可以百事大吉了！比如，他們覺得中國要走向民主，祇須拾出幾個名流做做花瓶就够了……。」黃德樹補充了我的意見，我們大家都相互唏噓嘆息。

「國民自由黨」的領袖林東海（當時是中央政治大學的教授，我一年前在香港碰到過他，他說他已經改行做生意了。）和「中國民主黨」的領袖候野君（留英出身，現在不知消息），我們常常見面，從座談會談到組織陣線，屢次都無疾而終，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們力量單薄，還不可能領導一個發生巨大影響的運動；第二、我們在作風上還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做法；第三、我們彼此也都想吃掉對方，缺一種真正民主精神的互助、互讓、互尊、互信的基础。

中國的傳統精神也成爲民主的障礙，許多年高的老頭子，他們對於新生的勢力和年青人的運動，並不加以鼓勵，他們躲在一邊訕笑、譏諷，甚至一遇到機會就投來幾塊石子，打擊我們。「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還艱苦得很，因爲守舊勢力和共產黨人都在夾攻我們。」我常常這麼感觸地說。

在中共渡江的前一年，我就決心放棄人民黨的活動，我向我的舊的同志和別的朋友呼號，大家都應該放棄小圈子，犧牲小我的利益，來促成和推動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民主大團結。

這時，上海的一批教授，作家和新聞記者，發表了「四一四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實行和平民主」，我熱烈的贊助和支持這個運動，這個運動在當時共產黨人極力指斥爲國民黨策動，真是冤枉。當時政府也一樣指這批人是「動搖人心影響戡亂」呢！

「四一四宣言」發表以後，我就參加發起組織「和平民主同盟」，當時這批人中，有些是心地良善的純潔的讀書人，他們真正是出自一顆「悲天憫人」「不忍生民塗炭」的心，但是也有不少投機的政客

在內。後來先後來到香港的有：周一志，他以後一度參加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現在好像反共，搞「第三勢力」。曹聚仁，他一度在星島日報工作，繼續唱他過去的「中間路線」的爛調子。其餘的人，我在下節要提及他們，從這些人事變遷中，感覺到中國智識份子的悲哀，和中國民主運動締造的不易。我在這裡極痛心的指出，這批人在開始從事「和平民主」運動的時候，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基本上都是反共的。但是後來幾乎有百分之九十都靠攏過，除了少數後來又陸續的溜到香港以外，其餘的在靠攏之後，共產黨對他們一個個分別開刀，被共產黨人相繼收拾了。

五七

上海「解放」前夕，許多「和平民主同盟」的朋友，都忙着向共產黨搭線，作靠攏的準備。

「我已經是內定的上海市副市長（指解放以後），」方秋葦（「和平民主同盟」最初的發起人之一，當時他是無錫社會教育學院的教授兼上海申報主筆）一副得意忘形的樣子，對我說：「你怎麼樣，趕快表示政治態度呀！」

「你要貴為上海市副市長，失敬！失敬！」我覺得有些近於滑稽，幾乎要笑得合不攏口來。

「當然，當然，你的一切也包在我身上，」他失態得談話有些近於語無倫次，繼續對我說：「你呢，給你一個報社社長當當好不好，新聞報或者申報，你喜歡那一家？」

我臉色陰沉了下來，沒有說話。

「幹嗎不說話，再過幾天這天下就是我們的了，趕快準備呀，準備接收！」他喋喋不休地繼續說着。我相信，在共產黨人，當時的確是利用這批小丑們的升官發財的慾望，勾引過他們。

另一個「和平民主同盟」的朋友（此人現在在香港，正在表示願意回心轉意，參加反共，因此我不想指出他的名字）對我說：

「滬西的洋房我已經看過幾座了，我還在考慮，不知道那一處對我更適合些。」於是，他又十分關心地對我說：「反正解放軍進來以後，我們接收的洋房汽車一定是用不完的。自然有你的份。」

還有一兩個人，他們本來的目的是要找我借錢，但是在說話中，也繞了半天圈子，最後終於伸出手來：

「趕快立功贖罪呀，……不過，現在你手頭方便不方便，先借點現款給我。」

我看到這批人在當時的嘴臉，加上我過去對共產黨的作風的憎惡，我就決定暫時隱蔽起來，有幾個朋友（如趙康民，現在也逃來香港行醫）一定問我的意見，我坦率的告訴他們：

「共產黨人不是好碰的，或許，當他們初來的時候，是可能表示一點寬大的，甚至還得借重你們對地方情形的熟悉，利用你們一陣。不過，以我對共產黨的了解，我不能不提醒你，你們這批「民主人士

「是沒有多久好混的，以後的日子就一天天難挨了。輕則吃點苦頭，重則一命嗚呼……。」

上海「解放」以後，我的預言都一一見諸事實；起初，方秋葦等人，在中共的授命之下，拉出一批地方士紳，組織了一個類似日本人時代的「維持會」，他們興高采烈，神氣活現四出「劫收」，霸佔了所有的大建築，共軍初入市的時候，因為需要他們合作，因此就放任他們為非作歹，胡作胡為，不久之後，這個方秋葦就以「偽裝前進，假借名義」的罪名被捕，從此永遠不知此人的下落。

另一個人是魯莽（原名魯覺吾，當時任上海正言報主筆，也是「和平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之一），他在上海「解放」之後，立刻在「解放日報」上刊登廣告，自稱過去如何如何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作地下工作，反對蔣某的獨裁，他的目的本來是希望藉此吸引中共的注意，向中共當局表功邀寵的，殊不知中共當局也認為他的行為過於過那個，跡近可疑，也把他逮捕，用各種殘酷的刑法要他供出「陰謀」，最後被打斷一隻腿才被釋放。

還有一個莫自新（也是「和平民主同盟」的），在上海「解放」後也突趨活躍，不久就被逮捕，後來我在上海報紙上看到他的消息，以「匪特」的罪名被槍決。

在「和平民主同盟」的熱心人士中，還有一個萬枚子，他原是軍事委員會機關報「和平日報」（原名「掃蕩報」）的社長，後來因為他的社長職務被停職，一怒而反對政府，但在參加「和平民主同盟」時，他對中共也沒有好感，而且可以說，他是極端反共的，但在「解放」以後，他却以極左傾的姿態出

現，大寫其歪歪斜斜的小詩，歌頌「毛主席」，此人用了這麼大力氣「立功贖罪」，後來也無聲無息了。

這時，我也看到過去在政府時代熱中於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的一批朋友，如王良仲，葛克信等，都突然以「前進」、「地下工作者」的面目出現，但是這批小丑，不久之後，也無聲無息了。

上海「解放」之初，也暴露出一部份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身份，其中有幾個人的事，提起來頗發人深省，這幾個人就是：

高方中，「解放」前混在張君勱的民主社會黨中，後來搞民社黨革新派，「解放」後以中共社會部的一個小頭目身份出現。

王大超，「解放」前是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辦事處的行動大隊長，到處敲詐勒索，藉勢凌人，並鎮壓真正的民主運動，他曾把我拘禁到他的隊部裏，警告我：「你再作政治活動，我就把你當共產黨法辦。」「解放」後證明他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主持審訊「反革命」案件，可謂駕輕就熟了。

盧緒章，「解放」前他是上海廣大華行和民安保安公司的總經理，絕口不涉及政治，總說：「我們生意人，不談政治。」並常和一羣政府貪官污吏在一起鬼混、花天酒地、肥頭碩腦，當時有人會懷疑過他有共產黨嫌疑，總有許多貪官污吏爲他洗脫。「解放」後他出任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貿易部副部長，

並證明他是過去上海對政府作金融鬥爭的領導者。

李劍華，「解放」前他是政府的社會局副局長，處處以好好先生的態態出現，「解放」後出任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勞動局副局長（現已被撤職，並被開除黨籍。）

這幾個人，我和蔡力行（是一個精幹的青年出版家，他經營了幾近十年的聯合編譯社，在共軍進入上海後，業務即已完全停頓。）都是熟識的。在上海「解放」後不久，蔡力行找到我。

「可怕，在上海竟有這麼多大亨都是共產黨，怪不得國民黨不垮台。」他一見到我，就這麼感慨的說。

「這有什麼奇怪，這不過和打仗一樣，靠人海戰術的成功吧了。」我對他說：「一般人祇知道中共在軍事上有人海戰術，殊不知在政治鬥爭上也一樣有人海戰術，比如像王大超，他在國民黨時代，他的職權就是專門捕殺共產黨員和左傾份子，中共拿一部份小幹部填進去犧牲，就可以使他在上級獲得信任，取得他的地位。比如像李劍華，他過去的社會局，再以前是在勞動局，主要的任務都是對付工人罷工，鎮壓罷工，中共爲了培養他在政府機關內取得更高的地位，也一樣拿一部份工人做犧牲，如法泡製就行了。這和在戰場上拿幾萬人填進去奪一個據點，不是如出一轍嗎？」

「唔，原來是這麼回事。」

「你不懂得，還是少談這些吧！」

蔡力行的話題又談到他自己身上，他說他家裡有老有小，個個都在嗷嗷待哺，現在我們別的事可以

不管，但是問題在，我們怎麼活下去。

「我們是老朋友，我和你說老實話。」我鄭重的對他說：「你來看我，我相信你至少是沒有惡意的，那麼我祇有坦白的告訴你，你要想活下去，祇有兩條路，一條是立刻離開這兒，離開整個中共的區域，另一條是立刻改名換姓，做點小工藝，把自己暫時埋沒起來，或者也可能苟活一時。除此以外，是沒有你的生路的。」

後來我離開上海以後，我知道，他並沒有聽我的話，却在東鑽西鑽，結果鑽上了一点中共文藝處的關係，恢復了私人的出版業務，爲中共賣力宣傳，不久中共就說他侵犯了「人民出版社」的版權，他登報悔了過還不算，中共又說他犯了「欺騙人民」的罪。現在被判了五年徒刑。

蔡力行也是一個聰明人，他也還算是對中共有相當了解的。我還記得，在這以前，他還對我這麼說過：

「中共的欺騙政策之所以成功，因爲他能够把握住人類的一個共同弱點，那就是，一般人都是短視的，易於沈醉在眼前的『寬大政策』的糖衣下，有幾個人能想到更遠的將來呢。」

想不到他自己也終於墮在中共的糖衣政策下了，他也是出於短視嗎？還是僅僅爲了一家嗷嗷待哺的老小，不得不跳進這火坑中去呢？

我又要重覆我在前面說過的話了，中國的悲劇，我們這羣不長進的讀書人，實在應該要負大責任。

我能爲我的朋友洗脫他的罪惡嗎？當然不能。但是他假使還勉強能够苟活到我們推翻中共政權的一天，這個老朋友將有什麼面目來再見我呢！

五八

中共的小特務們，到處在搜索我，有一個過去在中央銀行當專員的並不十分熟識的朋友吳藻溪（現任中共政務院參事，）這時找我格外起勁據說他找我的原因也是爲了要向中共當局「立功」，我實在討厭這些小鬼頭對我的糾纏，但是也無可奈何他們。這時我躲在一個朋友家裏，總有兩個多月沒有出過大門一步，有一天，我的朋友在夜深開收音機收聽短波，遭到中共當局的注意，他們派了一隊人來，翻箱倒篋，搜查了一夜，我的朋友受到警告，以後不准再收聽，這次搜查雖然沒有帶去人，但是我們已經飽受虛驚了，同時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驚弓之鳥，因爲不願連累朋友，第二天就在「解放」後的上海抱頭露面，找到另一個做生意的朋友。我一見面就直率的告訴他：「我是來找個事的。因爲現在一則生活困難，二則沒有一個事也不大方便。」

那個朋友倒很够義氣，他起先告訴我現在生意幾乎全部停頓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點貨存在那兒，就賣一段吃一段吧。這個年頭兒，你老兄談什麼找事，有碗飯就大家吃吃，你就搬到我們這兒來住吧。假如你一定要個名義，那麼我就請你當個副經理。」他很誠實的對我說。

從這時起，我就正式以一個商人身份在上海出現了。但是，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在路上碰到了劉人壽，他是在延安時我的棗園同學，如今，貴爲中共中央華東局的秘書了。

「啊，原來是×同志。」他叫了我一聲「×同志」，倒把我嚇了一跳，我對他的印象早已很模糊了，但是他還是像在延安一樣親熱的和我招呼。

「啊，你是——」我想了好一會，才記起他的名字，「啊，你是劉先生，劉人壽先生。」

「老同志了，還這麼先生先生的做什麼？」他大聲的笑着，這時我敏感的有個警覺，憑着我過去當過共產黨員的經驗，當他愈對我客氣和面帶笑容，我愈感到不安，愈覺得有些不妙。他繼續說着：「我們找你好久了，你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我們那一處沒找到，川公路，虬江路，威海衛路，卡德路，不是嗎？」

我聽到他背出這一連串的地址後，內心感到極度的緊張，但在表面上，我還極力保持鎮靜。他問我當時的地址，我爲了「安全」的理由，不願再啓他的疑竇，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了他，以後他每隔三兩天就來看我一次。

「漢年同志很關心你，希望你一定得去看看他。」像提解一個犯人似的，他就把我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仍是過去市政府的老地方，裏面亂糟糟，茶几和寫字枱堆在一邊，另外用些破

舊的木板臨時隔成許多小房子，我等候在會客室，劉人壽先過去通報了。

潘漢年搖搖擺擺的走出來，他比一般土幹部都老練得多，十足的官僚架子，他像預備好一篇訓詞似的，和我沒多說幾句敷衍話，就直截的對我說：

「你的情形我完全了解，你的路已經走錯了，你像是一個大家庭中失散的子女，現在是浪子回頭的時候了，你的個人英雄主義害了你，不過，你還年青……」

「我現在祇想做生意，對政治已經沒有興趣。」我回答他說。

「你考慮考慮，三天後再來答覆我。」

走出「市政府」後，劉人壽說要請我吃晚飯。

「我們就在附近找一個小館子吃便飯吧。」我說。

「小館子怎麼成，我請你進『五層樓』去。」

於是，他在「五層樓」大大破鈔一番，同時一面和我開起談判，他說，組織上很重視我，因為我對於反動派的情況知道得很多，「而且，你的才幹應該繼續貢獻給革命，希望你考慮回到黨的大家庭來。」

「我不是一再說過嗎，我對政治已經沒有興趣。」我說：「而且，你們問我要人民黨的名單，人民黨在一年以前就已經不活動了。再說，和平民主運動這批讀書人，他們幾乎全部靠攏你們了，別的我的確什麼都不明白。」

第四天，我又被劉人壽「押」到「市政府」去。

「你一定已經考慮好了。」潘漢年說。

「是的，我考慮過了，我對政治實在沒有興趣，我覺得做生意……」

「做生意，做生意」潘漢年立刻翻了臉，「你全是欺騙我們，根據我對你這個人，從你的性格和你的歷史上了解你，你不會有一天對政治沒有興趣的，你也不會就消極下來，你不要不識好歹，我是一片好心拯救你，要你重新做人，你如果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將來一定為反動派所利用。」

我的心是冰冷的，怎樣的甜言蜜話也打動不了我，怎樣的威脅恐嚇也對我無可奈何，我已經打定了主意，最嚴重的不過是一死吧，倘使如此，早一點或遲一點有什麼分別呢！他們用笑面把你迎過去或惡狠狠的把你綁過去，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在把你置死以前，最後再讓你苟活幾天，利用你一陣，贖你盡了對「革命」的最後一次的貢獻以後，然後再把你折磨至死或者秘密處死，這比立刻槍斃不是更不好受嗎？

但是，潘漢年的這次談話，無異是提醒了我，要想在中共區域再挨些日子也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下定了決心，立刻冒險逃出去。

五九

我在生意上做得十分起勁，一方面爲了使他們相信我確實是在做生意；一方面，由於我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熟悉，我幫這個朋友賺了不少錢，他也就更加信任我，中共一個經濟政策上的變動，我往往先幾天就有預感，我對於中共的一些知識，這時得到「學以致用」的機會，我很輕鬆的和中共在經濟上鬥法，我的朋友的生意，却因此獲得苟延殘喘了。

這時，我很早就留心到在我們公司前面，每天總是停着一部三輪車，這個踏三輪車的「同志」，別人的生意是不肯做的，我一出門就迎過來，「這簡直是你的私人包車了。」我的同事嘻笑地對我說。有時我沒有坐上他的車或者步行時，他也一路跟在我後面，這還不明白嗎？這個蠢豬，是中共特務機關的眼鏡，我應該感謝他，因爲他爲我證實了，我這時所往來的全是一批生意人，所談的也全是一套生意經。

在同一個時候，有天一個女共幹來找我，我的同事通知我，說她正等在外面。

「找我？」我詫異地問。

「是啊，正是找你。」他們顯然也有幾分新奇的感覺，「身上着的是解放軍制服，好像還是個老幹部呢。生的樣兒也蠻不錯。」

我遲疑的走出去，仔細一看，啊，正是夏森。

「夏森，夏森！」

「噢，」她沒有表情的回答我。

「你憔悴得這個樣子，唉，真是，你一定在這幾年來太苦了。」

「嗎……。」她把頭低下去，不敢正面再看到我。

「羅——」

她立刻打斷我的發問，她說「請你不要再提起他，他已經早和別的同志結婚了。」其實這時我知道夏森後來也另外和陳伯鈞結過婚，我想再問一聲：「陳——呢？」但是我從她的表情中已經看出她有隱痛，我何必再勾起她的傷心的回憶呢。

夏森繼續告訴我，她這時已經改名「章雯」，在上海做婦運工作。她從劉人壽處知道我的地址，劉人壽也要她來看我，要她再試試說服我。

「你自己的意思呢？」我似笑非笑的問。

「在我自己，我也想想試試，能影響你，轉變你，不過……。」

「不過什麼？」

「他們的意思要你先立功表現。」

「我不是對他們說過千百次嗎，我現在對政治沒有興趣，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兒，已經完全是個生意人了。」

「你懂得比我多，我是不可能說服你的，不過——」

「又不過什麼，幹嗎老是這麼吞吞吐吐的。」

「不過，你是老同志，而且他們都說你政治興趣很高，又一直跟反動派有來往，他們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我倒想知道，假使我決心不回到黨裏工作，他們準備把我怎麼辦？」

「這，我可也不大清楚。」她的一對滴溜溜的眼睛，又在我全身上掃過，像電流似的，震撼着我的心。然後，她又把頭低低的垂下去，輕輕的以同情的聲音對我說：「否則，除非你離開我們的地方。」我們之間，半晌沒有說話，終於還是由她先打破了這沉默，她恐怕剛才的話我沒有聽明白，又再重複了一遍：「否則，除非你立刻離開我們的地方。」她加上了「立刻」兩個字，藉以強調她的語氣。

當我送她出門的時候，她頻頻的回過頭來對我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革命，革命就是要殘酷的。不過像我這樣的共產黨員，已經太不够成色了。好在幸虧我祇是個女人。」

她一面說，一面用手帕在眼角上輕輕的拂了一下。

從這時起，章雲沒有再來見過我，奇怪的是，我們前的那個三輪車夫也不見了。我的生意圈子愈做愈廣闊，起先我押運了一批貨到鎮江，第二次我又運了一批貨到南昌，我都獲准

領到通行證。我在生意中，接觸過好多中共幹部，他們對我的印象都說我是個老老實實的法商人。在第三次滙兌當中，我就領了到廣州的通行證，一溜煙跑到香港來。聽說我到香港以後，我的那個對家遭到很多麻煩，他們一定向他要人，我心裏很覺難過。幸好後來他的生意在中共派公債時期，遭到破產，他也逃到香港來。爲了避他的囑告，我沒有提及他的名字，他說他的家屬都還在中共區內。

我在離開上海的前幾天，在霞飛路上碰到董時進（農業專家，現在美國），他當時正從北平沮喪地回到上海不久，我們見到後，四面張望了一陣，看看有沒有人釘在我們身邊，他告訴我，他將回到老家種田去，我告訴他，我的生意頗有發達，將一直做下去。

「哈哈，我們一農一商。」

「哈哈！」

其實我當時已經準備就要動身到香港來，董先生不久也來到香港。但在那個時候誰敢對誰說一句真話呢！



第十四章 爲民主中國堅持奮鬥下去

六〇

「解放」以後的上海，羣魔亂舞，恐怖的氣壓一天比一天低，到處坦白哪，清算哪，捕人哪，風暴一個接着一個，一個比一個凌厲。

共產黨人一向總是以自己的行爲標準去理解別人的，他們實行的是特務政治，因此他們懷疑每個反對他的人盡是特務，他們搞慣了陰謀，因此他們懷疑每個安份的百姓也都是對他們有陰謀的，他們辦任何一樣事都是「政治」的「鬥爭」的，因此他們對於教會或私人辦的學校、醫院以及一切社會慈善事業，也都認爲是屬於「政治」的「鬥爭」的反對他們的特務機關。

「坦白呀！」他們用槍尖指向每一個人。「這裏一手是「搞通思想」的令牌，一手是死亡的魔影，你選擇那一個呀！」

過去的地下強盜，這時都鑽出地面，一個個成爲公開的合法的強盜了。

「人民」呀！「解放」呀，「翻身」呀，什麼呀，這是一批說謊的人和強盜合夥打劫的世界！

我是下了決心，這次直奔香港了。再會吧，我的祖國，我的不幸的祖國。

我又在開始流浪了，一個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已經作了十五年的「亡命之徒」，我們真不幸啊，生長在這個時代，生長在這個國家。我呆望着水上的孤萍，一會兒被水波捲沒，一會兒又浮出水面，不禁淚下。我們都還是些孩子，我們失去了青春，犧牲了應該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啊！難道我們真的都是被世界所遺忘的孤兒嗎？

祖國的山河依舊是那麼令人陶醉，巍巍的山峯，一望無際的平野。我們的同胞，依然是那麼誠樸可愛，他們眼看著一個新的朝代，還不過是完糧納稅，失去了天真的表情。漸漸地，他們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又拖上山去，打起游擊來。

我懷着極度痛苦的心情，離別了我的朋友、同志們。他們都是些年青的小伙子，熱情、誠懇，而富有理想。但是他們都籌不出一筆最低的旅費，隨我一道離開。我慚愧，我難受，我沒有力量幫助他們。在途中，我默默地爲他們祈禱。期待上帝保佑我們這些年青的朋友們，他們，都是我們祖國的最後的希望啊！

有人對我說：「現在共產黨真寬大呀！」

我心裡暗自爲他們着急，一個打魚的漁夫，一定要靜靜的撒下魚網，他能丟一塊石頭在水裡，先把

魚嚇跑嗎？

有人對我說：「共產黨來了，並沒有共產呀，生意還不是一樣做嗎？」

我心裡又暗自爲他們着急，當一羣豬羊被趕進屠場的時候，沒有不留着一批批活宰的，有這樣愚蠢的屠夫，先把這些豬羊餓死嗎？

我在途中，常聽到關於反共游擊戰爭的英雄故事，感到歡欣鼓舞和雀躍，同時據我所知道這些游擊隊的發展，都是自動自發的，孤立無援的，困難重重的。當一個區域被撲滅了，另一個區域又燃燒起來，我遙向這些英雄好漢，這些祖國的優秀的兒女致以敬意。但是這時我的心際却跳出想到另一個問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有一整套的欺騙工夫，所以他能使若干人中毒，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明朗的理想和觀念，給人民帶來新的希望，則，盲目的反抗，遇到一個殘暴如共產黨的敵人，恐怕是很難有多大成效的。

「你以爲中國人民需要一個怎樣的遠景呢？」當我第一天到達香港的時候——一九四九年的聖誕之夜，我和朋友談起中共區的情形，他問。

「我們今天談遠景絕對不能離開中國現實的要求。」我說：「比如，我們談民主政治多少年了，共產黨今天也假冒民主的招牌奪取了政權，可見民主的遠景是中國人民所一致渴望的。可是真民主和假民主在現實的中國，立刻遭受到兩個考驗，如果能夠一手給人民以麵包，一手給人民以自由的，這就是真

民主。否則，像中共這樣的「民主專政」，他們帶給人民以饑餓和恐怖，這就是假民主。」

「你以為中共能在中國長期統治下去嗎？」他問。

「不可能！」我堅定的回答：「第一，一個長期依靠欺騙統治的黨，絕不可能一手掩蓋天下耳目的。第二，我不否認在初期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些富於理想的革命份子，但是這批人在歷次的黨內鬥爭中，土地革命中，內戰中差不多都死光了，現在留下的是些狡猾的黨棍子和新滲入的投機份子，黨的素質已經完全變化，他們那裏還配說得上革命。第三，中國人民經過這次巨變，固然多一重災難，但是也未嘗不可能澈底從噩夢中甦醒過來。」

這天晚上，我雖然極度疲乏，但是也極興奮。逃出了鐵幕，像小鳥回到了天空，游魚躍入了大海，自由，這是多麼可貴啊。我遇見每一個人都要向他訴一訴我心中的積怨，我像是一個聖潔的少女的心，過去被毛澤東這羣野獸強姦了。現在，我要控訴，向自由世界的人士控訴。

我苦口婆心的向每一個朋友剖視共產黨的真相，分析共產黨的欺騙，指出中共最後必然失敗。無論他們信與不信——因為當時的香港還相當混亂，中共還在進行「寬大」的釣魚政策，誘人上勾，不少人還在做「靠攏」夢呢。

到香港不久以後，我有一件最使我難過的事，我的好友毛健吾（他是前南京、漢口、衡陽等地大剛報的總社長，是中國民營新聞事業中一個傑出的人材。）終於不聽我的勸告，北上「靠攏」了，我記得

我們在最後一次談話中，我還屢淚俱下的對他說：

「在共產黨人那些最苦的日子裏，打游擊，困稻草，忍飢耐寒，冒着生命的危險，我和他們共過患難，但是當他們一天飛黃騰達，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來以後，我毅然的脫離了他。你以為我離開中共是出於懶惰嗎？你以為我今天的反共是出於自私嗎？你是知道我過去的全部遭遇的，你以為我還不夠了解共產黨嗎？你一定要自投羅網我也沒有辦法，但是，老朋友，我不能不對你作一次最後的忠告，你現在已經站在懸崖的邊沿，一失足之下，你就要粉骨碎身，我們這一次的生離也就變成死別了。」

「但是，這個社會充滿了欺詐……。」他很淒然的對我說：「而且我的錢現在全被人騙光了，現在，你為我想，不回去的話，我的生活又怎麼辦呢？」

我默然很久，最後我還是嚴肅的對他說：

「祇要我們的意志堅定，怎樣苦，我們總可以活下去。」

「那我倒不如回大陸試一試再說了。」他不得已的說：「總之這個百孔千瘡的社會，是沒有救的了。」

「不，我不是這麼想。」我堅定的這麼說：「我從來沒有為這個不合理的社會辯護過，而且我們也沒有必要這麼做。問題是，那一個社會是更不合理的。」

「但是，他是一種理想。」

「任何一種幌子，任何一種理想，任何一套好聽的名詞，如果受到獨裁者個人的意志所支配，那一定就要走樣了。」

「那麼，你以為要怎麼樣？」

「我以為，我們首先要決心推翻這個獨裁政治，其次要大胆的有信心的去追尋一個更高級的理想，創造一個真正合理的社會。」

「這個理想現在在那兒？」

「這，正需要我們自己去重新摸索，去創造呀，我們能等待什麼救世主嗎？我們能閉門造車嗎？都是不可能的。我以為中國的民主事業需要一步步從頭做起，這，首先需要恢復我們的信心，發揮創造精神。」

「我們不行了，太老了。」

他說着這句話時，聲音有點嘶啞，他的太太在一邊聽着，也不斷的用手帕擦着她一對紅腫的眼睛。我們就這樣說聲「再見」了，海角天涯，鐵幕深垂，我常常低首思念我這位故友，但是，朋友，我們能再見到嗎？我們將在戰場上相互撕殺嗎？我應該寬恕你嗎？

從毛健吾回到大陸以後，我痛苦了好一個時候，我深深的感到，我們的失敗是由於在精神戰線上已經被敵人全部瓦解了。特別是我們這批知識份子中間，必須首先從重建起我們的思想武裝着手，因此，我決心從事自由文化工作。

在香港，我見到過多少難友，他們終日奔波，不得一飽，天天在爲着最低的生活問題而苦惱，他們呼號無應，告貸無門，請纓無方，求職無路，他們在飢餓，疾病，死亡中遭受磨折，這一個不幸的時代啊，假如我們的祖國今天不遭受如此深重的災難，他們一個個都是生龍活虎一樣的英雄，建設國家的棟樑。

我們歌頌民主國家的自由，但是在這裏也有失業的自由，飢餓的自由，每一個人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就像投身在汪洋大海中，有人幸運的泅至岸邊，也有人在驚濤駭浪中被吞沒，這個社會給我們什麼保障沒有呢，沒有。有些意志不堅的朋友，他們望着海中的巨浪，動搖了，發抖了。「我們今天正像是一艘在海洋中擊毀的大船，全船的乘客今天都漂泊在海洋上，有人抓着一隻救生圈，有人握着一塊木板，有人在水中呼救。這時，大大小小的救生艇駛過來，他們都齊聲在叫：『快上我的救生艇呀！』但是，當有些求救的人趕來的時候，艇上的人却推開了他們：『滿啦，滿啦，裝不得了。』其實，這些救生艇有的根本就沒有救過一個人，有的他們還想在水中撈些求救的人的財物呢！」有位朋友對我說。

我對他的話，有些不解，連問：

「這是……怎麼回事？」

「啊，你不知道，香港有的儘是怪現象。」他依然含混的說，我當時迄未明瞭他的意思。

有次我在「星島日報」上看到一則小廣告，內容是「徵求文友」，這小廣告登了很久，爲了好奇心驅使，我當即寫信去應徵，幾天後回信約我在一個茶樓晤面，我當時總以爲對方一定是個青年朋友，或者談些合作辦刊物的事。豈知一見面之下，他却是一位六十以上白髮蒼蒼的老先生，身穿一件破舊的夏威夷，一雙皮鞋已經穿得「空前絕後」。據他身邊的一個人告訴我，這位老先生過去是留美學生，農業專家，當過多年教授，現在正在推行「良心運動」。

推行「良心運動」？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正奇怪的加以推測。老先生的說教這時已經開始了：「我們的良心運動是什麼呢？我們覺得要救中國，首先要從中國的讀書人澈底覺悟做起，做學問要做些實事求是的真學問，讀書人不要儘在騙人上用功夫。中國過去爲什麼弄得這麼一團糟，讀書人個個說謊，地位最高的人，說愈說得大，小騙子騙無知的百姓，大騙子騙小騙子，一個騙一個，騙過來，騙過去，好了，現在碰到一個更大的騙子，大家都完了……。」

我問他「這最大的騙子是誰？」他微笑的對我說：「我是不談政治的，我祇談良心運動，我「徵求文友」的目的，祇想對每個讀書人說，祇要大家不再說謊，中國就有救了。」

我起初覺得他有幾分神經質，後來聽他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我逐漸增加了對他的敬意。我看了看他

的破皮鞋，好意的提醒了他一聲：

「老先生，你化了許多錢登廣告，爲什麼自己不買雙皮鞋呢？」
他鄙視的看了我一眼，我慚愧的低下頭來。

這位古怪的老頭子，我很遺憾的忘記了他的姓名，他是我兩年半來在香港的流亡生活中，最值得追憶和紀念的一位老人，我爲他的健康祝福。

我在上海的一羣朋友，後來我在香港陸續的知道他們一部份的消息，林益聖在浙江打游擊，尹傑在湘贛邊區領導了一支相當強大的游擊部隊，我很興奮，也爲這些朋友感到驕傲，不過幾近一年以來，我已經又得不到他們的消息了。

有些朋友到香港以後，生活無着，他們就在馬鞍山打石頭，以自己的勞力換取生活，剩餘的時間就埋頭讀書，看到這批朋友刻苦努力的精神，我增加了百倍的勇氣，他們帶來了祖國未來的希望，他們也給了我更高的生命的力量。

年青的人們在嚴肅的工作，年老一輩的人們，他們過去做過大官的，當過將軍的，他們的想法就不同了，他們以爲，將來反攻大陸以後，做院部長的還是做院部長，帶兵的還是帶兵，他們現在手上帶着錢，在香港過寓公生活。他們手上又捧着一大堆「資歷」嚇唬年青的人們。他們常爭吵，但是吵的却不是爲的建國大事，而是爲的……

「在這些老頭子中間期待一個真命天子出現嗎？他們有的是頭腦糊塗，不知民主為何物的多烘先生。有的是自私自利，投機取巧，目光如豆，胆小如鼠的策士，「教主」和「大師」。有的是自命不凡，獨個兒閉起門來開名單發號施令的精神病態者……。」有一個朋友這樣說。

「原諒他們吧，他們也實在上了年紀了，晚年總要發揮一下坐而論道的癮的，看來他們談一千年也談不完，反正他們也都快歸天了……。」另一個朋友說着風涼話。

「不行，」又一個朋友接上去尊脆的說：「他們委實一點作為都沒有，我們要他們讓開路，我們今天不是要以一個偶像代替另一個偶像，以一種教條代替另一種教條，中國今天的反共鬥爭需要新血液，新智慧的創造，讓年青一代的人挺起胸脯，接應上去，負起責任來。」

一個知識份子最愉快的事，莫過於澄清了自己的思想，在脫離中共以後，我真正最快樂的日子莫過於現在。我摸索過很長一段的「中間路線」，徒然給我不斷帶來無謂的煩惱。事實證明，「中間路線」無論偏左，偏右或者絕對中間，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我又為內戰而感到痛苦過，也是「中間路線」給我拖下的尾巴。殊不知對付共產黨人，祇有一條路，堅決的和他鬥爭。否則，你一定始終在共產黨人的迷魂陣中兜圈子。既想反共，又要中間，能不自尋煩惱？我在香港公開寫文章反共以後，我覺得一切反而不似過去那麼心猿意馬，彷徨不定，要怎麼說就怎麼說，精神上輕快許多。我認定了這個反共戰爭是個義戰，我的責任就是對這罪惡的中共政權口誅筆伐，為這個神聖的戰爭而服務。

我在有次一個聚餐會上，朋友們提出幾個有關中共的問題問我，我的答覆我以爲值得很在認真，作爲我今天對於中共的認識的一個總結。

問題一：中共的特質是什麼？

答：中共的特質是軍閥主義，流氓主義和野蠻的專制主義的混合物，這也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表現軍閥主義的就是，毛澤東始終迷信「武裝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表現流氓主義的就是，他們善於運用政治上的機詐和無賴；表現野蠻的專制主義的就是，布爾雪維克的軍事性的黨的組織，和澈頭澈尾的特務政治。

問題二：中共可能狄托化嗎？

答：如果指毛澤東，絕不可能，毛澤東的偽政權，是由蘇聯所一手扶植。毛澤東粉墨登場的第一天，就宣布了「一面倒」，這是表示他和他的一幫已經死心塌地作了史太林的鷹犬。中共和南共的發展有個基本的區別，南斯拉夫共產黨從反抗異族侵略者，領導民族鬥爭中發展壯大，所以黨員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而中共則不同，中共靠內戰起家，一貫與自己的同胞爲敵，一般的黨員對於民族意識比較模糊。所以要期待中共整個黨轉變或狄托化是絕不可能的。倘使某些中下級中共幹部起義，出現一批小狄托，反抗俄帝和中共的領導機構，則是可能的。

問題三：中共勝利的基本原因何在？

答：原因甚多，但是基本原因是由於中國文化的貧乏，中國文化在動搖了舊的基礎以後，始終沒有換上民主主義的正路，青年多在苦悶中彷徨，尋求刺激，而麻醉品就易大量傾銷了。民主主義是唯一對抗共產主義細菌的抗毒素。假如我們的國家過去像個樣子，多培養一批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青年們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創造的機會，則中共絕對無隙可乘。

問題四：你以爲中共會自行崩潰嗎？

答：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份，是不應該孤立起來的。整個世界是向着戰爭之途邁進。假使世界局面澄清，中共自然會更快的崩潰。假使世界不戰不和的局面拖下去，中共問題也不是期待敵人自行內部崩潰，而是決定於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反共力量的成長。我們不否認，中共內部有矛盾，有危機，但是科學的態度，應該對敵人作十分客觀的估計，在目前敵人還有可能克服他的危機。不過一個克服下去，又可能由此產生另一個新危機。比如說，中共控制大陸以後，最大的危機是軍事危機，前面說過，中共是一個軍閥主義的黨，軍人認爲憑他們打出了天下，自恃跋扈。解決軍事危機的途徑不外兩個，一個是肅軍，一個是繼續打仗，給軍人發揮的機會。在中共參加韓戰以後，雖然暫時克服了軍事危機，但是浩大的赤字，却帶來更大的財政危機，於是他們又用「五反」來搜括工商界。克服了財政危機，却又帶來了更大的生產危機。於是南漢宸（中共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莫斯科簽訂了新的貸款協定。總之，中共自行崩潰一時絕不可能。因爲危機的發展，也同時帶來一個因素，使中共向蘇聯靠得更緊，使史太

林對於中共黨內的矛盾，更便於運用。

問題五：如何打敗中共？

答：擊潰中共的武力或者並不太難，但是要澈底打敗中共，這不是單靠武器所能濟事的，我們必須瓦解敵人的思想戰線，和建立我們的精神戰綫。我以為，頂重要的是兩件工作，第一是提高中國人民的自信心，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第二是思想的消毒工作，這種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不是一把火把共產黨的譽燦光，而是積極的給他們更美麗的遠景，使他們認識民主主義的優越。使每個人民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體驗中，受到民主制度的恩賜。

x

x

x

x

我和共產黨之間，第一個階段，我因迷信和盲從，開始附和過他。第二個階段，我由人性的覺醒，開始背叛了他。第三個階段，我由理性的選擇，開始與他鬥爭。實際上，我早已和共產黨公開宣戰了。但是，當我執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心中不時仍有情感上的微波起伏。就我個人來說，無論在理智上，在情感上，我是不願意把一般普通的中共黨員看作敵人的，因為從我自己過去切身的經驗中體會到，他們是一羣可憐虫，我與其說恨他們，毋寧說是應該同情他們。有些年青的黨員熱情而有作為，他們雖經過中共一再的「思想改造」，相信他們還沒有完全失去人的智慧。他們對於舊社會舊中國的革命熱情，本來是一股民族的活力，可惜他們為毛澤東這批黨棍子所利用，作了少數野心家的工具，成了異族

剛暑者的犧牲品。但是作爲一個共黨產員，他們祇有閉着眼睛跟着黨的路線。他們絕不可能表達自己真實的意志，絲毫影響黨的政策。除非，他們有足够的勇氣和週密的計劃，豎起叛旗，或者逃出鐵幕來。我深知道他們內心是痛苦的，我不願見到他們隨着共產黨的領導機構把他們一天天帶上絕路。自由世界一定要勝利的，俄帝和中共是必然崩潰的。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搶救這些迷途的青年共產黨員，多爲國家留一分元氣。

——完——

亞洲出版社出版書籍簡目

類別	文報告	翻譯名著	人物傳評	專題研究	文學創作	文報告	文報告
書名	鬥爭十八年	中國赤潮記	魯迅正傳	蘇聯能戰勝嗎？	憤怒的羅崗村	毛澤東殺了我的丈夫	太湖兒女進行曲
作者	司馬璐著	<small>雷震遠神父合著 愛連，科巴利，崑</small> 李潘郁譯	鄭學稼著	馬伯樂著	余乃玉著	許瑾女士著	東方微白著
定價	港幣二元五角	港幣二元五角	港幣二元	港幣一元五角	港幣二元五角	港幣二元	港幣一元五角

亞洲出版社即將出版新書

連環圖畫			報 告 文 學			翻 譯 著 名	專 題 研 究	文 學 創 作	類 別
								書 名	作 者
烏 龍 王 獻 妻 記	烏 龍 王 靠 攏 記	突 擊 南 日 島	潮 汕 淪 陷 三 年	飛 越 三 大 洲	回 向 人 道	陝 北 奴 工 營	隔 牆 有 耳	中 共 財 政 解 剖	鮑 烏
雷 雨 田 繪	雷 雨 田 繪	蔡 漢 生 繪	蔡 慕 華 著	蘇 源 昌 著	孟 伯 謙 著	蘇 偉 權 著	李 潘 郁 譯	何 雨 文 著	田 義 仁 神 父 著
港 幣 八 角	上 集 港 幣 八 角 下 集 港 幣 八 角	港 幣 六 角	港 幣 二 元	港 幣 二 元	港 幣 二 元 五 角	港 幣 二 元 二 角	港 幣 二 元 五 角	港 幣 二 元 二 角	林 適 存 著
									定 價

著者 Author 司馬路撰

書碼 8569
Call No. 8434

書名 Title 鬪爭十八年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3295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三二	杜渝		

中華民國四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書碼 8569
8434 登錄號碼 00329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鬥爭十八年

全一冊基本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 司馬璐

出版者 亞洲出版社

發行者 亞洲出版社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八十八號

印刷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香港高士打道六十六號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再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3295



價定本基

承印者：東南印務出版社

天 人 道 義 行



000003295